# 大汉兴亡四百年 2

与其说是大汉王朝400年精彩绝伦的兴亡史，
不如说是2000年疆域版图、统治思想、文化凝聚力的奠基史。

李金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大汉兴亡四百年 2

与其说是大汉王朝400年精彩绝伦的兴亡史，
不如说是2000年疆域版图、统治思想、文化凝聚力的奠基史。

李金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大汉兴亡四百年2

与其说是大汉王朝400年精彩绝伦的兴亡史，
不如说是2000年疆域版图、统治思想、文化凝聚力的奠基史。

李金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目录


第一章 悲情天子

梦魇时光

萧规曹随

匈奴来信

吕氏封王

第二章 女主天下

宿命难逃

喋血王冠

南越难题

二帝并立

第三章 王者归来

致命魅影

将相联盟

左袒兴刘

意外赢家

第四章 仁君祸心

赏罚不公

周勃罢相

王子复仇

杀人无形

第五章 王朝密码

学者丞相

五行学说

德性之争

背后奥秘

第六章 双面帝王

劫后重逢
不留情面
意外难题
敢于碰硬
第七章 匈奴方略
依法办事
晁错方案
移民政策
蚍蜉力量
第八章 寂寞英雄
持节云中
快意人生
问卜长安
遭谤去国
第九章 残酷真相
时空对话
言外之意
医患纠纷
修法事件
第十章 多事之秋
兵归细柳
新朝气象
一语成谶
家宴风波
第十一章 七王之乱
父子诀别
白首起兵
秘密谈话
朝衣斩市

第十二章 黎明时分
死而后生
大侠相助
后发制人
曙光降临

# 第一章 悲情天子

## 梦魇时光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长安。汉高祖驾崩。

新皇帝登基大典在未央宫举行，十七岁的太子刘盈被拥立为大汉帝国第二代天子，是为汉惠帝(汉朝自刘盈起，除光武帝刘秀外，去世后谥号都加孝字，刘盈谥号全称为孝惠皇帝，但一般习惯上都用简称)。

惠帝是个苦孩子，幼年懵懂之际，父亲便抛下他们母子三人离开。三人生活在沛县丰邑中阳里老家，整日过得提心吊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就是一座山，是一棵大树，是依靠的臂膀，是力量的源泉。

然而，惠帝的童年是缺少父爱的。

他再次见到父亲时，正值彭城兵败。吃了败仗的高祖匆忙路过沛县老家，带上一双儿女一起跑路。可是当时楚兵追得急，仓皇之际，高祖为了跑得更快，不惜将刚刚带到身边的儿女推下车去，要不是夏侯婴执意带上他们，惠帝和姐姐恐怕早就夭折于乱兵之中了。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惠帝跟着高祖到了关中，被立为太子。那一年，他刚满五岁。

然而，被立为太子后，他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最需要的是父母的疼爱和一个温暖的家，但他统统没有。

那几年中，母亲被项羽俘虏到楚营，生死不明，父亲长年在外征战。惠帝独自一人生活在栎阳，活得就像一个孤儿，周围陪伴着自己的都是一些宦官。

楚汉战争结束后，母亲虽然回来了，但数年的离别使母子二人几乎成了陌生人。

楚营的人质生涯，使得吕后性子大变，她变得阴毒、冷酷、强势，不管惠帝怎么努力追忆，都很难将眼前这个女人与记忆中慈爱的母亲联系到一起。

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始终冷冰冰的，形同路人。父亲将所有爱都倾注到另外一个女人戚夫人和她所生的刘如意身上，看自己的目光始终是轻蔑、疏远和失望的。

童年的家庭生活氛围，对一个人的性格塑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惠帝在这种孤独、无助、缺少关爱的压抑气氛中长大，犹如一株野草，一天天熬着。他能平安长大，已经是人间奇迹。

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使惠帝变得怯懦、敏感，严重缺乏安全感。

惠帝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弃儿，父亲早年曾毫不犹豫将自己抛下车去，后来又打算驱赶他去征讨英布，准备把他丢弃在战场上。

要不是周昌、叔孙通、张良等一帮臣子拼命护着，他这个太子说不定早就被废黜了。庆幸的是，他支撑到了最后，终于熬到高祖去世。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父亲去世是一桩悲痛哀伤之事，但对于惠帝来说，恰恰是解脱，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当他坐上高高在上的皇帝宝座时，才发现，即使做了皇帝也依然快乐不起来。

因为做了皇帝，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天子，感到很惶恐。名义上，他现在是大汉王朝最有权力之人；但实际上，他现在除了拥有皇位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做不了主，什么都干不了。

有一团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他心头，他根本无法摆脱。

阴影背后站着的人，正是他的母亲，大汉的皇太后吕雉。

朝堂上的事，由一帮先帝时期遗留下来的老臣做决定。论年纪，他们差不多都是惠帝的叔伯辈了。

尽管表面上他们对皇帝恭恭敬敬，但实际上，这些人依仗资格老，根本没把少年皇帝当回事。

且不说萧何、陈平、周勃这些功勋卓著的老臣，就是叔孙通这样的腐儒也要对他说三道四。鉴于大汉的礼制都是叔孙通制定的，所以惠帝即位之初，就任命叔孙通为奉常(列位九卿，秩中二千石[1]，掌宗庙礼仪祭祀，景帝时改称太常)，制定宗庙的礼仪之法。

由于皇帝居未央宫，太后居长乐宫，惠帝每次拜望吕后，都要净街，百姓避让。次数多了，惠帝有点不忍心，觉得不能因自己出行而干扰百姓的日常生活。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从未央宫到长乐宫之间修建一条空中通道，这样一来，既不用上街扰民，又方便到母亲那里问安，可谓一举两得。

国家大事你们看着去办，这种小事朕总做得了主吧。

说干就干，惠帝立刻让相关官员着手修建，工程上马后，进度顺利，没多久，已修了一大半，惠帝感到很满意。

可没想到，就这样一桩小事，也招来叔孙通的反对。

按照礼制，高祖去世后，他生前所用衣冠，每月都要从寝宫送到高庙(祭祀高祖的宗庙)举行祭祀仪式，完毕后，再原路送回来。

而空中通道恰好跨越通往高庙之路，这就意味着，在空中通道建成后，每一次祭祀，迎送高祖衣冠的使者都要从通道下面穿过。

叔孙通指出，子孙行走在上方，而让先帝衣冠从下面通过，实在大不敬。

惠帝一听，这可如何是好，要不干脆将建了一半的工程停工拆了吧。

谁知，叔孙通却说不能拆!

惠帝有点尴尬了，修建违礼，拆除又不成，到底要如何才对？

叔孙通说："皇帝是不会错的，即使出现失误了，也不能承认，因为整个天下的人都在看着陛下您的一举一动，所以，空中通道还要修建下去，但高祖衣冠绝不能从通道下通过，怎么办？好办!在渭水北边再建一座高庙，这样一来，高祖衣冠无须过通道下方即可送达新庙祭祀，既不违背礼制，又彰显了陛下的孝心，可谓两全其美。"

叔孙通曾担任太子太傅，为保惠帝的太子位，不惜以死相争。但他绝不是个好老师，一面给惠帝灌输皇帝不能认错的歪理，另一面又挫伤了少年天子好不容易独立办事的一点自信心。

与惠帝的毫无实权相比，吕后现在已经被权力所控制，近乎歇斯底里。长期以来困在内心的权力野兽，在她胸膛里肆意横冲直撞。

残酷的人生经历，使得她现在除了权力之外，什么都不信。

目睹了吕后铲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后，群臣算是领教了吕后政治手腕的老辣，萧何等人被迫选队，站到吕后一边。

在吕后的威慑下，许多人做事时，都不得不好好掂量一番。

高祖临终前，曾派陈平、周勃前去燕、代军中处死樊哙，两人正是迫于吕后权势，首鼠两端，最终才置皇帝命令于不顾，擅自做主，将樊哙押回长安。

结果押送樊哙的囚车还没到长安，却传来高祖驾崩的消息，陈平松了一口气，暗自庆幸成功利用时间差保住了樊哙的性命，回去后总算可以向吕后有个交代。

转念之间，他又马上紧张起来。

虽冒着曲解皇帝旨意的极大风险，保全了樊哙，但他此次逮捕行动，已经招惹了吕媭(樊哙之妻、吕后之妹)。此刻，说不定她已向吕后进谗言，要除掉自己了。

陈平明白现在情形十万火急，绝不能再耽搁了，必须马上行动，第一时间见到吕后，向她解释清楚才行，好让吕家姐妹明白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

若晚一步，恐怕身家性命难保。

事不宜迟，他驾上驿站车马，先撇下樊哙，独自一人先行一步，心急火燎地往长安赶。

走在半道上，陈平迎面遇到朝廷派来的使者，传诏命他和灌婴先驻守荥阳。

坏了，陈平心中暗自叫苦：吕后开始提防自己了。

接过诏书后，他并没停下来，而是继续快马加鞭往长安跑。

抵达长安时，高祖遗体尚未出殡。

在这新旧交替、重塑权力格局之际，绝不能有丝毫的迟疑，陈平顾不上车马劳顿，也没回家洗把脸，直接驾车跑到宫中。

入宫后，陈平冲到高祖灵前号啕大哭，越哭越伤心，在旁守灵的吕后本来对陈平有着满腔怒火，但渐渐被他哀伤的神情打动了，不由得心头一软，气消了一半。

陈平边哭边用眼角余光观察吕后，看她脸色缓和了许多，觉得火

候差不多了，再表演就过头了，便停住哭声，满脸悲戚地向吕后解释了逮捕樊哙的全过程，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良苦用心表达了一番。

吕后听完后，气色好了很多，表示体谅陈平的不易，宽慰了几句后，让他先回家休息。

陈平心想，如今的吕后，情绪极不稳定，难保他前脚刚出宫门，后脚吕媭在她耳边一煽风点火，马上就会变卦。此刻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留在吕后身边。

他态度坚定地表示，大行皇帝刚去世，内外千头万绪，在这时刻，臣哪有心思休息，无论如何都要留在宫中，担任警戒任务，以保证不出乱子。

大行皇帝新丧期间，宫中确实是需要陈平这样一位重臣来稳定局面。吕后看他态度很坚决，便答应下来，命他暂时署理郎中令，顺便好好辅导少年皇帝。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陈平一直待在宫中，陪伴在惠帝身边寸步不离，总算平安落地，保全身家性命。

至于樊哙，等押送到长安后，被立刻释放，官复原职，俸禄和待遇都维持不变。

朝堂上，基本还保持着高祖末年的权力格局。萧何身体多病，已较少露面，各衙署按部就班地运行，没有大的变故。

不过，平静是暂时的，一场权力斗争的风暴即将到来。

果然，过了没多久，吕后就出手了，将毒手伸向了戚夫人。

在吕后看来，导致自己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都是这个女人。高祖尸骨未寒，她就下令将戚夫人囚禁到永巷(宫中长巷，为幽闭宫女之所)。

那一刻，长期积压在吕后心头的怨恨爆发了，她毫不保留地全部

倾泻到戚夫人身上。戚夫人失去了高祖的庇护，就如一只柔弱的小猫，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

皇家后宫，自古就是女人的战场，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腹黑心狠，相互撕咬，不到最后，谁也难以保证谁才是最后赢家。

作为宫廷斗争的失败者，戚夫人如今唯有默默忍受吕后的肆意欺凌羞辱。华贵服饰和满头珠翠被悉数剥除，她被迫换上一身土红色粗布衣服，一头如瀑长发，也被剃了个精光。

这还不算，戚夫人被强迫到舂米房做苦役。

戚夫人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哪里吃得了这苦？她劳累不堪，整日以泪洗面，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此时此刻，她特别想念儿子刘如意。

只是，现在刘如意远在千里之外的赵国，音信难通。

夜半时分，戚夫人望着窗外的月光，思子心切之下，一边舂米，一边哀伤地吟唱：

我儿在做王，

为娘我为奴，

没日没夜，舂米到天亮!

唯有死亡与我做伴，

儿与我，关山相隔三千里，

有谁能替我捎信给你？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幽怨的歌声在寂静的庭院间徘徊，被人听到后，立刻传到吕后耳

中。吕后一听火冒三丈，怎么，还想指望你儿子撑腰？好，这就让你们母子团圆!当下派使者去赵国，传赵王刘如意入京。

赵国国相周昌目光如炬，一眼就识破了吕后的用意，直接对使者把话挑明了："我奉高祖遗命照顾赵王，太后怨恨戚夫人众所周知，现在召赵王，摆明了就是要斩草除根。劳烦您回去后转告太后，就说赵王生病了，无法远行!"

吕后不死心，三番五次派使者去催刘如意。

不过，周昌愣是一口咬定赵王病了，不能出门。

吕后非常恼火，但一时也没办法。她算是看出来了，要除掉刘如意，必须先搬掉周昌这块绊脚石。

很快，周昌接到京城来的命令，让他到长安述职。周昌明知道这是吕后的调虎离山之计，但也无奈，只得奉命上路。

果然，周昌前脚刚到长安，后脚吕后就再次派人去征召刘如意。没有了周昌在身边周旋，刘如意只得跟着使者动身。

吕后这么大动作，惠帝自然也知道了。

惠帝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知道吕后不怀善意，就主动跑到霸上迎接刘如意。哥儿俩一起同车返回京城，此后，两人同吃同睡，形影不离。吕后恨得牙痒痒，但苦于投鼠忌器，一时也无法对刘如意下手。

日子一天天过去，几个月转瞬即逝。时间一长，惠帝以为吕后已经死心了，便放松了警惕。

有一天早晨，天色刚亮，惠帝外出打猎。

刘如意还是个小孩子，贪睡恋床，不想起来，惠帝只好将他一人独自留在宫中。惠帝以为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想必母亲的怒火已经平息了，也没太多想。

其实，他哪里知道，吕后的目光从来就没从刘如意身上离开过，始终在暗中盯着宫中的一举一动。

一得知儿子出宫，吕后立刻命人带上一壶毒酒，急急匆匆赶到刘如意住处。刘如意此时尚在睡意朦胧中，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灌入毒酒，很快一命呜呼。

待到惠帝晨猎结束返回时，刘如意早就没了气息。

不幸的人面对不幸的人，总有一种自我心理投射。刘如意的死，让惠帝不由得联系到自己的人生遭遇，一时间陷入自责和痛苦之中，久久难以自拔。

而此刻，吕后正在享受复仇的快感。如意已死，等于斩断了戚夫人活下去的最后一丝念想，然而，吕后并不着急让她马上去死。

死未免太便宜了她，吕后要像猫玩耗子一般，慢慢折磨她，要让她感到死亡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吕后下令，将戚夫人斩断手脚，剜掉眼睛，熏聋耳朵，再给她灌下哑药，然后将她丢到厕所里。

这是怎样阴暗、恶毒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千载以下，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由于长期的压抑，吕后心理已完全扭曲，她近乎无法抑制这种变态的仇恨心理，复仇的快感让她无比兴奋。她不满足于独自享受这种感觉，决定让儿子和她一起分享。

数月后，吕后邀请皇帝去看自己的杰作——人彘(彘，即猪)。惠帝不知底细，怀着好奇心理，陪着吕后一起去观看。

眼前的情景让惠帝大吃一惊，但见一个肉球在粪坑中蠕动，脸上两个空洞，唯有嘴唇还在一张一翕。那一瞬间，他觉得胃部好像被大手猛地攥了一把，感到一阵眩晕和恶心，差点没吐出来。这哪里是什

么人彘？分明就是个人!

半晌他才定下神来，一问左右，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人彘，正是戚夫人。他当场情绪失控，不由得大哭起来。

惠帝本来就文弱胆小，哪里受得了这般刺激？眼前的惨状，给他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此后每当合上眼，脑海中浮现的都是那张长着空洞双目的面孔，吓得他瑟瑟发抖，难以入眠。很快他就一病不起。

一年过去了，惠帝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吕后带着惠帝去看人彘，本来是抱着教育儿子的态度，意在告诉他，为娘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你臭小子？别不识好歹，胳膊肘往外拐，要是失败的是我们，恐怕今日沦为人彘的不是戚夫人，而是我们母子二人!

谁承想，教育儿子不成，反而将他吓出了一身病。

经此事之后，惠帝身体再也没有好转，对人生，他已绝望了，善良的他，实在难以承受人性之恶，而释放恶之花的正是他的亲生母亲!

这个少年皇帝，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脆弱，就算他是皇帝，又能如何？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让他感到疲惫和无奈。

他再也不想过问政事，并派人给吕后捎话："将活生生的人做成人彘，这样的残忍之事，实在不是人干的。作为太后之子，我实在没能力治理天下，往后的事太后您自己看着办就好了。"

万念俱灰之下，少年皇帝整日将自己泡在酒色之中，唯有美酒和美人相伴，才能使他暂时忘却痛苦，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之下，他才能找到活着的意义。

日复一日，放纵的生活，渐渐掏空了他年轻的躯体，他再也无法缓过来了。

# 萧规曹随

除掉戚夫人和刘如意后，吕后的安全感并没有增强，她反而愈加感到不安，凡是会对自己权力构成潜在威胁之人，都被她列为下一步清除的目标。

高祖身后共有八个儿子，除了惠帝刘盈为吕后所生外，其余七人皆为别的姬妾所生。如今刘如意已死，尚有六人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为诸侯，分别是齐王刘肥、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燕王刘建。

如今儿子做了皇帝，自己贵为太后，但吕后的被迫害妄想症却愈发严重，总觉得有人想要夺取她手中的权力。为了保证儿子的皇位绝对稳固，她必须设法铲除惠帝的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

所有皇子中，吕后最嫉恨的就是齐王刘肥。刘肥是高祖的庶出长子，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到齐地，下辖七十余城，是诸王中势力最为雄厚的一位。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冬十月，时值岁首，天下诸侯到长安朝见天子。正规朝贺仪式结束后，惠帝留下刘肥，想一家人在一起热闹热闹。

惠帝为人心地善良，觉得刘肥常年远在千里之外的齐国，难得见一次面，好不容易一大家子聚齐，想设宴款待一下这位大哥。

既然是家宴，就没必要太拘束，一家人在轻松氛围中，快快乐乐吃顿饭比啥都强。筵席安排席位之时，惠帝提议按照年纪长幼排列即可，至于朝堂上那些君臣礼仪，可以暂时放到一边，才显得亲近自然些。

因此，在安排席位之时，惠帝觉得刘肥是兄长，就应该坐在上首，自己在一旁陪坐。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安排，却给刘肥招来杀身之祸。

吕后一见座次安排，不由得怒火往上冲，你这个庶出的孽子(刘肥是刘邦私生子)，怎配坐在我儿子上首？当场二话不说，直接命人在刘肥面前桌上端上两杯毒酒，让他给自己敬酒祝寿。

刘肥毫不知情，举杯站了起来。

吕后对用毒酒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法，早已得心应手，赤裸裸地毫不掩饰。或许是有了刘如意被毒死的前例，惠帝出于本能，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当刘肥举杯之时，便同时端起了另外一杯毒酒，也站了起来。

吕后见状大惊失色，立刻冲上前，一巴掌打翻了儿子手中的酒杯。

刘肥再傻，也看出酒有问题了，当下佯装酒醉，提前离席出宫。很快，他便打听到吕后在酒中下毒，想要毒死自己。

怎么办!怎么办？刘肥急得团团转。这些年来，吕后心狠手辣的手段，他可是耳闻目睹了许多，无论是韩信、彭越这样的悍将，还是刘如意这样的先帝骨肉，一旦被她盯上，就很难逃出生天。

看来此次能否活着离开长安，已经是个未知数。

值得庆幸的是，刘肥成了例外，意外逃出了吕后的魔爪。这应该归功于此次随行进京的齐国内史士(内史为官职，负责管理诸侯国内民政事务，士为名，另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该内史名勋。此处从《汉书·高五王传》)。

“大王可知太后为何恨您？”内史士问刘肥。

刘肥惊魂未定，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原因很简单，太后只有一子一女，即当今皇帝和鲁元公主，鲁

元公主食邑不过数城，而大王您却坐拥七十余城，岂能不招人恨？为今之计，您赶紧献上一郡之地给太后，作为公主的食邑，只要讨得太后欢心，大王您自然就平安无事了。”内史士为刘肥指了一条明路。

为了保命，别说割城献地，就是割肉，刘肥也舍得，他赶紧将城阳郡献了出来，并尊鲁元公主为齐国的王太后，等于将这位异母妹妹尊为长辈了。

见刘肥如此知趣，吕后感到非常满意，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心情一好，就不再嫉恨刘肥了，还特意在刘肥的长安住处为他设宴饯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刘肥最终也得以安然离开长安，回到封国，四年后去世。

刘肥一生，活得比较窝囊，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事，不过没想到的是，他的后代却在大汉王朝的历史上搅动起一番风云来。刘肥共有十三个儿子，其中八人被封为王，这在汉初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

就在宫廷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帝国境内也不太平，天灾接踵而至。先是在陇西发生了一次特大地震，接着，全国又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

正当多事之秋，相国萧何已进入弥留之际。

萧何历经了高帝末年的那场牢狱之灾后，早已心力交瘁，身体越来越差，苦苦支撑了一年半后，生命进入倒计时状态。

出于对这位开国老臣的敬重，惠帝亲自到萧何府上，见他最后一面。

面对病榻上奄奄一息的萧何，惠帝宽慰一番后，问了一个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相国您百年之后，你看谁接任相国比较合适？”

对于这样敏感的大事，最高明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一切唯上是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萧何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陛下目光如炬，要说对臣下们优劣的了解，莫过于您。"

萧何为人一生谨慎，就算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亦是如此。他知道，皇帝咨询他，那是出于礼貌客套，心中想必已有了合适人选，就轮不到他置喙了。

对于下一任的相国继任者，他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必然是曹参。

果不其然，惠帝小心翼翼地问道："您看，曹参如何？"

萧何听完，立刻挣扎着起来，连连叩头说："陛下圣明，慧眼识人，臣死而无憾!"

其实，萧何心中明白，相国人选的最终决策者是吕后，皇帝只不过是替她来传话而已。

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但一大家子人往后还要生活。为确保家人的安全，他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掺入新的权力斗争之中。

惠帝走后，萧何叹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安心闭眼了。

作为大汉帝国的首任相国，萧何久居中枢，可谓位高权重，但长期以来，他全身心扑在王朝的长治久安大业上，对自家产业倒很少经营。他购买的一些土地和宅邸，都地处偏远，值不了几个钱，在修建居家住房时，亦尽量简简单单，只求能住人就行。

老子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历经宦海风浪，萧何已大彻大悟。

临终前，萧何交代家人说："后世子孙如果德行端正，就将我俭朴持家的家风传承下去。退一步，摊上不肖子孙，守着这点家产，也不至于被人惦记，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秋，七月初五，萧何去世。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当时还是齐国国相的曹参，就吩咐身边人抓紧时间收拾行囊，为赴长安当相国做好准备，免得到时候过于仓促。

左右都有点半信半疑，没想到，二十几天后，朝廷就派使者前来，宣布任命曹参为新任相国。大家都对曹参的预判力赞叹不已。

西汉建国之初，因首席功臣之争，曹参与萧何失和，自此两人各居一方，少有往来。但要说对萧何的了解，无人能及曹参。

早年，二人在沛县曾共事多年，萧何担任主吏掾，曹参为狱掾，都是沛县地界有头有脸的人，彼此关系非常好。后来，又一起追随高祖反秦灭楚，大汉建立后，各自出将入相。但此后二人逐渐生隙，为了避免矛盾升级，高祖让曹参离开长安，赴齐国担任国相，辅佐齐王刘肥。

不过，曹参并没有因为离开中央权力中枢而感到灰心泄气，反而既来之则安之，坦然面对。

高祖末年，陈豨和英布先后叛乱，曹参积极协助高祖平叛，发挥了关键作用。前半生，曹参戎马倥偬，四处征战，军政经验丰富，但行政民事阅历明显不足。很显然，作为一国国相，治国理政是首要任务。

曹参走马上任后，面临严峻挑战。

齐国地处东方，依山濒海，在诸侯中属于大国，齐国的稳定关乎天下安危。刘肥尚年轻，治国理民全靠国相，高祖让曹参赴齐，就是希望他挑起这副重担。

曹参上任后，召集齐国境内长者与士人咨询民情，就齐国治理问题广泛征求和倾听他们的意见。老年人阅历广，经验丰富，读书人见识多，有点子，听他们的肯定错不了。

然而，实际结果却让曹参失望了。

人倒是找到不少，但是这些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口水费了不少，就是拿不出个统一的方案来，搞得曹参都不知该听谁的。

后来，曹参无意间听到胶西地区有一位隐世高人，叫作盖公，便派人带上厚礼去请他。

盖公的研究方向是黄老道学，讲究清静无为，而曹参是一位从战场尸山血海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将军，两人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盖公的话，曹参听得进去吗？

出乎意料的是，曹参不但听进去了，而且听到心里去了，甚至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为官处世的方式。

两人见面后，盖公并没有谈什么高深玄妙的大道理，相反，他说话很直白："世上哪有什么治国安邦的千金妙方？世间一切祸乱源泉，都是帝王将相的雄心壮志造成的。想要天下安定，一句话，不要瞎折腾，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用不了多久，社会自然安定，天下就会太平!"

曹参顿时豁然开朗，自己苦苦思索、四处寻觅的真理，原来竟然如此简单。

多数时候，我们习惯了两套标准，一套是对别人，一套是对自己，对别人以圣贤苛求，对自己则以凡夫自居。如此，尘世多了许多表里不一之人，人间少了几颗赤子之心。

想要改变世人，先要从自我做起。

曹参决定自己带头，改变执政风格。他从自己办公理政的大厅搬了出来，请盖公住进去，一改行军打仗时雷厉风行的做法，办事不再一味求速度，立马见成效，开始变得温温吞吞、慢条斯理。众人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曹参，觉得他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一般，

变得有点不认识了。

周围的人，起初还真有点不适应曹参新的工作方式。但是日子一长，大家也就渐渐习惯了。

没想到就这样，数年后，齐国境内的战争创伤渐渐疗愈，老百姓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齐国人民私下里无不惦念着曹参的好。

在齐国的几年间，曹参虽然人在东海之滨，但心却一直在庙堂之上。他和萧何虽然后来有分歧，但他相信，满朝衮衮诸公，懂萧何者，唯有曹参，而知曹参者，唯萧何也。

因此，他料定，萧何临终前举荐的继任者必然是自己。

长安，我回来了。

相国上辅佐天子，下引领百官，地位何等尊荣？相国府如今换了主人，一举一动，朝野瞩目，大家都在屏息凝神，等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

曹参和萧何不和，人所共知，接下来，推翻萧何制定的政策，撤换相府萧何留下的班底，这些看上去都是可预期之事。

然而谁承想，自打曹参搬进了相国府后，对外只传出一句话，一切按照萧相国原定方针办事，然后就没了下文。

大家本以为，曹参这是刚上任装装门面罢了，只要过上一段时间，终究会推翻前任的政策，出台自己的执政方针，毕竟做官嘛，谁不想有所作为，在史书上给自己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到头来，众人的期望落空了，他们想象中那一幕始终没有出现。相府上下跟往日一样，该干吗就干吗，没有任何大动静。

曹参上任后，除了从天下各郡国中选拔了一些忠厚能任事的官吏，到相府担任属官，同时罢免了一些巧言令色、追名逐利却不担事的官员外，就再也没了任何动静。

再后来，相国府中传出消息，曹相国整日无所事事，将自己泡在美酒中，没日没夜地喝酒。

众人从满怀希望变失望，接着开始有点气愤了。

不承想，曹参非但没有带头激励士气，反而消极敷衍，整日与杯中物为伍，如此下去，可如何是好？

有些人看不下去了，直接跑到相国府上，想劝曹参打起精神来。

就算是外放齐国几年，需要弥补心理落差，但也不能如此放纵自己啊!

哪知话还没开口，曹参却先把酒杯递到了嘴边："先喝几杯，然后再谈事可好？"

造访的人盛情难却，只好接过酒杯。

这不接酒杯还好，一接酒杯就放不下来了，曹参就不停地给客人斟酒，一杯又一杯。

眼看酒喝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该说正事了。

没想到，刚要张嘴，曹参再次用酒杯堵住了他的嘴，直到结束，来者被曹参灌了个稀里糊涂。

就这样，一个个来访的人雄赳赳气昂昂地阔步进了相府，最后都东倒西歪被人扶着出来，自始至终，都没说上一句完整的话。

渐渐地，曹参的所作所为传到皇帝耳中。惠帝有点不满了，本指望曹参上任后有所作为，能帮助自己打开一番新局面，没想到他却消极怠工。本想马上召见他，当面训斥一番，但转念一想，曹参毕竟是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的老臣，起码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于是，他想让人先给曹参带个话，看他有何说法。

曹参的儿子曹窋(kū)在朝中担任中大夫，惠帝便对他说道："听闻

曹相国终日不理政事，他这是何用意？难道是欺朕年轻吗？你回家替我问问，就说：‘高帝刚去世，新君初即位，您身为相国，却整日饮酒作乐，也不向皇帝请示汇报政务，打算如何治理国家呢？’但不要让他知道这是我的意思，问清楚后，回来如实向我汇报。”

曹窋一听吓得不轻，因为曹参在家期间，从不和家人谈论政务，但皇帝交代的差事又不能不办。

回到家中，一家人闲聊的时候，曹窋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意无意地探测父亲的口风。曹参一听，恼火异常，大发脾气，当下命人将儿子拉出去鞭笞二百，然后怒气冲冲地说：“赶紧滚回宫中，好好侍候皇帝，国家大事是你该问的吗？”

实际上，曹参内心明白如镜，儿子的话，绝非是他自己要说的，打探之人必然另有其人。不过，在对方未挑明身份之前，只能让儿子先遭受一番皮肉之苦了。

次日朝堂上，惠帝看曹窋举止有点不对劲，一问才知道，他回家挨了父亲一顿鞭子，现在浑身鞭伤。惠帝闻听，就有点不高兴了，立马召见曹参，埋怨说：“那天是朕让曹窋问话的，相国没必要下如此重的手吧!”

曹参一听，立刻脱帽跪下谢罪，反问道：“陛下扪心自问，自认为和高皇帝相比，谁更英明神武？”

惠帝心想，这不是废话吗？回道：“我怎敢与先帝相比呢？”

曹参又问道：“那么，陛下以为，臣和萧相国相比，谁更善于理政呢？”

曹参是武将出身，行政能力自然没法和萧何比，惠帝只好如实回答：“您似乎比萧相国稍差一些。”

曹参立刻接过话题，说：“陛下圣明，高皇帝与萧相国平定天下，各项法令制度制定已经很明确完备了，现如今，陛下只需垂拱而

治，臣等按部就班，遵纪守法，做好分内之事，不就可以了吗？”

惠帝似乎瞬间明白了什么，连声说：“相国说得对。”

有为是能力，无为是智慧。有为很难，无为更不易。

大破大立的时代已过去了，现在首要任务是与民休养生息，需要的不是雷霆万钧，而是和风细雨。

如今，只要不瞎折腾，不乱插手，不外行指导内行，社会就会有序运行。

目前帝国要健康发展，实现长治久安，无须再制定政策和规则，只要遵循好现有的规则，将人和物做好合理配置即可。

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之!

所谓大道至简，无为而治即如是也。

曹参在为相的日子里，奉行清静无为的政策，纵然相国府内属官们偶尔犯点小错误，他也睁只眼闭只眼，不过分苛责，给大家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

由于自汉初以来，数次诛杀功臣，搞得人心惶惶，曹参的方法恰逢其时，大家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做本职工作，不必再整日提心吊胆了。

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八月，曹参平静地去世，此时他担任相国刚满三年。

## 匈奴来信

曹参担任相国的三年间，表面上看，他做甩手掌柜，日子过得很潇洒，实际上，他的日子并不轻松。

其实选择无为而治，并非曹参甘愿为之，而是不得已的选择。在领政三年期间，表面上看，一切风平浪静，实则朝堂上早已暗潮汹涌，各种政治斗争从未停止。只是，由于曹参无为治国，奉行“不折腾国策”，使得各种矛盾暂时没有公开化罢了。

曹参的日子过得很不易，艰难地维持朝局平衡。

但是，就算贵为相国，他亦无力改变吕氏逐渐坐大的趋势。

惠帝四年，惠帝年满二十，按照礼制，皇帝应行加冠成人礼，可以亲政，太后理应将国家大事交给儿子了。

然而，吕后丝毫没有放权的意思。权力犹如毒品，一旦上瘾，就很难戒掉。越是掌握了最高权力，就越缺乏安全感，生怕失去，就算是亲生儿子，亦不能掉以轻心。

皇帝成人了，按理，该立皇后了。

皇帝立后是件大事，天下瞩目，但皇后人选公布出来后，却令人大吃一惊，竟然是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女儿张氏(名字不详)。

鲁元公主与惠帝是吕后所生的同胞姐弟，按照辈分，张氏是惠帝的亲外甥女。吕后的盘算是，将来小外孙女跟儿子生下孩子，权力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

权力使人疯狂，吕后为了稳固权力，竟然逼儿子陷入乱伦兽行中。

惠帝体弱多病，加上被母亲逼得心理快要崩溃，现在又要逼他迎娶外甥女，吕后这是铁了心，不把儿子彻底逼疯，绝不罢休。

好在惠帝没有疯，他自始至终坚守伦理纲常，不肯亲近张氏。

只是可怜了这个小女孩，遇到吕后这样的狼外婆，小小年纪就沦为权力的牺牲品，空顶着皇后凤冠，置身于高墙深宫之内，日复一日，蹉跎青春年华，守活寡到四十多岁，最终抑郁去世。

她的终生幸福就这样毁在狠心姥姥手中，不过聊以慰藉的是，由于她始终没有参与到任何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所以，在后来的权力大洗牌中，她侥幸躲过了一劫，得以平安度过余生，这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吧。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旦生在帝王家，没有人能够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权力疯狂起来，又会放过谁？

曹参选择无为治国，又何尝不是为了避免与吕后发生冲突，出于明哲保身的无奈选择？

不过，曹参无为，绝非啥事都不干，在他任期内，大汉帝都长安的城防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在他去世后一个月，历时三年多的长安环城城墙正式竣工。

据《汉旧仪》记载，长安城墙为夯土筑成，上窄下宽，周长六十三里，又环绕城墙掘了壕沟，全城共设十二座城门。在城内，一大半面积是未央宫、长乐宫等皇家建筑群，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特建了武库，用来储备武器装备。

长安城内共有八条长街，宽度基本一致，但长度不一，街道走向基本都保持笔直，没有蜿蜒曲折。在帝国初建、百废待兴之际，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建成如此宏大的一座城市实属不易。

长安城的建成，也算是曹参无为国策下的有为政绩。

至于对外方面，无论对北方匈奴，还是南方南越，基本都维持着和平外交的局面，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不过，这种和平其实很脆弱。实际上，匈奴对汉贼心不死，一直暗中窥视，高祖去世之后，冒顿认为机会来了，就给吕后送来一份语气极为挑衅的书信：

> 北方天寒地冻，阴冷潮湿，除了放牛牧马无事可

干，加上我现在是单身，实在孤单寂寞冷，好多次我独身一人盘桓于汉匈边境地带，眺望南方，很想到中原游玩一番。近来，我听说太后您也新丧偶，独居一室，情况跟我差不多，闷闷不乐，不如我们凑合凑合，搭伴过日子，这样两人都很开心，您可否考虑一下？

吕后读完信后，气得七窍生烟，她哪里受得了这番羞辱？恨不得马上杀掉匈奴使者，即刻发兵攻打匈奴。

群臣看太后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惹，大家都顺着她的意思，一个劲地附和。樊哙是个直性子，义愤填膺之下，当场向吕后请命，声称只要给他十万大军，他就能率众出塞，纵横草原，狠狠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匈奴人。

樊哙一席话刚落地，立刻就有人表示赞成。

顿时，朝堂上喊打喊杀之声，起此彼伏。

就在此时，忽听有人大声说：“就凭樊哙此番亡国之语，现在就该拉出去砍了!”

众人一听大惊失色，回头一看，原来是中郎将季布。吕后感到很奇怪，便问他有何看法，季布朗声答道：“昔日高祖带领三十二万之众，北上出征，结果如何？还不是被匈奴人困在白登山七日，几乎难以脱身!往事历历在目，当年战争中伤残之人至今尚未痊愈，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樊哙竟然大言不惭地说，率十万大军就可以横行匈奴，请问他如果真能做到，为何当初不带人突围，何须待到今天？如今，为了讨得太后欢心，睁眼说瞎话，这是要陷大汉于战争深渊啊!”

樊哙顿时语塞，满脸通红，一时不知做何回答。

季布缓了缓语气，又说：“像匈奴这种野蛮人，跟禽兽差不了多少，管他作甚!他说几句好话，我们没必要高兴，同样，他嚷嚷几声恶言，我们又何必在意？”

季布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吕后心头之火，慢慢地她气消了许多，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她知道，冒顿给她写这封言辞轻慢的书信，绝非真的要跟她结亲，真实目的就是要激怒她，做出错误的决策，然后匈奴好乘虚而入。

愤怒之下发兵匈奴，不正中冒顿下怀吗？

以大汉现在的国力，实在经不起一场举国战争。

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吕后有点忘乎所以，但她并不糊涂，孰轻孰重还分得清，相比大汉社稷安危，自己受点气又算得了什么？

恢复平静后，吕后让大谒者张释替自己代笔，给冒顿单于回了一封信：

非常感谢单于眷顾，惦记我们这个百业凋敝的国度，肯给我这个糟老太婆写信。只是我现在年事已高，头发、牙齿都差不多脱落殆尽了，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实在不值得单于垂青，以免玷辱您显赫的威名。长期以来，敝国从没冒犯过您，想来此次，也一定能获得您的理解。最后，我这里有两辆车、八匹车辕马，一并赠送给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望不要推辞。

这份语气谦卑的书信，送到匈奴后，大大出乎冒顿的意料，冒顿反而被搞得有点尴尬了，只好再次给吕后回信：

我们久居大漠，对于中原的礼节不太熟悉，本无意冒犯您，幸好殿下您宽宏大量，宽恕了我的冒昧和唐突，实在让人感到庆幸。

给吕后送来书信的同时，冒顿给汉朝馈赠了一些马匹作为回礼。就这样，一场外交冲突总算和平收场了，双方最终都避免了战争。

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汉匈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摊牌的准备。

不过，樊哙经过此事后，再也没有公开场合露面的记载，估计在他满朝文武面前，被季布一阵猛戗，颜面尽失，只好憋着气窝在家里不出门了。

就在曹参去世一年后，这位猛将也过世了。

樊哙去世的同一年，张良也去世了。

多年来，张良一直闭门不出，人们几乎都快遗忘了这位谋略大师的存在。然而，像张良这样不世出的天才，命中注定是没法被历史淡忘的。

张良死后五百年，已是西晋末年，时逢天下大乱，群盗乱起，许多前朝帝王将相的葬身之地，成了盗贼的乐园，许多古冢都被挖掘一空，墓中陪葬之物大量流落市井之间，其中不乏已经失传已久的古籍。比如从战国魏安釐王墓盗出的古书《竹书纪年》，填补了许多上古历史的空白。

在这场盗墓狂潮中，张良墓也未能幸免。盗墓贼挖开张良墓后，从张良遗骨玉枕下发现了一部古书，名为《素书》，据说这就是当年黄石公授予张良的那部兵书。

至于宋人张商英这段记载可信度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但为张良的身后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感。

不过在当时，由于张良早已远离中枢，他的死对政局影响不大。反倒是曹参去世后，相位出现空缺，这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萧何、曹参担任相国时，都是独自一人领政。由于高祖临终前有安排，萧何卒，曹参继任；曹参之后，王陵为相，陈平辅之。因此，吕后废除相国，恢复丞相，分设二人，让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以右为尊。与此同时，周勃被任命为太尉。

朝堂上完成新一轮的权力洗牌之际，惠帝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最终于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八月十二日去世。

惠帝生于乱世，从小缺乏家庭的温暖，在惶恐不安中长大，造就了他怯懦胆小的性子，而上天又赋予他一副善良的心肠。他对所有人都真诚友善相待，曾呵护赵王刘如意，帮助齐王刘肥，哪怕这些人都有可能是他潜在的威胁，他依然不改初衷。

他对臣下宽容相待，遇到曹参消极怠工，最多发几句牢骚而已，却没有采取任何惩处措施。

他爱着每一个人，但世人都在伤害他，伤他最深的正是他的亲生母亲。吕后一遍又一遍地摧残自己唯一的儿子，不折腾到他奄奄一息，决不罢手。

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冷酷无情的权力。

要是人生有选择的话，或许惠帝宁愿选择生在普通百姓人家，哪怕是粗茶淡饭，只要有爱，虽苦也甜。

但每个人注定的宿命，谁也没法挣脱。

对于惠帝而言，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在帝王家。

好在他现在终于解脱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看似高高在上，实则冷冰冰的家，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至于彼岸世界是否有爱，没有人知道。

二十三岁，惠帝在最美好的年纪，结束了一生。

惠帝的去世，受打击最深之人毫无疑问是皇太后吕雉。吕后一生坎坷，看似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内心的凄苦只有她自己清楚。

对一个母亲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早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使得吕后除了权力之外，什么都不

信。

她对权力充满了狂热，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顾一切。不过她毫不犹豫地设法除掉戚夫人和刘如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唯一的儿子。

她知道儿子性子弱，下不了手，为了护住儿子的皇帝宝座，哪怕一丁点儿威胁都不允许存在，必须铲草除根。

长期以来，她对儿子抱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但她没料到，正是她自己一步步毁掉了儿子。

唯一的儿子死了，莫名的恐惧笼罩在吕后心头，一时间，她竟顾不上丧子之痛。

儿子死了，自己的权力将受到新的挑战，未来如何应对朝中那帮老臣？

儿子死后，大汉的法统空缺，又将如何填补？

由于过于紧张，吕后在儿子灵前只是一个劲地干号，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这一反常表现，被在场的侍中张辟强看在眼里。

张辟强是张良儿子，虽然此时年方十五岁，但非常聪慧。他觉得吕后有点不正常，便悄悄对一旁的陈平说："太后只有皇帝一个儿子，现在皇帝驾崩，她却没有流泪，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陈平也觉得很奇怪，便问张辟强到底怎么回事。

张辟强说："道理很简单，皇帝英年早逝，身后没有成年的孩子，太后岂能不担忧你们这些大臣会对她不利？为今之计，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主动提出，让吕台、吕产、吕禄这些太后娘家子弟出任将军，掌控南北二军，唯有吕家人掌握了实权，太后才可以安心，你们也就平安落地了。"

陈平觉得很有道理，当下立即向吕后推荐吕氏子弟。吕后听后，内心稍安，才念及丧子的痛苦，泪如雨下，哭得非常伤心。

按照礼制，皇帝新丧，就该立太子称帝。

太子优先人选是嫡长子，只是惠帝生前从未接近过张皇后，更谈不上一起生儿育女了。

好在吕后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早早就做了预案，从后宫中抱来一位美人(妃嫔封号)的儿子，对外谎称是张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古籍皆无名字记载，后世称刘恭，不知出处)。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孩子生母被处死。

待惠帝一死，太子就被推到皇帝宝座上，史称汉前少帝。

考虑到张皇后在惠帝四年被立为皇后，为了对外说得通，少帝即位时，估计最多也就三四岁。

幼龄孩童当然无法处理政务，自此大权完全掌握在吕后手中。尽管在惠帝时，吕后已经将最高权力操控在手，但在表面上，至少有些礼节性的事务，还是由惠帝去做，因为他才是大汉天子。

不过现在，吕后连这层面纱都不需要了，公开称制，朝堂诏令皆以太后名义发布，与皇帝别无二致。

## 吕氏封王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爬上权力巅峰之后，还想将权力传诸子孙万世，可惜吕后唯一的儿子已死，眼下信得过之人，也就唯有娘家子侄了。为了将权力永远掌握在吕氏手中，吕后想进一步大力培养扶持吕氏势力，打算封自家子侄为王。

封王这种大事，非她一人说了算，需先征得大臣们的支持，尤其要经过丞相点头同意才行。

吕后决定，先探探右丞相王陵的口风。王陵是个直性子，做事一贯坚持原则，立刻搬出高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顶了回来。

吕后很恼火，王陵这老家伙也不看看当今谁是大汉的当家人，竟然如此死脑筋，不懂得变通，便转身询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等人的意见。

与王陵不同，陈平、周勃马上表态赞成给吕家人封王：“高帝平定天下，建立大汉，封刘氏子弟为王，同样，现在太后临朝称制，封吕氏子弟为王，并无什么不妥。”

吕后听后转怒为喜，既然已有陈平、周勃等重臣支持，王陵的话完全可以弃之不理了。

王陵本以为，只要老臣们意见一致，齐声反对，太后无奈之下，只有收回成命了，但没料到陈平、周勃这些人背信弃义，为了讨好太后，不惜背叛了先帝盟约，在朝堂上，让自己这张老脸没处放。

功臣退朝出宫后，王陵怒气冲冲地拦住陈平、周勃，批评道：“当初，高帝与群臣歃血为盟时，你们难道不在场吗？如今高帝不在了，太后称制临朝，你们为了巴结太后，不惜曲意逢迎，背弃盟誓，让吕家人为王，将来有一天，待你们死后，又有何面目到地下去见先帝？”

其实，王陵错怪了陈平、周勃，他们并非那种投机分子，但如今吕氏崛起已是无法逆转，就算他们一起站出来反对，也未必能改变吕后的主意。

坚持立场的勇气，固然值得敬佩，但在权力的博弈中，光靠执着和坚持原则，往往行不通。为了达到目的，学会变通，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坚持大义很难，委曲求全更难，因为这样做并不见得能赢得对立阵营的完全信任，而且会招来自己一方人实实在在的误解和鄙视。

但如今，无论说什么，都无法跟王陵解释清楚。

既然如此，好吧，就让我们坚守心中的正义，各自努力吧。

“在朝堂上，当着太后的面坚持原则，公开力争，我们的确不如您。但要是保全刘氏后代的君位，恐怕，您就不如我们了。”二人无奈地说。

在王陵看来，这不过是陈平、周勃为自己开脱的借口罢了，便懒得再理他们，径自扬长而去，从此与他们分道扬镳，不再往来。

说真话、坚持原则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没多久，王陵就被升为皇帝的太傅，同时，免除了相位。

太傅是从周朝始就设置的职位，名义上地位尊崇，实际上不过是毫无权力的荣誉头衔罢了。吕后用明升实降的方式剥夺了王陵的实权。

王陵非常郁闷，此后称病在家，闭门不出。

王陵被免职后，陈平接任右丞相，辟阳侯审食其出任左丞相。

自大汉建立以来，历任丞相，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皆是开国功臣，无不立下赫赫功勋，但突然让审食其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出任左丞相，实在有点蹊跷。

其背后，隐藏着一段宫廷秘闻。

楚汉战争之际，高祖兵败彭城，在仓皇西逃时，顺道经过沛县，打算将一直留在老家的吕后母子三人带走。谁知楚兵追得紧，慌乱之中，只觅得一双儿女，吕后却被楚兵俘虏，滞留楚营整整四年。

在楚营做人质期间，正是审食其陪在她身边。

一个女人，孤身一人身陷敌营，遭受的压力和苦难可想而知。项羽曾为了胁迫高祖投降，将刘太公押解阵前，支起大锅，威胁要煮了

他。估计，吕后也少不了遭受类似恐吓和羞辱。

当时，汉军接连吃败战，楚汉之争的未来结局会怎样，谁也说不准。

那段时间，吕后的日子充满灰色，能否活着看到第二天的太阳都没把握，未来一片渺茫，生死难测。

这几年间，唯有审食其默默地陪着她，生活起居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使她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坚持到最后。

吕后生性刚毅，但终究是个女人，审食其的体贴关怀，是她四年黑色生涯中唯有的一丝亮色。就这样，数年下来，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内心的空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两人渐渐暗生情愫。

待后来，吕后回到汉营，尊为皇后，审食其被封为辟阳侯。

成为皇后后，吕后的日子并未好过，接下来数年间，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之位，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直到高祖驾崩为止。

高祖去世之时，吕后内心的弦紧绷到了极限，儿子还年轻，朝堂上那帮老臣，可都是曾与先帝一起打天下的，他们岂能甘心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俯首称臣？

数来数去，身边唯一值得信赖之人，就是审食其了。

毕竟两人有过共同患难时光，这份情义靠得住。

吕后对审食其透露了一个绝密计划，为了避免儿子皇位不受威胁，她要设法秘密除掉朝堂上那些宿将老臣们。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吕后对外封锁了高祖的死讯，估计打算出其不意干掉将军们。

吕后自认为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骗诸将入宫，然后一并伏击处死他们，就像当年的韩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死在她手里。

审食其得知吕后的谋划后，是什么态度，不得而知，估计他被吕后的疯狂吓坏了。吕后这是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要与功臣们彻底决裂，一旦失败，不但吕后母子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审食其也必将身死族灭。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曲周侯郦商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了消息，为了自己，也为了开国将领们的安危，他决定必须阻止这场政治屠杀。

吕后已经陷入癫狂，现在跟她肯定说不通了，那么必须找个能在吕后面前说上话的人，毫无疑问，只有找审食其了。

“我听说皇帝驾崩已有四天了，但皇后却秘不发丧，打算趁国丧之际铲除诸将，如果正如传闻这样，恐怕离天下大乱不远了。现如今，陈平和灌婴率领十万大军驻守在荥阳，樊哙、周勃带领二十万大军在燕国一带平定战乱(指的是卢绾之乱)，一旦听到这个消息，为求自保，他们肯定会联合起兵，杀回关中。如此一来，外有诸侯谋反，内有朝臣叛变，恐怕大汉将会万劫不复。”

郦商没有任何遮掩，将后果的严重性直接分析给审食其听。

审食其一听，大惊失色，他听得出来，郦商绝非危言耸听，立刻跑回宫中，原原本本复述给吕后。

明白阴谋已败露，吕后只好取消行动计划，大汉因此逃过一场刀兵之灾，将军们也幸免步韩信后尘。审食其这次无意之举，也救了自己一条命，待吕后死后，功臣们并没有清算他，也算是对他的投桃报李了。惠帝即位后，吕后大权独揽，审食其由于得到太后宠幸，一时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但谁都知道他是怎么上位的，无论是大臣们还是士人，多鄙夷其为人，不愿意与之往来。

审食其感到很尴尬，急需找一些比较有声望之人来装点门面。

楚人朱建原本是英布的国相，英布谋反时，朱建苦苦相劝，但英布置之不理。英布战败身亡后，由于反对叛乱，朱建不但没有被朝廷

追究，高祖还封他为平原君。

朱建口才好，为人耿直，洁身自好，不愿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故而，在朝野间口碑很不错。审食其得知后，想拉拢他，不料朱建不吃这一套，审食其碰了一鼻子灰，不过他依然不肯死心。

别看曾做过国相，但由于为官清廉，朱建一贫如洗，以至于母亲去世后，连办个体面葬礼的钱都没有，无奈之下，只得到处借钱(这官做得太憋屈了)。审食其听说后，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便派人送去百金厚礼，朝中那些见风使舵之辈，一看辟阳侯送了如此重礼，马上也跟着随礼，总共凑了近五百金。

世人多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而审食其这笔钱送得太及时，解了朱建燃眉之急。人心都是肉长的，经过此事，朱建不由得对审食其多了几分好感。

帮助朱建解决了难题，审食其自己却祸事临门了。

原来，高祖去世后，审食其常出入宫禁，坊间免不了传出些风言风语，时间一长，就传到惠帝耳中。惠帝此时已是十几岁少年了，什么事不懂？听闻后，既感到羞耻，又非常恼火，一气之下，下令缉拿审食其，将他打入大牢，想择日处死了之。

吕后得知后，羞愧不已，唯有干着急，因为她实在没法跟儿子张口求情。审食其情急之下，托人给朱建带话，希望见见他，给自己出个主意。他很快得到朱建回信，信中称，你现在涉案，为了避嫌，我们还是别见面为好。

审食其一看，心凉了一半，没想到朱建空有虚名，做人竟然如此不厚道，忒不仗义了。

然而实际上，身陷囹圄的审食其不知道的是，朱建虽然没到牢中探望，但一刻都没闲着，而是为了替他开脱，到处奔走。

此案与皇帝家事有关，找朝廷大臣出面估计行不通，况且，此事

由皇帝母子恩怨引起，外人也插不上嘴，所以，应该找个与皇帝关系密切之人才行。

朱建找到惠帝男宠闳孺(又称闳籍孺)，建议他给皇帝吹吹枕边风。

审食其之事实在有点棘手，闳孺不想蹚浑水，支支吾吾，想一推了之，不过朱建岂是随便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

“你深受皇帝宠爱，这是世人皆知，如今辟阳侯突然无辜下狱，外面都在传言，是你向皇帝进的谗言。”朱建故意虚张声势道。

闳孺一听，有点着急了：“这是根本没影子的事啊!”

朱建见他上钩，便顺势说：“别人怎么看不重要，但是太后听到后会怎么想？”

闳孺一时惶恐不已，忙向朱建请教怎么做才能洗刷嫌疑，不要让吕后误解是他背后使的坏。

朱建说：“很简单，赶紧向陛下求情，放了辟阳侯，太后得知是你向皇帝求情，必然会对你有好感，往后你既有皇帝恩宠，又有太后关照，还用为富贵发愁吗？”

闳孺顿时有了拨云见日之感，随后立刻跑到惠帝那里，替审食其说情。估计，惠帝也只想敲打一下，也没真想将审食其杀头，如今，恰好闳孺在一旁说情，便下令放了审食其。

吕后与审食其的暧昧关系，终究令惠帝蒙羞。纵然他贵为天子，依然无法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此后，抑郁成疾，最终英年早逝。

至于审食其，在牢中度日如年，恨朱建见死不救，等他出狱后，才得知是朱建帮的忙。

经过这次牢狱之灾，审食其开始变得非常谨慎。

惠帝死后，吕后对审食其的恩宠有增无减。如今，左丞相的位置空出来了，优先考虑的自然是他。

不过，审食其毕竟不是宰相之才，他出任左丞相，充其量是被授予的一种荣誉头衔。实际上，他并不参与朝堂具体政务，他的主要工作还是负责管理宫廷内务，跟郎中令(官职，秩中二千石，列位九卿)差不多。

郎中令职位看上去虽然没有丞相显赫，但其职权其实很大。出任这一职位的人，往往是皇帝的亲信，比如秦朝时，赵高就曾担任过郎中令。

表面上看，审食其职权低于陈平，但朝中大臣想要了解吕后的想法，向太后请示政务，必须要经过审食其之手。因此，众人在处理政务时，往往以他的意见揣测吕后的意思。

经过一番人事调整后，朝堂上反对吕氏封王的声音被打压了下去。

吕后决定先将已经去世的父兄追封为王，封吕公吕宣王，哥哥周吕侯吕泽为悼武王。

死人是没有感觉的，追封死人，其实是为了给活着的人开路。

吕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壮大吕氏势力，给娘家子侄们封王。当然，为了安抚刘氏宗室，也为了堵住像王陵这样死心塌地拥护刘氏的大臣们的嘴，吕后先给惠帝的几名幼子封王，封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衡山王，刘弘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这几个孩子是否真的为惠帝所生，历来存疑)。

紧接着，吕后暗中指使宦官大谒者张释给大臣们吹风：能做的事，我都做了，现在诸位大臣，该明白接下来怎么办了吧!

大臣们都不傻，马上配合演出，立即主动提出给吕氏子弟封王。

该走的流程走完了，戏也演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吕后就堂而皇之地封侄子吕台(吕后大哥吕泽之子)为吕王。

汉初分封时，本无吕国，唯有从现在的封国中分割出土地来建国。纵观天下诸侯，唯有齐国拥有七十余城，只能从它身上下手了。

此时，刘肥已死，其子刘襄为王，面对强势的吕后，他只能忍痛割肉，将济南郡让出来，立为吕国。

不过，吕台命不长，封王一年后，随即去世，其子吕嘉袭位。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此后两年间，淮阳王刘强、衡山王刘不疑也莫名其妙地死了。

至于是不是吕后觉得分封自家人的目的已达到，就没必要留着他们做掩饰，于是暗中做了手脚，使他们夭折，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令吕后感到恼火的是，侄孙吕嘉实在不成器，在位短短四年间，肆意妄为，骄纵不法，她一怒之下，废掉了他的王位，让侄子吕产(吕产是吕台之弟)为吕王。

仅仅让一个侄子封王，并不能让吕后感到满足。为了避免刘氏反扑，就必须进一步壮大吕氏势力。

吕国的建立，才刚刚拉开吕氏和刘氏宗室之争的大幕。

[1] 汉朝官员俸禄多以实物发放，一石为12汉斤，一汉斤约为248克，一石相当于现在60斤，秩二千石相当于年俸12万斤粮。——编者注

# 第二章 女主天下

## 宿命难逃

吕后心狠手辣，权欲极强，但也是个心思缜密之人。在抑制刘氏、壮大吕氏的过程中，她步步为营，每走一步都经过精心算计，以循序渐的进方式逐步瓦解刘氏，而不是一步到位。如此这般，其目的就是缓解朝臣阻力，降低刘氏宗室的反弹力度。

称制后最初四年内，她给吕家人封了一些侯爵，但裂土封国也仅仅是吕国一家而已。况且，吕国也不过一郡而已，规模实在太小，与遍布天下的刘姓封国一比，实在微不足道。正因如此，即使她公然违背了高祖定下的白马之盟，也尚在众人容忍范围之内。

很显然，扩充吕氏势力是既定方针，至于方法可以根据形势灵活把握。封王毕竟太招眼，那就先封侯。

在很短时间内，不少吕家人被封侯，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甚至打破常规，连妹妹吕媭都被封为临光侯。

一时间，吕氏满门为侯。

就在吕氏不断崛起之际，吕后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死了，时在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四月。

鲁元公主生平遭遇很不幸。相较于弟弟刘盈，她的身世更加可怜，幼年时缺乏父母关爱，没有享受过一日天伦之乐。高祖在彭城兵败时，为了逃命，曾将他们姐弟二人推下车去，差点丧命。

白登之围后，高祖听信刘敬建议，为了稳住匈奴，打算将她嫁给冒顿单于，幸亏吕后不停地苦苦哀求，她才逃过一劫。

但是生在帝王家，注定身不由己，鲁元公主虽然侥幸逃过出嫁匈奴的厄运，但依然没法逃脱被当作政治联姻工具的命运，最终还是被嫁给赵王张敖。

张敖为人胆小谨慎，估计不敢怠慢她，但作为政治婚姻，应该谈不上幸福。高祖对张敖这个女婿总不大看得起，导致引发了贯高谋反事件，张敖也受到牵连，被下狱。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张敖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此事对鲁元公主的惊吓可想而知。

鲁元公主婚后生下一儿一女，不幸的是，女儿同样难以逃脱成为权力交易工具的命运。当年，吕后为了女儿，多次替她出头，而多年后，她却一手造成了外孙女的悲剧。

面对母亲将女儿夺过来，强行塞给弟弟，她除了含泪逆来顺受，还有什么办法？

所有种种人生不幸遭遇，使得她最终与弟弟一样，难逃英年早逝的宿命。

至此，吕后养育的一双儿女，全部先她而去。

如今的吕后，只剩下手中的权力。暴虐、狠毒、残酷的外表之下，她承受着失去儿女的痛苦，唯有将全部的感情寄托在唯一的外孙身上，封鲁元公主与张敖所生之子张偃为鲁王。六年后，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宣平侯张敖也死了。

吕后觉得，张偃小小年纪就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一个人在世上孤苦伶仃实在可怜，便又封张偃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为侯，张寿为乐昌侯，张侈为信都侯。

张敖一辈子活着窝囊，死得憋屈，如果他地下有知，看到身后三个儿子同列王侯，或许会有些许欣慰吧。

不过，作为曾经的赵王，张敖虽然活得不顺心，但好歹得以善终。自他以后，赵国注定成为凶险之地，赵王王冠，犹如中了魔咒，一旦戴上，就等于踏上一条死亡之路。

张敖之后，被封为赵王的是刘如意，他最终难逃吕后魔爪，被鸩杀。赵王王位出现空缺，吕后下令将淮阳王刘友改封为赵王。

刘友受封赵王的同时，吕后将娘家一名吕氏女子嫁给他，立为赵国王后。刘友不傻，一眼就看出，吕后这是对他不放心，为了监视他，在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此后他的一举一动，必会及时传到吕后耳中。

睡在身旁的枕边人，是他人的耳目，当然会令人不自在。

刘友讨厌这门政治婚姻，对吕氏女子没什么好感。在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宁愿跟其他姬妾整日耳鬓厮磨，也懒得看王后一眼。

吕氏女仗着太后撑腰，嚣张跋扈惯了，哪里受得了这般冷遇？一气之下跑回长安，向吕后诬告刘友：“赵王现在私底下盼着太后早死，然后杀光我们吕家人!”

吕后一听怒火冲天，这还了得，当即下令召赵王刘友进京。

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刘友被迫之下，还是不得不上路。

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正月，春寒料峭，经过漫漫旅途，刘友从邯郸赶到长安。谁知却吃了闭门羹，吕后并不露面。

刘友无奈，只好先住了下来，不料等次日天明，发现住处早被团团围住，将他与外界隔离起来。

断了供应后，刘友连吃饭都难以为继。几天后就饿得头昏眼花，奄奄一息。

跟刘友同行来长安的赵国官员们于心不忍，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赵

王饿肚子，便设法私下偷偷托人捎带一些吃食给刘友。就这样，在半饥半饱中，刘友又支撑了一些时日。

但没多久，有人暗中给刘友送吃食的事就被人发现了，吕后命人将涉事之人统统抓起来，刘友彻底被断了粮。刘友看出来，吕后这是打算活生生饿死他。

后来，刘友实在饿得不行，怨身边没有一个忠臣能够出面相助，又恨吕氏倒行逆施，竟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要将堂堂一方诸侯饿死，绝望之下，便唱歌解忧：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到后来，刘友连唱歌的力气都没有了，被活活饿死了，遗体被运到城外，随便找个地方，以普通百姓方式草草掩埋了之。

刘友死后，梁王刘恢被改封为赵王，成了刘如意之后的第三任赵王。尽管心中很不乐意，但迫于吕后威慑，刘恢只得前往就国。

一到邯郸，刘恢发现宫内外全都是吕后安插的眼线，自己处在全方位无死角监控之中，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

吕后随后又册封吕产的女儿为新赵王后。刘友尸骨未寒，刘恢又要被迫与另外一个吕家女人结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憎恶，惹不起咱就还躲不起吗？他尽量躲着王后，整日与一位宠妾厮守在一起。吕产的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颇似姑奶奶吕后，做事心狠手辣，见丈夫泡在另外一个女人房内，躲避自己，妒火燃烧之下，直接一壶毒酒鸩杀了她。

等刘恢得知时，心爱的女人早已香消玉殒。

此事对刘恢打击太大，他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伤中，久久难以自拔，为表达哀思，特意写了四首哀悼诗，命乐师们谱成曲子，让乐工天天吟唱。

一曲未尽人断肠，曲终生死两茫茫，夜半亭轩花房，独彷徨，余音犹在绕梁，阴阳两隔，伊人何方？谁人堪诉衷肠？

半年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刘恢，自杀身亡，追随爱妃而去。

吕后得知后气急败坏，没想到刘恢宁愿去死，也不愿意与自己侄孙女共处，恼羞成怒之下，传出话来，刘恢不思如何发扬祖宗基业，竟为了一个女人去死，这种人实在不配做王，随后，下诏剥夺了他的王位。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刘恢死后三个月，燕王刘建也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刘建是高祖第八子，出生年月不详，但可以推断，绝对超不过十八岁。对于刘建的死因，史书没有任何记载，但极有可能遭了吕后毒手。

刘建刚死不久，吕后就派人将其年幼的孩子杀死。如此迫不及待地斩草除根，使她难以摆脱害死刘建的嫌疑。

就这样，不到一年工夫，吕后除掉了三位刘氏诸侯王。至此，高祖八个儿子，仅剩下了两个，即四子代王刘恒和七子淮南王刘长。

刘长母亲早死，高祖将他托付给吕后抚养。他自小和吕后、惠帝很亲近，吕后对刘长也另眼相看，视如己出。

因此，吕后很快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代王刘恒身上，下诏给刘恒，打算将他改封为新赵王。

按照以往手法，刘恒受命上任，吕后就会塞给他一名吕氏王后，然后再以王与后关系不睦的理由害死他，使他成为第四个死于非命的

赵王。

然而，一切到此为止了。

刘恒接到诏书后没有动，上书给吕后，委婉地提出，相比之下，代国比赵国更需要他，留在代国，替朝廷保卫边疆，更能为太后分忧，为国尽忠。

代国与匈奴接壤，常年受胡人滋扰，刘恒主动挑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甘愿为国戍边，面对这个充分的理由，吕后没法反驳，只好同意。

刘恒之所以能侥幸逃过一劫，缘于身边有高人支招，具体情况暂且搁下，容以后再细说。

说起来，刘恒也是个苦孩子，这些年过得实在不容易。

实际上，他能够来到这个世间，本身就是个意外。

高祖在世时，相较于万千宠爱集一身的戚夫人，刘恒生母薄姬几乎被人忽略了。

她低调、简朴，不愿抛头露面，遇事能让则让，与人和善，走到哪里人缘都不错。正是这种处事方式，反而让她历经惊涛骇浪，平安度过种种劫难。

所有这一切，与薄姬人生阅历有关。

薄姬的父亲生在吴地，是个地道的南方人，母亲却是魏国人，还是魏国宗室，是个具有高贵血统的北方女子。周秦之时，民风淳朴自然，男女之情完全出自天性，礼法约束远没有后世那样森严，故而，社会上有不少非婚生子女，薄姬就是一个私生女。

不幸的是，薄姬父亲早早就去世了，葬于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时值秦末，天下大乱，一个单身母亲带个孩子，很难在乱世中活下去。恰好赶上魏国复国，魏豹称王，薄姬母亲魏媪咬咬牙，将女

儿送入魏王宫中。

生在乱世，人命如草芥，薄姬入宫就一个目的，活下去。然而，谁承想，她传奇的一生就此拉开帷幕。

入宫不久，薄姬遇到了著名的女相士许负。

许负，河内郡温县人，是个浑身散发着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她一生阅人无数，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曾经准确地预测了许多人的命运。

陈胜吴广起义后，高祖也起兵反秦，曾带兵路过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县令许望站在城头，看着城下义军，心急如焚，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何去何从。

此时，在旁年仅十几岁的女儿许负，观察高祖面相，觉得此人长相不凡，将来必成大事，便劝父亲归降。

许望也觉得孤城难守，便投降了高祖。

高祖建立大汉后，许负被封为鸣雌亭侯，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列侯之一，这是发生在许负与薄姬相逢数年后的事。

两位年轻女子是如何相遇的，是偶然见面，还是相处已久，不得而知。许负观薄姬面相后，言之凿凿地说，她将来必会生下天子。

薄姬听后，一笑了之，现在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至于大富大贵，实在不敢奢望。

谁承想，话传到魏王豹耳中后，却激发了他的政治野心。魏王豹本无多大理想，在乱世中，保住魏国就很不错了。

当时楚汉之争，战事陷于胶着，天下局势尚未明朗，魏王豹听到许负预言后，竟然生了取渔翁之利的幻想。魏王豹盘算的是，先让汉王与项王拼个你死我活，待他们两败俱伤，奄奄一息之后，趁机收拾残局，好坐拥天下，最不济也可以割据一方，与楚汉三足鼎立，均分

天下。

于是，他宣布脱离汉王，与汉隔河对峙。

但没多久，韩信、曹参渡河击魏，魏王豹及家人被俘，队伍中就有薄姬。荥阳之战后，魏豹被周苛所杀，薄姬被罚作苦役，在织房做苦力。

织房日子很难熬，薄姬没日没夜地干活，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生活充满艰辛苦涩，根本看不到未来，一眼就能看到命运结局，看来最终就要在织房劳碌到死。然而，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她的命运。

有一日，高祖闲暇无聊，路过织房，无意间看到了薄姬，心生好感，将她纳入后宫。然而，君王身边从来不缺女人，薄姬很快就被遗忘了，整整一年，她连高祖的面都没见到。

薄姬少时，有两位闺蜜，三人关系非常好，为了表明姊妹情深，薄姬曾郑重对天盟誓说：“我们三人，将来无论哪一位得到贵人垂青，都不要忘了其他两位。”

人在年少时，未识人生之艰险，谁不曾壮志踌躇？谁不曾少年轻狂？就如陈胜落魄，为人做佣工时，曾环顾左右之人，豪言将来有朝一日，“苟富贵，无相忘”。然而，多年后，最先断头的却是陈胜，成事者却是刘、项!薄姬的人生亦是如此，她被冷落在深宫，过着活死人一般的日子，而那两位闺蜜，即管夫人、赵子儿却已成为高祖的新宠。

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高祖曾外出赴成皋灵台游玩，管夫人、赵子儿同行陪伴皇帝左右。闲谈之际，两人翻出昔日薄姬盟誓之事，少不了一番嘲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高祖听后，反而觉得，薄姬作为一介女子，倒有些英豪之气，顿时有了好感，很快就召见了她。

被冷落一年之久的薄姬，觉得机会来了。在帝王之家，想要恩宠

日久，单靠以色事人，无疑缘木求鱼，唯一可行之路就是为皇家开枝散叶，生下一儿半女。

当高祖亲近她时，薄姬故作扭捏，说：“夜来妾得一梦，梦到有龙距于胸口，不知是何征兆。”

这话的用意，实在明显不过了。

因为关于高祖身世，流传着一个很广泛的说法。想当年，高祖生母刘媪外出久久不归，刘太公很着急，前去寻找，当时天色大变，乌云密布，天地一片昏暗，天空中雷电交加，太公顶着风蹒跚前行，后来在一片大泽之旁，远远望去，刘媪处在昏睡状态，一条蛟龙伏在身上。

据说，刘媪回家不久后，就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了高祖。高祖鼻梁很高，额角饱满，种种迹象表明，他是龙种，而非凡人。

很明显，这是为了政治需要编造出的蹩脚的政治神话。

政治神话就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地位决定了人生高度，薄姬说出这番话，显然与民间夫妻之间闲话家常不同，看似无意，实则充满了强烈暗示。

高祖当然懂了，当即说：“此梦非同寻常，是福贵征兆，我来帮助你实现。”

一夜雨露，薄姬有了身孕，生下一子，便是刘恒。

此后高祖的所有爱都倾注在戚夫人身上，至于薄姬母子，渐被淡忘。

高祖晚年，朝野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戚夫人与吕后之间的夺嫡之争上。薄姬由于不受皇帝宠爱，得以置身后宫斗争的旋涡之外。

在剪除诸王之后，高祖将儿子们封为新的诸侯，刘恒被封为代王，那一年，他刚满八岁。

高祖去世后，像戚夫人这类在高祖生前备受宠爱的姬妾，无一例外地遭到吕后疯狂报复，多数人都被幽禁至死。

反倒是薄姬，由于长期受到冷落，没招惹吕后嫉恨，得以逃脱毒手。最终，在弟弟薄昭陪护下，跟着儿子一起去了代国。

此后数年间，汉朝宫廷内腥风血雨不断，朝堂政局诡谲多变，而刘恒母子因远在塞北边疆，没有被波及。北疆日子虽过得苦，但好歹母子团聚，一家人在一起，也是难得逍遥自在。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诚哉斯言!”

刘恒无论声望还是势力，都太弱小，对吕后无法构成威胁，所以活到了最后。

疾风过岗，巨木尽折，唯劲草存焉!

代国土地贫瘠，冬日漫长，外有匈奴虎视眈眈，想在这片冰天雪地活下来，实在很难。在这里，大多数人不死于暴风雪，就会死在匈奴人的弯刀之下，能熬到最后之人，没有几个。

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就这样，吕后又一次放过了刘恒。

## 喋血王冠

帝国的权力中枢在京城，根基在地方。经过数年经营，吕后已经牢牢控制了朝政大局，可在全国各地的支持力量依然很薄弱。

想要彻底扭转局面，必须削减刘氏宗亲诸侯，扩展吕氏版图。但是这一点，岂是朝夕之间能完成的？而且一旦操作力度太大，引起刘氏宗亲联合反扑，恐怕得不偿失。

吕后看似强势专横，实际上，她每走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

刚开始，她从齐国割出一郡之地，封作吕国，对刘氏来说，这不

过是很小地退让了一步，然而对吕氏来说，却是迈出了一大步。

吕后这是在试探，就是想看看宗亲和朝臣们有何反应。她发现，朝野之间并没有出现激烈的反对之声，大家都保持了沉默。人性的自私，决定了没有人敢做出头鸟。

于是，吕后决定，加紧扩展吕氏的政治版图。

就在梁王刘恢被迁封赵国后不久，吕后就将刚刚被封为吕王不到一年的吕产，改封为梁王，随即将梁国改为吕国。

一招偷梁换柱，将吕氏的封地扩大了好几倍。

紧接着，吕后封二哥吕释之之子武信侯吕禄为赵王、侄孙东平侯吕通(吕台之子)为燕王，吕通之弟吕庄继任东平侯。

不过，吕后新封的诸侯王，基本都不前往就国。

惠帝的那几个被封王的儿子，都是幼年孩童，根本没法离开长安，不过是名义上的王而已。至于吕家的吕产、吕禄等人，吕后要留在朝中辅佐自己。

吕产还以吕王身份，兼任帝太傅。天子的教育问题，从来都是帝国的头等大事，西周初，即设有太傅，与太师、太保并号三公，地位相当尊崇，一般由重臣兼任。理论上，三公都肩负着教育天子的责任，但一般情况下，也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已。

太傅一职只不过是名誉虚衔罢了，朝廷一般不常设此职，只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安抚某个功勋卓著的大臣临时给予此名誉头衔，比如王陵就曾被授予太傅。

既然如此，吕后为何给吕产授予这样一个貌似高得吓人，实则百无一用的官衔呢？

原来，皇帝教育出了大问题，一度让吕后颇为尴尬。

少帝即位以来，吕后忙着巩固权力，疏于对少年天子的管教，本想他也不过是个几岁娃娃，就是自己手中一枚棋子而已，所以根本没在他身上给予太多关注。

然而，殊不知，小孩子是会一天天长大的。少年时期，正是叛逆期，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迟早会出乱子。

果不其然，随着年龄渐长，少帝已经从懵懂儿童变得知晓世事，周围不少风言风语，也传到他耳中，他渐渐得知自己并非惠帝张皇后所生，生母其实早已遇害，死于吕后手中。

小孩子没有城府，心里藏不住事，听后心中既悲痛，又气愤，情急之下，口无遮拦地嚷嚷道：“太后竟然杀害我的亲生娘亲，却让别人冒充顶替，待我长大后，一定会报仇。”

小皇帝的话很快被吕后得知。

吕后勃然大怒，心想，这还了得，绝不能让这小兔崽子长大。于是，她召见群臣，当众宣布：“皇帝久病不愈，以至于出现精神恍惚，恐怕实在难以治理天下了，因此继续坐在皇帝位置上，有点不合时宜了，应该另行换一位皇帝才行!”

换皇帝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大事，按理在朝廷中应该有不同意见，但如今面对吕后的高压专断，谁敢说不？

群臣纷纷表示，太后这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为江山社稷着想，臣等一致赞成，完全拥护太后英明决定。

就这样，少帝在当了四年傀儡皇帝后被废黜，囚禁在永巷，禁止周围人接近。没过多久，吕后暗中使人将其杀害。

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少帝被废一个月后，吕后另立惠帝儿子恒山王刘义为皇帝。

刘义本名刘山，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四月，被封为襄城侯。

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惠帝的另外一个儿子恒山王刘不疑死了，刘山便被改封为恒山王，同时，改名为刘义。

谁承想，如今又被立为皇帝，同时，又被改名为刘弘。

短短四年间，这位少年，先后被封侯、封王、称帝，又接连换了三次名，看似人生不断飞跃，其实命运一直操弄在吕后手中，不管称呼如何改变，但本质上依然不过是一件政治点缀品而已。

刘弘年幼，依然被称为少帝，不过，为了区分已被废的少帝，称作后少帝。

本来依照礼制，新皇帝即位，必须要改元，以显示新朝新气象，但由于朝政大权都尽操控于吕后，如今大汉朝廷，她才是真正的无冕女皇。因此，连这种表面文章，她都觉得没必要做。

所以，尽管换了皇帝，朝廷并没有改元。

有了前少帝的经验，吕后对少帝刘弘其实也不大放心，让吕产出任太傅，当然有监督督促之意。

除了废立天子、在朝野树立绝对权威之外，她对在长安的刘氏宗亲也丝毫没放松警惕。当然，吕后知道，刘氏力量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被斩尽杀绝，故而，她用铁腕铲除了高祖三个儿子的同时，也同时懂得拉拢另外一些人。

在没有绝对把握一举消灭所有敌对力量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逼得对手狗急跳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分化他们，防止他们串联结盟。

权力斗争的手段，不外乎弱化对手力量，扩充己方势力，在此消彼长间，实现压倒对手的目的。

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运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

吕后宣布，将外甥女(吕后胞妹吕媭女儿)嫁给营陵侯刘泽，让吕

福女儿与朱虚侯刘章结亲。

这样一来，既可以向这两位刘氏宗亲列侯示好，自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同时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可以随时掌握二人的一举一动。

可以说，吕后已经将政治联姻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发挥到了极致。只是，她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她失算了，这两位吕家的姑爷，将来都成了诛灭吕氏的急先锋。

因为，刘泽和刘章可不是刘友、刘恢，在枕边安插一个吕家女儿，就会被制得服服帖帖的。

先说刘泽，要论血缘，他其实跟高祖一脉已很疏远，按照辈分，是高祖远房堂弟，早年生平不详，初次露面是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平定陈豨之乱中。此战中，他擒获了陈豨的部下将军王黄，因功封侯。

实事求是地说，刘泽靠着微薄战功而封侯，实在有点勉强。只不过，当时正赶上高祖剪除异姓王、扩大同宗力量的好时机罢了。

吕后之所以看重刘泽，并非他的营陵侯爵位，而是他担任的大将军职位。大将军可以调动军队，这才是让吕后颇为忌惮的。

不过，刘泽对现状并不满足，他不甘愿就这样在大将军一职上长期待下去，他的志向在于裂土封王。

可现如今是吕后当政，诸侯中高祖的亲生骨肉都被接二连三除掉了，作为一名远房宗亲，能保住性命无忧就不错了，想要封王无疑是痴人做梦。

不过，事在人为，看似无法做到的事，总有一些奇人能够让它实现。

刘泽封王的梦想，就是在一位奇人运作下实现的。

此人是一位齐国田姓书生，姑且称他为田生。

田生喜欢到处游逛，但是囊中羞涩，钱不够花。不过对于有想法的人来说，钱从来就不是个事儿。没钱花没关系，可以出售点子换钱花。他找到刘泽，不知帮他出了个什么主意，总之，哄得刘泽很高兴，刘泽心情一好，一口气赏了二百斤黄金。

有了这么一大笔钱，田生立刻结束行程，返回齐国去了。

估计田生帮刘泽出主意解决的问题，是见不得光的事。为了防止引人怀疑，第二年，刘泽特意派人给田生带话，让他不要再跟自己来往了。

田生敏锐地意识到刘泽遇到了麻烦，便收拾一番后，赶赴长安。

他抵达京城时，正赶上赵幽王刘友被饿死不久，刘氏和吕氏的斗争已呈白热化，京城的刘姓宗亲们无不人心惶惶。

在此特殊时期，去拜见刘泽，无疑是去给他添乱。田生决定从暗中助刘泽一臂之力。

他先在长安觅得一处宅院，让儿子去接近吕后身边的红人大谒者张卿，一来二去，数月时间过去了，也算混了个熟脸，田生让儿子邀请张卿到家中做客。张卿倒也没推辞，爽快答应下来。

在官场这么多年，张卿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依然被田生超乎规格的接待场面而震撼到了，宴席上摆满了各种精美器具，各色美味佳肴轮流上桌，房内挂上了奢华帷帐，显得豪华气派，不亚于王侯住处。

在如此奢华的环境下聚餐，心情自然很不错，两人推杯换盏，酒意渐浓，田生眼看火候差不多了，便屏退左右侍候之人。

“这些日子以来，我在长安游历，发现京城百余座诸侯宅邸，多属于高祖之时的功臣，如今太后年事已高，而吕氏势力很弱，她现在

心中必然忧虑。但是忌于群臣反对，又不敢主动提出，足下作为太后身边近臣，圣眷正隆，又深受群臣尊崇，在如此关键时机，应该有所作为才是啊!”田生不动声色地说道，看上去完全是为张卿着想。

张卿一时间吃不准田生到底是何用意，沉吟不语，没有表态。

田生见状，话锋一转说道：“作为内臣，就该为主分忧，说太后想说却又不便说的话，应该向太后主动提议封吕家人为王，博得太后欢心，事成之后，您就算封万户侯也不在话下。倘若还迟疑不定，让别人抢到前面，恐怕足下富贵难保不说，祸事临头也不远了。”

张卿恍然大悟，回去后，找了个合适时机，巧妙地向吕后提议封吕家人为王。此举正中吕后下怀，随后，她在朝堂上，就张卿的建议向大臣们征询意见，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一听，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众人当下纷纷附和，赞成封吕产为王。

吕后对张卿此次表现非常满意，事后给他赏赐黄金千斤。张卿没有忘记田生，将一半黄金送到田生住处，以做酬谢。令人意外的是，面对金灿灿的黄金，田生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了。

张卿觉得有点过意不去，问田生，自己要怎么感谢他。田生趁机说：“如今吕产封王，太后高兴了，但大臣却未必心服，吕氏的危局并未完全解除，想要他们无话可说，最好还是安抚一下刘氏宗室。”

这些年来，张卿一直陪侍在吕后身边，亲眼见证了三位赵王被接连诛杀，深知刘氏宗亲和满朝文武无不人人自危，如果再不适当缓和一下，恐怕难免出大乱子。

眼见张卿不吭声，田生知道他被自己说中了，遂继续说道：“营陵侯刘泽是宗亲，又是大将军，面对目前局面，心中肯定有所不满，足下何不向太后建议，随便划出几个县给他封王，顺势将他撵出京城去就国，如此一来，既解除了吕氏的威胁，又抚慰了刘氏宗亲，何乐而不为呢？”

张卿随即将田生的话原原本本转述给吕后，吕后觉得有道理，便

同意将齐国的琅邪郡划出来，建立琅邪国，册封刘泽为琅邪王。

对于田生在幕后的活动，刘泽毫无所知，所以当突然接到朝廷封王的诏令时，他大感意外，事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由于事出仓促，他本打算收拾收拾再出发。

就在此时，田生出现在刘泽面前，催促他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舍不下你那些坛坛罐罐，别再磨叽了，赶紧出发，抓紧时间逃命吧，要是等太后回过神来反悔了，想走都来不及了。"

刘泽一听，立刻携带家人与田生一起离京，一路上马不停蹄，星夜兼程赶路。

果不出田生所料，事后不久，吕后就后悔了，马上派人去追，只是，此时刘泽一行早已出了函谷关，犹如鸟儿出笼、鱼儿脱网，一路向东远去，根本追不上了。

刘泽溜走后，留在京城的年长一点的刘氏宗亲就属朱虚侯刘章了。

汉初以来，诸侯王子弟多留在京城，在宫中担任值宿护卫。

刘章是高祖长子齐悼惠王刘肥次子。

刘肥死后，长子刘襄袭位，刘章和弟弟刘兴居分别被封为朱虚侯和东牟侯，负责汉宫安全工作。

眼看着刘氏诸王一个个被吕后诛杀，诸吕陆续封王，刘章心中非常不忿。他此时不过二十来岁，正值血气方刚之时，加上他天生一身气力，为人自视甚高，认为自己作为高祖长子之后，却被安排给吕后看家护院，这是一种耻辱。

在刘章看来，高祖去世后，帝位理应由作为长子的父亲来继承才对，退一步，作为嫡子的惠帝继承倒也说得过去，但惠帝死后，就该由高祖长孙齐王刘襄来继承，而不是任由吕后随便找个来路不明的孩

子安插在皇位上。

不过，如今吕后把持朝政，这些话只能咽到肚子里。虽不能明着来，但刘章一直想着，总得找个时机打击一下吕家人的嚣张气焰。

机会终于来了。

一日，吕后在宫中举行宴会，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吕氏新贵。刘章被安排行酒令，维持秩序。

刘章说，自己是个武夫，行酒令需按照军令来。

行酒令，也不过是为了活跃一下宴会气氛，没有人将这种酒桌娱乐活动太当回事。所以，当刘章一本正经提出按照军令行酒令时，吕后被逗乐了，行行行，你说咋办就咋办。

在她眼里，刘章就是个半大小子，她根本没仔细琢磨，刘章这样做背后是否还有什么用意。

待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众人都差不多喝高了。

刘章提出，给大家献舞助兴，吕后表示同意。一曲舞毕，刘章看上去意犹未尽，又说："请太后允许我为您唱一段耕田歌。"

吕后此时兴致不错，笑盈盈地戏谑他："你父亲对农家耕作之事应该很熟悉，至于你嘛，一生下来就是王子，怎么会懂得耕田之事呢？"

不过，刘章却没有笑，而是一本正经地回道："臣了解。"

吕后听后不改笑意，继续揶揄道："好好好，那你倒是给我讲讲，庄稼应该怎样种？"

刘章清了一下嗓子，唱道：

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这几句歌词，表面看全都是说种庄稼的方法，耕种时翻土要深，种子要密实，苗秧之间间距要稀疏，一旦发现长出杂草，必须立刻铲除。

实际上，刘章一语双关，暗讽吕后对非己生的诸王的清除行动。

吕后当然听懂了，只是保持沉默，若有所思，半晌不说话。就在此时，有位吕氏族人喝醉了，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便瞅了个机会，偷偷逃离了酒席。

不料，很快被刘章发现，刘章立刻追上去，二话不说，当场就把他给宰了。然后，返回来面不改色地向吕后汇报："有人竟敢不遵守军法，擅自离席，臣已经将他就地正法了!"

在场的人听后，无不大惊失色，没想到，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那位吕氏族人就丢了性命。吕后虽然不悦，但苦于有言在先，也不好责怪他。这场酒令杀人事件，最终只好不了了之。

好好的酒席，突然让刘章这么一闹，吕后再也没心情喝酒了，只得宣布宴会到此结束。

经此事后，吕家人都看出来了，别看刘章年纪不大，却是个狠人，路上见了他，就远远躲开，免得招惹这个灾星。

经过此次宴会风波之后，朝中不少心属刘氏的大臣，看到了一丝希望，开始逐渐暗中向刘章靠拢，被吕后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刘氏宗亲们总算缓过神来。

刘章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打击一下吕氏的嚣张气焰，没想到杀了一个无名之辈，却发生了如此的变化，恐怕他自己也始料未及。

世间很多貌似很强大的势力，人们往往被其表象所震慑，实际上，往往只要轻轻捅一下，就会轰然倒塌了。

器满则溢，月盈则亏。看似不可一世的吕氏势力，实则已走向穷

途末路了。

## 南越难题

自高祖去世后，吕后成了大汉帝国的无冕女皇，掌握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看似可以恣意妄为，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当这个家并不容易。

大汉建立在秦末战乱的废墟之上，虽说吕后执政十余年间，并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乱，国家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历经多年战乱，整个社会早已千疮百孔。为了维系帝国安定，其间的艰辛，唯有她自己知晓。

这些年来，帝国内部灾异不断。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正月二十七日，在陇西郡羌道县(今甘肃舟曲县西北)、武都道(今甘肃西和县南仇池山东麓)一带，突然大地震动，一时间地动山摇，引发大面积的山体垮塌。由于地处偏远，关于此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没有留下任何官方记载。

同年六月三十日，正值盛夏，晴空万里，农夫在田间劳作，商贾在路上奔走，官员们正常办公，一切看上去与往日没有任何不同。但突然间，太阳出现亏缺，很快失去光芒，天地间一片黑暗，白昼瞬间变成黑夜。

作为有着发达且绵延不绝的史官传统的古老国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对星相天文的完整记录。古人如同今人一样，时常仰首遥望浩瀚星空，对深邃空际充满了好奇，一直没有停止对宇宙奥秘的探索。

只是拘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月星辰的运行，都与尘世密切相关，日月盈昃都是上天在冥冥之中给人间统治者暗示的天机。

天象与政治结合起来，作为一项政治伦理规则，到了汉初已经深

入人心，不仅仅是统治者驾驭民众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成民众审视上层的标准。当然，这种理论还处在很粗糙的状态，要等到一位大汉帝国历史上的牛人登场后，它才会得到进一步完善，但这并不妨碍日食这样的天文现象给统治者造成压力。

未央宫上空的太阳，没多久又恢复了昔日的光芒，但短暂的黑暗，给吕后形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她本能地以为这是上天在警告她。

此后数年间，天灾频仍，水患不断，重大灾变记录如下：

高后三年夏，汉中、南郡洪水肆虐，四千余户人家被淹；

次年秋，伊、雒两河泛滥成灾，受灾百姓达一千六百多户，同时，汝水泛滥，淹没八百户人家；

高后八年夏，汉中、南郡再次爆发洪灾，淹没六千多家，紧接着南阳沔水泛滥，遭灾百姓更是多达一万户；

……

可以说，吕后当政这几年间，天灾人祸从来就没断过。政敌们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绝佳的可以做文章的机会，穿凿附会，说这是上天对她打击刘氏、分封吕氏表达的强烈不满(《汉书·五行志》)。

同样，外部环境也很严峻，帝国边疆从来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稳。在北方，虽然惠帝时，含垢忍辱，给匈奴送钱送粮送女人，但匈奴人依然贪得无厌，仍在边疆侵扰不休。

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冬十二月，匈奴杀入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烧杀一番后，劫掠两千多百姓后呼啸而去。

而就在前一年，狄道已经被匈奴抢劫过一次，同时匈奴还攻陷了

阿阳县(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

北方匈奴添乱，南边南越也不安分。

有关部门请示吕后，对南越采取经济制裁，严禁铁器等物品出口。不料，南越王赵佗得到消息后，一怒之下，于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悍然自称南越武帝，这是对大汉权威赤裸裸的公开挑衅。

赵佗是何许人也，竟敢挑战大汉帝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一切还要从南越的起源说起。

神州大地大江大河不少，然以黄河、长江为首，黄河纵贯中原，从上古起，三代以降，中华文明率先在黄河两岸及其支流流域发源。至于长江以南，虽有楚、吴、越等古国绵延数百载，但一直被中原文明斥为蛮夷。至于地处岭南(岭南是指五岭之南，五岭由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岭南大致涵盖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的百越地区，更是被视为蛮荒之地。

所谓百越，是对包括扬越、外越、东瓯、闽越、南越、越隽、西瓯、骆越、句吴、于越等众多族群的统称，他们族源不同，互不统属。在古籍中“越”与“粤”互通，故百越又被称作百粤。

这里高山峻岭，一望无际的原始林区中弥漫着莫名的瘴疠之气，到处野兽虫蛇出没，气候高温、潮湿、多雨，百越人大多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基本尚处在未开化的蒙昧状态。

战国之际，楚国版图急速扩张，其势力扩展直达南海，触角伸到百越地区，并在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设立楚庭。今广东一带的越人向楚国纳贡，表示臣服。

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始皇帝开始将目光投向这片遥远而又陌生的区域。次年，始皇帝派大将王翦南征百越，令五岭之北扬越(今湖南郴州一带)臣服。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帝命屠睢发卒五十万，兵分五路进攻百越：一路至镡城(今湖南省通道西南)，一路至九嶷山(今湖南省江华附近)，一路至番禺，一路至南野(今江西省南康)，一路至余干(今江西省上饶北)，分别攻击诸越。

秦军入侵，遭到越人的强烈反抗。尽管越人当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兵力，都无法与久经战火的秦军相比，但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与秦军周旋。

长期以来，秦军熟悉山地战与平原野战，但对丛林战毫无经验，加上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使得秦人强弩效果根本发挥不出来，导致战斗力大大减弱。

战争整整进行了三年，秦军被越人拖入亚热带雨林的战争泥沼中，丛林深处的毒箭与陷阱，成了许多秦军士兵的葬身之地。屠睢本人也死于攻占瓯越的战争中。

此次南征百越，除了征服东越、闽越外，其他诸越之战皆受挫。

赵佗正是在此次战争中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赵佗，真定县(原秦恒山郡东垣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人，早年生平不详，南征百越时，作为其中一方军主将任嚣的副手。

始皇帝横扫六国，志在天下，岂能向区区百越之地服输？得知屠睢兵败身亡后，决定再次发兵出征，力图一举荡平百越。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廷征召曾经逃亡之人、因贫穷入赘女家的男子、商贩等入伍(古代社会，上门女婿和商人地位低贱)，共三十万，攻掠陆梁地(即岭南，《史记正义》称“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想通过征服岭南，实现神州大地的真正一统。

此次秦廷改变了分路进攻作战的方式，集中兵力攻占，依靠强大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很快征服了百越。

平定百越后，秦廷置桂林(治所在布山县，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下辖今广西都阳山、大明山以东，九万大山、越城岭以南地区，及广东省肇庆市至茂名市一带)、南海(治所在番禺县，即今广东省广州市，下辖今广东滃江、大罗山以南，珠江三角洲及绥江流域以东)、象郡(治所在临尘县，即今广西崇左县境，下辖今广西西部、广东西南部及贵州南部。另外一说，称治象林，即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南茶荞一带，下辖今越南北、中部地区及中国广西西部)三郡。

任嚣出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

为防止越人再次反叛，始皇帝下令将五十万中原人迁居五岭，与南越的本地人杂居。

中原人远离故土，移居他乡，日子久了难免动思乡之情，任嚣、赵佗联合上书，要求朝廷征集三万名尚未婚嫁的适龄女子赴岭南，一方面为戍守士卒缝补衣物，同时可自主婚配，以此达到扎根当地的目的。

始皇帝最早批准征一万五千女子，前往岭南。大规模的移民，深刻改变了百越地区的人口结构。华夏族人与诸越杂居，文化交融，使得岭南自此成为大秦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始皇帝去世，大秦内乱，诸侯纷争，中原战火连绵不断，帝国中央自顾不暇，更不用说顾及边陲之地。

消息很快传到岭南，作为大秦的地方军政官吏，该何去何从，考验着任嚣和赵佗。

是北上帮助朝廷镇压义军，还是留在任上，保护一方的安宁？两人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后，毅然选择了后者，认为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设法阻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

此时，任嚣已是病入膏肓，自感来日无多，他召来赵佗，托付后事。

“我听说陈胜兴兵作乱后，项羽、刘邦等人在各地纷纷响应，群雄豪杰并起，究其因都是秦朝暴政逼迫所致。如今，中原战乱四起，战争不知何日才能终止，南海虽然地处东南一隅，但是我很担心随着中原战事的不断扩大，迟早有一日会波及我们这里，应该早做准备才是。”

赵佗自然知道，以目前南海郡兵力，就算北上，也难以挽回大秦覆亡的命运。再说了，以大秦数十万性命换来的百越之地，好不容易才刚刚平稳下来，根本经不起丝毫风吹草动。

况且，赵佗自南征以来，已抱着终老南海的决心，早无北返之意，因此，任嚣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

任嚣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拉着赵佗的手说：“为今之计，赶快切断与中原的通道，割据自保，番禺背靠险要山势，南方有大海做屏障，东西数千里，又颇有些中原人士可以依靠，有了这些，完全可以建立国家，自保有余。只可惜呀，南海郡的同僚中，无人可以一起商量大事，数来算去，唯有你值得托付。”

叮嘱完毕后，任嚣当场就向赵佗颁发任命文书，让他代行署理南海郡事务。

任嚣去世后，赵佗立即传檄给横浦关(今广东省南雄县东北、江西省大余县西南大庾岭上之梅关)、阳山关(今广东省阳山县东北锣寨岭上)、湟溪关(今广东省英德市西南连江注入北江处)等南越连接外界通道上的重要关口，对守关将士们宣称：“盗贼将至，大家立刻断绝道路，集结队伍，做好自卫战斗准备。”

原秦朝任命的官吏中，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赵佗在此次备战行动中，将他们统统肃清，然后安插上自己的亲信。

秦朝灭亡后，赵佗趁着楚汉争雄，无暇南顾之际，出兵吞并了桂林郡与象郡，割据立国，建号南越，自称南越武王。

就在此时，中原大地的战火渐渐熄灭，高祖赢得了楚汉之争，平

定各路诸侯，建立大汉，天下重归一统。

作为大秦帝国法统直接继承者，高祖理所当然地认为，大汉对南越享有主权，只是帝国初建，社会一片凋敝，百业待兴，实在无力再发起一场针对南越的统一战争。

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是不用战争，能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当然最好不过了。

以前外交事宜，基本都是郦食其帮高祖解决，只是如今他已死，唯有另觅他人了，好在高祖身边有个幕僚，口才出众，楚汉之争时，曾多次奉命出使诸侯各国，颇有些名声。高祖便想让他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附大汉。

此人名叫陆贾，楚人。

## 二帝并立

高祖给陆贾此行出使交代的底线是，大汉可以承认南越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但南越必须接受大汉帝国作为中央王朝的地位，也就是说，大汉与南越并非对等并立两国，而是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在这前提下，大汉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南越的现行制度和内部自立。

陆贾使命艰巨，而他身后并没有护卫军队，随身携带的，只有一颗朝廷颁发给赵佗的南越王印玺。

从长安到番禺(西安至广州)，路途迢迢，即使是交通便捷的今天，也是一趟遥远的旅程，在两千多年前的汉初，路更加难走。陆贾从清爽干燥的大西北出发，一路跋山涉水，向东南海滨进发。

陆贾沿途骑马走陆路，乘舟行水路，穿越密不透风的原始林区，翻过崇山峻岭，加上许多地方道路被赵佗人为破坏，每前行一步，都是万分困难。

好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陆贾终于安然抵达番禺，见到了南越武王赵佗。

不过，初次见面并不理想，赵佗在告别中原多年后，终于首次见到故土来人，但丝毫没有他乡闻乡音的激动，反而摆出一副高傲冷淡的姿态。

陆贾见赵佗无论着装还是发饰，已经完全南越本土化了，他梳着南越人流行的锥子型发髻，岔开两条腿，满不在乎的神情挂在脸上。

陆贾算是看明白了，赵佗这是故意给他一个下马威。但是越是刻意这样，越表明他是刻意掩饰内心真实想法。

作为一名外交老手，多年来，陆贾跟形形色色的人物打过交道，也是见过世面之人，所以并没有感到丝毫尴尬和愤怒，反而处惊不乱，表面上风轻云淡，根本看不出情绪的变化。

在外交博弈中，实力决定一切，嗓门大并不能解决问题，任何谈判场合，都离不开身后的实力支撑，如果没有强大的后盾，任你有再高明的谈判技巧和语言天赋，都是毫无用处。

要是真的靠一张嘴皮，就能解决问题，还要强大的军队干什么？

陆贾觉得，要打掉赵佗的傲气，就必须让他明白大汉的实力。

毕竟在这世界上，还是拳头大的人说话比较管用。当然，外交场合中大家毕竟是文明人，不能一上场就亮拳头，还是需要谈谈礼乐文化。

“大王您本是中原人士，祖先和亲戚故旧坟墓都尚在真定，但没想到，如今您却忘却了中原风俗，抛弃祖宗衣冠，蜗居在南越弹丸之地，妄图与大汉为敌，对抗天子，恐怕祸事临头，尚不自知，我深为您忧虑!”陆贾一张口，就击中了赵佗的软肋。

一个人想要在异国他乡落脚生根，必须入乡随俗，真正融入当

地，让土著人士认可你是他们中的一员才行。

赵佗南来以后，为了让中原华夏族人与越人融合，减少外来移民与本土人之间的矛盾，带头改变衣冠，改变风俗，这本身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走之路。

不过，对于一个生于中原，长于中原的人来说，华夏文明早已根深蒂固地浸透于血液，岂是生活环境的转移，就能轻易改变？从内心深处来说，赵佗对中原礼乐文化，依旧充满了深深的依恋，难以割舍。

正因为如此，当陆贾一张口就数落他数典忘祖时，他默然无语，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陆贾见状，继续发动心理攻势："秦朝暴虐无道，诸侯并起，豪杰逞强，唯有汉王率先入关灭秦。后来，项羽背盟，自号西楚霸王，一时间看上去强大无比，诸侯慑于其淫威，皆归附于他，结果如何？汉王从巴蜀起兵，不出五年，就消灭项羽，臣服诸侯，平定天下，中原重新一统。能做到这样，难道仅仅是人的能力所能办到的吗？是天意所属!"

在一番义正词严的外交宣誓之后，陆贾容不得赵佗反驳，立刻进行威吓道：

"听说您在南越擅自称王，大汉朝堂之上，群臣无不义愤填膺，争着想率兵前来踏平南越。只是天子仁慈，以百姓为念，觉得如今天下刚刚脱离战争，实在不忍再燃战火，以致荼毒百姓，才派我前来，代表朝廷授予南越王金印，剖符为信，互通使臣。谁承想，天子使臣莅临，您不但不行郊迎之礼，面北称臣，反而在此摆出桀骜不驯的模样，妄图想以新拼凑起来的小小南越对抗朝廷，实在不自量力。试问，此事让朝廷知道了，天子震怒之下，下令刨掘您祖坟，灭您宗族，而后，再派一员无名偏将率十万之师南来，届时，恐怕惶恐不已的南越人为了自保，会争着杀您降汉，南越的覆亡不过易如反掌之事。"

这番话可谓逻辑缜密，有礼有节，并且恩威并施，恰到好处，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听得赵佗心惊肉跳，不觉汗出。

陆贾这套外交辞令，实在是高明至极，妙就妙在它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大汉与南越关山相隔、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赵佗对朝廷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多少，因此，短时间他根本来不及搞清陆贾的言辞哪些是货真价实，哪些是虚言恫吓。

赵佗再也坐不住了，当下站起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久在蛮夷，有些疏忽礼节了，先生勿怪。”不过，赵佗毕竟是一代人杰，单靠三言两语就能将他混弄过去，显然太小看他了。

“依先生之见，相较于萧何、曹参、韩信等人，我与他们，谁更胜一筹？”他试探着问道。

陆贾是个聪明人，知道说话分寸，马上回答说：“您似乎要比他们强一些。”

赵佗虚荣心得到满足，进一步问道：“那么，与大汉皇帝相比又如何呢？”

事关原则，涉及大汉天子的尊严，就决不能退让。

陆贾立刻正色驳回道：“皇帝自丰沛兴义兵，诛灭暴秦，横扫强楚，上继承五帝三皇之伟业，下统御之民数以亿计，土地方圆万里，政令出于一人之手，开创亘古未有之盛业。反观您，治下民众不过数十万，且多为愚昧蛮夷，土地拘于山海一隅，究其规模，充其量也不过是大汉的一个郡罢了，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赵佗听后也不以为忤，倒是豪迈地大笑起来，自信满满地说：“我只是时运之故，错过了在中原起家的机遇，偏安一隅称王。试想要是我在中原，又怎知我不如汉王？”

最终，赵佗同意接受汉廷册封，向大汉称臣。

公事办完了，该聊点轻松的话题了。

两人话越说越多，愈加投机，赵佗一时也舍不得让陆贾走，就挽留他住一段时间，再走不迟。

此后，二人常在一起饮酒作乐，赵佗趁着酒意，对陆贾掏心窝："在南越这么久，身边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倒是你的到来，让我听到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趣事。"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数月过去了。是时候回去复命了，陆贾辞行时，赵佗有点依依不舍，给他赠送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礼物。

陆贾靠三寸之舌，就使南越归顺称臣，维护了南疆的安宁，可谓厥功甚伟。高祖对他此行非常满意，授予陆贾太中大夫。

高祖出身市井，习惯了自由洒脱，是个性情中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反感拐弯抹角，更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掉书袋子，一看见咬文嚼字的儒生，就不给好脸色。

但陆贾不以为然，依然不改儒生本色，他于皇帝面前谈话时，常引经据典，张口《诗》云，闭口《书》曰，次数多了，惹得高祖很不高兴，你这是在欺负朕读书少呢!

一次，高祖忍无可忍之下，张口就骂道："少在我面前啰唆这些酸文，老子的天下是在马上打下的，《诗》《书》顶个屁用!"

在皇帝那儿碰了钉子，但陆贾并没流露出尴尬的神色，反而一脸严肃地回答说："陛下可以在马上取天下，难道能在马上治天下吗？殊不知，攻守各有不同，纵观前代圣王如商汤、周武，无不以武力争得天下后，迅速调整方略，以文治国，国运得以昌盛，享国绵延久长。反观那些只懂炫耀武力的君主，如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晋国大夫智伯，最终无不身死国灭，贻笑后世。远的咱们不说，近世秦朝只知严刑峻法，不知调整变通，结果自取灭亡。如果秦朝一统天下后，及时改变治国方略，效法先圣，实行仁义之道，恐怕也不会有陛下什么事了吧？"

高祖自身毛病不少，但他分辨得清是非曲直，听得进去不同意见，不像项羽一般，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这也是高祖不断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再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陆贾的一席话，让他立刻醒悟过来，觉得陆贾说得在理，当下拜托陆贾给他写一些分析秦亡汉兴根本原因以及古代历朝兴衰和治国理政得失的文章，以备自己参考。

回家后，陆贾挑灯披阅典籍，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连续写了十二篇分析前朝得失的文章，献给皇帝。

高祖仔细阅览后，发现每篇文章都写得很中肯，切中要害，令人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后来这些文章被集结成册，世作《新语》。

不过，就陆贾一生来说，他的主要功业，还是建立在对南越的外交活动上，他的名字注定要与南越联系在一起。

陆贾与南越的缘分远没到头，后文还会提到。

再说高祖去世后，惠帝即位，最初几年，南越与大汉之间相安无事，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秋七月，赵佗还一度派人给朝廷称臣纳贡。

赵佗此举究竟是纯粹为了向大汉新天子示好，还是趁着朝政大变之际探听虚实，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但若结合后来发生的事，就会发现此次进贡活动很不单纯。

因为，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就是大汉与南越之间的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化解。

之所以暂时没有爆发冲突，那是因为目下双方都在忙于处理内政，无暇分身而已。

从汉廷而言，很难容忍在南疆之侧有一个割据区域大国的存在，而南越对于汉的警惕自始至终也从未放松过。

此外，赵佗建立南越以来，野心勃勃，从未放弃过对周边扩张的想法，尤其是与南越相邻的长沙国，国力弱小，难免引来野心勃勃的赵佗的觊觎。

值得注意的是，赵佗派人纳贡的前一年，长沙王吴臣刚去世，新王吴回即位。国内新丧，新君初立，千头万绪，边防难免出现疏漏。

赵佗此次纳贡，究竟是派人直接到长安，还是移交给大汉边境官吏，史书没有记载，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少不了与长沙国打交道。考虑到数年后，赵佗发兵攻打长沙国，此次朝贡很有可能是一次探路行动，是在为以后的战争做准备。

这样的推测，并非笔者臆想，而是有事实依据。古往今来，两国使节往来，任务从来就不单一，除了公开的外交活动外，往往还肩负着搜集情报的秘密任务。对于这种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只不过心照不宣而已。

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大汉已经第四代天子在位了(高祖、惠帝与前后两位少帝)，长沙王也换了四代(此时吴回已死，其子吴右袭位)，但南越王，依然是赵佗。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大汉天子又要不停地换人，但南越王仍旧是赵佗。与其他人相比，他最大的资本就是有大把时光。

人只要活着，就可以做事，心若在，梦便在。赵佗从没放弃逐鹿中原的梦想，他现在静静等待，需要的是一个借口。

就在这年秋七月，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借口送上门了。

就在这一年，吕后听从有关部门建议，下令对南越进行封锁，禁运铁器等物品。

铁器技术含量高，以南越当时的科技水平还无法制作。没有铁，意味着农夫将失去铁犁等高效农具，战士将无锋利的兵刃。

吕后这一招，可谓捏住了南越的七寸要害。

如此下去，恐怕不出多久，南越又要重回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这是赵佗无法容忍的。于是，他决定挑起战争。

开战前，赵佗传出话来：“昔日，高帝立我为南越王，相约互通有无，没想到太后却听从他人谗言，将蛮夷看成另类，断绝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这肯定是长沙王在背后捣的鬼。他这是想靠着大汉这棵大树，吞并南越，自己兼任南越王!”

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总会设法将己方打扮成受害者。

赵佗随即宣布即位称帝，自号南越武帝，派兵攻打长沙国，攻破长沙边境数县，烧杀抢夺，发泄一通后，扬长而去。

长沙国惹不起南越，也无力还击，只得上书朝廷求援，吕后闻知后，恼怒万分。北方匈奴惹不起，连小小南越都打上门了，这口气如何咽下去!吕后当下命隆虑侯周灶，对南越发起反击。

征讨南越，最大的阻力，从来不是敌人的战斗力，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汉军大多来自北方，实在难以忍受高温和潮湿气候的折磨，不少人因水土不服，病倒在途中，疾病很快在军中蔓延开来。

将士们别说打仗，就是行军都很困难，最终连阳山岭都没有翻过去，只得停下来，等待朝廷的命令。

拖了一年后，朝廷只得取消了进攻南越的命令，汉军军事行动以失败而收场，无疑助长了赵佗的傲慢，原来泱泱大汉，也不过如此，自此，逐渐不再把朝廷放在眼里。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赵佗时不时将军队开到大汉边境耀武扬威，同时，用大把钱财贿赂拉拢闽越、西瓯和骆越，在赵佗的威逼利诱下，诸越都先后依附南越，一起建立抗汉同盟。

经过赵佗的不断经营，他下辖国土东西达万里，一时间俨然成了南天霸主。赵佗在国中，乘坐黄屋左纛之车(车盖用黄缯做里子，车衡的左边设有牦牛尾做装饰的旗子，为帝王专用)，公开以皇帝身份发号施令，将自己视为与大汉天子并肩的皇帝。

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二帝并立的局面。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作为中原天朝，大汉肯定难以容忍南越如此无法无天。

只是，此时汉朝方面根本顾不上去惩罚赵佗，因为吕后病危了。

# 第三章 王者归来

## 致命魅影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十月，新的一年开始了。

就在前一个月，燕王刘建去世了，他唯一的儿子也被吕后派人暗杀。如果说，以前吕后打压和铲除刘氏宗室诸侯好歹要制造个理由，现在她连罗织个罪名都嫌麻烦，已经开始有点迫不及待、不择手段了。

刘建死了，继承人没了，燕王宝座空了出来。

十月岁首，新年伊始，吕后封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其弟吕庄继任东平侯。

天下诸侯，如今吕氏已经有了三个，分别是吕王吕产、赵王吕禄(吕后二哥吕释之之子)、燕王吕通。吕(梁)、赵、燕都是大国，吕氏的权力版图在短短数年间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再过几年，吕氏完全取代刘氏是迟早的事。然而，漫长的冬季终究会过去，春天来临了，刘氏宗室的寒冬也终结了。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三月，上巳节。

按照风俗，这一日，长安城内官民都要出城到郊外行祓禊礼，具体活动就是到河边祭祀，洗濯污垢。

吕后此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还是坚持亲自出城祭祀。希望在阳春三月，借万物复苏之际，祈祷自己的身体会好起来。毕竟如今朝政大事都系于她一身，在吕氏与刘氏权力斗争尚未取得压倒性优势

前，她可不想倒下去。

祭祀仪式结束后，在返城途中，经过轵道亭(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即当年秦王子婴向高祖投降之地)时，不知从哪里窜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直接扑向吕后銮车。

由于事出突然，吕后来不及躲闪，腋下被它咬了一下，那个黑乎乎的东西随后跳下车去，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发生得太快，加上当时光线比较昏暗，周围的人都没看清它具体长相，觉得有点像狗，但似乎又不像，没有人说得准。

本来是出城祛邪除晦，没想到却遇到鬼魅般的物事，吕后感到很晦气，让人占卜看看，到底是何方妖孽作祟，是否有禳解之法。

巫师占卜后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在吕后的一再追问之下，他才回答说，是前赵王刘如意的鬼魅作祟。

害死刘如意之事，吕后一直比较忌讳，现在听巫师这么一解释，心中更加心虚和惶恐不安，病情一下子加重了。

并且，她腋下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越来越严重了。

鬼魅作祟之类的鬼话，自然不可信，吕后很可能被狗咬伤后，感染上了狂犬病，导致伤口感染。在古代社会，因为没有有效的消炎药，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口恶化。

巫师的一番话给她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她心头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病情一天天愈加严重起来，终于成为不治之症。

吕后已意识到大限将至，趁着头脑清醒时，开始着手安排后事。对于自己去世后，吕氏的命运走向，她很是忧虑。因为，吕产、吕禄、吕通这些晚辈都是在前人的羽翼下长大的，根本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一旦自己不在了，他们能否支撑住吕氏的江山，她没有信心。

刘氏宗室虽说已受到重创，但全国各地还有不少刘氏诸侯，而且在朝堂上，周勃、陈平、灌婴等开国功臣尚在，跟他们一比，自己的这帮子侄们太稚嫩了。

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只要手中握了刀把子，谅他们也翻不了天。

七月某日，吕后在病榻前召集了吕家重要成员，当场宣布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

汉初以来，为了护卫长安安全，设立南北二军。南军长官称卫尉，主要负责未央宫、长乐宫等宫城安危；北军由中尉统率，负责守卫京城。南、北军相互制衡，互不统属。

吕后依然不放心，特意叮嘱吕产、吕禄说："我的时日不多了，有些事需要提前向你们交代一下。近年来，我封立吕氏为王，朝中大臣很多人不赞成，如今皇帝年幼，一旦我不在了，恐怕大臣们会趁势向吕氏发难。我死后，你们一定要牢牢将禁军掌握在手中，死守宫禁，千万不要给我送葬，免得受制于人，切记切记!"

八月三十日，吕后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吕后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不甘平凡的一生，也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一生。

她性格刚毅，一生可谓历经劫难，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心理创伤使得她性子变得扭曲、狠毒，对对手毫不仁慈，务必除之而后快。

好在吕后与刘氏宗室之间的权力斗争始终停留在高层，没有波及一般庶民。在她执政的十五年时间，基本奉行"不折腾国策"，朝堂上有以曹参、陈平等为首的执政团队，竭尽全力维持朝局日常运作，使各方政治势力保持平衡。

吕后执政时期，黄老思想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王霸意识暂且被摒弃一旁，国计民生日益好转，社会经济也开始缓慢复苏。

然而，均衡局面是脆弱和暂时的，是被迫无奈之下不得已的选择，朝堂上企图冲破这种局面之人，大有人在。

大凡政治人物，有几个可以做到风轻云淡，遏制住立万世不朽之功的冲动？

当初，樊哙不就是请缨率十万之旅横行匈奴吗？

好在吕后头脑冷静，总算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

她犹如一名游走在权力钢丝线上的高手，看似有些恣意妄为，摆出一副为达到目标可以不惜一切的姿态；实际上，她每走一步，都充满了算计，一切尽在可控范围内。

匈奴冒顿单于的公然羞辱，她可以忍受、妥协，但对赵佗的称帝，她决不退让，立刻发兵讨伐。因为，与匈奴作战，那就意味着是要打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战争的后果无法预料；至于南越，对汉而言，不过是一场局部战争，属于可控范围内。汉匈开战，就是国运之战，是一场豪赌；而汉越之战，充其量只是维护大汉正统的面子之战。

吕后死后，对于南越的征讨随即就终止了。此次南征，汉军看上去损失不少，但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可以从容从战场退出。

一南一北，因地制宜，两种不同策略，达到相同目的。在维护帝国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处理，显示出吕后非凡的政治智慧。

对外如此，对内依然如此。高祖末年，遍封刘氏宗亲，由于子侄辈多年幼，为了扩充刘氏力量，以至于连属于远房的刘贾、刘泽都被封侯。高祖的分封策略，对后来的吕氏崛起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对那些刘姓诸侯，吕后也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有的拉拢，有的削弱，有的打击。

回顾历史，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中女性执掌朝政的不乏先

例，比如秦宣太后、赵威后、齐君王后(齐王建生母)等。

这些女性尽管曾口含天宪，将一国大权操控在手，在位期间，王权旁落、重用外戚等，然而，从没有一位像吕后这样，在如此辽阔的帝国版图上执政，甚至企图颠覆原王室的政权。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女人，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如此前无古人、惊世骇俗的做法，必然会招来朝中功臣集团和刘氏诸王的抵制和反对。

吕后能够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惠帝的文弱，以及陈平、周勃等功臣的妥协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执掌朝政大权后，吕后开始有步骤地打压刘氏诸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吕后铲除的诸侯，多是高祖所出的几位皇子，至于其他人，罕有波及。

高祖弟兄四人，刘伯、刘仲与高祖系同出一母，然而，兄弟几个关系并不和睦。

刘伯早死，大嫂带着儿子刘信过日子。高祖早年交友广泛，时常带着一帮朋友去大嫂家蹭饭，一来二去，惹得大嫂很不高兴。

后来，一看见高祖领人进门，她便故意用勺子将锅刮得叮叮当当地响，暗示锅见底了，已没饭了。

朋友们很尴尬，自讨没趣。高祖心中起疑，偷偷跑去掀开锅盖一看，发现还有半锅羹汤。一气之下，不再与老大一家来往。

高祖称帝以后，心头仍有一口怨气，依然无法对往事释怀，所以故意冷落他们一家子，将他们晾在一旁不闻不问。刘太公看不下去了，在旁边提醒高祖，做了皇帝，怎么就不管自家兄弟了？

高祖气嘟嘟地说：我没忘，就是我那大嫂实在不像话，根本不配做个长者。但后来，他实在经不住太公在一旁唠叨，便在高祖七年

(公元前200年)，封大哥儿子刘信为羹颉(jié)侯。

颉，是克扣之意，看来直到最后，高祖依然没有忘记那锅羹汤带给他的羞辱，所以将这么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封爵赏给侄子，以宣泄心中的不满。

至于刘仲，本身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善于勤俭持家，踏实务农，深受刘太公的喜爱。高祖称帝后，封他为代王，后来匈奴侵边，吓得他舍国南逃，被贬为郃阳侯，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去世。

与这两位一奶同胞的兄弟相比，反倒是异母弟刘交，与高祖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刘交与不喜儒生、讨厌读书的高祖截然相反，他从小爱读书，勤奋好学，年少时，就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向荀子大师的高足浮丘伯学习《诗》。

待到秦始皇下令取缔百家之言，焚烧《诗》《书》时，众人才不得不提前中断求学生涯，各自散去。

高祖起兵后，刘交就与萧何、曹参等人一起追随高祖左右。此后无论高祖入关灭秦、迁徙巴蜀，还是与项羽征战期间，刘交一直陪伴在兄长身边。

兄弟俩这份手足情谊，远非刘仲能比。即使是高祖称帝后，刘交依旧能够自由出入皇帝住处，根本不需别人传话，直接进入高祖卧室。在汉初的国策制定、传达机要命令等重大事务中，都有刘交的身影。

诛杀韩信后，刘交被封为楚王。刘交就国后，立刻重新召集穆生、白生、申公等一帮昔日同窗好友，让他们出任中大夫，一时间，楚国朝堂上可谓人才济济，且多为饱学之士。

刘交是个聪明人，吕后执掌国柄后，他立刻让申公陪伴儿子刘郢客(又称刘郢)到长安。名义上，他们是到京城至浮丘伯处学习

《诗》；实际上，就是等于向吕后送上人质，好让她安心。

至于刘交本人，自就国以后，只醉心学术研究，不掺和朝廷的争权夺利，终日与一群儒生研究《诗》《书》，并亲自为《诗》作注释，后世称之为《元王诗》(刘交谥号为楚元王)。

刘交就是在告诉吕后，自己根本不会对她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

在刘交身边人中，申公(名为申培)对《诗》研究最为透彻，也是首个给《诗》作注之人，他注解的本子称为《鲁诗》(因申公为鲁人)，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诗》《书》经秦始皇焚书之劫，加上汉初君臣普遍轻慢儒生，诗书文化濒临危亡，而刘交为文化的传承和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权力政治不过一时烟云，而文化影响足以光照万世。

吕后在庙堂上大开杀戒之时，刘交在楚国集结了一批当时最富有文化情怀的学者伏案笔耕，使诗书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自先秦起，对《诗经》的研究，就已绝非简单地研习诗歌文化这么简单，而是从政的必备知识。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诸侯列国间，无论贵族宴饮，还是使节出使，都要运用《诗》，委婉巧妙地表达真实用意，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

《诗》从来就未曾远离过政治，昔日高祖路过曲阜祭孔时，人群中就有申公。

吕后执政以来，朝堂上奉行黄老思想，虽然经过叔孙通、陆贾等人的不懈努力，儒学有所恢复，但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状态。

申公对朝廷总体政策方针基本没产生过大的影响，但他后来培养了一批弟子，犹如播下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会破土出芽，对大

汉帝国后来的治国思想发挥重要作用。

道路漫长，只待来者。

刘交潜心学术，是出于心灰意懒，为求自保放出的烟幕弹，还是有意将希望寄托在后世，期望用文化的力量重塑大汉，我们不得而知。

但历史证明了，在秦汉战火之后，刘交为后世的大汉保存了一批文化种子，实在功莫大焉。

不管是出于有所顾忌，还是苦于找不到借口，吕后始终没有对楚王刘交下手。

齐国是除了楚国以外的另外一个刘氏诸侯大国。齐国富庶，下辖七十余城，吕后最先盯上的就是齐国。

虽说齐悼惠王刘肥靠着惠帝庇护和臣下的机智斡旋，逃过了吕后的毒手，但吕后削弱齐国的决心从未动摇过，她设法分化齐国，先后从齐国分出两个郡，建立吕国和琅邪国。

然而，刘肥虽然老实可欺，但他生下的几个儿子都不简单。尤其是次子朱虚侯刘章，一直不甘心久居人下，暗中跃跃欲试。

吕后的死讯传开后，刘章觉得机会终于来临了。

## 将相联盟

当初，吕后为了监控刘章，将吕禄女儿嫁给刘章。可惜刘章不是刘友、刘恢那样的人，非但没有被吕后掌控在手中，反而利用老婆刺探吕家人的一举一动。

吕后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蚀把米。

刘章不知给吕禄女儿灌了什么迷魂汤，很快从她口中打探到一个

惊天秘密，吕产、吕禄等人暗中密谋作乱，要对刘氏宗室下手，只是顾忌周勃、灌婴等功臣宿将，一时不敢贸然行动。

先下手为强，后出手遭殃，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刘章偷偷派人捎信给大哥齐王刘襄，让他抓紧时间起兵西征，讨伐诸吕，自己和弟弟东牟侯刘兴居在长安做内应，兄弟三人齐心合力，杀光吕氏，重新夺回刘氏天下，然后由刘襄做皇帝。

接到弟弟书信后，刘襄马上召集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合计发兵事宜。不过，如此重大事宜，他们却有意回避了一个重要人物，即齐国国相召平(在秦末汉初，名叫召平之人，此前出现过两次，一位是陈胜旧部，一位是秦东陵侯，曾规劝过萧何，《大汉兴亡四百年》第一卷，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们与齐国相系一人，应该是同名的三个人)。

估计刘襄已经料到召平会阻挠，所以干脆就绕开了他。

然而，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岂能完全瞒得住国相？召平很快得知，他马上站出来公开反对发兵。

召平为何反对，是觉得以齐国的兵力根本无法抗衡朝廷，还是认为齐王以下犯上，本身就是不能容忍，具体缘由已无法得知。

刘襄此时已经铁了心，一门心思要做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劝说，绝不容许有人挡道，当下决定设法搬掉召平这块绊脚石。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了他，以绝后患，刘襄派杀手赶赴相国府，刺杀召平。

只是杀手还没来得及动手，行迹就败露了。

召平气急败坏之下，干脆先发制人，率兵包围了齐王宫。

自然为君不仁，就休怪做臣不义!

讨伐政敌之战尚未开打，自己窝里先乱了起来。

眼看一场火并在所难免，就在此时，中尉魏勃主动去找召平，单靠三言两语，就让剧情出现了反转。

算起来，中尉属于诸侯国内的高级军职，不过魏勃并非职业军人出身，相反，却是生在音乐世家。魏勃的父亲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弹得一手好琴，据说还曾受到过始皇帝的召见。

然而，荣誉归荣誉，音乐并没有改变魏家的家境生活，他们家依然一贫如洗，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父亲的遭遇，让魏勃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世上，想要出人头地，靠音乐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想要活出个人样来，必须攀上高枝才行。

只是想要上下活动，打通各个关节，处处都要花钱，可魏家实在太穷，根本拿不出一个大子儿来。没有钱，连权贵的大门都进不了。

但是，魏勃不死心。接近不了权贵，就先从权贵身边人入手，只要设法引起这些人的注意，以后不愁没有进阶之路。

当时齐国国相还是曹参。曹参有个贴身侍从，有一段时间，每当他凌晨出门时，总发现大门前早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

此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侍从门前卫生总有人在帮忙清理。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便想探个究竟。

一日他早早起来，此时天色尚未大亮，天上几颗残星还在闪烁，四下寂静，没有人迹，他便躲藏在暗处观察。等了不大一会儿，一个人出现了，但见他走到门前，抡起扫帚，闷头不声不响搞起清洁来。

侍从遂现身，将他逮了个现行，质问他，你是何人，如此这般，天天跑我家门前打扫卫生，究竟有何目的？

这位义务清洁工正是魏勃。他就是想引起侍从的注意，现在目的已达到，就如实说，想要拜见国相，寻个出路，但苦于无人引荐，只好出此下策。

侍从被魏勃的诚意所打动，便带他去相府，将他引荐给曹参。曹参觉得魏勃人还不错，遂让他留在身边，做个侍从。

此后，魏勃常跟随曹参出入，有时候还给曹参驾车。

曹参发现，魏勃谈起政事时，颇有些见地，遂起了爱才之心，将他推荐给齐悼惠王刘肥。刘肥去世后，刘襄即位，魏勃继续受到重用，终于坐上中尉位置。

魏勃能够走到今天，固然是有些本事，但更多靠的是善于左右逢迎和投机钻营。魏勃出身卑微，但却不缺乏野心，只要有向上爬的机会，他是从来不会错过的。

如今召平包围王宫，魏勃觉得立功机会来了。

事实很快证明，召平不但政治觉悟不高，而且智商也很堪忧。

魏勃一见面，就称赞说：“大王没有朝廷的兵符，就擅自调动发兵，这是违反大汉律法之事，幸赖国相您果断出手制止，实在是英明之举!如今大事已了，剩下围困王宫这等小事，就尽管交给我好了，您也实在太辛苦了，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才是。”

魏勃这通马屁，拍得召平浑身舒坦，他觉得自己堂堂国相，总在这里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实在有失身份。带兵这等粗活儿，还是交给魏勃这等军人才是，至于自己，坐镇相府即可，料想齐王他也飞不出城去。

就这样，魏勃靠着三言两语成功忽悠倒了召平，解除了他的武装。

召平万万没想到，他前脚刚回到家中，魏勃后脚就率兵围住了相

府。

此时，召平才反应过来，仰天长叹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说的就是我啊!”

事已至此，与其等别人杀进来，还不如自行了断。绝望之下，召平拔剑自杀了。魏勃摆平了召平，齐王刘襄得以转危为安，为了奖励，特意任命他为将军。

召平已死，齐国上下再无人敢反对。刘襄任命舅父驷钧为国相，祝午为内史，将齐国军队悉数集结起来，为西征做好准备。

不过，刘襄也明白，单靠齐国这点兵力，根本无法战胜朝廷军队，最好找个盟友，壮大力量才行。于是，他派人到琅邪国，找刘泽一起搭伴造反。

刘襄早就看出来了，刘泽是个不安分的人，小小琅邪国，根本满足不了他的野心。

刘襄派祝午到琅邪国，游说刘泽和自己联合出兵，打到长安去，一起诛杀诸吕。刘襄给刘泽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使他无法抗拒。

祝午说：“听说吕氏在京城发动政变，大汉江山社稷危在旦夕，齐王已经准备出兵西征，为国除贼，消灭吕氏。只是，齐王觉得自己毕竟太年轻了，又没有作战经验，恐怕挑不起这份重担。我临行前，他一再叮嘱说，大王您曾追随高祖，长期在外统兵作战，作战经验丰富，务必要把您请到临淄，与您共商大事。他觉得这等大事，还是您来挑头为好，他甘愿率齐国军民，悉听命于您。”

权欲会蒙蔽人的判断力。祝午的一番话，让刘泽听得飘飘然，利欲熏心之下，他竟然信以为真，欣欣然跟着祝午前往临淄。

他刚一进城，就被刘襄扣押起来。

刘襄命祝午在琅邪国大肆征兵，将兵员编入齐国军内，由自己统

一指挥。

刘泽现在才缓过神来，追悔莫及，但已无力与刘襄抗衡。姜毕竟是老的辣，刘泽头脑渐渐冷静下来，知道现在不能与刘襄硬掰，为今之计，唯有设法从齐国脱身，然后再做长久打算。

打定主意后，刘泽找到刘襄，说："现在我留在这里，也没多大用处，还不如让我先行一步，赶赴长安，发动在京宗室和朝中大臣，迎接大王您做皇帝。大王您是高帝嫡长孙，理所当然应由您继承大统才是，只是众人现在还在犹豫不决，如今刘氏宗室中，属我年纪最长，想来大家对我的意见还能听得进去。此事宜早不宜迟，还望您早下决断!"

刘襄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当下给刘泽配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车队，体体面面地赶往长安。只是，他没有觉察，刘泽在登车出发那一瞬，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只是此时的刘襄，雄心勃勃，一心想着早点杀到长安做皇帝，根本无暇留意其他。虽然吞并了琅邪国，但想要对抗吕氏，必须尽量争取天下刘氏诸侯的支持，唯有将声势搞得够大，才能赢得这场关乎生死的权力争夺战。

信使们从临淄出发，快马加鞭奔赴四面八方，将齐王的书信传送到各诸侯国。在信中，刘襄历数吕后和吕家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比如先后无故诛杀刘如意、刘友、刘恢三位赵王，大肆分封诸吕，取代刘氏宗亲诸侯王，其中为了削弱齐国，不惜将其一分为四。

在信的最后，刘襄煽动说，如今太后不在了，皇帝年幼，朝政大权悉数被诸吕把持，大汉江山危如累卵，寡人如今要兴兵讨逆，诸位就看着办吧。

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及鲁王张偃，都年幼，人在长安，诸国的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诸吕手中，所以诸侯中，根本指望不上有人起兵响应。

不过，刘襄的目的，在于向天下人宣示，他不是兴兵作乱，而是在匡扶正义，拯救社稷。只要把声势打出去，为起兵做足舆论造势，目的也算达到了。

没过多久，刘襄在魏勃等人簇拥下，率兵向西开进。

此时的长安城中，公卿大臣们每时每刻都在煎熬中，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大家都心中没谱。怎样才能不站错队，考验着每个人的政治智慧。

陈平在吕后称制之初，靠着机智，顺应时势，平稳度过了权力危局。如今，又将迎来一场新的生死抉择。不过，对未来局势，他还看不清楚。

倘若是一般基层官员，还可以打哈哈，不需急着表态，先用模棱两可的态度敷衍一下，等局势明朗之后，再做选择也不迟。

但陈平不行，他是帝国的丞相，百官总揆，朝野瞩目，天下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乎朝局动向，想打马虎眼，根本不可能。

陈平之所以进退失据，主要是因为他夹在吕氏和刘氏两大政治势力中间，又缺乏可靠的盟友。为了躲避朝堂上的争执，他干脆躲在家里，暂时不露面，独自一人苦思冥想，思索破解目前困局之法。

一日，陈平正陷入沉思之中，以至于有人来访，坐在他身边，他都未察觉。

来者正是陆贾。

高祖去世，吕后掌权后，陆贾意识到，作为一名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之人，一旦卷入吕刘之争，无论如何站队，结局都很惨，便以身体不适需要疗养为由，主动辞职回家。他在外买了一块好地，将家安顿下来。

陆贾出使南越时，赵佗曾馈赠他许多珠宝。他统统拿出来变现，卖了足足千金，然后均分给五个儿子，每人得了二百金。他让儿子们用这笔钱从事经营生产，安然度日。

至于陆贾自己，常常乘坐豪车，随身携带一柄价值百金的宝剑，在十余名精通吹拉弹唱的侍从的陪伴下，到处游山玩水。闲暇时，在五个儿子家中轮流住宿，每家只住十天，然后再换下一家，日子过得好不潇洒自在，一副不问世事逍遥翁的样子。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表象。实际上，陆贾的视线从来就没离开过长安，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着京城的一切。

现在，他觉得是时候现身了。

陆贾明白陈平的难处，但不能一下子说得太直白。

有时候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见得是件坏事。

“丞相为何犯愁呢？”他明知故问道。

陈平也是人精，在不知道陆贾来意的情况下，不会轻易透露心事，遂反问道：“你不妨猜猜看。”

“您现在已位居右丞相，封爵列侯，食邑三万户，应该不会是为荣华富贵而发愁。那么，只剩下一件事，所虑者，唯有诸吕专权罢了。”

陈平不得不承认，如实回答道：“你猜得没错。依你之见，我如今该如何应对呢？”

陆贾于是干脆把话挑明了：“您目前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寻求盟友，尤其需争得军方的支持。具体来说，就是要与太尉周勃搞好关系。”

实际上，在此以前，为了撮合将相同舟共济，在私下里，陆贾已做了不少努力，曾登门劝说周勃，希望他和陈平搞好关系。

但周勃和陈平之间芥蒂很深，短期内岂能冰释前嫌？

想当年，陈平弃楚归汉，深受高祖器重，惹得周勃、灌婴等人眼红，嫉妒之下，没少在高祖面前说坏话。虽然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此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咸不淡、不好不坏。

所以，当陆贾有意为二人促和时，周勃付之一笑，权当笑话而已。心想，如果陈平想与我和好，为何不直接上门找我，何必让陆贾出来做和事佬？

其实，陈平对周勃也有心结，但为了大汉安危，为了自家身家性命，一切往日恩怨都可以暂时抛开。当下，立刻听从陆贾建议，拿出足足五百金厚礼，为周勃祝寿。紧接着，又在府上大摆宴席，宴请周勃。

酒席间，一片笙歌燕舞中，将相二人推杯换盏，笑意盈盈，气氛甚是融洽，他们一起追忆峥嵘岁月，把酒言欢。不知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二人之间曾经是多年的死对头。

此次宴会结束后不久，周勃也在自家府上摆下筵席，热情款待陈平。经过一番热络互动之后，两人放下了成见，淡化了彼此隔阂，就如何应对当前政治乱局，统一了意见。

事后，陈平为了感谢陆贾促成他与周勃的和解，一次性赠送给陆贾奴婢百名、车马五十辆、钱五百万。

得到这笔巨款后，陆贾并没有用来自我挥霍，而是用作活动经费，在朝中大臣间密集穿梭，游说大家站在刘氏宗室一方。

陆贾大张旗鼓地鼓动游说，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拥刘派大臣间的凝聚力，使他们下定了决心，往后不再骑墙，摇摆不定，要心往一起靠，劲往一处使。

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的长安，处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之中。

当众人惴惴不安，等待吕氏和刘氏最终对决之际，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从关东传来，齐王刘襄起兵了!

吕产得知后，立即以颍阴侯灌婴为大将军，率兵出函谷关，阻止刘襄西进。

灌婴带领大军一路东出，抵达荥阳后，就地安营扎寨，止步不前。灌婴是一名老将，对当前形势看得一清二楚。吕产命他东征，就是要他和齐军打消耗战，战败，自然是难逃罪责；战胜，无疑是帮助吕产清除反对势力。总之，此行无论胜败，吕产都是赢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灌婴决定设法避免与刘襄开战，绝不能让吕氏取代刘氏的阴谋得逞。

道理很简单，一旦吕氏取代大汉，改朝换代之后，他们这些追随高祖的开国功臣们将变得一无所有。

为了防止刘襄误判，造成双方不必要的伤亡，必须先与齐国达成和解。灌婴派了一名使者，急急赶赴齐军军营，向刘襄表明自己无意与齐国开战，并约定双方伺机而动，待吕产一伙反迹败露，就联合讨伐吕氏。

刘襄得知消息后，便率领大军后撤至齐国西部边界，两军遥遥相望，按兵不动。

吕产本指望灌婴率领汉军与齐军厮杀，好收渔翁之利，谁料双方根本没打起来。在朝中有周勃等功臣暗中掣肘，外面又有灌婴遥相呼应，这样一来，他反而拿不定主意了。

思来想去，吕产最终下定决心，抱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心态。只待灌婴与齐军打起来，然后再在京城发动政变。

吕氏和刘氏两方都在坐等对方先出手，一时间，双方玩起了瞪眼睛游戏，只看哪一方先绷不住弦跳出来。

# 左袒兴刘

现如今，小皇帝是吕氏手中的傀儡(吕后临死时，还将吕禄女儿立为少帝的皇后)。在政治法统上，吕氏占得先机，可以以少帝的名义号令群臣。

长安城中的主要军事力量南军和北军，都掌握在吕氏之手。京城列侯公卿性命安危，都操在吕产手中。

无论从哪一面来看，吕氏都拥有绝对优势。

周勃虽说是太尉，是大汉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上，对京城防卫，他根本插不上手。

太尉一职，起源于秦，理论上掌管帝国军权，属于最高武职官员，与丞相、廷尉并称三公，然而，皇帝是绝对不会放心将如此重要权力交付臣下的。纵观秦代史料，不难发现，与丞相和御史大夫相比，太尉从来就不是一个常设官职。

《琅邪刻石》《会稽刻石》《泰山刻石》等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秦代诏书刻石中，常有列侯、丞相、廷尉等重臣的联署，但从没有太尉的署名，说明太尉在秦朝可能只是为了应对战争需要，临时性授予的，一旦战争结束，立刻解除。

大汉建立后，首位被授予太尉官职的是卢绾。后卢绾出任燕王，随即免除太尉职位，前后不过短短三年，太尉官职也同时被废除。

惠帝时，恢复太尉一职，由周勃出任，然而如同王陵的太傅职衔一样，都属于地位崇高，实则没有任何权力的空头名誉职位罢了。

手中无兵，想扳倒吕氏，无疑是痴人说梦。

周勃和陈平凑到一起，密谋一番后，决定从曲周侯郦商身上寻找突破口。郦商是高祖时著名的四位战将之一(另外三位是周勃、樊哙、灌婴)，只是如今年事已高，加上体弱多病，让他出来打头阵，

显然不可能。不过，郦商的儿子郦寄与吕禄交情很好，为今之计，只能从郦寄身上做文章。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周勃和陈平决定，设法让郦寄出卖朋友。为了强迫郦寄就范，二人劫持了郦商。

卖友求荣是件可耻之事，但为了老父的安危，郦寄只好咬咬牙，去违心欺骗吕禄了。

人往往最容易被亲朋好友欺骗。因为亲情或友谊可以让人降低警惕，多数人对亲友的话，往往会少一些理性的判断，多一些本能的信任。

吕禄不像他的父辈，没有经历过战火，资历浅，见识少，眼界有限，思想单纯，不会料到好友会给他下套。

郦寄按照周勃和陈平提前拟好的剧本，去找吕禄，一见面就故弄玄虚说："足下现在处境很危险，还不自知，我实在为你担心。"

吕禄一听，有点着急，便让他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汉天下是由高帝和太后共同平定的，当今封王者，刘氏九人、吕氏三人，都是经朝中大臣共议，并昭告天下，得到天下人一致认可的，这本身没有任何疑问。只是，如今太后驾崩，皇帝年幼，您身为赵王，却不去就国，反而任上将军，统军驻扎京城，大臣和诸侯们会怎么看？他们一定会怀疑你对皇帝不利。齐王已经起兵了，接下来，要是其他诸侯纷纷效仿，杀向长安，足下又该如何自处？"郦寄一本正经地忽悠道。

自听说刘襄起兵后，吕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如今又被郦寄一番连唬带吓，不由得乱了方寸，急忙请教，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郦寄顺势说："你何不将上将军印交给太尉，同时，让吕王将相国印交付朝廷，你们二人各自就国？如此一来，齐王等诸侯和大臣们失去反对你们的正当理由，再也无法兴风作浪，往后你们坐拥千里封

地，后世子孙永保荣华富贵，双方皆大欢喜，各得所需，岂不美哉!”

吕禄本就是个平庸之辈，没有远见卓识，根本没有察觉郦寄这套逻辑背后的陷阱，认为好友是在为自己谋划退路，感激得不得了。自己有多少斤两，他心里一清二楚，自知根本撑不起目前危局，还不如索性撒手将军权交给周勃，自己只管享乐就好了。

不过，如此重大事宜，他还要回去跟吕氏家族的长辈们商量后，才能的决定。不过，吕氏族中的老人们，也是一帮没有见识的主儿，吃喝玩乐在行，军国大事一窍不通。听完吕禄提议后，有人表示赞同，有人表示反对，嚷嚷成一团，莫衷一是，拿不出个统一主张来。

吕禄倒是心安理得，认为只要将军权交出去，就天下无事了，所以常和郦寄外出游猎玩耍，开开心心，日子过得很自在。一天，外出狩猎，途经姑母吕媭府邸，便顺道去看看她。

吕媭与吕后姐妹二人脾性颇为相似，性子刚毅果断。如今吕氏和刘氏权力争夺战，已呈你死我活之势，不料这个不争气的侄儿却整日不务正业，到处瞎游逛，分明是自寻死路!

盛怒之下，吕媭当着吕禄的面，将府中珍藏的珠玉珍宝统统搬出来，扔到院中，气呼呼地说：“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身为上将军，整个吕氏家族的安危都系于你身，在这关键时刻，你不坚守岗位，却还有心思到处游玩，看来我们吕家覆亡的日子不远了。既然如此，我还守着这些东西干吗，还不是替别人保管着？还不如早些散了去!”

拔了牙的老虎，就是病猫，只能任人欺凌，将刀柄交到别人手里，还幻想能保全，岂不是痴人做梦？吕媭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只可惜吕禄堂堂男儿，连个女流之辈的见识都比不上。

就在郦寄攻破吕禄心理防线之时，陈平和周勃得到一条可靠情报，吕产为求自保，要占据皇宫。

早前，吕产派灌婴率军出征之际，另派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国，刺

探军情。九月初十早晨，御史大夫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到相国吕产府上议事，恰好碰到刚从齐国出使回来的贾寿也赶来汇报工作。

估计吕产也没拿曹窋当外人，并没有让他回避。曹窋只听得贾寿埋怨吕产说："我早先就曾劝您赶紧回封国，您不听，如今灌婴已与齐、楚勾结在一起，谋划讨伐吕氏，您就算想回封国，也来不及了(吕产封国为原梁国，灌婴驻兵荥阳，显然截断了吕产的去路)，现在您只剩下一条道，就是赶紧占据皇宫，以求自保。"

贾寿支的这一招，就是让吕产占领皇宫，裹挟少帝做人肉盾牌，好让倒吕大臣们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

曹窋听到这里，感到事关重大，不能再做停留了，当下从吕产府上偷偷溜了出来，快马加鞭，赶来通知周勃和陈平，让他们赶紧行动，再晚就来不及了。

事不宜迟，周勃决定先从吕禄下手，把北军夺到手里。他派郦寄和典客(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负责诸侯觐见与少数民族事务的礼仪官员)刘揭劝吕禄，赶紧交出军权，自己则亲自赶赴北军大营。

郦寄和刘揭见到吕禄后，谎称："皇帝已派太尉代行北军指挥职务，命您立即交出将印，前去封国，若不然，大祸即将临头。"

吕禄自上次和郦寄会面以后，对未来何去何从一直犹豫不决。不过，他天真地认为，凭着他和郦寄多年的友谊，郦寄应该不会害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放弃将印，主动交出军权。

只能说，吕禄实在太幼稚了，不知道在权势和利益面前，友情实在太过于脆弱，根本不堪一击。

为了保住老父的安全，郦寄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吕禄。当吕禄解下腰间印绶，交给刘揭那一瞬，吕氏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

再说周勃，赶到北军大营门口时，却被阻之于门外。周勃心急如焚，一旦争夺军权图谋失败，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情急之下，他想

起了一个人——襄平侯纪通。纪通职责很特殊，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符节。

周勃说服了纪通，让他带上符节，赶到北军大营，假意宣称周勃奉皇帝之命进入北军。北军门卫守军看到皇帝符节，信以为真，便打开大门，放周勃一行进去。

周勃进入军营时，吕禄早已离开了。长期的军戎生涯，使得周勃懂得，此刻军营内群龙无首，一定要尽快稳定军心，争取将士们的支持。

他当即传令军中："拥护吕氏者，可露出右臂；拥护刘氏者，请亮出你的左臂来!"生死关头，必须鲜明地表明立场，绝不容许有人持骑墙态度。

吕禄自动解除军权后，北军的将士们看出来了，吕禄靠不住，为今之计，只能听命于周勃了。于是，大伙儿齐刷刷地亮出左臂。

周勃长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这一步险棋成功了。

虽说夺得了北军的军事指挥权，但驻守长安的另外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南军，依然掌握在吕产手中。为了谨慎起见，周勃尚不敢公然亮出反击吕氏的旗帜。

此时，朱虚侯刘章受陈平之托，赶来协助周勃，周勃便让他把守军门。周勃现在最担心吕产入宫挟持少帝，一旦他将皇帝捏在手中，以皇帝名义指控他犯上作乱，那就麻烦了，在战略上将陷入被动之中。于是，他抓紧时间派曹窋传令给未央宫禁卫军卫尉，要求严防死守，务必将吕产拦截在大殿之外。

曹窋不敢怠慢，火速赶往未央宫阻止吕产。他前脚刚到不久，吕产便心急火燎地赶来了，直接往里冲，却被卫军拦住。

吕产气急败坏，一时间也无可奈何，急得在大殿前来回踱步，寻思对策。

曹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吕产现在还是大汉相国，一旦他下定决心硬往里冲，估计单凭未央宫卫军，绝对支撑不了多久。情急之下，他翻身上马，一路纵马狂奔，返回北军，将未央宫目前局面如实汇报给周勃，让他快点拿主意。

周勃尚在犹豫，如果现在就与吕氏摊牌，还没有必胜的把握。在一旁的刘章站出来主动请缨。形势逼人，已容不得瞻前顾后了，周勃拨给刘章一千人马，命他立即赶往未央宫，不过对外宣称，是要入宫保卫皇帝陛下。

此时，双方还在未央宫大殿前对峙，吕产仍在踌躇不决。

就在此时，突然刮起大风来，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刘章见状，趁机下令士兵们，立刻攻击吕产卫队。

天象突变，莫名其妙地平地起风，让吕产身边的追随者们感到惊诧不已。刘章猛不丁杀出，打了个措手不及，吕产卫队乱作一团，当即纷纷撇下吕产，只顾自己逃命，作鸟兽散了。

眼看成了孤家寡人，吕产慌乱之中，跑进郎中府一处厕所躲藏，但很快被刘章士卒们发现，被揪了出来，当场就给杀了。

未央宫中一时杀声四起，惊动了少帝，得知外面大乱，少帝便派谒者手持皇帝符节，出来安抚各方。

到目前为止，刘章的所作所为，从律法角度讲，都属于擅自调兵，遂想从谒者手上夺取符节，好以皇帝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行动。

谁承想，这位谒者性子很倔，死死握着符节不撒手。

刘章没法子，索性强行将谒者抬上车，与他一起驶出未央宫来。一路上驾车疾驰，途中官民看到谒者手中符节，纷纷避让。

就这样，刘章一路驱车，直接驶入长乐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杀了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又马不停蹄赶回北军，向周勃汇报事

情经过。

至此，吕氏大势已去，接下来就是如何清算残余了。

周勃立即派人分头行动，将吕氏族人无论男女老幼悉数逮捕，就地格杀勿论。

当天夜里，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屠杀在长安大街小巷展开。

待到次日(九月十一日)，赵王吕禄、燕王吕通、临光侯吕嬃全部被处死。吕通相对死得痛快些，被斩杀；吕禄和吕嬃死得很惨，被活活打死，吕嬃更是被处以羞辱性的笞刑，即当众扒了裤子，按倒在地，抡起板子打屁股。

权力斗争就是如此残酷，吕后当政时期，诸吕专权，全然不将功臣们放在眼里。吕嬃更是飞扬跋扈，群臣见了她无不胆战心惊。

陈平曾受命逮捕过樊哙，吕嬃对他衔恨在心，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因吕后从中周旋，她想打击报复的图谋才没有得逞。但经过此事，她把陈平彻底得罪了。吕嬃死得很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如果说，吕嬃是咎由自取，那么她的儿子樊伉完全是池鱼之殃。樊哙死后，樊伉继承了舞阳侯爵位，史书中没有任何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估计也只是个平凡的侯二代。不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樊伉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或许，念及樊哙开国功劳，樊家总算逃过了灭族的命运。数月后。樊哙一位妾生的儿子樊市人袭位为舞阳侯。

吕氏家族在短短十五年间，快速崛起，差一点取代了刘氏的皇位。但随着吕后的去世，在不到一月之内，便灰飞烟灭，大汉王朝总算有惊无险，避免了易姓换代的命运。

吕氏的覆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诸吕能力低下，无力驾驭复杂的朝局，刘氏宗室的力量虽然受到

打击和削弱，但还没到伤筋动骨地步。

此外，高祖在建立大汉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功臣群体，他们是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坚定不移的维护者。吕后执政以后，对这些人没有进行妥当的处理。

当他们感到在权力场被边缘化，利益受到侵犯时，势必不满。这也是周勃、陈平、刘章等人发动政变时，基本上没遭到反抗就轻而易举地挫败吕氏家族的主因。

与刘氏宗室和功臣集团相比，吕氏势力根基尚很浅，在地方上尤其如此。因此，当他们联手发动政变时，吕氏势力根本不是对手，全面溃败。

长安，在短短一夜间翻了天，权力又重新回到功臣们手中。

周勃和陈平很清楚，长安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传到全国诸侯耳中。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天下人证明，他们发动政变，不是阴谋作乱和企图颠覆汉室，恰恰是为了拥护刘氏的江山。

事不宜迟，他们以少帝名义颁布诏书，废除鲁王张偃的王位(谁叫吕后那么疼爱他？只是他虽然不是吕氏族人，好歹也是高祖外孙，所以保住了一条性命)，紧接着，改封济川王刘太为梁王(吕王吕产已死，吕国复称梁国)。

周勃和陈平这样做，是在对外发出讯息，表明他们要拨乱反正。当然，主要是做给齐王刘襄看，意在向齐国伸出橄榄枝。

因为，济川国本来就是吕后从齐国分割出来的，现在等于将原齐国土地，归还给齐国了。

周勃和陈平之所以急着安抚齐国，是因为刘襄想做皇帝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他现在已经起兵，接下来的一举一动，尤其值得关注。

刘襄若是执意引兵西来，是阻拦还是迎接，如何应对，他们还没想好。群臣尚未统一意见之前，必须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

他们决定先派人去齐军大营，劝齐军退军。

至于此行使者人选，刘章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方面，刘章是此次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另一方面，刘章是刘襄的胞弟，他前去，比任何人都更有说服力。

九月十八日，刘章离开长安，动身前往齐国。

就在刘章离京不久，有人从齐国赶到长安。

来人正是琅邪王刘泽。

## 意外赢家

诸吕倒台前，功臣们和刘氏宗室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结成盟友。如今政敌被消灭了，接下来就是重新布局权力格局。

在权力和利益面前，盟友和敌人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只要风向一变，昔日的盟友，有可能就会变成今朝的敌人，往日敌人也有可能成为现在的朋友。

很显然，少帝刘弘无法胜任这一任务。

且不说少帝年幼，根本无力驾驭朝堂上这帮老臣，大臣们也对他不信任。毕竟少帝是吕后所立，他的皇后还是吕禄女儿，一旦他成年亲政，秋后算账怎么办？

无论如何，少帝是没法继续在皇帝宝座上坐下去了。

以陈平和周勃为首的群臣聚在一起，密谋如何处理少帝。

废除皇帝必须要拿得出充足理由才行。少帝即位以来，尚未亲

政，如果想要从政治层面做文章，显然难以服众。

不过在权力场上，想要搞臭一个人，总能想出一千个理由来。少帝之所以被立为皇帝，最主要的法统基础是血缘，他不是惠帝的儿子。

那么，就从这一条否决。

群臣经过一番密集讨论以后，对外宣称，不但少帝，就是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皆非惠帝亲生。是吕后将他人儿子抱来，养在后宫，杀掉其生母，让惠帝认作儿子。这些孩子只是吕后用来扩充势力的工具。如今诸吕已灭，等这些孩子成人后，在座的大臣恐怕都难逃灭族命运。

在高压专制之下，宫廷诡谲内幕，外人永远难以得知，真理与谎言永远是一体两面，相对于说谎言，说真话付出的代价更加昂贵。身在庙堂之上，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看风向说话，至于事情的真相如何，没有人愿意去深究。

当年吕后立少帝，封刘太、刘武、刘朝等人为王时，没有人敢站出来质疑；如今，功臣们公开宣布这些皇子们血统造假，同样无人敢说不。

沉默者，永远是大多数。

群臣就废除少帝达成一致意见后，就开始讨论后少帝时代的皇位人选。基本上，大家都倾向于立齐王刘襄为帝。

按照周礼，皇位继承，优先立嫡立长。刘襄父亲刘肥是高祖长子，刘襄又是刘肥的嫡长子，从血统来讲刘襄享有优先权。更何况，在此次政变中，刘章在内出大力，刘襄在外陈兵呼应，兄弟俩厥功甚伟，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刘襄似乎都是新皇帝的不二人选。

正当群臣意见接近统一时，琅邪王刘泽站了出来，表示反对。

“诸位或许还不知道，齐王的母舅驷钧，生性残暴，简直就是戴了帽子的老虎。大汉朝廷，由于吕氏专权，差点江山易色，如今刚打倒吕氏，难道要重新树立另外一家吕氏吗？”

此言一出，朝堂上立刻鸦雀无声。

刘泽费尽大半辈子力气，好不容易才拥有了一郡之地，谁承想王座尚未焐热，就被刘襄兼并了去。如此奇耻大辱，他岂能咽得下去？

不过，刘泽也是刀尖舔血过来的人，深知如果硬抗，无疑是自寻死路，为了脱身，他假意称愿为刘襄赴长安周旋。没想到，刘襄鬼迷心窍之下，竟然同意放行。

刘泽一路走来，早就盘算好了如何对付刘襄。

他心中想：你兼并我的国，那么，我就让你失去整个天下!

刘泽很聪明，如今刘襄、刘章有大功于国家，如果对齐王本人进行人身诋毁，很难站得住脚，也难以取得群臣的支持。

那么，只有另辟蹊径了。

经过吕氏之乱后，群臣最忌惮的莫过于外戚专权。

刘泽便从刘襄外家下手，只要引起大臣们的反感，目的就达到了。至于驷钧为人究竟如何，是否真的像刘泽所说那样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没有人愿意去查明真相。

刘泽轻飘飘一席话，彻底粉碎了刘襄的皇帝梦。

刘襄被排除了，那么，新皇帝该由谁来当？

有人提议立淮南王刘长，但马上有人站出来反驳，刘长太年轻，根本难以驾驭目前乱局；况且，根据坊间传闻，刘长外祖母家也是一伙穷凶极恶之人，立他无疑是引狼入室。

此时，刘泽说出了他的人选，代王刘恒。

理由很充足，目前在世的高祖儿子中，属刘恒年纪最长。另外，代王母亲薄氏娘家素有贤名，堪称谦谦君子，让代王称帝，完全可以放心。

天下人都知道，薄氏是个私生女，娘家除了一个弟弟薄昭，根本就没什么人。刘恒坐上皇位，没有任何外族力量可以援引，是孤家寡人，难以摆脱功臣们的掌控，不用担心会被秋后算账。

在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辞之下，其实全是权力和利益的算计。

当刘泽提议立刘恒为帝后，在场的人都心照不宣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大家都懂了。

新皇帝人选敲定后，众人开始筹划派人迎接代王入京事宜。

不过，大臣们还有个担忧，万一齐王刘襄不服咋办？

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帝位，外藩起兵杀入京城，血溅宫廷之事史不绝书。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众人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原因是，刘襄的能力根本撑不起他的野心。

刘襄一心想做皇帝，但他根本没有勇气发动一场战争。最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缺乏为他征战杀伐的将领。

刘襄所倚仗的无非是驷钧、魏勃之流，然而魏勃此人，玩点小心眼儿还可以，但要说两军对垒，阵前杀敌，他根本不行。

灌婴自驻扎荥阳以来，就开始搜集齐军方面的情报，将齐国上下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很快就得知，刘襄之所以敢兴兵，全靠魏勃在背后给他壮胆。于是，他便派人去齐军军营，召魏勃到荥阳汉军大营问话。

魏勃没有胆量与灌婴较量，接到命令后，不得不动身前往。

灌婴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身上自带威严和杀气，坐在那里不怒自威。魏勃一见面，腿不听使唤，不由自主地哆嗦不停。

灌婴一张口，就劈头盖脸好一顿训斥，指责魏勃不该擅自怂恿齐王起兵。魏勃吓得不轻，磕磕巴巴解释说："因为听说吕氏作乱，情况紧急，只能事急从权了。就好像家里失火了，只能先急着救火，没法顾得上在第一时间跟长辈请示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魏勃就退后闪到一旁，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灌婴看魏勃两腿不停颤抖，犹如筛糠一般，不由得感到好笑，刘襄靠这号人，能成什么大事？

随即笑道："我以前听人说，魏勃为人非常勇武，没想到竟是一介庸人而已，算了，你还是回去吧!"

见面结束后，灌婴便撤兵返回长安。

刘襄也知大势已去，只得罢兵东归。

消息传到长安，群臣们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陈平和周勃便秘密派人去代国，与刘恒接触。

不久，使者回来了，带来的消息让他们感到有些错愕。刘恒婉言谢绝了他们的一片盛情，称自己能力不足，还请诸位大臣另请高明。

其实，使者自抵达代国，代表群臣宣布迎接刘恒称帝意见之后，代国君臣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刘恒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会上代国官员们分成立场完全对立的两派。郎中令张武持反对意见，而中尉宋昌则赞成刘恒进京，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

张武的理由是，陈平和周勃等人的诚意值得怀疑，恐怕动机不纯，还需进一步观察后，再下结论也不迟。他说："如今朝中掌权的大臣，多是跟高祖一起打天下的老臣，这些人精通兵法，富有韬略，

跟他们一比，大王您显然不是对手。长安刚刚经历过血腥政变，未来朝局走向不明，陈平与周勃等人此时迎接你去京城，只是畏惧高祖、吕后的余威，拿你做幌子罢了。因此，切不可在这个节骨眼去蹚浑水，不如干脆称病，先看看他们的动向，再做打算!”

张武话音刚落，许多大臣都纷纷表示赞同，觉得张武的意见比较稳妥，建议刘恒不要急着下结论，先观望观望再说。

在一片附和声中，唯有宋昌站出来，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主张：代王应该抓住时机，立即进京称帝，毕竟机会稍纵即逝，绝不能错过。

宋昌大声说：“诸位大臣完全错判了当前局势，你们反对大王赴长安，究其原因，无非是担心一旦大王到了京城，朝中功臣们对他不利，其实这种担忧完全是多余的。自打秦朝崩溃之后，天下英雄纷纷揭竿而起，想称王称帝的人数以万计，但最终得天下者却是刘氏。如今，刘氏称帝，已得到天下人的一致认可，那些曾经有野心的人也早已死心，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取代刘氏天下，这是其一。”

一时间，大殿上纷扰争议之声全都停了下来，四下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竖耳听宋昌发表意见。

“高祖称帝后，将刘氏宗室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彼此犬牙交错，引以为援，刘氏宗室地位固如磐石，已无人撼动，这是其二。大汉建立以来，尽数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颁布新法，对百姓施以恩德，深得民心，天下人都想过安稳日子，民心思定，民意基础很牢固，这是其三。诸位不妨想想看，吕后专权以来，将自己子侄三人封为王，吕产、吕禄掌握南北二军，权势够大了吧，结果又如何呢？太尉周勃凭着手中一支符节，疾驰而入北军，登高一呼，将士们无不左袒响应，吕氏多年经营，朝夕之间土崩瓦解，化为云烟，这就是天意，这就是民心所向。面对刚刚发生在眼前之事，相信群臣们都会为之震撼。退一步讲，就算现在有人企图作乱，恐怕百姓们也不会追随他!”

宋昌稍微停顿一下后，继续说道：“大王去了京城后，并非孤立无援，因为如今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等宗亲，地方上还有吴、楚、淮南、琅邪、齐等诸侯，谁要是胆敢图谋不轨，他不得不掂量一番吧？目前，高帝皇子就剩下大王您和淮南王，且大王您居长，贤圣仁孝早已闻名天下(有点夸张)，无论从哪个角度，皇位归您，完全是众望所归。大臣们迎接您前去称帝，只不过是顺天应人之举罢了，大王您大可不必再犹豫了。”

宋昌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朝堂上，代国官员们无不心服口服，无语反驳。

只是，刘恒依然迟疑不决，下不了决心。他决定去和太后商量一番后，再做决定。只是薄太后一介妇人，能帮他拿什么主意？半天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刘恒举棋不定，最后决定干脆问一下鬼神，让神明帮自己下决断。

巫师将一片龟甲丢进烧得通红的炉火中，半晌后，将龟甲从火中取出来。龟甲在高温焚烧后，出现了裂痕，龟甲中央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横向裂纹。

刘恒忙问巫师：根据龟甲呈现的裂纹看，上天给予寡人怎样的启示？

巫师回答说：“根据卜辞，这是预示大王将要做王了!”

刘恒感到不解：“我现在已经是王了，还要做什么王？”

“上天预示之王，非诸侯王，乃是天王，即天子!”巫师解释道。

巫师的预言，让刘恒又喜又忧。就在此时，长安方面又派来使节，敦促他赶快赴京。

原来，在代国君臣就是否赴长安展开激辩之时，长安城内，陈平

和周勃也在揣摩刘恒的用意。

做皇帝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刘恒却要拒绝从天而降的皇冠，究竟是怎么想的？

陈平和周勃毕竟是纵横政坛多年的老狐狸，经过一番盘算，他们认为，刘恒这是在测试他们的诚意。于是，又再次派使者赶到代国。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关于京城的传闻听了很多，大臣们也提了不少意见，但刘恒总觉有点不踏实，心想不妨趁此机会，派人实地探个究竟，遂命舅舅薄昭走一趟，到长安了解实情。

薄昭抵达长安后，面见周勃。周勃没有藏着掖着，如实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薄昭看得出来，周勃言谈举止之间是真情流露，没有丝毫做作迹象，当下判定他们是真心迎接代王。

返回代国后，薄昭将自己耳闻目睹之事悉数向刘恒做了汇报，称长安大臣们迎接大王之事，绝对假不了。薄昭的话，无疑验证了宋昌的判断是正确的。刘恒对宋昌，也不由得多了几分赞赏。

刘恒心里终于踏实了，拿定主意，动身赴京，让宋昌做自己的参乘(同乘一车，负责保卫或备顾问应对)，可以随时帮自己拿个主意。另外还有张武等六人同行，一起乘车赶往长安。

一路上跋山涉水，至高陵(今陕西省高陵西南)时，刘恒还是有点不放心，停下车，先让宋昌驱车前去探路，查看长安有无异象。

宋昌刚抵达渭桥，就见丞相以下的官员，早早在那里等候迎接，态度甚是恭敬，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便径自返回，向刘恒汇报说，一切都正常，大王大可放心了。

刘恒听后，才放下心，向长安进发。车驾一行至渭桥时，长安的大小官员都来拜见。刘恒也从车上下来，向群臣回礼。

整场欢迎仪式，总体上主宾双方行礼如仪，气氛融洽和谐，不过

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小插曲。

周勃不知是出于什么打算，曾试图想和刘恒单独面谈一下，说：“臣有些事，希望单独向大王汇报一下。”

刘恒还没来得及答话，宋昌在旁插话道：“要是公事，不妨当众公开讲；若是私事，王者不会受理私事!”

这番话合情合理，周勃实在无语反驳，一脸难堪，到嘴边的话，只好硬生生咽了回去。

不得不承认，宋昌比较老辣，处理手段很到位。刘恒初来乍到，对长安形势基本两眼一抹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多观察、少说话，不要轻易表态，要让长安朝臣们猜不透他内心真实想法。

再说，没正式称帝之前，私下接触周勃这样的重臣，难免给群臣留下密谋阴谋的印象。

为君者，绝不能与臣子做私下交易。不然，往后还怎么在朝堂上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然，这些话，刘恒碍于身份，不便讲，宋昌主动替他化解了一场危机。

经宋昌一通抢白，周勃自然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只好就地跪下，献上皇帝印玺和符节。

不过，刘恒并没有立即接过来，反而语气很平淡地说：“一切等进了长安，到代邸(汉朝时，诸侯列王在京城都有属于自己的官邸，以备朝觐进京时用)再说吧。”

迎接仪式看似风轻云淡，但三言两语背后，却是不动声色地暗中较劲。

周勃想抢先一步向新君表功，留个好印象，一副邀功心切的嘴脸暴露无遗。反倒是刘恒表现得不温不火，分寸拿捏得很到位。

刘恒心里很清楚，周勃这些人可是跟着高祖一起打天下的老将，对他这个来自边塞的年轻皇子，估计心中多少有点轻视。所以，必须先变相敲打他们一番。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闰九月三十日，刘恒进入长安，住进代邸。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这些京城重量级人物，都一起来拜望。

众人行礼完毕后，直奔主题："皇子刘弘(注意这称呼)不是惠帝的儿子，不能再继续坐在皇位上，经过宗室和大臣们商议，一致认为大王您是高帝长子，由您继承帝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刘恒脸上显得有点为难，说："我才能不足，恐怕扛不起这份重担，我觉得我叔父楚王(刘交)辈分高，是更适合的人选。"

大臣们都不傻，谁都知道刘恒这是在做姿态，要是真心让楚王来做皇帝，刘恒大老远来长安干什么？但此时，君臣双方都要配合对方，一定要把这场礼让戏演下去，而且还要表演得非常到位，感情要真挚，表情要逼真，唯如此才行。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是扮演角色不同而已。

这些大臣们，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哪一个不是戏精？当下都趴在地上，摆出一副刘恒不答应他们就坚决不起来的姿态。

刘恒还在谦让。陈平觉得，演戏嘛，差不多就得了，如果演过头，就难以收场了，届时大家都下不了台，可如何是好？遂示意周围之人，将刘恒从西面位置扶到坐北朝南的主位上。

坐西向东，为宾客之仪，坐北朝南乃是君臣之礼。坐席方向一变，就等于确定了君臣名分。

刘恒依然在半推半就地谦让，丞相陈平语气诚恳而又坚定地说："臣等认为大王继承高帝大业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也是诸侯们的愿望，更是天下百姓的共同心声。臣等这样做完全是为宗庙社稷考虑，绝无私心，万望大王允准!"

话音刚落，陈平便将天子玉玺和符节高高举起，献给刘恒。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刘恒觉得再不能推辞了，便顺势说："既然大家都这样认为，我就不敢再推辞了。"遂从陈平手中接过印玺和符节。

完成这道程序，刘恒相当于已是准皇帝了。

自吕后去世后，短短一个多月间，经历了吕氏和刘氏两大政治势力的大较量。觊觎最高权力的人很多，但谁也没料到，皇冠意外落到了看似很弱小、最没有可能的刘恒头上。

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诚哉斯言!

# 第四章 仁君祸心

## 赏罚不公

臣子们一再劝进、刘恒反复辞让的表演，总算在双方的密切配合下告一段落，刘恒成为大汉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位天子(当然，从官方角度说应该是第三位，因为前后二少帝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对刘恒来说，并不意味着就此万事大吉，可以心安理得地做皇帝了。

实际上，他的谦让，固然有政治表演成分，但同时也是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

落魄皇子一夜之间成了大汉天子，对许多皇室贵胄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刘恒却一直开心不起来。

他自南下赴京，进入长安后，处处小心，步步谨慎。只身从代国边陲到帝国心脏，是祸是福，现在谁也说不准。

在京城，刘恒没有任何根基，不要以为将天子印玺和符节拿到手，就等于掌握了帝国最高权力。假如没有一帮属于自己的嫡系人马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掌握各个要害部门，即使拥有了帝王的头衔，也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名分罢了，没有人真拿自己当回事。

京城的开国功臣、地方上的各位诸侯，没有一个是善茬儿，想要他们心悦诚服、俯首称臣谈何容易？想要驾驭这些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逼他们表忠心，如此等于君臣间签署了一份不可道破的权力契约，借机树立权威，让这些人以后再无法质疑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由外藩入中央继承大统，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帝位继承方式，往往会产生一项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处理原来的掌权者与新君自己班底人马之间的关系？说得更透一点，就是新形势下，权力和

利益如何分配？

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激化为派系斗争，甚至演变为政变，这样的事，远的不说，在汉朝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刘恒去世百年后，他的子孙中就有一位从外藩入主中央的王子，就因为没有处理好这层关系，在皇位上待了没几天，就被打包送了回去。

幸运的是，刘恒开了个好头，最终坐稳了江山。他的秘诀就是，想要爬上权力巅峰，就必须先放低姿态。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柔者为刚，弱者称王。

刘恒的低调和示弱，也是陈平和周勃最乐见的。

多年来，陈平和周勃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辅助高祖打天下，可谓劳苦功高。但高祖在世时，他们基本处于权力核心的边缘地带，地位都比较尴尬。

高祖去世，吕后专权以来，他们二人顺应时势，选择了主动迎合吕后，保住了权势和荣华富贵，但也因此背上了背弃高祖遗嘱的罪名，受到刘氏宗室的排斥。

不过，为了保住大汉社稷，他们唯有委曲求全，至于蒙受误解，遭人唾弃，都算不了什么。他们坚信吕氏专权只是暂时的，天下终究还是刘氏之天下。

经历这么多以后，他们不想再侍奉一位强势皇帝，他们希望新君垂拱而治就好。只要大汉法统重新回归刘氏，剩下的事交给群臣即可。

群臣之所以反对吕氏，拥戴刘氏，不正是为了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吗？

迎接代王刘恒，无疑是最佳选择。陈平和周勃洗刷了以前背负的

罪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相信今夜过后，所有关于他们的非议都将戛然而止。

在权力斗争中，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站队正确，赢得了最终胜利，一切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在你手中。

与陈平、周勃的老辣相比，刘章、刘兴居弟兄俩显得徒有血气之勇，他们此前一直积极为自家大哥奔走，希望由齐王刘襄继承帝位。本以为是十拿九稳之事，不料最后群臣却选择迎立代王，这样一来，两人的处境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刘章好歹在扳倒吕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兴居却什么都没干。一旦代王继位，恐怕难逃秋后算账。

事不宜迟，必须抢先一步，在新君面前争一份功劳，往后才能说得过去。只是，刘恒已经进入长安，能干的事已经不多了，必须干一件脏活累活才行。

拥戴刘恒为新天子的事是敲定了，但未央宫还住着少帝刘弘，刘恒要搬进去，意味着刘弘就要被撵出来。这毕竟是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刘兴居当场提出，此事交给他去做。

刘兴居需要个帮手，太仆夏侯婴掌握着皇帝车驾，和他搭伴再合适不过了。时间紧迫，两人决定立即入宫。

少帝尚浑然不知，不晓得外面已经变了天。小孩子哪里懂得成人的世界？他还不大明白，看到刘兴居和夏侯婴大晚上冲进宫来，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刘兴居看着一脸懵懂的少帝说："足下不是刘氏后代，不应该再坐在皇帝位置上了。"说完，就催促他立刻动身。

由于事出突然，皇帝周围的侍从和卫兵们都没反应过来。刘兴居挥手让他们走开，有些人自动放下武器，但也有几个人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不肯离开。

幸亏宦者令张泽站出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大家总算明白了，未央宫将要换新主人，所以他们只好也跟着放下武器，自动散去。

夏侯婴找来车子，扶少帝登车出宫。车子驶出宫时，少帝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问夏侯婴："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夏侯婴回答道："到外面给你安排个住处。"

离开未央宫后，夏侯婴找了个住处，将少帝安顿下来。

当天晚上，少帝刘弘和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等几个惠帝的儿子全部被处死。可怜几个小孩子，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最终也难逃成为权力斗争牺牲品的命运。

刘兴居和夏侯婴准备齐全天子仪仗，赶往代王府邸，迎接刘恒入宫。

在众人簇拥下，刘恒进入未央宫，行至端门，有十名谒者持戟把守，他们不知内情，看到有人深夜闯宫，大声喝道："天子还在，你是什么人，胆敢闯宫？"

刘恒无奈，只好回过头，让周勃出面解释。

周勃走上前，耐心将来龙去脉解释了一遍。谒者们明白大势已去，便放弃抵抗，丢下武器，四下散去。

经过一番波折，刘恒终于进入内廷。

入住未央宫当晚，刘恒迅速颁布了两条紧急人事任命案：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未央、长乐两宫卫队和南北军；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视殿中。

然后，他没有稍做休息，直接到未央宫前殿，正式以皇帝身份临朝，颁布第一道诏书：

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

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pú)五日。

刘恒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他知道自己在京城没有根基，必须快速将京城的防卫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同时，由于以前他在天下人心中根本没有存在感，所以借着继位之初，要大力收买人心。

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对朝廷上层的权力更替基本漠不关心，他们更在乎谁给他们带来实惠。赐爵、赏牛、准许聚众喝酒，这些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单拿大酺这件事来说，汉代社会执行盐酒专卖政策，民间实行严格的禁酒令，根据《汉律》，一旦查实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者，要被处死。

因为酿酒要浪费大量粮食，但在农业产出普遍低下的古代社会，粮食要优先保证食用。况且，饮酒对社会风气也有负面影响。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总结商朝灭亡原因时，归纳出主要一条就是商人放纵饮酒。为了使周人免于重蹈覆辙，他颁布了严格的禁酒令，此后无论秦汉，都执行禁酒令。

在秦汉时，民间百姓能喝酒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不过诏令是下发了，具体到地方上，能否完全执行下去，就不得而知了。

马上又是十月岁首，新的一年开始了。按照惯例，当以新皇帝纪元，刘恒谥号为孝文皇帝，故新的一年当为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

文帝前元元年十月二日，文帝率领群臣在高祖庙中举行隆重肃穆的祭告仪式，正式宣布登基。而后，根据在倒吕政变中的功绩，进行

论功行赏，具体如下：

太尉周勃任右丞相，加封食邑一万户，赐予黄金五千斤；

右丞相陈平改为左丞相，加封食邑三千户，赐予黄金两千斤；

大将军灌婴任太尉，加封食邑三千户，赐予黄金两千斤；

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每人食邑二千户，赐予黄金一千斤；

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子黄金一千斤；

琅邪王刘泽改封为燕王。

如果细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份封赏名单并不公平。在政变中，周勃和陈平做了一些谋划调度，但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刘章。

很显然，此次封赏最大的受益者并非刘章，而是周勃和刘泽，跟他们一比，刘章和刘兴居哥儿俩的封赏显得微不足道，属于象征性的。

实际上，在这份封赏名单出炉前，另有一番内幕。

原来就在文帝入主未央宫后，第二日朝会就不见右丞相陈平的身影，一问才知道他染病了。文帝不禁心生疑窦，觉得很蹊跷，早不病晚不病，为何恰恰在这个时候就病了？

文帝不信世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便前往陈平府中探个究竟。

见皇帝亲自前来探视，陈平只好实话实说："高祖在位时期，周勃功劳不如我，因此，我位居他之上。而在消灭诸吕的斗争中，我的功劳就比不上他了，所以心甘情愿将右丞相位置让给他。"

人在职场，往上爬靠的是贪婪和野心，但往回退，却需要智慧和勇气。

强者任他强，横者任他横。

眼看着有人起高楼，眼看有人宴宾客，到后来，终难逃，曲终人散楼坍塌。

毫无疑问，陈平是个智者。他知道，多年来，周勃一直对他心怀不忿，嫉妒自己官居于他之上。虽说为了扳倒吕氏，两人握手言和，但一旦没了共同的敌人，暂时按下去的旧日恩怨终究会重浮水面。

那么，让他一下又何妨!

文帝思考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陈平的决定。

封赏令颁布后，有人欢喜，有人恼火。

周勃终于得偿所愿，坐上了右丞相的位子，成为首席功臣，一时间风光无限。多年来，他心头憋着一口气，现在终于将陈平踩在脚下了，扬眉吐气了一把。

至于刘泽，本是个投机分子，谈不上对文帝有多少感情。他之所以主动提出迎接文帝，多半还是嫉恨齐王刘襄，不愿意让他美梦成真。

在倒吕行动中，刘泽基本没出多大力，反倒成为第一个受封之人，拥有了燕国这样一个大国。只是，他也没欢喜多久，就国两年后就死了。

对此次封赏极为不满的，自然是刘章、刘兴居兄弟俩。刘章立有大功，却只封食邑二千户，赐金不过千斤，打发了事。

刘章、刘兴居哥儿俩心中自然感到愤愤不平，只不过暂时敢怒不敢言罢了。

如此安排，实为文帝私心作祟。

其中缘由是他后来得知，刘章之所以在诛灭吕氏行动中如此卖力，主要是为了迎接齐王刘襄称帝，心中自然很不痛快。

反观刘泽，虽说没有冲在倒吕政变的第一线，但在大臣们群议纷纷之时，他站出来提出迎立文帝，对于营造舆论风向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封他为燕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两年后，文帝一口气册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为了安抚其他刘氏宗室，封被吕后饿死的赵幽王刘友长子刘遂为赵王、幼子刘辟疆为河间王，顺便捎带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

看上去，虽说晚了一些，但好歹也算补偿了一下刘章、刘兴居。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哥儿俩的不满，且不说封赏有点姗姗来迟，就是城阳国和济北国，也是从原来的齐国划分出来的，刘肥一系的势力并没有丝毫变化，等于玩了一个数字游戏而已。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四月，在封王一年后，刘章带着愤懑和不甘心去世了。在他死后不到一月，匈奴入侵，匈奴右贤王进入北地郡，渡过黄河，占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及其以南地区，又称为新秦中)。一时间，大汉北疆形势空前紧张。

吕后执政以来，对匈奴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使匈奴变得愈发骄横。估计，他们得知大汉新君初立，代国一时无主，想趁着汉朝北部边境空虚，南下捞一把。

此时，文帝正在巡幸甘泉宫(本为秦林光宫，秦二世时所建，位于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

得知匈奴南侵，文帝觉得以前为了避免战火，保持边境的安宁，不惜给匈奴送去大量女子财帛，却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贪得无厌的匈奴，依旧时常越过边塞，杀害大汉边关官民士卒。有时候甚至深入内地，烧杀劫掠。对于匈奴这种言而无信的野蛮人，一味地忍让，非

但不能终止他们的强盗行径，还会进一步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帝在当代王时，见多了匈奴的暴行。如今他是大汉天子，决不能再妥协，遂决定对匈奴发起反击，下令边境一带约八万五千骑兵将士在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延河北岸)集结，由丞相颍阴侯灌婴统领，迎头痛击敌人，并调遣中尉材官归属于卫将军(名不详)，驻守长安，以防止有人趁着汉匈开战时在后方捣乱。

匈奴右贤王得知汉军大军集结，急忙逃遁而去。灌婴正准备继续追击敌人，却接到皇帝命令，要他放弃追击，立刻掉头南下。

原来，济北王刘兴居就国以后，总觉得文帝封赏不公，心中怏怏不平，恰好听说皇帝不在京城，又逢外敌入侵，以为可趁机作乱，便举兵造反。计划先派兵偷袭荥阳，一旦荥阳到手，就可以趁势攻入关中。

攘外必先安内。得知刘兴居造反，文帝只得下令汉军暂停反击匈奴，全力平乱，命棘蒲侯柴武(有的版本作陈武)为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征讨刘兴居。同时，命祁侯缯贺为将军，驻扎在荥阳，以防止叛军偷袭。

平叛战争在短短三个月后就结束了，刘兴居被俘后自杀，济北国改为郡县，由中央直接管辖。

刘兴居昙花一现的叛乱，使得那些还持观望态度的诸侯彻底死了心，再也不敢痴心妄想。

刚即位，就遇到内忧外患，文帝没有丝毫的慌乱，反而表现出了从容不迫的帝王气度。原来的行程安排，并没有因发生意外而改变，依旧从甘泉宫北上高奴，顺路到太原，接见代国群臣。虽说离开代国也不过数月，但身份变化后故地重游，回到昔日封国，文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当年，文帝刚来代国时，还是一个八岁孩童，离开时，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代国的一草一木，他都记在心头。如今以大汉天子的身份，重回代国，他岂能不感慨万千？

代国虽说苦寒贫瘠，但在吕后疯狂报复打压刘氏宗室之时，却成了文帝和薄太后母子二人的庇护所。幸赖代国臣子们齐心协力，从中周旋，才使他们侥幸逃过了吕后的魔爪。

文帝心想：现在朕回来了，是时候回报一下了。

多年的苦日子，使得文帝养成了勤俭过日子的良好习惯，不过这一刻，他没有丝毫的吝啬，对代国的群臣进行大肆封赏，感谢他们陪自己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文帝是个重感情的人，在赏赐官员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代国的普通百姓赏赐牛和酒，免除晋阳、中都民众三年的徭役和赋税。

即位以来，无论对臣下还是百姓，文帝都广施恩义。但如果有人就此以为他是好好先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和事佬，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根基薄弱，要拓展权力基础，唯有尽其所能，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

作为帝王，最大的忌讳就是让臣下看到弱点，让臣下抓到把柄。继位之初，文帝对朝中大事知之甚少，为避免在臣下面前露破绽，他尽量在具体事务上不表态，不乱干预臣下工作。

但令文帝没想到的是，他谦逊的态度却助长了一些人的傲慢，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右丞相周勃。

## 周勃罢相

早年的艰难岁月，给文帝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他即位之初就下定决心做一名好皇帝。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义之君，成了后世历代君王效法学习的榜样。

文帝的身上体现了儒家提倡的一切美德，概括起来，就是“仁孝”二字。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教育。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孩子的人格成型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帝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缺少父爱，但他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位谦和宽容的母亲。

薄太后生性恬静淡泊，为人内敛不争，她的言传身教对文帝的成长产生了很大作用。在她的呵护和陪伴下，儿子并没有由于缺少父爱而出现人格的缺陷，反而成长为一个品德优秀的好少年。

虽说自古帝王之家缺少家庭亲情，但文帝与薄太后母子二人感情非常好。文帝对母亲，是非常感激的，是那种纯天然、出乎天性的孝顺。他刚一即位，就赶紧派舅舅薄昭赶赴代国，迎接母亲到长安。

终其一生，文帝对母亲的孝顺不减丝毫。薄太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文帝总是设法精心照顾她。

或许与北方地理气候条件差有关，在代国期间，薄太后经常生病，有一次，一病不起，卧床长达三年之久。文帝不放心下人，就亲自在太后榻前伺候，每次服药，总要亲自尝药试温，然后再喂给母亲。由于照料得当，薄太后身体逐渐康健，直到文帝驾崩后两年，才安然去世。

文帝的孝行感动了很多人，后世将他列入二十四孝，成为孝道教育的榜样。文帝对母亲恭顺，对臣下则多宽容。大臣们偶尔犯点小错误，他也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忍过于苛责。

然而，有些人，将皇帝的宽容误认为是懦弱，将皇帝的仁慈，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周勃，就做得实在太过分。

他自认为是拥立文帝的首席功臣，走起路来鼻孔朝天，全然不把旁人放在眼里。就是在朝堂上，也常举止失仪，退朝的时候不行趋礼，径自大踏步离去，全然不顾礼仪。念及他的功劳，文帝心中虽然不快，但依然目送着他离去。

朝中大臣们对周勃的骄横做派多有不满，但惧于他的权势，不敢站出来反对。但日子一久，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站出来，向皇帝检举周勃。

令人吃惊的是，敢于拔虎须之人，竟然是与周勃关系挺不错的袁盎。

袁盎，字丝，楚人。其父早年曾落草为寇，总觉得不能一辈子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便洗手不干，举家迁至安陵(惠帝陵寝，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袁父共有俩儿子，老大为袁哙，老二为袁盎。

占山为王、拦路打劫的营生没了，但饭还是要吃。袁盎一度到吕禄府上做家臣，这段时间到底过得如何，不得而知，估计混得也很一般。

后来，吕氏倒台，吕禄被灭族，好在袁盎没受到牵连。究其原因，一来他在吕禄手下就是个不起眼儿的小角色，根本没参与什么大事，没有不良记录；二来周勃与他的哥哥袁哙交情不错，估计有意放了他一马。

文帝即位后，在袁哙举荐下，袁盎做了一名郎中(皇帝的随从)。

袁盎为人正直，最看重儒家君臣伦理，觉得臣子无论有多大功劳，都必须恪守为人臣的本分。在君臣大义面前，个人情谊根本不值得一提，看着周勃昂首离去的背影，正在文帝身边当值陪侍的袁盎，不动声色地向皇帝问了一个问题：“陛下认为丞相绛侯(绛侯是周勃的封号)是什么样的人？”

“是国之重臣啊!”文帝不晓得袁盎为何突然有这么一问，便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不见得，绛侯是功臣，但并非重臣。”袁盎答道。

“功臣和重臣有区别吗？”文帝觉得好奇。

“有!”袁盎斩钉截铁地答道，“吕后称制，诸吕专权之时，刘氏的天下犹如命系一线，周勃身居太尉高职，却没有站出来匡扶正义，直等到吕后去世，群臣出来反对吕氏时，周勃察觉到风向有变，顺势抓住机会，参与了倒吕行动。因此，说他是功臣不假，但谈不上国家重臣。能够在国家危难之际站出来力挽狂澜，与皇帝患难与共，不计较个人得失之人，方可以称之为重臣，显然，周勃不是!如今，周勃对陛下面露傲色，陛下却依然对他谦让、礼遇有加，我觉得你们君臣二人做法都有失礼节，陛下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态度!”

文帝听完后，默然不语，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周勃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收起以往谦逊和蔼的态度，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周勃看见皇帝没有好脸色，心里发怵，开始有所收敛，态度也变得恭敬了许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周勃很快就得知，皇帝态度转变，是袁盎在背后使坏，不由得气愤难平，当着袁盎的面骂他：“好歹我和你兄长袁哙交情不浅，你小子却在朝堂上诽谤我!”

袁盎认为自己是出于公心，做事无愧于心，因此也懒得理他。

周勃本以为文帝是受了袁盎蛊惑，最多就是不给自己好脸色，只要时间一长，一切就会好起来，毕竟自己对皇帝有过大功。

然而，时间很快证明，周勃想得太天真了。没有一个皇帝甘愿看臣下的脸色做事，文帝也不会例外。他之所以前段时间能够容忍周勃，主要是因为初来乍到，对朝政大事尚不清楚。

皇帝没有见习期，在坐上皇位之前，谁都没有经验。不懂没关系，可以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文帝对朝廷大事，心中基本有了初步掌握。此时，他对周勃的忍耐也已到了极限。

终于有一天，在朝会上，文帝发难了。

“敢问丞相，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

态度很和蔼，语气很亲切，犹如正常工作询问，一切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了。

周勃本是武将出身，没有多少行政经验，虽说坐上右丞相位子已经有些时日了，但只是忙于享受担任百官之首带来的权力滋味，根本无暇留意政事。见皇帝垂询，又不能撒谎，只好老老实实如实回答：“不知道。”

“那么，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有多少？”皇帝又问道。

周勃抬头看了看，见皇帝脸上依然一脸真诚，笑意很浓，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

那一刻，周勃感到巨大的压力，犹如一股超强气流，从宝座上向他呼啸而来，逼得他快要窒息了。汗，从鬓角渗出，流了下来，后背不禁已是大汗淋漓，浸透了袍服。他再一次弱弱地回答道：“不知道。”

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周勃感到满朝文武大臣的目光都盯着他，顿时又羞又臊，那一瞬，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好在皇帝没有继续问他，转过身去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

陈平很平静地回道：“了解这些事，陛下问相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就好了。”

文帝进一步问道：“具体主管者是哪些人？”

“陛下要是问刑狱判决，只管问廷尉；若是了解钱粮收支，询问治粟内史便是。”陈平回答很从容。

“既然各方面都有各司其责之人，那么，你又管些什么事呢？”文

帝追问道，这话就显得有点尖锐了。

既然方方面面都有主管部门，朕要你这个丞相又有何用？

陈平何等聪明，马上听出了皇帝的弦外之音，立刻端正态度，用略带自责的语气回答说：“陛下不嫌我才智低下，让我勉强出任丞相，臣下实在诚惶诚恐!至于丞相职责，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胜其职。”

一句话，丞相就是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督促百官做好手中工作。至于具体事务，交给职能部门就好了，没必要事事躬亲。

文帝听后很满意，连声称赞陈平回答得好。

两人一比较，高下立现。朝会结束后，周勃感到很不是滋味，认为陈平有意让他在皇帝和百官面前出丑，憋了一肚子气，气呼呼地抱怨陈平说：“您平常为何不教教我这些话，害得我在陛下面前抬不起头？”

陈平听后，非但没生气，反而笑意盈盈地说：“您现在已是身居相位，怎么还不知道丞相的职责？假若陛下问起长安城中盗贼数目，难道您也要胡乱编个数应对吗？”

直到此时，周勃才明白了，自己自始至终和陈平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他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体会到自己和陈平存在差距这个水平了。

其实，有些话陈平没有说，是希望他自己去体会品味。

这时，有个无名好心人提醒他：“您大祸临头了，怎么还跟没事人一般啊？”

周勃觉得莫名其妙，忙问：“你说明白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来人见周勃毫无所知，只好把话挑明："你诛杀诸吕，迎立皇帝，立有大功，但你却没有自知之明，身居高位，居功自傲，不知危险将近，皇帝问您那些话，其本意不在考察你的理政能力，是在暗示您，要懂得有所进退。如果您还不急流勇退，恐怕祸事真的不远了!"

周勃听后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于是不再犹豫，立即给皇帝上书，自称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实在难以继续扛起丞相重任，愿意辞职还乡。

周勃辞职书呈上去后，心中还保留着一丝幻想，希望文帝挽留一下，至少做个姿态也行，没想到文帝很痛快地批准了。

至此一切明白了，周勃只好收拾一下走人了。

周勃辞职后，文帝不再设左右丞相，丞相职位由陈平一人一肩挑。

不过，陈平在任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陈平刚去世没几天，周勃接到皇帝诏书，让他重新做丞相。周勃喜出望外，看来皇帝究竟还是没忘记他的功劳啊!

然而，事实证明他高兴得有点早了。

周勃回炉重任丞相不久，文帝就颁布了一道诏书。

内容大致是这样："古时候诸侯林立，各自守着自家封地，按时向天子进贡，百姓们也就近给封主缴纳赋税，上下相安无事，和睦欢喜，这是多好的事啊!只是眼下，列侯们多居住在长安，与自己封地路途遥远，封邑百姓们每年千里迢迢往京城送物资用品，同时，列侯也顾不上打理自己封地事宜。从现在起，列侯都回到自己封地去，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实在走不开的，也要派儿子前去封地。"

诏书颁布后，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大多数人都寻找各种理由赖在

长安不走。其中缘由很简单，没有人舍得离开繁华的京城，到乡下去过苦日子。

一年时间过去了，列侯中大多数人依然如故，待在长安磨磨蹭蹭，就是不动身。

文帝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既然都不愿动，就别怪我点名动粗了。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十月三十日，发生了日食。天象有异变，必然是朝堂上出了问题。文帝决定趁这个机会出手，他找来周勃谈话，语气很柔和，但态度很坚决。

“前些日子，朝廷下诏让列侯去封地，但总有些人找托词不走。丞相是我一贯器重的大臣，你看现在你可否做个表率，带个头？”

周勃不知道皇帝为何突然扯到封地上，一脸茫然，他想辩解一番，但嘴张合几次，终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到最后，只得颓然地点头表示同意。

很快，周勃的丞相职务被免去，他心中纵然十二分不愿意，但也只得收拾一番，上路去封地了。

周勃走后，丞相一职由灌婴接任，同时免除灌婴太尉职务。而太尉一职被宣布废除，其职权归入丞相。

栽了跟头，丢了官，但周勃自始至终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能说他的政治觉悟实在太低，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对权力法则还是没有透彻的认识。

庙堂高处不胜寒，无论是谁，若是行事不小心，就会被权力野兽吞噬，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也概莫能外。

为了保全自己，保证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皇帝就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人马。一朝天子一朝臣，古今皆然。吕后执政时期，她全力提拔自己娘家子侄，毕竟还是自家人可靠。自那时起，陈平、周勃

等功臣就已经靠边站了。

只是后来的倒吕政变，让陈平和周勃的政治生命意外得到了延续。不过政变的结束，意味着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文帝绝对不能容忍在朝堂上还有一群功臣在颐指气使。周勃初次罢相时，皇帝的意图已经很明了，但他却丝毫没有察觉，等重新出山之际，还欣欣然不知所以。实际上，文帝采用的是先扬后抑的策略，欲要取之，必先予之，之所以让周勃再次复任丞相，就是打算将他彻底逐出权力核心，但周勃却浑然不知。

至此，周勃总算领教了什么叫君心深似海，他满怀沮丧和失落，回到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

不到一年多，他先是从云端跌了下来，然后又重新扶摇直上，没想到没多久，再次重重摔落下来。人生的大起大落，让他感到人生无常，变幻莫测。

当年的周勃叱咤风云，何其雄壮？如今却落得终日惶惶然，难有片刻的安宁。虽说现在还是世袭列侯，但他总觉得有一种不祥感，在向他慢慢逼近。

绛县属于河东郡，河东郡守和郡尉等地方官员定期到下辖各县巡视，每当到绛县时，周勃就高度紧张，害怕自己遭暗算。出于职业军人的敏感，每逢地方官来访时，他总是顶盔披甲，全副武装后，才在家人簇拥下出来接见。一来二去，地方官们觉得不对劲，绛侯回到封地安心养老即可，搞这么大阵仗，到底有何企图？不行，这事必须要向朝廷汇报。

周勃回到封地一年后，文帝就接到地方官的揭发信，检举周勃不老实，要图谋造反。

谋反这等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文帝立即下令廷尉彻查。廷尉不敢怠慢，交给长安刑狱部门去办理，周勃随即被逮捕下狱。

面对飞来横祸，周勃百口莫辩，一时不知该如何自证清白。

长安遍地王侯，所以长安监狱的狱吏也是见过大世面的，随便哪天牢房中丢进来个把王侯，他们都不会觉得稀奇，早已司空见惯了。

在阴暗湿冷的牢房中工作久了，狱吏们心肠早已变硬，性子也犹如牢房一般，阴暗狠毒，没有一丝阳光。甭管你以前是王侯还是将相，只要进了牢房，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不出三天，定能让你身上的尊贵和骄奢气蜕尽。

周勃是一员久经沙场的猛将，现在虽老，然虎威犹在。可是自打下狱后，每天面对狱吏的百般折辱和刁难，没出几日，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猛虎快变成病猫了。

在监狱里，昔日的官衔和荣耀都暗淡失色，没有任何用处。周勃失落、潦倒，愁绪万千，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念头犹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头脑闪过，他想起了一件利器：钱!

虽说人在牢房，但在没定罪之前，周勃家产尚在，不缺钱。现在不是心疼钱的时候，他咬咬牙，给狱吏送了一笔钱，足足有千金之多。如此巨额的钱财，足以诱导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

一介小小狱吏，几辈子都未必能攒足这么多钱。狱吏动摇了，立刻换了一副嘴脸，态度大转变，殷勤了许多。一日，趁着四下无人，狱吏偷偷将一片木简塞到周勃手中。

狱吏走后，周勃摊开手细看，谁料木简上一片空白，不着一字。周勃有点失望，下意识将木简翻过来，才发现背面有字，忙凑近牢房窗户，借着微弱光线，隐隐看见上面写着几个字。

“以公主为证。”

周勃恍然大悟，立刻懂了。下狱后，遭遇突然变故，以至于乱了方寸，竟然忘了一个关键性证人，就是自己的儿媳妇。

文帝即位后，为了笼络周勃，将公主下嫁给周勃长子周胜之，现在只要公主站出来说句话，远胜过自己说百句。皇帝可以不相信我的证词，但自己女儿的话总得信吧？

不过，周勃总觉得单凭公主做证还不保险，最好找个能在皇帝身边说上话的人，出面为自己澄清才行。可自他下狱后，那些昔日与他交好的王公贵戚，唯恐避之不及，谁肯站出来？思来想去，皇帝是个孝子，旁人的话可以不听，但太后的话，必定能听得进去。

于是，周勃将昔日皇帝所有的封赏悉数拿出来，派人送到薄太后弟弟薄昭府上，拜托他在太后面前替自己求情。

薄昭见钱眼开，应允了下来。

此时，周勃涉嫌谋反案的审查工作也不断推进，眼看结案在即，薄昭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向薄太后替周勃求情。薄太后深以为然，也觉得周勃不大可能谋反。

一日，文帝退朝，赶来向太后请安。

薄太后遂问起周勃的事来，文帝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愿意正面回应。惹得老太后恼火了，顺手抄起身边头巾，向文帝扔了过来，骂道：“你也不想想，绛侯当初掌管着北军，手里握着玉玺，那时候他不谋反，反倒返回小小绛县后谋反，这可能吗？”

文帝当时也刚看过周勃在狱中的供词，基本确信他没有谋反，恰好被母亲一顿训斥，当下下令将周勃释放。

周勃走出牢门时，回头看了看狱吏，但见他早已转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满脸笑容，态度毕恭毕敬，仿佛从来没有对周勃凶过，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短暂的牢狱生活，让周勃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一名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老将，他也是踩着尸山血

海过来的人，早已看淡了生死。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狱吏，在这几天，让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

两军对垒时，周勃浑身是胆，可没想到，方寸牢狱竟压榨出了他内心的怯懦。阴暗力量实在太可怕了，他不由得长叹了一声：“我也曾是统领百万之师之人，没想到今日，才算见识了狱吏的厉害!”

周勃出狱后，文帝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昔日那些亲友故交，又纷纷找上门来，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但是，周勃对世事的看法已不同往日了。对这些人，他没有热情，没有愤恨，甚至内心没有起一丝涟漪。

趋利避害，人之天性，世态炎凉，本来如此。

只是，让周勃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身陷囹圄、同僚亲友袖手旁观之际，只有一个人为他上下奔走。而这个人，在此前，周勃对他一直很鄙夷，此人便是袁盎。

危难之际见真情。周勃落难之际，本该站出来的人，都明智地选择了置身事外，而周勃印象中的卑鄙之徒袁盎，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伸出了宝贵的援手。

再后来，周勃得知，如果没有袁盎上下积极活动，他不可能这么快就被释放出来。

事实证明，袁盎是个公私分明之人，是个堂堂正正之人，他当初检举周勃是出于公义，如今搭救周勃是发自友谊，两者并不矛盾。

平常看清一个人很难，唯有危难之际，方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品行。

经过此事，周勃对袁盎以前的误解一扫而空。此后，二人成了真诚相待的好友。

不过，这场牢狱之灾对周勃的打击实在太大。出狱回到封地后，

他再也不过问世事，直到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孤独去世。

在此以前，灌婴早在文帝前元四年十二月去世。

随着周勃撒手人寰，跟高祖打天下的功臣们基本凋零殆尽。

创业者们的终结，标志着大汉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 王子复仇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倒吕政变的主角们一个个先后出事了，先是文帝逼周勃罢相，紧接着，刘章英年早逝，刘兴居谋反未遂，自杀身亡。

内有藩王谋反，外有匈奴入侵，这一年纷扰不断，就没消停过。就在内忧外患之际，长安城内发生了一桩凶杀大案。长安作为大汉帝都，人口众多，发生个把凶杀案，本不足为奇，只是这桩案子无论是遇害者，还是凶手，都是当朝显赫人物。最奇的是，凶手杀人后，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袒露上身，跪在宫阙前自首。

遇害者是辟阳侯审食其，凶手是淮南王刘长。

自吕后去世，诸吕被诛杀后，作为一名过气人物，审食其一直低调做人，基本上待在府中不出门，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人们几乎快要将他遗忘了。没承想，他却意外惨死在刘长手中。

虽说审食其如今落魄了，但他毕竟也是曾经担任过丞相、太傅等显赫职位之人，并非一般平头小老百姓。突然之间遭人杀害，一时间，这桩大案立刻成为京城上下关注焦点，群议纷纷，就看朝廷如何处置此案。

刘长与审食其有何深仇大恨，竟要下此毒手？一切要从刘长的身世说起。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高祖追击韩王信，战役结束后，途经

赵国，赵王张敖为了讨好皇帝岳父，咬咬牙，将自己的一位美人(妃嫔封号)献给了高祖。

一夜欢愉之后，高祖抛下美人，急急忙忙就走了。不久后，她发现有了身孕。张敖一贯胆小谨慎，得知后，自然不敢再让她住在赵王宫，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宫室将她安置下来，只待有机会，将她送到高祖身边。

谁承想，张敖还没来得及汇报，赵国国相贯高谋反事件就东窗事发，赵王及其家眷统统受到牵连，被抓起来关在河内，其中就有那位美人。

谋反是夷三族的大罪，一旦受到牵连，断无活路。可怜的女人整日提心吊胆，个人生死早已不重要，作为母亲，她此刻有个强烈的愿望，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孩子。她央告监管的官吏说：我怀了皇帝的孩子，希望你代我转告一下陛下。

官吏听她说得有板有眼，不由得不信，深感兹事体大，不敢懈怠，立刻向高祖汇报。不巧的是，当时高祖被贯高谋反之事扰得心烦意乱，正在气头上，根本没心思理睬这档子事。

孕育新的生命，等于让女人重新拥有了一次生命，再柔弱的性子，也会变得无比坚韧起来。得到消息后，美人并不死心，就拜托哥哥赵兼通过审食其的关系求见吕后，希望她出面，在高祖面前求情，给她们母子一条生路。

吕后此时正在为戚夫人和刘如意恼火呢，一个后宫敌人已经让她嫉恨不已，岂能再给自己和儿子增添对手，所以她根本没发一言。

将赵兼引见给吕后，审食其已是冒了很大风险，眼瞅着吕后面若冰霜，就算他是吕后身边的红人，也不敢再拂逆她的意思？就很知趣地保持了缄默。毕竟这世间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更何况，一个陌生女子的性命，对审食其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他也没必要觉得亏欠和内疚。

悲剧已经注定，那个可怜的女人在生下孩子后，绝望之下，带着对这个不公人间的愤恨自杀了。

这个一出生就没了娘的孤儿，就是刘长，他是高祖的第七个儿子。

不知是出于慈悲心肠，还是担心事后万一皇帝得知真相追责自己，看护刘长母子的监护官吏决定再冒一把险，带着襁褓中的刘长赶赴长安，求见皇帝。此时，贯高谋反案已尘埃落定，高祖气早就消了。看着初生的刘长，他心中既是怜爱，又是满怀悔意，但人已经死了，悔之晚矣，只好下令将刘长母亲安葬于她的老家真定，至于刘长，交给吕后抚养。

刘长母亲已逝，自然无法与自己争宠，吕后也乐得抚养一个孩子，就这样，刘长在吕后的精心抚育下，一天天长大。自懂事起，惠帝就陪他一起玩耍，刘长与吕后、惠帝的关系很亲近，吕后也拿他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或许出于愧疚心理，在剪除淮南王英布当年，高祖就将淮南国封给刘长。

吕后专权后，高祖的几个孩子，刘如意、刘友、刘恢、刘建几人都没有逃脱吕后魔爪，唯有刘长安然无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长渐渐懂事，母亲的悲惨身世就如一颗巨石压在他心头，亡母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由于心中的怨气无处释放，他的性格已经严重扭曲，变得自大、狂妄、焦躁。

他知道，导致母亲惨死的直接凶手是高祖和吕后，高祖的无情和吕后的冷漠，逼死了可怜的母亲。然而，这两个人，他是万万不敢有怨言的。高祖既是他的亲生父亲，又是大汉天子，他又是吕后一手养育长大的，如果忤逆背叛，他将无立身之地。

故而，所有的恨只能算到审食其头上。刘长心中有一种幻想，想当初，审食其要是站出来说句话，自己母亲或许能够活下来。

但纵有万般仇恨，也只能悄悄藏在心头，因为他知道，只要吕后活着一天，自己就奈何不了审食其。

日子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刘长心头的仇恨并没淡化，反而愈加刻骨铭心。

这些年，多少个无人的夜晚，刘长跪在母亲的神主牌前默默流泪，心如油煎刀割，痛不欲生。噬心之痛、刻骨之恨，让他觉得，现在活着的最大动力，就是复仇!

好了，现在终于熬到吕后死了。

审食其最大的靠山没了，是时候报仇了。

只是文帝即位以来，审食其闭门谢客，夹着尾巴做人，一时也找不到机会。

文帝为人宽容，加上高祖的八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他和刘长两人，他倍加珍视手足之情，对刘长偶尔所犯的小错误，也不忍心追究。

但刘长却不知深浅，恃宠而骄，做事愈加狂妄骄横，就算是在朝堂上也不知收敛。出猎时，他与文帝同坐一辆车，说话没大没小，直呼文帝“大哥”，根本不管君臣礼仪。

依照礼制，就算是兄弟，一旦君臣名分已定，就必须恪守人臣本分。刘长的做法，明显已经越界了。文帝虽有些不快，但也隐忍没有发作。

袁盎提醒文帝，再不能让刘长由着性子胡闹，该给他安排几名得力太傅，教导规劝一下才是。不过，文帝似乎没听进去，事后也没啥动作。

文帝的宽容，无意间进一步助长了刘长的嚣张气焰。

他暗中估摸，以文帝的性子，就算自己惹出再大的祸端来，文帝

也不会加罪于自己。于是，他决定实施蓄谋多年的复仇计划，向审食其下手。

刘长天生神力，力可扛鼎，他决定用一击而中的方式，结束审食其性命。打定主意后，刘长在袍袖中暗藏了一柄铁锤，寻上门去。

审食其尚不知死神已向他靠拢，听说淮南王刘长前来拜访，虽感到有些意外，但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皇子，只好出门迎接。

步出府门，审食其见刘长器宇轩昂地站在门口，便笑意盈盈地迎了上去。

这一刻已经等了多年了，刘长再也懒得饶舌，趁审食其不注意，从袖子中抽出铁锤，铆足劲抡起来，冲着审食其脑袋就是狠命一击。一切来得太快，毫无防备的审食其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血泊中。

刘长还不解恨，让随从魏敬上前割下审食其的脑袋。

大仇已报，刘长心中有说不完的畅快，当即骑马一路狂奔，赶往皇宫，脱掉上衣请罪，并向皇帝进行自我辩护，称之所以刺杀审食其，是因为他身负三宗罪：

其一，当年我母亲受赵王张敖谋反案无辜牵连，审食其见死不救；

其二，赵王刘如意母子二人无罪，被吕后害死，审食其袖手旁观；

其三，吕后给诸吕封王，打压刘氏，审食其没有加以阻止。

刘长信誓旦旦地说，杀审食其是为母报仇，同时也是在为天下人除害!如今大仇已报，请陛下治罪!

刘长安在审食其头上的三桩罪名，看似义正词严，实则根本经不起推敲，完全是强词夺理。他所罗列的三项罪，每件事的主谋都是吕后，审食其连共犯都谈不上。

说白了，刘长母亲罹难时，审食其只是选择了明哲保身而已，道德上有瑕疵，但谈不上犯罪，更扯不上谋杀!

至于刘长对审食其的另外两项指控，更是胡乱罗织罪名。吕后杀害三名皇子，分封吕氏，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如果说，真要找出个有罪之人，首先是陈平、周勃、灌婴等庙堂上衮衮诸公才是，至于审食其，虽说备受吕后宠幸，但在朝政大事上，根本没有多少决定权。

退而言之，纵然审食其有罪，自有大汉律令制裁，大可向廷尉申诉，岂能擅自动用私刑？如果天下人都像刘长这般，凡事都以自己好恶为行事标准，似江湖游侠般胡乱杀人，那还了得!

文帝即位以来，审食其虽说已失势，但也是堂堂列侯，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尸自家门口。消息传开，长安舆论哗然，朝野上下都在关注此事，看皇帝如何处理此事。

袁盎知道文帝一向宠着刘长，担心他下不了手，便在一旁提醒说：“对诸侯过于放纵，必然会招来祸患，不妨适当地削减封地，敲打一下。”

然而，文帝依然没有听进去。

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刘长毫发无损地被释放了。

皇帝对外宣称，淮南王身世遭遇，实在令人同情，他杀人完全是出自一片孝心，朕实在不忍心治他的罪。

一桩朝野瞩目的凶杀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过不罚，就等于在助长犯罪。文帝看似对弟弟手足情深，实则

将刘长往不归路上狠狠地推了一把。

此后，刘长愈发无法无天，嚣张跋扈，上至薄太后下至满朝官员，人人看见这个混世魔王都头疼不已，唯恐避之不及。

至于在自家封国内，刘长出行做派就像皇帝一样，全然不将朝廷法令放在眼里，肆意制定律条。就是给皇帝上奏疏，也言辞傲慢，丝毫没有作为臣子的恭敬态度。

于是，文帝也有点受不了了，但他又不想亲自出面责备刘长，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让舅舅薄昭出面，以长辈的身份给刘长写封信，规劝他一番，希望他能听得进去。

薄昭奉命给刘长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长，列举了刘长的过失，和皇帝对他的恩德，告诫他要懂得感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信中，薄昭总结了刘长犯下八项罪，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擅自杀害辟阳侯审食其；

其二，枉顾朝廷法令，驱逐朝廷任命的淮南国官员，私自在国内安排丞相等高官(按照汉朝法律规定，诸侯国内国相等高级官员的任命权在朝廷，诸侯王无权干预)；

其三，竟然想放弃王位，甘愿做百姓，去真定给母亲守坟(这桩罪名有点勉强)；

其四，高祖打江山不容易，你却自甘堕落，想做个百姓，贪图虚名；

其五，作为子孙，不思进取，不想如何将祖宗江山发扬光大；

其六，就算是守坟，也该去守长陵(高祖陵寝)，

不该将母亲摆在父亲前面(这是什么逻辑)；

其七，多次违背皇帝命令；

其八，不肯钻研学习大道，做事全凭感情用事。

这八项罪名，有些确实严重，有些有点勉强、强加于人的感觉。当然，薄昭的目的就是要刘长明白，他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而皇帝对他又是多么宽容仁义。

权谋之道，无非是一软一硬，恩威并施。薄昭说完文帝的恩德后，语锋一转，就进行威吓了。

先讲了一番周公诛杀管蔡、齐桓公杀兄弟公子纠、秦始皇杀死两个弟弟等前朝往事，以及本朝刘仲被高祖剥夺王位、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被杀的例子，好让刘长明白，皇帝弟弟的身份绝不是违法乱纪的挡箭牌，皇帝完全可以将他绳之以法。

在谆谆教诲完后，薄昭在书信结尾处，对刘长提出殷切希望，希望他主动向皇帝承认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然而，薄昭这封苦口婆心的感化信，对刘长根本没起什么作用，他看完信后，丢到一旁，依然如故，该干吗还干吗。

开章是一名前政府官员，不知犯了什么罪，被朝廷撤职拿办。他提前得知消息，跑到淮南国谋出路。

刘长对开章委以高官，赏赐深宅大院，将他豢养起来。窝藏朝廷罪犯，可是重罪，开章藏身淮南的消息传开后，长安尉奇(主管司法的官员，名叫奇)前往淮南国逮人。刘长矢口否认有这回事，私下派人将开章处死，备好棺材、衣服，偷偷埋藏在肥陵(今安徽省寿县东南)，坟头竖一石柱，上书“开章死，葬此下”，将查案人员糊弄了过去。

如此种种，草菅人命之事数不胜数。

刘长胆子越来越大，野心渐长，已不满足于做一方诸侯，暗中招募窝藏罪犯，并私下与棘蒲侯柴武的世子柴奇密谋勾结，相约一起起事。同时，偷偷派七十名亡命之徒驾驶四十辆辇车藏匿于谷口县(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伺机而动。然后，又派人去闽越、匈奴，企图内外勾连，图谋不轨。

只是刘长空有野心和狂妄，还没来得及造反，就阴谋败露被朝廷察觉。文帝下诏将他带到长安。

诸侯王谋反，非同小可，文帝命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与宗正(管理宗室事务的官员)、廷尉等人一起会审。

经过密集审讯，刘长许多不法事迹都被查了出来。经核实，刘长犯下的主要罪状有：

一、僭越礼制，起居出行规格和皇帝一样；

二、不遵守大汉律法，擅自制定法律；

三、随意任命官员，窝藏资助逃犯；

四、勾结棘蒲侯世子柴奇，共谋反叛，危及社稷；

五、勾结闽越、匈奴，企图里应外合；

六、藏匿犯法官员开章，事发后杀人灭口；

七、随意诱捕无辜者处死顶罪，真正违法者却逍遥法外；

八、胡乱判刑，滥杀无辜；

……

根据刘长的种种罪行，会审官员们一致要求将刘长弃市(在街头砍头)。

按照汉朝法律，犯人杀头必须由皇帝签署，皇帝有驳回判决结果、要求重议的权力。文帝看到判决书后，下诏给会审官员，称实在不忍心治刘长的罪，请大家再重新合议。

于是，包括诸侯及二千石官以上官员共四十三人，组成庞大的合议庭，经过重审后，众人一致决定，按照法律，维持原判。

重审结果再次上呈给文帝，总不能再次驳回，于是，他决定行使一项皇帝的特殊权力——特赦。下诏给有关部门，免去刘长死罪，废除王位。

皇帝下诏了，审判官员们自然不能再坚持了，便退而求其次，要求改判刘长流放蜀郡严道县邛地，刘长妻儿必须同行。至于食宿，可责成严道县令提供。

判决书递上去后，文帝仍然不放心，特意在判决书后加了一条，给刘长食物供给必须到位，每天伙食标准要求有五斤肉、二斗酒，他的十名姬妾和他共同起居。

文帝实在用心良苦，纵然刘长罪恶累累，屡教不改，但文帝仍然没放弃挽救他。

刘长被押解上路了。

然而，出发后没多久，文帝就接到消息，刘长因绝食死在半路上了。

## 杀人无形

纵观刘长谋反案，给人的印象是，刘长就是一个屡教不改、顽冥不灵的浑小子，一路走来，就是在自我作死的道路上狂奔，最终滑向万丈深渊。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兄长，文帝对他疼爱有加，一直不

忍心责罚，即便是杀了辟阳侯审食其这样的高官，文帝也宽宥了他。刘长在淮南国境内无法无天，文帝依然不肯放弃他，让薄昭写信苦口婆心挽救他，从来没有不教而诛。

直到最后，刘长谋反案东窗事发，群臣口径一致，皆曰可杀之时，文帝依然顶住压力，放他一条生路，可谓仁至义尽。

当刘长身亡的消息传来，众人都觉得刘长自作孽不可活，罪有应得。唯有文帝水米不进，痛哭流涕，一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样子。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数百年前，也曾发生过同样一幕。

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的历史大幕刚刚拉开，在郑国就上演了一幕为争权夺利而手足相残的人伦悲剧，一下子撕掉了西周以来维持了数个世纪的宗法制的亲情面纱，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暴露在世人面前。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郑武公与王后武姜共育有两子，即寤生和叔段(一说名为段)，寤生出生时逆生，孩子胎位出了问题，造成难产，差点让武姜丧命，武姜因此视寤生为自己命中克星，一直不大喜欢他，倒是对叔段疼爱有加。

依照礼制，寤生作为嫡长子，理所当然地被立为世子。武姜多次企图说服武公废长立幼，改立叔段为世子，好在武公意志坚决，不为所动，寤生才保住了世子的位子。

武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长立幼，废黜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所生幼子伯服，结果引发太子姬宜臼母族申国联合犬戎入侵镐京(今陕西省西安一带)。最终，幽王和伯服被杀于骊山，镐京化为丘墟，周室被迫东迁，周朝自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武公的父亲桓公就死于这次动乱之中。

殷鉴不远，武公是个聪明人，不会这么快就忘记血的教训。

武公死后，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

武姜虽没有得逞，但废长立幼的心思依旧没变。

庄公继位之初，武姜就立刻提出，将制邑(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封给叔段。制邑本属于东虢，是郑武公灭了东虢后，并入郑国。制邑地势险要，属于军事要地，武姜的用心一目了然，就是壮大叔段的势力，以便抗衡庄公。

庄公一眼就看穿了偏心母亲的心思，以制邑为不祥之地为由，委婉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武姜又提出将京邑(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封给叔段，这一次，庄公没有拒绝，答应了下来。

大夫祭仲站出来反对说，以京邑的城防规模，分封给叔段，有违礼制和法度，切不可行。庄公无奈地表示，这是母亲武姜的意思，他也没法拒绝。

祭仲说：人的贪欲永远无法满足，为了国家的安宁，此风万不可长，决不能任其蔓延。况且是事关您的弟弟，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庄公冷冷说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好吧。

叔段到了京邑后，立刻加筑城墙，笼络百姓，整修盔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还策反周边许多城邑，归附于己。一时间，郑国境内俨然两君并立，人心浮动，不知如何是好。

公子吕看在眼里，非常焦急，如果再按照目前形势发展下去，郑国迟早会陷入内战，遂劝庄公早点动手，免得受制于人。但庄公不为所动，称叔段纵然扩张土地，壮大实力，但如若对君王不义，对兄长不亲，必然得不到道义的支持，最终还是会失败。

叔段在不断膨胀的野心促使下，决定对庄公发动偷袭，武姜也悄悄做好了为叔段开门接应的准备。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闻讯后，果断出击，命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讨伐京邑。叛乱很快被平息，走投无路的叔段只好出走共国，最后身死异国他乡。

对于此事，《春秋》称“郑伯克段”。

《春秋》有一套特定的语言记述方式，字里行间暗藏褒贬，称为春秋笔法。每个字都是经过反复斟酌，表达著者对史实的评价。

“克”字，本意是两国之间，一国击败另一国。《春秋》称庄公与叔段兄弟权力之争为“克”，实则暗讽，叔段为弟怀揣阴谋，犯上作乱，而庄公名义上宽容，实际上是利用母亲的偏心和叔段的野心，给弟弟设下陷阱，让他步步落入自己的圈套，一举铲除。

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兄非兄，弟非弟。

叔段叛乱结束后，庄公与母亲武姜在隧道相见，通过一出母子二人不计前嫌、和睦如初的亲情戏，将自己包装成孝子明君的形象。然而，还是没逃过史官的眼睛，史官如实记录下了母子二人的丑恶嘴脸。

如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刘长的人生轨迹与叔段极其相似，文帝和郑庄公的手段也是如出一辙。

表面上看，文帝对刘长疼爱有加，即便是刘长当街杀人，也被无罪释放。过度的溺爱，就是纵容犯罪。可以说，正是文帝一步步将刘长推向了不归路。

那么，文帝为何这么做？

从文帝继位之初的一段告白，就不难看出些端倪来。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正月，文帝刚即位三个月后，朝堂上就有官员提出册立太子。

至于这是文帝暗中授意，还是有人为了讨好皇帝的奉迎拍马之

举，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此举迎合了文帝的真实想法。

关于君位传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侧重，比如殷商多兄终弟及，周朝重父子相传。但自周公构建宗法制以来，主要还是以子承父业为主，像文帝这样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实属特殊情况。

但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别人也可以效法？

文帝继位时，高帝的儿子，除了文帝，还有一人，正是淮南王刘长!

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按照礼制，刘长与文帝同样具有继承权，只是按照顺序，文帝靠前而已。对此，无论文帝，还是群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他至少要做个姿态，试探一下大家的态度。

“我德行一般，能力有限，还没来得及做任何让天下人满意的事就着急立太子，实在不妥，我看此事先缓一缓再说。”

皇帝态度暧昧，不是很坚决，官员们觉得有戏，本来嘛，谁不想将皇位传给自己子孙？在官场混久了，谁都知道，有些话万万不能当真，皇帝越是谦虚，下属们态度越要坚定。

于是，官员们用庄重的语气说：“及早立太子，就是表示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以天下人为念，此事实在不能再耽搁了。”

“宗族诸侯和功臣中，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大有人在。像我的叔父楚王(刘交)、兄长吴王(刘濞)、弟弟淮南王(刘长)，如果我执意选自己儿子做继承人，那么，天下人会怎么看？是不是会觉得我心怀私念，不为天下着想？因此，我是不会同意你们的提议的。”

请看看文帝列出的这份具备继承人资格的名单，楚王刘交、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其他人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刘交此时已年迈体弱(刘交在文帝前元元年三月就去世了)，刘濞是刘仲之子，不是出自高祖一脉，且高祖生前就看出此人野心勃勃，连封他做王都有点后悔，只是诏令已颁发，无法收回，不得已让他去就国，临走前还警告

他说：“天下同姓皆为一家，希望谨慎做事，不要造反!”刘濞做继承人，已无可能。那么，能对文帝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一人，就是刘长!

准确地说，刘长对文帝帝位的合法性，基本已经无力发起挑战，但他对文帝子孙具有很大潜在威胁。高度决定思维方式，任何人一旦站在了权力巅峰，就会想，不仅要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还要必须传到自己子孙手中。

权力会噬人，也会反噬掌权者。

一个人一旦攀上权力之巅，倘若主动放弃权力，就意味着身后有可能被清算，子孙将无遗类。文帝亲眼见证了吕后死后，吕氏全族遭灭族屠杀，惠帝的诸子无一人存活的惨剧。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权力杀戮，给文帝留下深刻的教训，长安上空的血腥气尚未完全散尽，绝不能让它在自己死后重演!

至于文帝对群臣宣称，身后继承人可以从其他宗室中选出，显然是言不由衷，是不得已之下的违心话，是以退为进的斗争艺术。其目的就是趁着自己继位之初，君臣之间尚在合作蜜月期，快刀斩乱麻，抓紧时间，快速将自己儿子扶上太子之位，好断了旁人的觊觎妄念。

文帝没有别的选择。他以外藩诸侯身份入主大统，面对外有宗室诸侯、内有功臣的局面，能做的就是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谦让、宽容、仁义，将自己树立成为大汉一代仁君，让权力对手们无话可说。

道德力量是柔弱的，是无形的，是内敛的，但道德同时也是至刚的、无坚不摧的。文帝用自身道德光环，给群臣编织了一张无形之网，看似孱弱无力，却令他们无力反驳。

朝堂上大臣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点就透，马上明白了皇帝的用意，立刻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殷周前朝说起，直到当下，摆史实、列例子，无非是表明，天下唯有父子相传才是绝对真理，是关乎王朝千秋基业的基石，是绝对不能动摇的。高祖的事业，必须在他直系子孙中代代相传下去，想在诸侯和宗室中选择继承人，绝对有违高

祖的本心。

文帝很满意，表示既然大家都这样想，我只好顺从民意，勉为其难，立自己儿子为太子。

在为代王时，文帝与前王后共育有四个儿子，只是王后早故，四个孩子也先后夭折。文帝后来娶窦姬，他们一起生育了两子一女，长子刘启、次女刘嫖、幼子刘武。

按年岁次序，刘启作为长子，被立为太子。同年三月，窦姬因母以子贵，被册封为皇后，刘嫖被封为馆陶长公主。第二年，封刘武为代王，后改为梁王。

立太子，解决了后顾之忧；册封皇后，稳定了后宫。

在朝堂上，文帝培养嫡系人马的步伐，也从没停止，他封舅舅薄昭为轵侯、宋昌为壮武侯，扈从他从代国同行而来的六人，都官居九卿。

在以后的数年间，功臣或死(如陈平)，或被踢出朝堂(如周勃)，对宗室诸侯或安抚(如文帝前元四年四月，一口气将齐悼惠王七个儿子封为列侯)，或武力镇压(如刘兴居造反，文帝宁肯暂时放弃反击匈奴，也要坚决征讨)，文帝的权力也逐渐稳固下来。

至于对刘长，文帝自始至终，都是一味地放纵，就像当年郑庄公对叔段一样，直到将他送上不归路。

可惜狂悖的刘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有一把无形的刀与他如影相随。

刘长本来还有一丝生机，可惜被文帝果断掐断了。

当他被押送上路时，袁盎在一旁提醒文帝：“陛下一直宽纵淮南王，不给他设严厉的国相和太傅，由于缺乏管束和教导，以至于出现目前局面。他的性子烈，突然遭到如此打击，我怕他扛不住，万一在

路上出现意外，丢了性命，恐怕陛下难免背上杀死自己兄弟的恶名，还望三思啊!”

袁盎胆子大，性子直，一下子就把文帝的心思抖了出来。

文帝有点尴尬，讪讪地说：“说得是呀，朕也为此而苦恼呢，我这样做，也不过是让他自我反省一下罢了(早干吗去了)。行行行，这就派人去召他回来。”

但是，迟迟没有行动。

后来发生的事，不幸让袁盎说中了。

刘长是被关在一辆辎车(一种有帷盖的大车)中，押送上路的，沿途地方官虽接到朝廷旨意，要求给刘长提供饮食供应，但谁都不愿招惹这个混世魔王，递饭时也不敢将他放出车外。一路走来，刘长都是待在狭窄的车厢内。

长期以来，刘长放纵自在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没出几天，就非常郁闷，对伺候他的侍者发牢骚说：“他们不敢放我下车，估计以为我是个勇猛之人，怕放我出去出乱子，其实你老子我只是个被娇惯放纵，却无人约束之人，以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人一辈子活着，干吗要遭这种罪!”

此后，他便开始绝食。周围的人都以为刘长不过是闹情绪，过几天就好了，故也没太在意他的话。等到了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七里南古城)，县令下令打开车门，才发现刘长早已死去。

刘长的死讯传到长安后，袁盎猛地觉得不对劲，有点后悔自己不该乌鸦嘴，一不小心，道破了皇帝的内心算计。如今，朝野间对皇帝不满的人，肯定会拿刘长之死做文章。文帝又是个特别在乎自己政治形象的人，他是断不能背上害死弟弟的恶名，绝对会找个替死鬼背锅。

袁盎越想越后怕，事到如今，唯有抢先一步，赶在皇帝下诏前主

动跑去请罪，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事不宜迟，袁盎抓紧时间，跑到宫里请罪。

袁盎进宫时，正赶上文帝在哀号，他连忙跪下叩头请罪。

文帝看到袁盎，便哭诉说：“都怪朕没听你的话，结果害死了淮南王!”

听出来了，皇帝并没有让自己背锅的意思，袁盎长嘘了一口气，暂时放下心来，便开导文帝：“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已无法挽回，陛下也不能过于自责，要放宽心，多加保重身体才是。”

文帝不说话，还在那里哽咽不止。

袁盎知道，文帝此刻心痛的不是刘长的死，而是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光辉形象，于是劝道：“淮南王之死，不足以败坏陛下的名声。因为，陛下曾做过三件超乎常人之事，早已在朝野间传播开来。”

文帝忙问：“是哪三件？”

袁盎便列举了文帝三件往事：一是在太后重病期间，文帝三年衣不解带，药必亲尝的逸事，这是至孝；二是吕氏专权败亡之际，文帝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毫不畏惧地奔赴长安，这份勇气，就是孟贲、夏育等勇士也不及，此乃勇于担当；三是在即位前，文帝三番五次地谦让天子之位，此等胸襟就是古代名士许由亦没法比。

袁盎进一步指出，有此三事，陛下的光辉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天下人断不会非议陛下不能容淮南王。况且，陛下贬谪淮南王，只不过是想磨砺一下他的心志，好让他迷途知返。至于他的死，完全是由于沿途官员照顾不周而出现的意外罢了!

文帝听完，才放下心来，停止哭泣，下令将刘长以列侯的规格就地安葬于雍县，安排三十户农户专门守坟。

只是那些沿途官员成了倒霉蛋，文帝将罪责全都推到他们身上。

对外宣称，正是这些人，不给刘长打开车门，导致刘长绝食身亡，他们是害死刘长的罪魁祸首。

可怜这些人，被稀里糊涂地斩杀于街市。

不过，这些枉死鬼们的血，并没有洗刷掉文帝害死刘长的嫌疑。数年后，一首童谣在民间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开来：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童谣很快传到文帝耳中，令他颇为尴尬，毫无疑问，这对他的明君形象很不利。这样下去可不行，必须引导舆论，文帝辩解说："过去尧、舜放逐亲生骨肉，周公杀死管叔、蔡叔，但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徇情枉法。世人怎会误以为我是为了贪图淮南王的土地呢？"

为了表明自己大公无私，无意将淮南国兼并为朝廷所有，文帝将城阳王刘喜(刘章之子)迁为淮南王。

刘长死的时候，几个儿子皆年幼，都不过七八岁模样，文帝封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城侯。

文帝又以诸侯的规格，扩建刘长墓园，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

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又将刘喜迁回城阳国，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给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封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此时，东城侯刘良已死，故没有册封。

刘长的短暂人生，以悲剧始，以悲剧终。惜乎生于帝王家，表面上他桀骜不驯，实际上，他只是个心灵受到创伤的悲惨之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走出幼年丧母的悲情。

文帝试图用各种手段淡化他与刘长权力斗争的痕迹，给后世留下

一个凶顽弟弟和慈爱哥哥的故事。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父辈的悲情会在下一代人身上继续延续下去。

刘长与文帝的恩怨，在不远的将来，会在他们子孙身上重演。当然，所有这些，文帝是看不到了，他现在全部心思都花在巩固权力上，他立志要做一个好皇帝，带领大汉走出纷争，走向太平，以仁君的英名，名垂青史。

# 第五章 王朝密码

## 学者丞相

刘长之死说明了一个道理，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其实，高祖在世时，就已注意到这一点。

高祖本人不爱读书，怠慢儒生，动辄辱骂读书人，甚至扯下他们的儒巾往里面撒尿，有一次，高祖竟然按倒周昌，骑在他脖子上。宋人徐钧作诗讥讽曰："溺冠骑项不知儒，马上功成习未除。《新语》见称应有意，当时人未说诗书。"

不过，高祖为人有个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人，虽然都曾被他戏弄，但认识到错误后，他马上就改正，并委以重任。

高祖晚年已意识到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对诸位皇子，他都安排了名师教导辅佐。比如让叔孙通为太子傅，教导太子刘盈；周昌为赵国国相，去辅导赵王刘如意；而给淮南王刘长安排的是张苍。相比于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人，张苍是个全能型人才，也是个学者型官员。据说，他师承荀子(刘向《别录》称，荀子受业于赵国赵孝成王国相虞卿，又传授于张苍，张苍又传授于贾谊)，但这种说法历来受到质疑，钱穆先生在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就断然否定。姑且不论张苍的师承，他的才华在汉初高层官员中，罕有其匹。

张苍，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人，早年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大凡诗书文学、乐律、历法等，无不涉猎。在秦朝时，张苍就出任柱下史(周、秦时官名，类似于汉朝时的御史)，负责掌管宫廷内府图书文档，这段履历，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只是秦法森严，动辄得咎，要想不犯法实在是很困难，不知何故，张苍后来也犯了法，

他趁着尚未被发现，一口气跑回了阳武老家，藏了起来。

此时已是秦末，天下大乱，海内反秦浪潮此起彼伏，朝廷忙于对付各路义军，根本无暇顾及他，张苍因此侥幸逃过了一劫。

回到家乡没多久，高祖率领义军路过阳武，张苍算是看出来了，秦朝已是回天乏术，便投奔高祖麾下，一起反秦。

说起来，张苍命数实在差，倒霉透顶，随义军西征至南阳时，又触犯了军法，被处以斩刑。

行刑之时，张苍被扒了衣服，强按倒在行刑墩上。张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细腻，在阳光照耀下，犹如葫芦子一般洁白。

没想到躲过了秦法制裁，如今却要死于义军刀下，难道宿命就该如此吗？张苍暗自神伤不已。

满腹才华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这样死于非命，他实在心有不甘，但又能怎样？待到刽子手手起刀落，尸首分离，一切成空!

正以为生命已走到了终点之时，没料到峰回路转，有人出面为他求情，张苍就这样被无罪释放了。

此人正是王陵。

原来，张苍伏在行刑台上时，王陵刚好路过，眼看一名美男子就要性命陨落，动了恻隐之心。

所谓的悲剧，就是将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在你面前摧毁。王陵不忍心看眼前这幕即将发生的悲剧，主动站出来，向高祖求情。

当时，王陵刚率众归附高祖，他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坚定意志，不惜自杀。高祖觉得欠王陵一份人情，所以见他出面，自然不会驳他的面子，立刻答应下来。

王陵让张苍活了下来，同时，也给了他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这

份恩情，张苍感恩了一辈子。

当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游走了一圈后，他对生命的理解就会大不同，会更加珍惜生命，过好每一天。

张苍迎来重生后，暗自立志，定要把握好机遇，活好当下，必须要让余生活得更加精彩纷呈。

从南阳行刑台上走下来后，他满怀感恩之心，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后一生平稳顺畅，仕途基本一帆风顺。那些年，他的人生履历，几乎与大汉帝国崛起同步，随高祖入关，迁往汉中，而后重返三秦，接下来，东出函谷，先后出任常山郡郡守和代国国相。后来，又跟韩信一起，参与了灭赵之战。收复河北地区之后，高祖重新立张耳为赵王，张苍为赵国国相。张耳死后，张苍继续辅佐张耳之子张敖，不过没多久，朝廷一道调令，让张苍回国，重新为代国国相。

等到燕王臧荼谋反，张苍跟随高祖前往平叛，战乱很快平息。张苍因功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受封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

大汉初建之时，在朝廷层面人才荟萃，然而，其中大多数人，诸如曹参、周勃、樊哙、郦商等，都是行伍出身，行军打仗在行，对治国理政却缺乏经验，实干型人才奇缺。像张苍这样从前朝过来，具有丰富从政经验又博学多智之人，更是稀有。

很快，张苍从地方调到中央，以列侯身份出任主计(负责全国财政的官员，初名计相，张苍上任一个月后，更名为主计)一职，办公地点就设在相国府。高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张苍全力协助萧何，摸清大汉的家底。

由于在秦朝时，张苍就曾博览宫廷收藏的天下图书典籍，对典章制度、户籍税收之类非常熟悉，更何况他本人聪慧过人，精通算术、乐律、历法等，因此在新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埋首于各个郡国汇集上报来的各类账目与会计数据报表间，一干就是四年。

在这四年中，张苍整日与简帛、算筹为伍。大汉的财政家底，在

他手中一天天清晰起来，他初步理清了目前国家基本财政状况，统计出了第一手数据。

当张苍在高度繁忙中度过每一天时，长安城外的地方也不太平，高祖为了铲除异姓诸侯王，在关东一带浴血奋战。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二月，高祖彻底击败淮南王英布，平定海内，然后封刘长为淮南王。

当时刘长不过几岁，需要一名信得过、能力强之人，出任淮南国国相辅佐教导他，毫无疑问，没有人比张苍更适合了。

张苍没有任何推辞，二话不说，护送刘长离开长安，去了遥远的南方。

高祖的晚年是凄凉悲怆的，他知道自己死后，吕后专权已是无人能阻止。那么，他能做的就是趁着还有一口气在，将儿子们一个个打发得远远的，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越远越好，希望他们能够逃脱吕后的毒手。

为此，他让刘如意北上赵国，派刘长南下淮南。

同时，让生性耿直的周昌辅佐刘如意，聪慧过人的张苍辅佐刘长。

高祖本以为，以周昌的忠直，定能扛得住吕后的压力，保全刘如意。同样，以张苍的聪慧多识，必然会将刘长教导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之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高祖错了，他的儿子们都难逃殒命。

高祖识人无数，对身后事的预判，大多一一得到了验证。可惜，却没有保住几个儿子的性命。

吕后自掌权后，就已铁下心来除掉高祖诸子，恐怕没有人能轻易改变她的决心。周昌固然耿直，但也只懂得一味硬抗，不懂得变通，

最终被吕后骗离赵国，刘如意被杀。

至于张苍，纵然博学多才，经验丰富，但少了一份周昌一样的执着。在淮南国，他一待就是十六年，但对成长中的刘长，似乎并没产生多大影响，终究没有化解掉这位少年皇子心头的戾气。

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试想一下，假如当初高祖让周昌和张苍对调一下，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刘如意和刘长的命运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结局？

我们不知道，也无法回答，或许会吧。

但无论如何，张苍被高祖调出长安，无疑是帮他跳出了火坑。

吕后大权在握的十五年间，京城内吕氏和刘氏两派争得你死我活，不知有多少朝廷大员惨死在她的屠刀之下。而张苍远离长安，在淮南安然无恙，丝毫没有受到波及。

刘长年幼，淮南的大小事务，自然由张苍全权代理。在他的治理下，经过十余年，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封国内部基本保持平稳有序的状态。

吕后去世之后，御史大夫曹窋被免职(按理说，曹窋在倒吕政变中及时传递情报，也是出了力的，不知何故，却被罢了官)。张苍接到调令，赶赴长安，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张苍上任后，响应周勃、陈平等人的建议，积极拥立文帝，颇为皇帝器重。故而，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灌婴去世后，他被拜为丞相。

张苍的人生轨迹，相当于在大汉帝国辽阔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圈。他先是北上代、赵，后又南下淮南，如今，再次重返帝国的中心，荣登丞相之位，位列三公之首，达到了人生巅峰。

不过，多年来，无论身处何处、官居何职，有一个人，张苍从未

片刻遗忘，那就是王陵!

南阳刑场的救命之恩，他一直记在心头。

吕后称制后，王陵失势，朝堂上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唯有张苍始终不离不弃，视之如父。可惜的是，当重返长安之时，王陵早已黯然离世。

故人凋零，但情义不能忘，哪怕如今官拜丞相，张苍依然初衷不改，不管政务如何繁忙，每逢节假，他都坚持抽出时间，带上美食去王陵府上，拜访王陵夫人，并亲自侍奉她吃完，然后才回家。

为人如此，为官亦如是。

文帝即位时，大汉已经立国二十余载，丞相也换了多位。然而，此前的数任丞相(相国)，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灌婴等，都是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遍观朝中百官，多是武职出身。

严格来说，张苍也属于功臣集团中的一员，但他又是一个绝对异类，他不像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夏侯婴等，不属于从沛县走出来的嫡系人马。同时，他也不像这些人，只懂得打打杀杀。

他博学多才，与朝堂上那些草莽出身的军人们形成鲜明对比。

那些将军们关心的事，无非是土地爵位、钱财权势。至于深层次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等高深的领域，他们理解不了，也没有兴趣去关注。

但张苍不同，他将更多兴趣投射到文化思想方面，爱读书的习惯终生不改，他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各个方面，尤其是精通音律和历法。

他觉得，如今大汉国家局面已基本平稳，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帝国的方向主轴。那么，是时候制定和修订大汉新的音律与历法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律绝非单纯属于音乐领域，历法也非简单的计时方法，它们从来不曾远离政治。音律与历法的修订，关乎王朝正朔，关乎王朝法统的正确性，从来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大事。

大汉建立后，百废待兴，想在短期内在制度方面有所创新，几乎不可能。因此，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朝那一套制度框架，只不过在局部地方，做了一些调整而已。

虽说，叔孙通和陆贾等人在倡导儒学、修订礼制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楚元王、申公等人在儒家经典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大汉立国二十几年以来，儒家学说依然处于点缀品的尴尬地位。

高祖去世以后，惠帝、吕后时期，在朝廷层面，奉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文帝即位后，依然延续了这种局面。总体来说，汉初的意识形态领域，基本上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依旧余脉相传。

之所以这样，并非不愿为，实为不能为也。主要是国家初建，国力疲弱，朝廷对民间控制力量有限，更无力在文化思想领域加以管控。

更何况，历来执政者对于各家学说，大多都不会僵硬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恰恰相反，采用灵活的实用主义策略。比如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推崇法家思想，但并未因此就将其他百家学说完全扼杀，其他学说依然在秦存在。

比如，墨家思想在秦曾一度非常活跃，至于儒者，就是始皇帝颁布焚书令后，在朝堂上依然有叔孙通这样的儒者博士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秦人虽推崇法家思想，然实际上，同时吸取其他学派观点作为官方指导思想，两者之间并行不悖，比如阴阳家思想，在大秦帝国就大行其道。

汉承秦制，大汉继承的秦帝国各种文化遗产中，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它与黄老思想一样，在汉初依然受到推崇。

与儒家只关心政治伦理不同，阴阳五行学说的渗透大到宇宙星象，小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像修订音律和历法这样的大事，理所当然，必须合乎阴阳五行才行。

张苍万万没料到，他无意间开启了一场长达百余年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议题是，大汉王朝的属性究竟是什么？这场争论的结果，直接导致张苍的政治生命终止，使他从帝国权力的巅峰跌落。

那么，一场看似围绕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争论，为何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想要搞清这个问题，还要追本溯源，搞清楚阴阳五行学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 五行学说

在古代世界，由于受到科学技术限制，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有限，在漫长的时光中，总有一些人试图对自然世界给出自己的解释，利用自我认知，去阐释天地与人的关系。

来自西方文明滥觞之地古希腊的贤哲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空气、土、水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印度人则认为，地、水、火、风四种元素，组成了物质世界。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中国古人们对宇宙及物质世界就有一个朴素的认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所组成，称为五行。

关于五行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洪范》云：

>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

很显然，五行的最初概念是古人对生产生活，特别是对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尚书大传》说得更直白：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

如此看来，所谓五行，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与吃穿住行、耕耘劳作息息相关的五种基本元素罢了。因此，在最初时候，五行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作五材。

只是，它们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这个问题困扰着古人们，让他们百思不解。

后来，就有人尝试给出各种解答，认为金、木、水、火、土之间不但有规律，而且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甚至王朝的兴衰都与五行相关。

至战国时，百家争鸣，齐人邹衍糅合了《周易》中的阴阳思想和五行学说，开创了一个学派，称作阴阳家。在当时，阴阳家虽不如道、法、儒、墨这些显学般显赫，但秦汉以后，对后世影响越来越大。

史书中关于邹衍生平的记载寥寥。关于他活跃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史学界有种种说法。顾颉刚先生认为大概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60年，钱穆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05年至前240年，日本学者井上聪则认为大致在公元前300年至前260年，总之大概生活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稷下学派盛行之时，约在孟子之后。

先秦诸子中，除了墨子外，道、法、名、儒多关注政治、伦理领域，对实践科学，较少涉猎。而邹衍不同，他是个饱学之士，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地理、物候、气象等多个方面。

邹衍初学儒，后改攻阴阳五行，他不喜迂阔之术，专治经世致用

之学。(见《盐铁论·论邹》)

战国末年，诸侯各国为了强兵兴国，养士之风盛行，大肆招揽人才，尤以齐国为最。齐威王时，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外设馆，提供优渥的待遇和宽松的治学环境，招揽各国人才，号称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几乎涵盖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各个学派，会集了孟子、淳于髡、田骈、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儿说、鲁仲连、驺奭、荀子等大家。

而邹衍，就是置身这些大家之中，也是一等一的大师，名扬天下。后世称邹子，诸侯各国无不对他敬重有加。

燕昭王为了复国，厚礼聘邹衍至燕，当自己的国策顾问。邹衍抵达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拿起扫帚在前面清扫道路(刘向《说苑·君道》)，以免邹衍沾染灰尘。其在诸侯中享有的盛誉，可见一斑。

由于邹衍博学，熟悉气象与物候方面的事，估计在燕国期间，在农业生产方面给予了燕国人一些指导帮助，世人不知，觉得实在神奇，将他看作近似神仙一般的人物。关于他，流传至今的一些简单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 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王充《论衡·寒温篇》)
>
> 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黍生，今名黍谷。(《艺文类聚·水部》引刘向《别录》)

利用音律改变气候，当然是荒诞不经之事。很有可能是燕国地处严寒，在邹衍帮助下农业生产大为改观，结果被以讹传讹罢了。

只是好景不长，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一改昭王时做法，乐毅等前朝老臣要么被迫害致死，要么被迫出走，邹衍也未幸

免，遭到诬陷，被打入大狱。

身陷囹圄的邹衍，悲感交集，老泪纵横，不由得仰天长叹，感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满腹学问眼看就要成为绝学。说来也巧，当时明明是初夏五月，一夜之间，地上竟然结了一层厚厚的霜。

在古人看来，天象异变，必然是世间有人蒙冤。邹衍蒙冤下狱，上天降下异兆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了开来。

民间舆论给燕惠王造成很大压力，不得已之下，他只好下诏释放邹衍。邹衍出狱后，不敢再留在燕国，他动身返回母国——齐国，再后来，他一度作为齐国使者游历赵国。在邯郸期间，他遇到了大名鼎鼎的诡辩术大师——名家(先秦诸子百家的一派，以诡辩和逻辑推理而著称)大师公孙龙。

公孙龙曾提出“白马论”“坚白论”等著名逻辑命题，在逻辑学上影响极大，其人口才非常了得，能将白说成黑，将黑说成白，而且在语言逻辑上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几乎无人可以辩论过他。

然而，在和邹衍的辩论中，公孙龙却显得有点辞巧理拙，招架不住了。当然，两人都是一代宗师级人物，在理论上谁都无法说服谁，最多是语言技巧的较量罢了。

邹衍和公孙龙的此次辩论，可以看作百家争鸣之余晖。此后，邹衍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不知所终。

邹衍的生平近乎于老子，其真实面目早已云山雾罩，看不清楚，而其学说，在后世也不断被改头换面。不过，我们通过梳理，对他的学术成就，依旧可以理出个大致轮廓，其中不乏惊世骇俗之论，比如大九州说。

根据《禹贡》等古籍，古人普遍信奉天圆地方之说，认为天下地域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合称九州，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其外。九州之外，分布着四海。

然而，邹衍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指中原)所处之地，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所谓九州，不过是整个天下的九分之一，称作赤县神州。海外像九州这样的陆地，尚有八个，其周围也被大海环绕。其他八大州上的人物风情、物产禽兽，与神州亦不相同。

邹衍大九州说，当然是一种充满想象的空想假说，但其大胆推论求证的精神，无疑拓宽了人们对地理认知的眼界，以至于此后神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其精神，就是今天看来，依然弥足珍贵。

不过，邹衍学说中，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他的五德终始说。

邹衍将五行中的金(金属)、木(植物)、水(液体)、火(热能)、土(大地)赋予品质属性，称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

而五行之间，又是相生相克。五行相生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顺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由此衍生，将宇宙万物都归类到五行之内，在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中找到与之匹配的属性，比如：

天有五星：太白星(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星(火星)、镇星(土星)；

地有五方：东、南、西、北、中；

动物有五虫：蠃(人类等裸体动物)、鳞(鱼类等水生动物)、毛(走兽)、羽(禽类)、昆(昆虫)；

数有五位：一、十、百、千、万；

音阶有五声：角、徵、宫、商、羽；

药有五味：酸、甘(甜)、苦、辛(辣)、咸；

物有五色：青、黄、赤、白、黑；

粮有五谷：稻、黍、稷、麦、菽；

体有五脏：心、肝、脾、肺、肾；

……

可以说，五行学说几乎涵盖当时的天文、地理、术数、音乐、农学、医学等一切认知范围。有些领域，比如传统医学，至今仍以五行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至于阴阳说，最早起于《周易》，用“阴”“阳”表示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比如动与静、上与下、冷与热、男与女、内与外、尊与卑等。阴阳是一体两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可以互换的，比如日为阳、月为阴，白天为阳、黑夜为阴，日升月落、昼夜交替，永不停息，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邹衍将阴阳学和五行说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阴阳五行学说，同样也引申到政治领域，给金、木、水、火、土赋予相应的政治属性，称为五德，用五行来解释王朝兴替。试图说明王朝世代更迭并非偶然，而是有内在的规律，每个王朝的兴起与败亡都与五行相生相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邹衍一生著作颇丰，可惜后世遗失殆尽，只能从其他相关古籍中得窥一鳞半爪。战国后期杂家学说代表作《吕氏春秋》，几乎汇集了先秦诸子百家各派的学术主张，其中不乏阴阳家学术观点。关于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比较系统的阐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

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

从中不难看出，阴阳家将从黄帝到周朝的各代王朝属性列出来了，黄帝时为土德，夏朝时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

因此，依照五德终始理论，就不难看出其中规律。夏朝取代黄帝王朝，是木胜土；商朝取代夏朝，是金胜木；周朝取代商朝，是火胜金。

按照阴阳五行学说，一个王朝必须按照自己的属性来执政、用什么历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祭拜哪个方位的神、用什么音律等，丝毫马虎不得。一旦对自己的王朝属性产生误判，轻则产生灾变，重则王朝颠覆，为他人所取代。

邹衍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其阴阳五行学说包含一定的朴素辩证理论，但是在他身后，阴阳五行学说很快沦为燕、齐一带的方士骗人的把戏。到了后世，在庙堂之上，阴阳五行学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至于民间，则变质为江湖术士算命骗财的唬人伎俩(就是在现代社会，还有不少人在给孩子取名字时，讲究所谓五行缺一不可，比如某个孩子，被认为五行缺水，在名字中必须要有一个带水字旁的字，实在可笑之至)。

既然周朝是火德，取代周朝的新兴王朝的属性必然是水德。始皇帝讨厌儒家那一套繁缛礼节，但统一天下后，却很快采纳了燕、齐方士们的建议，认为大秦的属性是水德。

那么，问题来了，王朝的属性是如何判断的？

据说，天帝默默注视着人间发生的一切，时不时降下一些征兆，比如奇特自然现象、珍稀动物之类的。如上文《吕氏春秋》这段记载中，夏禹王时秋冬季节天气反暖，出现草木不枯萎，商汤王时水中浮现金刃，周文王时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这些所谓祥瑞，成为判断王朝属性的通关密码。

按照方士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判断秦朝为水德，是因为在秦文公时，文公外出打猎，曾捕获过一条黑龙。

秦文公至始皇帝时已有五百年，早已死无对证，谁也无法考证是否真有过这么回事，估计十有八九是方士们编造出来的鬼话。

不过，始皇帝非常虔诚地接受了方士们的建议。按照阴阳五行说，水德尚黑，主北方，节气为冬季(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为首。始皇帝下令，更名大河(即黄河)为德水，旗帜服色皆为黑色。

在宫廷礼仪中，皆尚数六，一切以六为最高标准。譬如符节、法冠(即貔貅冠，御史所戴的冠式)俱为六寸，舆车宽度为六尺，一步(长度单位)为六尺，天子车驾用六匹马。这是因为数字六吻合水德。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

在历法上，采用“颛顼历”，以冬十月(冬属水，十月为冬季之始)为一年岁首。

总之，五行学说在秦朝时已经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

大汉取代了大秦，既然秦为水德，按照五行学说，土胜水，那么，汉的德性应当是土德才对。

然而，高祖建立大汉后，面对千疮百孔的帝国，根本无暇留意五

德终始说。况且，以高祖和他的功臣集团的文化水平，根本无法理解阴阳家的这套庞大学术体系。

所以，汉初的一切，无论政治制度、官职架构，除了做个别删减外，基本都是将秦朝制度原封照搬。

高祖入关之初，为了庆贺胜利，想要感谢神明庇佑，但却不知祭祀何方神圣，便问询身边人，咱们该祭谁？

秦朝时，秦人因起于西陲，故而历代国君起先多祭祀白帝(按照五行学说，西方属金，尚白，白帝为少昊)，后来又祭祀青帝太昊(东方属木，尚青)、赤(炎)帝神农(南方属火，尚红)、黄帝轩辕(中央属土，尚黄)，合祭四帝。

大家遂如实回答道，我们应该祭祀白、青、黄、赤四帝之祠庙。

谁料高祖一听，却说，我听说天有五帝，为何现在祭祀的只有四帝？

祭祀四帝传统由来已久，谁也没想到高祖会有如此一问，一时间都愣在那里，不知该如何作答。

高祖见状，想了想说：“我明白了，这是在等我才凑齐啊!”当即下令修建黑帝祠堂，自此开始了对五帝祭祀的传统。

黑帝颛顼，主北方，属水德。高祖认为自己接过了大秦的家业，大汉的王朝属性，当然也属于水德。

以张苍的博学，对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自然非常了解，但他也认为大汉属于水德。他的理由是，当年高祖率领义军入关，抵达霸上时，正好在冬十月，冬十月属水，况且高祖首倡祭祀黑帝，不正是暗合大汉兴于水德吗？

张苍依照这个思路，坚持认为大汉应该还是使用《颛顼历》，一年以十月为首，服色还是和秦朝一样尚黑，在这个基础上，对历法和

音律做一些修正即可(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颛顼历》与实际情况常有出入，对朔月、弦月的推测时有错误)。在为相十几年间，他先后解决了历法和音律中存在的问题。

张苍本人是个音乐达人，善于吹奏律管(竹制乐器)，调试了各种乐器，使它们符合五声(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节)和八音标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八音，八音非指八个音调，而是古代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分别为：

金，钟、镈这类金属打击乐器；

石，磬这类石制打击乐器；

土，埙、瓯这样的陶制乐器；

革，鼓这样的皮革制作的乐器；

丝，琴、瑟类弦乐乐器；

木，指木制的乐器，如柷、敔等；

匏，笙、簧一类乐器；

竹，箫、笛、竽等竹制管乐乐器。

这就是说，张苍几乎给所有乐器都制定了音色标准。这还不算，他又为各类其他器物制定度量标准。张苍以一己之力，为大汉制定了一套国标体系，其工作之繁杂、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往后，凡大汉帝国境内百工，只管照张苍制定的标准去做事就好了。

毫不夸张地说，张苍完成的工作，是继始皇帝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之后，又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对新兴的大汉帝国产生的影响，无论给予怎样的赞誉都不为过。

张苍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哪方面的书，都会激发他浓厚的兴趣，让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学习。他就是一座移动的图书馆，一部会说

话的大百科全书。

这样一位神一样的帝国宰相，他所做出的决定，他所说的话，简直就是神谕，谁敢质疑？

所以张苍提出大汉属性为水德的主张后，朝堂上基本无人敢反对。然而，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谁也没料到，敢于向张丞相发起挑战的，竟然是一介无名之辈。

## 德性之争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皇帝上书，谈了他对汉朝属性的看法，此人名叫公孙臣。

公孙臣是谁，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是鲁国人。

公孙臣的生平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给皇帝上书的内容不简单，他直接对当前官方认定的王朝属性提出了质疑："秦为水德，大汉取代秦朝，按照五德始终推演，应该是土德，土德的祥瑞是黄龙出世，朝廷应该改正朔，以正月为岁首，尚黄才对。"

此时，张苍担任丞相已有十几年，声势如日中天，公孙臣的质疑被张苍轻而易举地否决了，犹如在平静的水塘中，扔进一粒石子，根本没激起多大水花，就很快沉入水底，了无痕迹。

一开始，大家都没将此事当回事，本以为这事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被人们遗忘。但没想到，公孙臣投入的这粒石子，将会掀起惊天海浪来。

就在第二年，事情发生反转，在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属天水郡)一带出现了黄龙。黄龙是何物，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大型爬行动物。据说，它出现后，既没有伤害人畜，又没

有破坏庄稼，只是大摇大摆溜达了一圈，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这条黄龙简直是百无一害的吉祥物，它到人间走一遭的目的就是代表天帝，向人间传达一个信号，解决大汉的德性争论难题。

黄龙，代表土德嘛!

公孙臣的预言应验了，本来被朝廷不闻不理、弃如敝履的他，忽然成了香饽饽，受到皇帝重视，文帝亲自召见公孙臣，拜为博士。黄龙出世，如此重大之事，朝廷必须有所回应才对，文帝下诏，责成负责礼仪的官员们讨论祭祀问题，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官员们经过一番考证商讨，认为皇帝应该遵循古礼进行郊祀。

秦朝故都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郊外五畤原，有秦人历代国君祭祀天帝的祠庙。文帝特意赶去五畤原，举行祭礼，以表达对上天眷顾的感激之情。

事后，文帝又让公孙臣着手依照土德编制历法。

毫无疑问，这等于公开否定了张苍多年的心血。

张苍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便知趣地半隐退了。常常称病在家，虽然他还保留着丞相的头衔，但基本上已不再过问政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张苍就可以这样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消失在世人视野中。

然而，在权力博弈中，很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张苍也没能例外。

能够做到丞相高位，自然免不了提拔、推荐一些自己人到关键岗位上，张苍也未能免俗，他曾经保举某人为中侯。中侯是将作少府的属官，负责宫殿营建工程等。这类职位，虽说官职不算高，但油水非常丰厚。

凡是涉及工程项目，历来都是腐败的高发区，此人上任后，就开始大肆受贿敛财。张苍以前大权在握，自然没人敢出头检举，如今他被边缘化了，此君的不法行为很快就传到皇帝耳中。

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腐败就意味着会出现垃圾工程，这还了得!既然是张苍荐举的，那就逃不了用人不察的责任。于是文帝当下召见张苍，劈头盖脸好一顿训斥。

一大把年纪的张苍，被皇帝训斥得灰头土脸，惶恐不已。此事之后，他再无意恋栈，索性以多病为由，向皇帝辞职。

文帝没有挽留，很痛快地批准了。

张苍担任丞相一职超过十五年，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萧何、曹参、陈平、王陵、周勃、灌婴等人的任期。虽说受了批评，但也算平安落地，已实属幸运，该没有任何遗憾了。

从帝国宰相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张苍在家安度晚年，又一口气活了十三年，以一百零五岁高龄(具体数字有待商榷)平静去世。此时，文帝在五年前已去世，而同他一起打天下的高祖已经弃世近五十年，冢中朽骨早化为土泥矣。

张苍的高龄，在那个时代，简直是个神话。

与他相比，一生苦苦寻求长生的始皇帝，也不过活了区区五十岁而已，而张苍的一生横跨了始皇帝与高祖祖孙三代。

一个人的高寿，有多方面因素，基因遗传是个关键因素，但据史书记载，张苍父亲身高不足五尺，容貌龌龊，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良好的家族基因遗传。

在张苍身后，到他的孙子辈，似乎又一下子出现了基因返祖，他们一个个都身高不足六尺，相貌才学皆平平，与庸人无二致。

张苍身高八尺，仪表堂堂，才华超群，又寿过百岁，看上去完全

是个基因突变的天纵奇才。

张苍的高寿，既然与家族遗传无关，只有从其他方面寻找答案。性格与生活习惯，是除了基因外，对寿命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两大因素。

先从职场生活来看，与前任们相比，张苍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比较宽容的皇帝，文帝由于以外藩诸侯身份入主大统，是个比较弱势的君王，对臣下一般不太苛刻。

张苍的那些前任们，日子过得远比他艰难得多。

萧何、曹参面对的是高祖、吕后这样的强势之君，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为大汉立下不世之功的开国宰相萧何，一言不合，就被高祖打入大牢，性命几乎不保。

至于陈平为相时，上有吕后临朝，作风狠辣多疑，下有吕氏把持朝政，处处掣肘。他犹如在鸡蛋上舞蹈，一不小心，就会有灭顶之灾。

与他们相比，张苍执政环境宽松得多，在他为相的十五年间，君臣之间基本相安无事，而朝堂上也没有与他抗衡的势力。因此，他执政基本还算顺利，没有出什么大事。

另外，与争权夺利、苦心钻营的周勃相比，张苍的权力欲望似乎没有那样炙烈，无论是在地方诸侯国担任国相，还是在朝中做计相、御史大夫，乃至坐到丞相高位，一路走来，他奉行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原则。无论坐在什么位子上，他都是埋首苦干，踏踏实实做事。

与那些一心爬高位、争权夺利的政客们形成鲜明对比，张苍是一位肯干实事的学者型官员，在世俗政务之外，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

这样的处世性格，使他内心少了几丝浮躁，多了一份从容和平静。

很多人一旦在权力场中浸润久了，犹如吸食了毒品，对权力上了瘾，就很难戒掉。君不见古往今来，多少身居高位之人，在权力舞台上挥斥方遒、意气风发，可一朝离开权力的滋润，很快就会垮掉。

所以官场之人，无不设法将自己的权力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甚至到了临死之时，仍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因为大家都明白，作为一名政客，一旦没了权力，活着跟死了已无差别。

很多人，只因手中没了权力，受不了巨大落差一命呜呼。

张苍罢相时，至少已是年逾八旬，在世人看来，他肯定难以迈过这个坎儿，估计私下里，已有不少人开始为他着手后事。

然而，张苍将一切看得风轻云淡。

想当年，在秦朝时，差点被处死，他侥幸逃脱了。再后来，在南阳，他再次被送上断头台，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人生在世，除了生死无大事，对于一个曾经死过两次的人来说，又有什么事看不开呢？

他已位极人臣，寿过八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现在他每多活一日，便是赚了。此刻的张苍，除了对上苍深怀感恩，对生命充满敬意外，内心平静如水。

人的生命，就算如彭祖，年过八百，那又如何，还不是难逃一死!

唯有功业不朽。相信他为大汉制定的律令和标准体系，在他死后还会被人长期记住，如此足矣。

在以后的每一天，张苍闲看春花开、秋风起，年复一年，日子过得平淡而又从容。

由于年寿日高，张苍牙齿脱落殆尽，早已无法咀嚼任何食物，唯有靠吸食哺乳期妇女的乳汁来补充营养。

直到十余年后某一天，他平静祥和地离开了人间。

他来到尘世时，天下纷扰，战乱不休，他目睹了大秦从一统到分崩离析；而后他追随高祖，亲手终结了乱世，并为新兴大汉王朝建立起基本制度框架；等他离开时，重归一统的神州大地，战争创伤已经疗愈，一片欣欣向荣。

张苍可以安心离开了。

张苍走了，但朝堂上的纷争并没有停止，关于大汉属性的争论，才刚刚拉开序幕。

公孙臣因政治投机受到重用，这让一些野心家们看到了希望。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原来单靠编造几个故事，就可以取得荣华富贵，有如此捷径，自然就会招来一些设法迎合帝王的喜好的投机客。

公孙臣之后，有个叫新垣平的赵国方士，很快找上门来。

方士就是一群靠鬼把戏骗人混饭吃的家伙，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大行其道，是因为人们的贪欲。

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权势和财富已是达到巅峰，无以复加，但仍然不知足，还想要永久拥有它，想要长生不老。

纵然是始皇帝这样的帝王，也曾被一帮方士骗得团团转，尽管他后来识破了方士们骗人的伎俩，但依然不死心，至死也没有放弃长生的幻想。

方士骗人的把戏很多，主要根据帝王们的需求而定。

如果你渴望长生不老，他们就称可以炼丹，可以海外求药，帮你白日飞升，实现长生不老。如果你贪财，他们就称可以点石为金，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你渴求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就称可以预测未来，

帮你化解危局。各种款式花样众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其实，想要识破这些江湖骗子们的鬼把戏并不难，因为骗子的伎俩虽说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升官发财。

可惜贪欲往往会降低一个人的智商水平，丧失对事物的正常判断力。

古今多少帝王，哪怕多么英明伟大，都很难经得住方士们精心编织的美丽谎言的诱惑，他们往往依靠几个低级花招，就很快解除了那些至高无上的人主们的思想武装。

新垣平见到皇帝后，自称善于望气，他曾亲眼看到，在长安东北天空中升起一股神秘气团，它冉冉升到半空后，化为五彩祥云，形状犹如帝王冠冕一样。

新垣平向皇帝解释说，五彩祥云的出现意味着长安东北方向可能有神明的居所，至于西部雍城，不过是五帝的冢墓所在地，现在上天已降下祥瑞，陛下就该建庙祭祀。

文帝素来迷信鬼神，听新垣平这么一说，不敢大意，立刻在霸水、渭水汇合之地建立渭阳五帝庙(据《括地志》记载，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庙内设五座殿宇，分别供奉五帝，大殿严格按照五行学说的方位建造，大殿内的陈设和供奉都是按照五帝所主颜色布置，庙的每一面有五个门，也是按照五色建造。

渭阳五帝庙建成后，庙内祭祀礼制跟雍城郊祭规格完全一致。

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夏四月，文帝亲自赴渭阳五帝庙祭祀五帝。五帝庙南临渭水，通过开凿人工渠沟，将渭水引到庙北方的蒲池(据《括地志》记载，蒲池即是当年始皇帝夜行遇刺的兰池)。

夜幕降临，祭祀仪式正式开始，举着火烛的队伍绵延不绝，火烛倒映在河水中，火光在水面上摇曳，远远望去，犹如直通天际，为祭祀现场营造出一幅如梦如幻、天人相同的意境。

通过如此盛大的祭祀，文帝觉得自己的虔诚之心应该已经上达天上，定会为神明所体察。

事后，文帝重赏新垣平，擢升其为上大夫，前后赏赐达千金之多。经过此次祭祀典礼之后，文帝开始陶醉于新垣平为他营造的幻境之中不可自拔，竟然想举行封禅大典。

说干就干，文帝命儒生们根据“六经”内容，制定巡狩四方行程仪式，及封禅大典的流程事宜。

就在这期间，文帝有一次外出，路过长门(亭名，在长安城东南)，估计当时光线不好，朦胧间，依稀看到有五个人立于道路旁，再仔细看时，他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文帝当下起了疑心，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五个人的身影，并不像凡人，莫非是五帝显灵了？

想到这里，文帝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命人在原地设立五帝的祭坛，用五套太牢礼(祭祀的最高礼节，献牛羊猪三牲)祭祀五帝。

在那些日子里，文帝整日都疑神疑鬼，将祭祀鬼神列为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

皇帝成天忙着祭祀鬼神，大臣中间不少人不以为然，但也不好站出来公然反驳。

在这段时间里，新垣平没闲着，他想利用皇帝好祥瑞的心理，决定投其所好，再玩一把大的。

一年后，某一日，他再次出现在皇帝面前，故作神秘地说：“陛下，我有一种预感，有一股宝气正在向宫阙逼近。”

果然，没过几天，皇宫门口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向文帝献上一个玉杯，杯身上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

做皇帝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福寿绵延，最好是长生不老。新垣平对文帝的心思实在是太了解了。

果不其然，文帝接到玉杯后，欢喜得不得了，本想和新垣平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没想到他却一脸肃穆地站在庭院中央，用饱含虔诚的目光仰望着苍穹，仿佛在等待一件即将发生的大事。

文帝感到好奇，看了看天空，晴空朗朗，与往日没有任何不同，便问他，你这是在看什么？

新垣平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臣在等待太阳再次恢复到天空中央。"

从未听说太阳会逆行，此时，明明日已偏西，怎么可能重回正午时分？这些日子以来，虽然文帝见识了新垣平的预测能力，对他钦佩不已，但要说出现太阳逆行复位的景象，他是绝对不相信的。

然而，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刚才明明早已偏西的太阳竟然奇迹般地恢复到了天空正中央，宛如中午时分，文帝惊讶得半天回不过神来。神，实在太神了!

自那一刻起，新垣平在文帝心中，就犹如神仙一般，他说的每句话文帝都无不笃信不疑。

文帝为了纪念当天的神奇天象，令天下大酺，决定从前元十七年(公元前163年)开始，重新纪元。

自先秦起，一般都是以君王在位纪年，以即位那一年为元年，直到去世，又以新君纪年，很少有君王在位期间重新改元之事发生。

当然，也有一些个例，比如秦惠文王和魏惠王，由于在位时，从诸侯国君称王，虽然只是改变了一下称谓，但在分封制下，意味着实现了重大飞跃，所以他们都相继改元。

但像文帝这样因天象祥瑞为由改元，却是历史上第一次。

关于新垣平预测太阳逆行这件事，在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史记·封禅书》)

这一看似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天文现象，却被白纸黑字，庄重记录在史书中，有可能是骗子的幻术把戏，但更有可能这条史料本身就有问题，有可能是史官为了粉饰皇帝，违心作伪记录的(笔者特意就此请教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他即持此观点)。

话题重回新垣平身上。骗子一旦得手，就很难自动收手。然而，再高明的骗局，哪怕你的骗术花样不断翻新，也终会露馅。

一个人演戏久了，难免会入戏太深，假戏当真；一个人行骗次数多了，难免自我陶醉，总是抱着侥幸心理，低估世人的智力，直到骗局被揭穿的那一天。

在一年后，新垣平的鬼把戏败露了。

## 背后奥秘

文帝改元后不久，新垣平向皇帝预测了一条更加令人激动的消息，九鼎就要重新问世了。他自称通过宝鼎散发出来的瑞气，感知到九鼎的具体位置，就在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西南庙前村北古城)一带的黄河水底下。

文帝听后，欣喜若狂，激动不已。

说起这九鼎，可是大有来头，称得上是上古三代以来的第一大神器。据说，当年夏禹平息水患后，将天下划为九州。九州州牧(类似诸侯)上贡铜料(在当时属于硬通货)，大禹命人铸成九座大鼎，鼎身饰有各州名山大川、地域物产、珍禽异兽等等，然后安放于夏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城镇)，作为君临天下的象征。

商汤灭夏后，将九鼎搬到商朝都城。

及周武王灭商，九鼎又迁到洛邑，这一放就是八百年。

随着夏商周三代更替，九鼎也是三易其主，已成为至高无上君权的象征。东周时期王权旁落，诸侯纷争不休，不少野心勃勃的诸侯，开始觊觎九鼎，企图将其据为己有。

春秋时，楚庄王曾饮马黄河，陈师洛邑，问鼎周室，亏得王孙满聪慧，尽力周旋。楚王的阴谋没有得逞，只好悻悻南归。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由于周室疲弱，根本无力遏制诸侯们的狼子野心。至战国时，秦国骤然崛起于西部，兵锋所指，直逼洛邑。

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率兵亲临洛邑，周天子君臣惶惶不知所措，眼看九鼎就要丧于秦人之手。不料就在此时，发生了意外，秦武王为了夸耀自己神力，竟然当众举鼎，结果不慎被砸断了胫骨，终不治身亡。秦人问鼎，最终草草了之，仓皇撤退。

经过此事，周室上下无不担心留着宝鼎还会招来祸端(据《战国策》记载，齐国人也曾打过九鼎的主意)，便命人将九鼎投入泗水。

至此，九鼎从人间消失。

数十年后，秦灭周，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但美中不足的是，秦没有得到作为九州象征的宝鼎，始皇帝曾派人至泗水打捞，但最终一无所获，遗憾终生。

没有实现移鼎，让大秦帝国总觉得在法理和道统上有些不足。在世人眼中，秦人只不过靠暴力取得了天下，并不是天命所归。

如今，宝鼎出现，不就意味着大汉是得到上天眷顾，成为继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正朔所在吗？

只是，按照古老的传说，九鼎不是被周人投入泗水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汾阴一带的黄河里呢？

还有一个疑问，当年周室极弱，投鼎入水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避免它被诸侯夺走，那么，为何不就近投入洛水或者泬水？为何不远千里，劳师动众跑去泗水投鼎？如此多此一举，就不怕沿途被人惦记上？

要知道，泗水可是楚国地盘，一旦出了周王畿，体形庞大的九鼎就很难隐藏得住(《战国策》中称数千人力，都未必能搬动九鼎，虽然属于纵横家夸张之语，但参考后世出土的后母戊鼎，像九鼎这样的国之重器，其个头定然很大)，岂不是羊入虎口？周人怎么可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将九鼎安然投入泗水？

后一个问题，姑且按下不说，先回到前一个疑问。按照新垣平的解释，黄河和泗水本来是两条完全没有交集的水系，只是秦末汉初之时，黄河泛滥，导致河流改道，并流入泗水。因此，原本在泗水的九鼎顺着水流，逆流而上，到了汾阴一带。

可以说，这种想法，实在有点脑洞大开，匪夷所思。但是见识了太阳逆行复位奇迹之后，文帝已对新垣平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宝鼎在水中逆行，也觉得合情合理。

于是，文帝立刻派人到汾阴，在濒临黄河的空旷之地建立祠庙，面向黄河祭祀祷告，乞求九鼎从滚滚波涛中浮出水面来。

按照以往来看，假以时日，新垣平一定会让九鼎重现人间。

可惜新垣平的表演到此为止了，朝廷接到检举，有人揭发新垣平造假。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很快真相大白，所谓“人主延寿”玉杯，不过是个拙劣的低级仿品罢了，新垣平的骗子面目大白于天下。

文帝觉得受到愚弄，恼怒不已，下令将新垣平夷三族。

堂堂大汉天子，被一介江湖术士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为天下人的笑料。庄严肃穆的帝国殿堂被闹得乌烟瘴气，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文帝为此郁闷了很久，对所谓五行正朔、祭祀鬼神之事，也渐渐

淡了，以前修建的那些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祭坛等，也就冷落了。有关祭祀只交给相关部门去打理，他自己再也没去过一趟。

至此，闹得沸沸扬扬、困扰数载的汉朝德性争论，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不过，搁置并不是彻底终止，只是因为太过于棘手，加上出了新垣平作假这样天大的丑闻，只好现阶段冷处理罢了。

如果将汉初的王朝属性之争，简单看作阴阳学说盛行之下的迷信活动，那仅仅是停留在表象，根本没有触及核心问题。

实际上，阴阳五行学说在秦汉时期大行其道，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为政权更迭提供了一套缜密的理论工具，并为新兴王朝解决了存在的法理问题和正统困扰。

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之时，正值战国后期，适逢天下大争，霸道、诡道、诈术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大行其道，正直、良善、仁义被践踏在地，数百年来，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贤良君子虽贤若颜回也难逃困顿落魄的命运，反倒是苏秦、张仪等鲜廉寡耻之辈沐猴而冠，身居高位，纵横天下，这些如何解释得通？

儒家学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自春秋以来五百年，弑君篡位者不下数十，贤臣良将被无故诛杀者不计其数，伦理纲常早就一文不值!

在儒家经典中，无论是上古行禅让之礼的尧、舜、禹，还是后来吊民伐罪、行“汤武革命”的商汤王、周文王和周武王，都是仁义圣君，但现实是，取代周室的却是根本不行仁义之道的秦人!

天下谁人不知，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大多是刻薄寡恩的虎狼之辈？秦人替代礼乐文明的周室，如果说是天命所归，怎么解释得通？

就在始皇帝一统天下时，阴阳五行学说恰好应运而生，为秦代周，提供了一套说得过去的理论支撑。

相较于秦，大汉建立以来面临的法统困境更加严峻，高祖以一介布衣，骤然崛起，不出四年，兼并四海，这是三代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夏、商、周、秦在成为天下共主之前，其祖先已经经历数百年乃至长达千年的沉淀积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然而，高祖起事之前，不过是区区一名泗水亭长而已，至于他的祖辈，更是芸芸众生中一粒沙尘，大风过后，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那么，他刘季一个市井无赖凭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创者，而我们却不能？在他发家之前，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汉初立之际，虽然编织了一些神话来神化高祖，但实在太低级，而且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跟市井巫婆的鬼话差不了多少。

大汉的开创者们，大多文化水平太低，制度多沿袭秦朝。如何解释秦汉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们。两者之间是继承关系，抑或对立关系？

从表面看，汉脱胎于楚，与秦势不两立，用武力推翻了暴秦，这也是汉家君臣不断宣扬的说辞。可事实上，汉初的现实是除了在文化上保留了一些楚的残余外，在政治制度上处处都是秦的影子。

所有这一切困惑，直到文帝时，依然没有摆脱。

于是，出现了两派思潮，一派是认为汉的法统继承于秦，秦汉一脉，虽江山易姓，但大汉与大秦同样属于水德。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丞相张苍，他认为东郡一带大河金堤泛滥入泗水，代表了大汉水德正盛。

但对张苍论点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既然是大汉推翻了大秦，按照五行学说，两者之间应是相克关系，土胜水，大汉自然属于土德，而不是水德。

公孙臣之所以敢于提出大汉属于土德的主张，当然有为谋求个人

富贵的投机心态，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张。

从表面上看，张苍和公孙臣的争执是在抢夺汉朝属性的解释权，实际上，是新旧力量的较量。

文帝之所以支持公孙臣，乃至后来被新垣平愚弄，除了他本人迷信鬼神、喜好祥瑞之外，他想迫切解决大汉王朝以及本人的法统问题，也是一大原因。故而，才让新垣平这样的江湖术士有了可乘之机。

新垣平这样的江湖骗子，大多是心理学大师，他们善于揣测帝王心理，投其所好。新垣平先后使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四招。

第一招，用望气说，很贴心地迎合了文帝喜好鬼神的需求，帮助解决了皇帝的信仰需求。

第二招，献上“人主延寿”玉杯，迎合了文帝喜好祥瑞的心理，满足了皇帝图虚名的虚荣心。

第三招，预测太阳重返正中天象，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心理武装，让他对自己心悦诚服。

以上三招，可谓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做到了天衣无缝，然而以上三招，其实都是为第四招做铺陈。

第四招，预言九鼎出世。

如果这一招得逞，新垣平帮皇帝成功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正统问题，自此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大汉上承夏商周三代，是名副其实的天命所归。

自然，此后新垣平就是大汉头号功臣，荣华富贵自不必言。

到了这里，就不难理解传说中九鼎最后消逝之地为何是泗水了——因为，高祖曾是泗水亭长。原来冥冥之中，九鼎注定要落入汉家之手。

据此可以判断出，所谓周人投鼎入泗水之事，很有可能就是汉初之人编造出来的。

至于新垣平诈称九鼎在汾阴一带黄河水下，自然是暗合文帝来自北方代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方便做手脚，毕竟他是赵人，在自家地盘，伪造几口大鼎，推入水中，相对比较好操作一些。

可怜文帝在一年内被新垣平哄得团团转，到头来才发现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罢了。

不过，这种低级的骗局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以后的帝国历史上还将不断上演。帝王的虚荣心和永不满足的欲望只要存在一天，就会有形形色色的术士骗子跑出来，源源不断地涌向京城。

尽管欺骗皇帝风险极高，一旦败露，就会身死族灭，但与谎言得逞后所换来的荣华富贵相比，再大的风险也值得一博。

新垣平的死，并没有阻止住方士们铤而走险，他们依旧像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地来到长安，当然他们的最终下场也是一个比一个惨。

新垣平事件搞得文帝灰头土脸，脸面尽失。就在他大搞祥瑞、四处祭祀鬼神之时，天下正当多事之秋，可谓天灾频仍，水患肆虐，疾病到处横行，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粮食歉收，不少地方老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

文帝感到很惭愧，知道再不能耽搁下去了，便用饱含愧意的笔触，下了一道诏书，向臣民们做自我反思，认为即位多年来，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要求以丞相为首的百官们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拿出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来。

只不过此时，张苍已被罢相，相位出现空缺。拜相事宜刻不容缓。

关于丞相一职，文帝倒是有个属意人选，但能否得到百官同意，

他却有点拿不准。

怎么办？只能先放水试温，看看百官究竟是何态度。

# 第六章 双面帝王

## 劫后重逢

张苍罢相后，文帝有意拜窦广国为相。

窦广国何许人也，为何能够获得皇帝的青睐？原因只有一个，窦广国是皇后窦姬(《史记索隐》称名为窦漪房)的弟弟。

窦姬生于赵国清河郡观津县(今河北武邑县东二十五里观津村)，吕后执政时，曾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了一批良家女子入宫，其中就有窦姬。

不久，吕后将其中一些人分配给各个诸侯王，每个诸侯王赏赐五人，窦姬也在外放的名单之上。

离家日久，窦姬迫切希望回到故乡去，她央告做分配花名册的宦者吏(宦者为少府下属官署，主管皇帝饮食起居等，不一定是宦官)，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的名字写到赵国名单上，那样她离家就近了一些。

这名宦者答应下来，谁知临了却一时粗心，将她写到了代国名单上。

窦姬得知后，伤心、绝望交织在心头，悲痛欲绝，泪如雨下，恨极了那名不负责任的宦者。与其去边塞代国，还不如老死皇宫。她打算执拗不走，赖在宫中。

只是，名单早已报请吕后批准通过，岂能随便改变？窦姬被迫无奈之下，只好动身前往代国。

鉴于吕后为了控制刘氏诸侯，曾将多名吕家女子嫁给高祖诸子，

她这次给诸位诸侯王送女人，目的肯定不单纯，难以摆脱给他们身边安插眼线的嫌疑。

因此，这些姑娘到了各个诸侯国，自然会引来诸侯王们的抵触。估计窦姬也是做好了思想准备，被遗弃冷落还好说，说不定还有性命之忧。

谁承想，她到了代国后，当时还是代王的文帝对她一见钟情，喜欢得不得了。很快，她为文帝生下一女二男，备受宠爱。

可以说，窦姬是因祸得福。试想，她要是去了赵国，随着三位赵王被杀，那一幕幕血雨腥风中，她很难逃得脱，说不定早就香消玉殒了。

文帝那时已经册封了王后，且王后也已生下四个儿子，地位牢不可破。窦姬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小心翼翼过日子，相夫教子，看着儿女们一天天长大，然后老死代国。如此，她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然而，命运总是捉摸不透，谁也想不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不知染了什么疾病，王后和她所生的四个王子，先后都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待文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窦姬顺理成章地被册封为皇后，她生的儿子刘启被立为太子。

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短短数年间，窦姬从一名出身民间、孤苦无依的卑微女子，一跃成为大汉皇后。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窦皇后的家人自然也该受到封赏，只是她双亲早就过世了，兄弟二人也离散多年，音信杳然。因此，就算她成了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也无亲人与她共享荣光。

为了安慰窦皇后，薄太后命令相关人员去观津县，将窦皇后父母坟茔修葺一新，并让当地两百户百姓守护墓园，一切都按照自己父母的墓园规格来办。

然而，身边没有亲人的滋味很不好受，窦皇后本以为自己后半生就要在没有亲人相伴的孤独落寞中度过，却没想到失散多年的兄弟找上门来了。

窦皇后兄妹共三人，哥哥窦长君(《史记索隐》称名为窦建，字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

窦家家境贫寒，加上父母早亡，窦皇后被征入宫后，兄弟二人的日子异常艰难。窦广国约摸在四五岁时，遭遇意外，被人劫掠，落入人贩子手中。

在以后的多年间，可怜的窦广国就像牲畜一样，被不停地贩卖，一会儿被卖到东边，一会儿又被卖到西边，如此辗转转移，先后去了十余个地方，最后被卖到了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

这户主人家在山上有口炭窑，拥有一百多名烧炭工。窦广国被送上山，做帮工烧炭。此后的日子里，他每日起早贪黑，整日砍柴烧窑，与炉火相伴，过着烟熏火燎的日子。

山间夜风很大，为了避风，大伙儿只能挤在一起，睡在一处山崖之下。烧炭是个苦力活，一天下来，整个人都快散了架，一倒地，就能马上昏睡过去，就算是雷鸣电闪，都毫无知觉。

一天夜半时分，或许是出于本能，窦广国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无法安然入睡，遂起身坐了起来。就在那一瞬，猛感觉到有山石滑落，他来不及思考，急忙跳起来撒腿就跑。

跑到远处后，惊魂未定的窦广国回头再看时，发现山崖整体坍塌，刚才睡觉的地方早被坠落的山石淹没，近百号同伴，无一人生还，全部命丧山崖之下。

窦广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庆幸之余，他当即给自己卜了一卦，卦象大吉，预示他不出数日就会被封侯。

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窦广国虽有点不太信，但还是很高

兴。主人家看上百人都遇难了，就他一人活了下来，也觉得此人不简单，说不定有神暗助，便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几日后，主人家决定带上他出一趟远门。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长安。

窦广国初到长安，就听说朝廷刚刚册封了皇后，皇后姓窦，观津人。

乍听到消息的那一瞬，窦广国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姓窦，观津人？这不是自己老家吗，莫非是她？

他有点不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

窦广国被人贩子从老家拐走时，不过四五岁模样，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对故乡的记忆亦越来越模糊。在为数不多的残存记忆中，他除了记得自己姓氏和故乡名字外，还依稀记得自家门前有棵大桑树，每年春季来临时，桑树郁郁葱葱，甚是茂密，他常常陪着姐姐一起去摘桑叶。

那时的他，虽年纪不大，但身手却异常灵巧，一溜烟蹿上树梢，在枝丫间来回窜动，桑叶在他小手间，犹如雨下，纷纷落地，姐姐拎着篮子在树下拾捡。

有一次，他正在树上摘桑叶，一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树上跌了下来，好在有惊无险，人没出意外，毫发无损。

时隔多年，这件事他仍然记忆犹新。

虽说冒认皇亲的后果很严重，但窦广国还是豁出去了，决定去皇宫碰碰运气。只是皇后受封以来，肯定少不了有人前来攀附，当年姐弟俩离别时，匆忙之间也没有留下任何信物，都过了这么多年，又怎么证明自己与皇后的关系呢？

窦广国思前想后，决定将姐弟俩摘桑叶时自己失足坠落之事写在

条子上，递进宫去。

窦皇后看后又惊又喜，一瞬间，陈年的记忆，犹如潮水一般涌来，但单凭这一件事，尚很难断定。于是，她向文帝汇报，请皇帝帮忙拿个主张。文帝听后，立即表示，让窦广国进宫当面问个清楚。

离别多年后，姐弟俩终于见面了，但是两人都早已面目皆非，根本没法辨认。

一个是雍容华贵，高高在上的皇后；一个是面孔黝黑，胼手胝足的奴仆，外貌相去甚远。

沉默了许久后，窦皇后终于开口了，她旁敲侧击，询问窦广国还记得哪些往事。

窦广国想了想说：“我记得，和姐姐最后一面是在驿舍，当时姐姐要离家西去，临走前四处央求，借来洗浴盆和淘米水，将我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又讨来饭食，给我一口一口喂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话音刚落，窦皇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下子拉起跪在地上的窦广国，拥抱在一起，号啕大哭起来。

眼瞅着一对苦难的姐弟俩劫后重逢，哭成泪人的情景，在场的侍从们无不受到感染，一个个哭得抬不起头来。

哭了很久，倾诉完离别之苦后，窦皇后渐渐平复了心情，决定好好补偿一下自己受苦受难的弟弟，当场给他赏赐了大量田地、房产和金钱。不久，又将哥哥窦长君和窦氏族人统统迁到长安来。

一时间，窦氏成了京城万众瞩目的新贵。

这引起了一些功臣们的警觉，由于大汉朝廷刚刚经历了诛灭吕氏的斗争，对于皇室外戚，他们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抵触。

好不容易刚刚扳倒吕氏，可不想再次冒出个窦家外戚来把持朝

政。

此时，周勃和灌婴等老臣尚在人世，他们忧心忡忡，聚在一起商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没死，但估计过不了多久，老命都会攥在窦氏兄弟二人的手中。这两人出身卑微，又没受过任何良好教育，趁着他们刚得势之初，得给他们找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来教导。另外，还需一帮为人正直的宾客在旁帮衬才行，这样，他们将来才不会恃宠而骄。”

周勃和灌婴久经宦海，眼光很毒，很快就看到了，窦氏的崛起，难免给朝廷带来隐患。

一个人在童年时遭受的心灵创伤往往很难愈合，这会对他的人格塑造会产生极不利的影响，甚至不少人会出现心理障碍和人格畸形。这样的人，一旦爆发，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膨胀，会加倍报复社会，以弥补内心的落差，追求心理平衡。

好在周勃和灌婴未雨绸缪，提前预防，及时给予窦家兄弟良好的教育，做了大量的心理疏导，使得他们在人格教育上没有出现缺失。数年下来，二人都成为知书达理之人，为人文质彬彬、温润如玉，处世谦和有礼，成为朝野称赞的谦谦君子。

与飞扬跋扈的吕家子弟相比，窦氏兄弟二人身上丝毫没有新贵的骄横霸道。

然而，不幸的事，终究还是避免不了，窦皇后生了一场大病，虽然病愈，但造成双目永远失明。

后宫之内是女人的战场，永远没有常开不败的花朵，喜新厌旧是帝王的共性，文帝也不能例外。

很快，在文帝身边出现了新宠，他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慎夫人、尹姬两位宠妃身上，至于窦皇后，渐渐就被冷落了。

时间一长，窦皇后的后位隐隐开始受到挑战。

窦皇后喜欢黄老之术，为人平和，在宫中与其他后妃在一起也很随和，不太在意尊卑之别，闲坐休息时，常和大家同坐一席。

一来二去，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不过，按照礼制，皇后为尊，嫔妃为臣，尊卑之分不可僭越。皇后可以谦和，但嫔妃们可不能因此忘了本分。

然而，慎夫人却仗着皇帝宠爱，渐渐忘却了这一点。

因后宫争宠引发的斗争史不绝书。汉宫中悄然发生的变化，都被袁盎看在眼中。

袁盎为人正直，一生都以捍卫儒家纲常为己任，君君臣臣，尊卑已定，岂能乱套!

有一次，文帝巡游上林苑，窦皇后、慎夫人同行。

休息之时，袁盎看到慎夫人的座席竟然和皇后并列，心想这还了得!当下悄悄将慎夫人的席子往后挪了一下，以显示主次差别。

不料这样一来，却惹恼了慎夫人，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死活不肯落座。

文帝也觉得袁盎纯属闲着无事，出来搅局，本来大家开开心心地出来游玩，却被他扫了兴，当下二话不说，气冲冲地回宫去了。

不过，袁盎却没有气馁，依然追随皇帝进了宫。

趁着身边没人，袁盎向皇帝解释他刚才做法的原委：“陛下想要后宫和睦安宁，就必须明确尊卑，使其各安其分。陛下既然已经册封了皇后，就要时刻维护皇后地位，慎夫人就算再受宠爱，但毕竟只是个妾，怎么能和皇后同席？陛下要是喜爱她，厚赏即可，切不可发出错误信号，让有些人产生误判，以为陛下在发出某种暗示，陛下以为是为了慎夫人好，其实是在害她，难道陛下忘了前朝戚夫人的下场吗？”

文帝听后，觉得袁盎言之有理，便也没再责怪他，事后将他的话，如实转告给慎夫人。慎夫人听后才反应过来，立即派人给袁盎送去黄金五十斤，以示谢意。

虽然慎夫人此后低调了许多，但要说她没有想更进一步，将窦皇后取而代之的想法，也是不真实的。

不过，无论是慎夫人还是尹姬，虽说备受宠幸，但她们都有个不足之处，就是自始至终没有为皇帝生下一儿半女。

这种缺陷，在后宫斗争中是致命的。

就算窦皇后是个年老色衰的盲女人，但她儿子终究是太子，一旦文帝驾崩，新君即位，凡是曾对自己母亲做过不利之事的人能有善终吗？

只要不是傻子，谁都能看出来这一点。

所以，不管慎夫人多么受宠，终究无法取代皇后。

况且，文帝即位以来，数任丞相周勃、陈平、灌婴、张苍都是高祖时期的老臣，作为一代帝王，他当然不愿意让朝政大权永远把持在这些老臣手中，要开创新局面，就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

然而，文帝信得过的人不多，他所依赖的不过是从代国带来的数人而已，但这些人，无一人是宰相之才。

比如母舅薄昭，本来是可以托付的骨肉至亲，可惜他擅自杀死朝廷使臣，使者代表天子，如此胆大妄为，实在不能姑息。只是文帝为人至孝，为了不让薄太后伤心，不愿亲自下诏诛杀，只好暗示他自杀。

可惜，薄昭硬抗着，不愿意自裁。

文帝没法子，只好让群臣披麻戴孝，整日到薄昭府上哭丧。

时间一长，薄昭实在受不了，只好一死了之。

除了薄昭，张武是文帝另外一名旧臣，是追随文帝自代国南来的六人之一。文帝曾对他寄予厚望，称帝后第一时间封他为郎中令，负责宫廷防卫事宜。

可惜的是，张武晚节不保，一入长安很快腐化堕落了，大肆受贿捞钱。文帝很气愤，只是念及他是故人，不忍心责罚，就主动给他送钱去，希望他能感到羞愧，有所收敛。

正因为如此，有才学、品行操守俱佳的窦广国成了文帝心中新任丞相的最佳人选。

然而，文帝没料到的是，纵然窦广国人不错，没有恶习，但很快还是招来一片反对声。缘由很简单，朝中大臣们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吕后专权、外戚横行留给他们的心理阴影太深了。

文帝本以为，随着张苍离职，高祖时的功臣集团成员或告退或老死，是时候交棒给新生代了。

没想到很快有人反驳，谁说功臣都死绝了，朝中不是明明还有申屠嘉吗!

## 不留情面

文帝即位之初，为了安抚高祖时的功臣们，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对在大汉开国之战中立有战功的官员们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封赏，那些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们，更是重点拉拢的对象，对他们一律加封关内侯(秦汉时期封爵共二十级，关内侯为第十九级，无封地)。上了这份名单的，共有二十四人，其中就有申屠嘉(复姓申屠，名嘉，其姓如司马、司徒一样，来源于上古官名)。

按照汉朝封爵制度，关内侯一般常住京城，并无封地，只是对封户享受征收租税之权。在此次封赏中，文帝特意给申屠嘉封五百户。

申屠嘉，梁人，早年是一名材官(经过特殊选拔的士兵，要求作战勇猛、体能好，类似于今天的特种兵)，在楚汉之战中，因军功被提拔为队率(底层小军官，相当于作战小队长)。

后来，英布发动叛乱，申屠嘉在平叛中立下战功，被提拔为都尉(中高级武官，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军分区司令)。

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淮阳王刘友改封赵王，淮阳国收归朝廷，改为淮阳郡。申屠嘉擢升为淮阳郡守，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

吕后称制后，于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四月恢复淮阳国，封惠帝儿子刘强为淮阳王。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刘强去世，其弟刘武继封淮阳王。

恢复淮阳国后的数年间，申屠嘉的任职去向不明。

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原御史大夫张苍拜相，御史大夫一职出现空缺，遂由申屠嘉出任。

如今相位出现空缺，候选人有两人，一位是窦广国，另一位就是申屠嘉。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文帝当然倾向于窦广国，他实在不想让功臣集团继续把持朝政。但他也知道，一旦任命窦广国，他的外戚身份必然会引来朝臣反弹。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文帝最终还是选择拜申屠嘉为相，封故安侯(将他原食邑改为封地)。

由于出身军人，申屠嘉虽然成了百官之首，但仍然保持着军人本色，为人做事直来直去，不喜欢技术官僚的做派。要是有人找他商量事情，他都在办公场所见，从不在家接见任何同僚。

申屠嘉之所以底气足，是因为他做官清廉，胸中无私，说话办事自然就硬气多了，就算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也敢于硬碰硬。

对于这位将军出身的铁面丞相，百官无不望而生畏，没人敢招惹他。不过，也有不知趣的人，仗着有皇帝撑腰，竟然不买申屠嘉面

子。首个撞到申屠嘉枪口上的人便是太中大夫邓通。

太中大夫，位居诸大夫之首，秩比千石，没有固定编制限制，人数不等，其职责为皇帝顾问，参与议政，有时候还代表皇帝出使，名义上归郎中令(实际上，两者之间在职务上没有多大交集)节制。说白了，就是看似地位崇高，实则没有多大实权的闲职。

这种官可谓活少钱多的美差，可以拿着极高的俸禄，却不用负责具体事务，可以利用亲近皇帝的机会发表对朝政的看法，却不用担责。出任这种官职的人，大多是皇帝的宠臣贵戚。

邓通之所以爬到太中大夫高位，并非他有多大能耐，只因他是文帝的男宠罢了。

秦汉之际，君王蓄养男宠者不乏其人，尤其是汉初历任皇帝，身边不乏男宠身影。从本质上看，他们与那些以色侍君的后宫女子别无二致，只不过是男儿身罢了。

比如高祖就宠幸籍孺，惠帝宠爱闳孺。这两人身无长物，就是靠着谄媚取悦君王，以换取人主欢心，经常陪同伺候皇帝起居，甚至公然共同起卧，成双出入。

切不可小看了这些小白脸们，由于他们身份特殊，能在皇帝身边说上话，朝中公卿大臣们要向皇帝汇报工作时，不得不借助他们转达。

比如惠帝时，辟阳侯审食其惹恼了皇帝，被打入大牢，最后幸亏打通了闳孺的关节，才侥幸逃过一命。

由于备受皇帝宠爱，闳孺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对朝野有着很大的示范效应。为了讨得皇帝欢心，他们对自己外貌形象格外注意，少不了涂脂抹粉，头冠插上锦鸡羽毛，腰带饰以贝壳，显得丰神俊朗，风度翩翩，引人注目。

时间久了，竟然引得宫中郎官、适中等人的效仿，一时间，引领

了宫禁之人的审美取向。

惠帝去世后，闳孺和籍孺二人无法再在皇宫容身，只好出宫，迁居安陵。

不过，汉宫的男风并没就此消失。

文帝即位后，有一次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境中，他正在飞升登天，但是无论怎么努力都飞不起来。正当焦急万分之际，猛地觉得有人在身后狠狠推了一把，一下子，他感到轻松了许多，身体轻飘飘飞了起来。

在飞升之际，文帝回过头瞟了一眼，看到一个黄头郎(郎官的一种，因着黄帽，故名)的背影，依稀间，见他衣服背缝上有个洞。

待梦醒后，文帝对梦境之事记忆犹新，他素来好鬼神，觉得梦中之事应是某种征兆，便暗中在宫中寻找梦中之人。当漫步至未央宫苍池之渐台时，发现一名撑舟黄头郎身影与梦境之人颇有几分相似，细看之下，竟发现，他衣服背缝上有个洞。

又惊又喜之下，文帝唤他过来，问其姓名，自称姓邓名通，蜀郡南安人。文帝转念一想，邓者，登也，当即认定此人就是助他登天之人，便让他留在身边。

与梦中之人相遇于现实，既令人觉得欢喜，又觉得美妙!文帝对邓通的关爱和赏赐，远远超过了一般臣子，就连宫中后妃所得宠爱都逊色于邓通。

文帝是过过苦日子的人，即位以来，处处节俭，不喜铺张奢华。譬如有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但看到工程造价近百金，如此一笔巨款，差不多抵得上十户中等人家家业了，他觉得做这种没多大用途的娱乐工程实在不值当，便搁置了建造计划。

在日常后宫生活中，文帝也要求嫔妃们不得过于奢侈，就是他最喜欢的慎夫人，也不许她穿那种衣摆曳地的华丽服饰。

不过，自打见到邓通以后，文帝一反常态，对他的赏赐从来毫不吝啬，先后累计赐予的钱将近过亿，并提拔邓通为上大夫。

更不寻常的是，文帝打破君王不亲临臣子之家的惯例，光顾邓通府上，两人一起饮酒作乐。这种荣耀，就是以前那些开国将相们都未曾有过。

不仅如此，文帝犹担心邓通受到委屈，连未来的生活，都为邓通规划好了。有次，他让一个相士(通过看面相断吉凶之人)给邓通相面，相士围着邓通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很笃定地说：“此人将来必会因贫困交加，饥饿而死!”

文帝一听，哈哈大笑：“朕最不缺的就是钱，让他富贵还不简单？不过是朕一句话的事情。”

文帝心想，就算给邓通一座钱山，或许也会花完，但如果朕让他自己来造钱，那还用担心将来他会没钱花吗？

于是下诏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邓通，让他自己铸钱，想用多少，就铸造多少。如此一来，邓通等于掌握了大汉的货币发行权。

在以后的日子里，邓通在没事干的时候就铸钱玩，而且是完全合法，可以在市面流通的。

没过多久，邓通所铸之钱就流向全国，人们称之为邓氏钱。

皇帝如此宠爱，邓通自然是感恩戴德，他也没啥出色本领，既不能为国举贤，也无力为君分忧，唯有努力殷勤伺候文帝。有时，文帝准他放假休息，但邓通主动放弃休假，坚持留在皇帝身边。

邓通这样做，固然是为了讨皇帝欢心，但肯定也是为了防止他人乘虚而入，取代他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其实，文帝又何尝能片刻离得开邓通呢？他对皇帝的服务可谓体贴周到，无微不至，这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有次，文帝染了毒

疮，皮肤溃烂，脓血流个不止。

为了减轻文帝痛楚，邓通伏在伤口处，用嘴一点一点地将脓血吸干净。文帝看在眼里，既感动，又有些失落。患疮病，最易招人嫌弃，但没想到，邓通竟然不嫌脏、不嫌累，甘愿如此为自己付出。

文帝是个孝子，尝药侍亲，三年衣不解带，同时，作为一名父亲，他又何尝不想自己儿子也能做到至诚至孝？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自他患病以来，孩子们的表现，还不如邓通。

生病的人，情绪很低落，皇帝也是人，也有向人倾诉的渴望。

“你看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是谁？”文帝怅然若失地问道，好像是问邓通，又像是在自问。

“那还用问，最爱陛下的人，自然是太子了。”邓通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文帝没有再说话，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恰好此时，太子刘启进来探视，文帝不动声色，示意他为自己吸脓。

不同于父祖，刘启出生就是天潢贵胄，没吃过苦、遭过罪，面对父亲突然给出的难题，一时间心理上实在难以接受。但看着父亲的盈盈目光，只好捏着鼻子，不情不愿地将脓吮吸一遍，但胃里不停翻腾，要不是强压着，差点恶心吐出来。

不过事后，刘启很快听说邓通也给父亲吮吸脓血，而且还吸得非常投入，吸得津津有味。那一刻，刘启内心比吸入脓血更恶心。

一个人做事如果超出了常理，超出了正常认知，大多属于那种人格低下、谄媚下贱之辈，这样的人是不大讨人喜欢的。

这件事，也为邓通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不过文帝却觉得，邓通才是天下最爱他的人，因此，对他宠爱有增无减。日子久了，邓通自然免不了有些恃宠而骄。

作为帝国丞相，申屠嘉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算皇帝本人也对他礼遇有加，可惜邓通被皇帝宠坏了，竟然有些忘乎所以了。某次，申屠嘉上朝参见文帝，在一旁的邓通却大大咧咧杵在那里，忘了向申屠嘉行礼。

武将出身的申屠嘉本就不大看得起邓通这号货色，看他仗着皇帝的宠幸，竟然忘了身份，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斤两申屠嘉当下气不打一处来。

等汇报完工作后，申屠嘉直通通对文帝说："陛下如果宠爱邓通，赐予富贵，臣无话可说，但朝堂之上，朝廷礼数还要维护!"

文帝听完，一时抹不开面子，替邓通打圆场："丞相别往心里去，你就是不说，朕也明白，我是平常有点过于偏爱他了，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可申屠嘉生来火暴脾气，哪能咽下这口气？此事决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待退朝，一回到相府，立刻命人带上自己手令，传邓通前来问话，并放出狠话来，邓通要是胆敢不来报到，就地斩杀。

邓通心里发怵，急急忙忙跑到宫中，向皇帝求救。

文帝明白，申屠嘉心中有气，必须要让他出出气才行，遂宽慰邓通说："你且尽管去好了，我随后会派人去接你。"

既然皇帝亲口允诺，邓通不好再推托，只好忐忑不安地前往相府。

一进大门，远远望见申屠嘉端坐在大堂中央，不怒自威。邓通不由得胆虚了一半，立刻免冠去履、赤足散发，冲着申屠嘉叩头请罪。

邓通本以为，有皇帝宠着，自己屈膝请罪，已让申屠嘉挽回了面

子，料他会见好就收。谁承想，任他叩头不止，这位将军丞相依然没有松口迹象，邓通当下不由得慌了，难不成他真的会杀了我？

看着邓通的样，申屠嘉大声呵斥：“朝廷是高祖之朝廷，你不过一介弄臣，竟敢在朝堂上随意轻狂，依律就该立即斩首。左右!马上将此人拉出去砍了!”

邓通一听丞相来真的了，吓得差点瘫了，惊恐万分之下，叩头如捣蒜，头都磕烂了，血流满面，但申屠嘉丝毫没有松口的意思。

此时，文帝在宫中内心也是七上八下，掐指头算时间，估摸申屠嘉气出得差不多了，赶紧派使者手持符节，前来传达口谕：“朕一时半会儿离不开此人，还望丞相权且饶过他一回!”

邓通眼看人头就要落地，多方皇帝及时搭救，总算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连滚带爬，出了相府，跌跌撞撞返回宫中，尚惊魂未定，一见到皇帝，立刻号啕大哭：“陛下要是再晚一点，丞相可就真杀了我!”

文帝看邓通可怜样，心中也不忍，只好温言安慰了他一番。

申屠嘉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廉明，在个人操守方面无可挑剔，加上他是高祖时期的老臣，因此，纵然在处理邓通时做得有点过火，文帝也只能隐忍不发。

作为一名军人，申屠嘉不屑于官场权谋，也不愿意放软身段。只是，作为帝国丞相，申屠嘉坚持原则之余，少了几分圆融和灵活。丞相作为百官之首，上要辅佐天子，下要统领百官，协调总领国政，每日处理的事务千头万绪，面对形形色色的官员，如果一味由着自己性子，不懂变通，实在算不上一名称职的宰相。

邓通在朝堂上失礼，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但申屠嘉的驴脾气上来后，愣是上纲上线小题大做，闹得皇帝都差点下不了台。通过此事不难看出，虽然申屠嘉已经官居丞相，但依然改不了军人性子，做事雷厉风行，工作思路简单粗暴，根本不讲究方法。

眼瞅着丞相将皇帝身边红得发紫的宠臣折腾个半死，皇帝最终只好出来做和事佬，才算保住了邓通性命。

日子一长，臣下们算是摸透了文帝的好脾气，胆子渐渐就大了，什么建议都敢提，什么话题都敢说。

比如袁盎，多年来，以维护儒家纲常礼教为己任，眼看不合儒家尊卑秩序之事，就立刻站出来指摘一番。在朝堂上，周勃目无君王时，他站出来了；面对皇室宗亲刘长图谋不轨时，他站出来了；甚至对后宫之事，他也敢于干预，慎夫人企图越位时，他又一次站出来了。

从朝堂进谏，到掺和宗亲恩怨，再到插手后宫，文帝对他的态度也逐渐由赞赏变为厌恶。文帝觉得袁盎手伸得太长了，只是一时忍住，没有发作而已。

凡是正常人，大多数都喜欢听赞美顺耳话，没有人愿意有人成天在你耳边聒噪，尤其是皇帝。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大多都认为自己永远正确、高大。

明君和昏君的区别在于，昏君直接让人闭嘴，而明君一般会用和蔼可亲的笑容说：“大家有意见尽管提，千万别客气，你们要是让朕意识不到自己错误，就是等于在害朕!”

但如果有人就此信以为真，要么是个官场弱智，要么就是情商堪忧。

很明显，袁盎既不是弱智，也不是情商低下之人，他之所以敢于屡次跟皇帝提意见，是因为他是一个勇于坚持自己信仰之人，是一个正直而又纯粹的人。

这样的臣子历来颇让皇帝头疼，他们是一群敢于坚持原则、不怕自我牺牲之人，皇帝想要整治，却一时苦于找不到把柄。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宵小之辈，站在阴暗处察言观色，一旦发现有

机可乘，便会落井下石。

没多久，袁盎就听到一个消息，有人背地里在皇帝耳边给他下绊子使坏。他不由得着急起来。

## 意外难题

给袁盎暗中报信的人是他的侄子袁种。袁种在皇帝身边担任贴身侍卫，自然会接触到一些一般大臣掌握不了的秘密，他多次听到宦官赵同(本名赵谈，司马迁为避父讳，改为赵同)在文帝面前中伤袁盎，心中感到很是不忿，特地通知叔父做好思想准备。

赵同可不是一般宦官，他是文帝的男宠之一。与除了懂伺候人外一窍不通的邓通相比，赵同精通星象和望气，很对喜好鬼神的文帝的胃口，以至于文帝每次出行，都要与赵同同车。

袁种给叔叔支招说："对于赵同这种人，想和他斗，就要当众折辱，狠狠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让他失信于皇帝，往后再也抬不起头来!"

袁盎听后，心里有了主意。

有一日，他看到皇帝车驾，知道赵同与皇帝同车，便跪伏在车前，文帝在车上见状，感到很疑惑，问到底怎么回事。

袁盎正色回答说："能够有资格与天子同车而行之人，应该是天下俊杰，陛下却与一个刑余之人共坐一车，难道大汉人才都死绝了吗？"

文帝尴尬地笑了笑，示意赵同下车。

赵同觉得很委屈，哭哭啼啼下了车。

这件事，表面上看，袁盎狠狠敲打了一下赵同，赢得了一局。实际上，他没有考虑一个人的看法，那就是文帝的内心感受。

任何人被公开指责，都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尤其是当着自己备受宠爱之人的面受到批评，更显得掉价。常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皇帝也是人，也需要个贴心人，说点私心话，但就这么点小自由都要被剥夺，文帝心中肯定很不爽，只是碍于面子不好发火而已。

但是，袁盎却没有意识到，他不经意间已惹恼了皇帝。

没过多久，他再一次拿文帝乘车说事。这次，他是从安全角度批评皇帝危险驾驶。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文帝乘车外出游玩，驱车登上霸陵，袁盎在旁陪同，估计皇帝当时兴致很不错，上山之后，打算玩一把速度与激情，想从山顶极速冲驰下山。

古代马车可没有制动刹车，一旦掌握不好，就有可能车毁人亡。

不过，文帝似乎满不在乎，他从车窗内看到袁盎使劲拽马缰，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不由得感到好笑，便逗他说："怎么，将军怕了吗？"

面对皇帝的冒险冲动，袁盎决定果断制止。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听说身家千金之人，不会坐于屋檐之下，因为怕屋瓦坠落受伤；家资百金之人，为防意外，不会倚靠楼台危栏，这是因为他们懂得爱惜自己；又听说圣明君王不会心存侥幸去冒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家国天下的重任。如今，陛下放纵车马疾驰，万一马匹受惊，发生意外怎么办？就算陛下不拿自己当回事，但您可考虑过太后的感受？可想过高祖的帝业怎么办？"

袁盎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文帝头上，文帝顿时没了激情，索然无味之下，只得悻悻然放缓车速下山。

谁说皇帝能够说一不二？谁说皇帝可以放纵任性？就是感受一下飙车都不行!

屡屡让人扫兴，文帝对袁盎的厌恶也到了极点。没有人愿意整天被人在耳边叨叨不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文帝心想：算了，你还是离朕远点，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

袁盎很快接到调令，前往陇西担任都尉。离开京城繁华世界，赴偏远苦寒的陇西，袁盎倒也坦然，没有怨言，径自去上任。

在陇西期间，袁盎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深得军心，士卒们对袁盎感恩戴德，乐于听他差遣，不惜效死。

不过，袁盎戍边生活没多久就结束了，朝廷调任他去齐国任国相。从帝国西陲，到东疆海滨，主政一国，是个不错的差事。袁盎简单收拾一下，赶赴齐国上任。

齐国是诸侯中一等一的大国，富庶繁荣，比起在陇西高原每日忍受凛冽西北风的苦日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说明皇帝还是比较体恤袁盎，让他吃点苦头，略施薄惩后，又委以重任。

文帝只是不愿袁盎在他耳边聒噪，至于袁盎的工作能力他还是认可的。这不，袁盎在齐国的舒服日子没过几天，长安方面又传来诏令，改任他为吴国国相。

仅仅从职位来看，袁盎这次职位变动属于平级调动，其实，同为国相，大有不同。如果说，齐国还算日子过得不错，那么吴国就是肥得流油了。

袁盎似乎捡了一个肥缺，应该做梦都会笑醒，然而，事实上，朝廷给他抛了一枚烫手山芋，因为吴王刘濞可不是善茬儿，是个不好伺候的主儿。

高祖分封刘濞时，就看出他是个不安分之人，只是苦于自己的儿子都年幼，不得已将吴国这一重要地域交给他。

刘濞为人骁勇骄悍，自去了吴国后，野心勃勃，肆意扩充实力。

吴国临海，气候湿润，境内河道纵横，地势开阔，物产丰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可谓要啥有啥。

在惠帝、吕后执政那些年，朝廷对于地方控制较弱，放任诸侯扩充力量，尤其是吕后时期，她忙着对付高祖诸子，根本顾不上远在东南的吴国。

刘濞恰好利用这段空档期，大量纠集各地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开挖豫章郡(根据《括地志》记载，此处并非为治所是今属江西南昌的豫章郡，而是指故鄣郡，治所在今浙江湖州长兴县一带)铜矿，私下铸钱。

盐和铜这两项战略物资，给刘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有了钱就好办事了，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对刘濞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比如徭役和赋税，从来都是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沉重负担，刘濞大手一挥免了吴国境内百姓赋税。

如果有的家庭无人服兵役，不要紧，你可以雇人服役，至于佣金，刘濞帮你出，而且价格绝对公平合理。另外，逢年过节之际，刘濞都会出面慰问境内贤达，给普通百姓赏赐礼物。

刘濞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收买人心。

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又得民众拥护，刘濞很自负，目中无人久矣。

文帝即位之初，吴国与朝廷的关系很微妙，刘濞自恃年长，不来长安朝觐，只是派太子(《史记》《汉书》皆不载其名。《楚汉春秋》云：“吴太子名贤，字德明。”)前来拜见皇帝。

对于刘濞这种敷衍态度，文帝自然很不满意，但为了不搞僵关系，也就默许了。但谁承想，吴太子这趟长安行，竟死于一场棋局。

原来吴太子在长安逗留期间，闲暇无聊之时，和太子刘启凑到一起饮酒对弈。下棋本不过一种娱乐活动，方寸之间的输赢，本无伤大

雅，奈何两人都正值年轻气盛，好胜心强，加上又喝了酒，渐渐地，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估计其中一方悔棋，另一方断不肯忍让，于是起了争执，产生了口角。

刘启自认为是皇太子，未来的大汉天子，自然轻视区区一方诸侯王太子，至于吴太子从小在骄奢溺爱中长大，加上他的几位老师都是剽悍好斗的楚人，平日里没少对他教唆和怂恿，耳濡目染已久，养成了无理搅三分、有理不饶人的坏脾气。

只是在长安，没有人会迁就你，吴太子傲慢轻狂的态度，激怒了刘启，怒火冲头之下，刘启一把抄起棋盘，冲着吴太子扔了过去，不偏不倚，砸在吴太子脑袋上，当即毙命。

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文帝感到很难堪，但也总不能让自己儿子抵命，只得让人好好收殓，然后派使者将遗体送回吴国。

没承想，没过多久，吴太子遗体又被送回长安来。刘濞让人捎来一句硬邦邦的话：“如今天下一家，人死哪里，就葬在哪里，埋在长安就是了，何必送回吴国，来回折腾!”

谁都看得出来，刘濞这是在置气。

文帝自感理亏，只好好言安抚刘濞。不过，自此以后，刘濞不再谨守藩臣礼仪，比如岁首入京朝贺等事宜，一概称病缺席。

全长安上下都知道，吴王的病根其实是自己儿子无辜枉死京城。朝廷方面经过查证，确认刘濞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染病。

刘濞自己不来长安，但时常派使者来长安，表面上是替他向朝廷致意，实际上是来京城探听口风。文帝对刘濞很恼火，下令将数拨人都扣了起来，命有关部门严肃审查。

刘濞听到消息后，开始有点慌了，暗中开始谋划造反，但为了争取时间，必须先设法稳住朝廷才行。因此，他依然按时派使者行秋请之礼(按照《周礼》，诸侯春秋两季，分别到京城觐见天子，汇报请

示工作，春季称春朝，秋季称秋请)。

文帝在接见吴国使者时，当面责问吴王刘濞为何不亲自前来长安觐见，使者慑于皇帝威严，只好如实和盘托出：“古话说得好，‘深渊之水过于清澈，一眼就能看到潭底的鱼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暗示上司不给下级预留任何秘密空间，会激发两者之间的矛盾)。吴王确实没病，只是听到朝廷接连扣留了吴国使者，心中害怕被皇帝降罪，装病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恳请陛下与吴王冰释前嫌，再给吴王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文帝看出来了，要是威逼过激，将刘濞逼急了，这家伙肯定会造反，如今国家千头万绪，断不能在此时再启战端。经过反复权衡后，决定当务之急，要设法稳住吴国。于是，下令将以前扣押的吴国使者悉数释放，并给刘濞送去案几和手杖，传话给他，从吴国到长安路途迢迢，吴王年纪大了，实在经不起车马颠簸，故朕特许以后可以不必亲自到京城觐见了。

不得不承认，文帝这一招很高明，双方矛盾被搁置，紧绷的关系一下子放松下来。刘濞也暂时解除了对朝廷的警惕，放缓了谋反步伐。

不过，此举仅仅是掐断了引信而已，并没有彻底摘除刘濞这颗炸弹，一旦风向变化，谁也说不准，他会什么时候爆发。对于这一点文帝心知肚明，所以他要派一个信得过之人到吴国去，安插在刘濞身边，充当朝廷耳目，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文帝觉得袁盎为人正派，能力强，从任职朝廷到主政一方，履历完备，派他去吴国再合适不过。

文帝的用意，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一桩美差，分明是送入虎穴，与虎狼伴舞。

袁盎侄子袁种在皇帝身边待得久了，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文帝的用心，他知道叔父为人一条筋，性子急，脾气倔，只是此次要面对的吴

王刘濞，非邓通、赵同这些弄臣能比的，他可是手握生杀大权，主政一方的诸侯王。刘濞就连皇帝都敢不放眼里，更别说区区国相了，他要是被惹恼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袁种觉得很有必要给老叔提个醒。

袁盎辞行时，袁种特意将他拉到一边，劝道："吴王此人骄横已久，指望他回心转意，改良从善，已几无可能，他身边多是一些为非作歹之辈，叔父此去吴国，要是向朝廷揭发惩治他们，后果堪忧，定然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扑，轻则被反诬，重则他们铤而走险，不排除暗中谋杀您的可能。故而，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睁只眼闭只眼即可。吴国气候潮湿，您要善自保重身体，大可每日饮酒自乐，只要设法拖住吴王，让他不要谋反就行。"

这些话，就算侄子不叮嘱，袁盎何尝不明白？面对大是大非，袁盎从来不隐瞒自己观点，以敢于发声闻名朝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莽汉。

到了吴国后，没过几天，刘濞就派人送来厚礼。

这等于给袁盎出了个难题，朝廷派国相的目的就是监督诸侯王，国相结交诸侯，历来是大忌，如果袁盎收下吴王的礼物，必然会招来朝廷的猜忌。但如果拒绝，很明显，他在吴国必然待不了多久。

这哪里是送礼，分明是相互取信的投保单!

但南下只身赴吴，根本目的不就是稳住刘濞吗？其他的，暂且顾不了太多!

这礼不但要收，而且要开开心心地收，大张旗鼓地收!

听说袁盎收下了礼，刘濞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看出来了，袁盎是不会与他对着干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袁盎与刘濞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刘濞看来，袁盎不给他添乱，自然再好不过了。在袁盎心中，只要刘濞不谋反，就是最大的胜利。各取所需，不亦乐乎？

只是，袁盎没想到，多年后，他接纳刘濞所赠财物之事，将会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

不过至少目前，袁盎的日子过得比较舒心，每天喝喝酒、吹吹牛，在吴国温润的暖风中，流连于江南秀丽风光，好不惬意。

自从和朝廷的关系松缓以后，刘濞谋反的心思也没有那么迫切了，毕竟造反不是闹着玩的。何况，他觉得自己还没有绝对能取代文帝的把握，那么，目前能做的唯有静待时机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袁盎决定请假回趟长安。此去吴国可谓不辱使命，袁盎心情不错，可是刚到长安，好心情就让人给破坏了。

在路上，他恰好碰到了丞相申屠嘉的出行车队，出于礼貌，袁盎立即叫人停下车子，下车向申屠嘉行礼。

申屠嘉看到站在道旁的袁盎，仅仅在车上微微颔首一下，然后扬长而去。按照礼节，申屠嘉应该下车回礼才对，但他貌似丝毫不想给袁盎面子。

袁盎身后站着许多属从，在自己手下面前遭人轻慢，他感到非常没面子。望着申屠嘉一路远去的烟尘，袁盎一脸难堪，无地自容。就算你申屠嘉是大汉丞相，我袁盎好歹也是一方诸侯国相，也算是有头有脸之人，你岂能当众羞辱于我!

袁盎回到家中，越想越羞恼，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往后自己还怎么在官场混？恐怕在下属面前，腰板都没法挺起来。不行，这面子从哪里掉了，还要从哪里捡回来。袁盎一旦较真起来，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是毫不退让。

袁盎决定亲自到丞相府，向申屠嘉讨个说法。赶到相府后，他提出要求面见丞相，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申屠嘉本人出来。

过了许久，申屠嘉才磨磨蹭蹭出来接见。

袁盎心中有火，但没有流露出来，反而一脸庄重地向申屠嘉跪下，说："希望丞相规避闲杂人，我有些话要私下单独跟您讲。"

在秦汉时，可不像后世，除非特别重大朝会场合，臣下见了皇帝一般都不会行跪拜礼，更别说下属见上司了。所以袁盎行跪拜礼，表明了他和申屠嘉谈话的严肃性。

申屠嘉是武将出身，比不得儒生，没有那么多矫饰，见袁盎一板一眼地说话，顿时心中很不痛快，当下冷冰冰回答道："如果你要说公事，请去官署，去找长史、掾吏(丞相府属官)，做好记录，我会将足下意见转呈陛下；要是私事，请恕我不接受私人谈话。"

申屠嘉意思很明白，别跟我套近乎，咱们之间没有私人情谊。

袁盎本来意在维护申屠嘉权威，给他面子，好吧，既然你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就休怪我说话尖刻了。

心中如此想，但他跪姿不变，脸色依然如旧，但语气却变得不太客气了："请您扪心自问，作为丞相，您与相国陈平与绛侯周勃相比如何？"

申屠嘉没好气地回答说："我自然是不如他们。"

"连您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这很好，陈平和周勃曾辅助高祖灭暴秦、除群雄，建立大汉，而后又在诛灭吕氏的斗争中立下不世之功，保住了刘氏的天下，这功劳够大了吧，但他们的结局又如何？您是过来人，应该比我更清楚吧!而您不过是底层材官出身，靠的不过是弯弓之力，从一名小队长，慢慢坐到淮阳郡守位子上，根本没有拿出过什么治国安邦的方略，也不曾有过攻城略地的过硬战绩，又有什么目中无人的资本呢？"

申屠嘉沉默不语，因为袁盎说的都是事实，他没法反驳。

袁盎继续说：“再说当今陛下，他自代国入主长安以来，宵衣旰食，兢兢业业，每逢朝会，碰到郎官呈上奏书，没有一次不是停下车来，听取意见，如果合适当即采纳，如果觉得有些不妥，先暂时搁置，从未拒人千里之外。正因为如此，四海仰慕，万众归心，陛下也因为每天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而变得愈加圣明。反观丞相您，却闭塞视听，傲慢自大，长期下去，恐怕离惹祸上门、被陛下治罪的日子也不远了。”

申屠嘉是个粗人，但并不傻，听完袁盎一席话，马上幡然醒悟，立刻拉他起来，冲着袁盎回拜，并略带歉意地说：“我就是个粗人，很多时候，不晓事理，望将军莫怪。今日幸得将军提醒，实在感激万分。”

说完，就挽起袁盎手臂往里走。

自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 敢于碰硬

袁盎敢于直言，也能慧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比如廷尉张释之就是他举荐给文帝的。

张释之，字季，南阳郡堵阳县(亦作赭阳县，今河南省方城县东)人，家境富裕，哥哥张仲为了给弟弟谋个差事，花了一笔巨款，给他捐了个骑郎(按照汉朝制度，花五百万钱，可以买个常侍郎)。

骑郎，秩比三百石，是郎官的一种，归郎中令节制，平常在宫中值班宿卫，遇到皇帝外出，就在车驾周围侍从护卫。说白了，也就是皇帝的警卫人员。

张释之之所以选择做郎官，是因为郎官较容易接近皇帝，本以为做了郎官，得到提拔的机会就会多一些。但谁承想，他在骑郎位子上一待就是十年，眼看前途渺茫，他感到灰心沮丧，觉得再耗下去，这辈子恐怕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张释之觉得自己辜负了哥哥，感到很愧疚，害得哥哥花了那么一大笔钱，自己却在十年间原地踏步，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与其这样浪费年华，还不如早做打算，另谋出路。于是，他打定主意，辞职不干了。

当时袁盎正在中郎将任上。中郎将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郎中令，负责职掌宫禁宿卫，随行护驾，另外，对郎官的考察选拔也是其职责之一。算起来，袁盎也是张释之的顶头上司。

由于平常工作中接触得多，袁盎对张释之比较了解，知道他人才难得。听说张释之要走，觉得让这样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就这样埋没了，实在可惜。当即求见文帝，希望皇帝挽留张释之，提拔他做谒者。

文帝听后，表示要当面考察一番，看看他究竟是否名副其实。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华，张释之激动不已。

一路上，他边走边盘算着如何给皇帝留个好印象，觉得以皇帝的高度，只要从宏观大视角给他阐述一些治国方略即可，没必要说枝末细节。具体如何操作，那是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事。

因此，见到文帝后，张释之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大计方针，文帝听后，脸上非但没流露出欣赏的神色，反而皱起了眉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题：“休要扯太远，高谈阔论的话就不要说了，重点还是说点贴近现实的事吧!”

文帝是个实干家，素不喜欢那些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言辞。

张释之听后便改变话题，给皇帝分析起秦亡汉兴的原因来，说得头头是道，文帝听得津津有味。渐渐地，他意识到，张释之此人不简单，是个人才，当下直接提升他为谒者仆射。

人生想要成功，单靠才华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机会，和一个赏识你的伯乐。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但绝大多数准备好了的人，不见得有机会。

张释之为了这一刻整整等了十年，好在他比较幸运，遇到了袁盎，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自此他的仕途一路光明，步步高升。

事实证明，袁盎没有看走眼，张释之在以后的工作中，敢于直言不讳，绝不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这样的操守在专制社会实属难得，一般人很难做得到。

譬如有一次文帝出行，游上林苑。上林苑为皇家园林，其范围极大，足足有几百里，其间既有供皇帝狩猎用的大片猎场，也有供皇帝观赏的野生动物园，里面豢养着诸如老虎等猛兽。

文帝登上虎圈高处，观望圈内的老虎，兴致颇高，随即询问在旁陪同的上林尉有关园内动物饲养方面的情况。

估计这位仁兄对本职业务不太熟悉，接连一问三不知，尴尬地左盼右顾，不知如何作答。就在此时，有个看管虎圈的啬夫(动物饲养员之类的小吏)站出来插话，代表上林尉回答皇帝问话，而且汇报非常到位。

文帝听后，频频点头，表示很满意，并意有所指地说：“作为一名官吏，不就该如此吗？看来上林尉是该换人了!”

张释之看出来了，眼前这位伶牙俐齿的啬夫其实动机不纯，表面上看是在为上司解围，实际上就是个见缝插针的投机主义者。如果任由这种巧言令色之人上位，必然会助长朝廷的不正之风。

“陛下觉得绛侯周勃是个怎样的人？”张释之不动声色在一边问道。

文帝不晓得张释之为何突然这么一问，只好随口答道：“是位令人敬重的长者啊!”

“那么，东阳侯张相如(汉朝开国将领，曾参与平定陈豨之乱)呢？”张释之继续问道。

“他也是一位长者啊。”文帝回答说。

“那么，绛侯和东阳侯是像这位啬夫一样在朝堂上喋喋不休、在陛下面前卖弄口舌吗？没有，他们是敦厚持重之人，只知道尽力为国办事，却拙于言辞。秦朝为何那么快就崩溃了？就是官吏中有太多只懂得迎合上司、善于做表面文章之人，皇帝却被蒙在里面，不知实情。现在陛下只因这个啬夫伶牙俐齿，单凭他的一番花言巧语，就越级提拔他，恐怕难免引来一些只懂耍嘴皮功夫，却不干实事之人群起效仿。希望陛下多加慎重为好!”张释之道出了他的忧虑。

文帝本也是一时兴起罢了，见张释之劝阻，也只好打消了任命啬夫为上林尉的念头。

在回宫途中，文帝让张释之与他同车，命人放缓车速，让张释之给他再细细剖析一下秦朝的弊端，好引以为鉴。

皇帝要求，张释之也不推辞，他结合眼下，以事实为依据，认真为文帝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车轮辚辚，道狭且长，君臣二人一路颠簸，谈古论今，越谈越投机。等车驾抵达皇宫后，文帝当场宣布提拔张释之为公车令。

公车令一职，全称为公车司马令，秩六百石，归卫尉节制，具体负责皇宫司马门守卫，以及宫中巡逻工作。

司马门是皇宫外门，凡是天下官民向皇帝上书，或者四方诸侯要上贡天子，必须交给公车令转交。

按照制度规定，无论官民皆不能擅闯司马门，就算是皇子诸侯也必须下车下马，经公车令验查后，方能通行。

不难看出，公车令一职虽说官职不高，但肩负皇宫的安全工作，责任重大，非皇帝信任之人，绝不会被放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文帝对张释之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了。

谁也没料到，张释之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武同车进宫，至司马门拒不下车，径自往里闯。

一个是皇太子，另一个是皇帝的爱子，这两位，谁敢惹？

守门的士卒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放行肯定难逃失职罪责，但强拦住，无疑是活腻了。

就在此时，只见张释之大步向前，迎了上去，直接拦住车辆，阻止他们入宫，请他们要么下车，要么原路返回。

刘启和刘武哥儿俩哪里肯听？坐在车里纹丝不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张释之面见文帝，揭发太子和梁王蔑视法度，犯了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可是相当严重的指控了，文帝一时两难，还未决定如何处理两个儿子时，消息就传到薄太后耳朵里。

老太太心疼孙子，当即召见皇帝，问个究竟。文帝为人至孝，眼看惊动了老太太，心里既惭愧，又过意不去，只得摘下帽子，赔罪说：“只怪我教导儿子不严，惊扰了太后!”

薄太后怜惜孙子，一时也顾不了太多，总不能让两个孙子就这样在宫门外候着，进不了门，赶紧命人带上赦免诏书，到司马门引导太子和梁王二人入宫。

这件事动静太大，闹得沸沸扬扬，很快整个长安的人都知道了。

张释之觉得自己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于心无愧。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会这么看，他忘了在一些人眼中，有一件事比法律和制度还要大，那就是面子。

刘启作为堂堂太子，栽了这么大跟头，在天下人面前掉了面子，他岂能无动于衷？只是在没掌握最高权力之前，暂时隐忍罢了。

在皇权社会，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不过是权力的仆从而已。这一点，无论张释之是否考虑到，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他最终的

结局，就此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不过在当时，经过此事，文帝对张释之更加刮目相看，觉得他敢于碰硬，敢于执法，于是愈加器重他，直接提拔为中大夫(秩比二千石，属于皇帝近身顾问)。

不久，张释之就升任中郎将，坐到了当年袁盎的位子上。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当初张释之满怀失望，准备返乡之际，恐怕做梦也没料到有一天自己会坐到如此高位。然而，他的仕途还远远没到顶峰。

中郎将负责皇帝安全，皇帝出行，就要贴身护卫，称得上是皇帝的影子。有一次，文帝携慎夫人游霸陵。霸陵是文帝给自己选的陵寝之地，他生前曾多次亲赴霸陵游览。

周秦以来，帝王陵多采用平地凿穴覆土的方式。文帝即位以来，念及国家离战乱未久，国贫民困，故而，处处以节俭为先。为节约民力财力，他决定采用“因山为藏”的方式，在长安东郊灞水之侧，在山崖开凿玄宫，已备将来栖骨之所。因陵寝就近灞水，便以水名为陵号，称作灞陵，又称霸陵。

文帝与慎夫人登临霸陵高处，极目远眺，一条大道映入眼帘，道路蜿蜒，直通远方，消失在天际。文帝驻足良久，用手指着道路对慎夫人说：“此乃新丰路，顺着它一路向前，直通邯郸。”言辞间充满了伤感。

是啊，远方的邯郸，是文帝的人生起点，而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自己的人生终点。

人生不满百，不过是往来于两点一线罢了，就算是九五之尊的帝王又能如何，最终还不是岩穴之下的一具朽骨而已？千百年后，所谓皇图霸业，终究犹如烟尘罢了。

或许是触目伤怀，文帝一时情绪很低落，让慎夫人弹瑟，瑟声铿锵悲凉，他不由悲从心来，合着拍子歌唱。

一曲未尽，已是泪光盈盈。文帝念及自己不幸的身世，感叹当前国运艰难，但万千心事，又能说与谁听呢？

半晌，文帝回过头，以聊以自慰的语气对身边侍从众人说：“唉，我千秋万岁之后，葬身此地，用北山之石制作棺椁，然后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充塞石椁缝隙，再在外边涂上生漆，估计后世再没有人打得开吧!”

皇帝话说得如此凄凉，众人哪敢拂逆？都异口同声附和说：“是是是!”

谁料，此时张释之却不合时宜地站出来，一脸严肃地说：“如果陛下棺椁内放置奇珍异宝作为殉葬品，即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未必能阻挡住人心的贪婪，他们还是会想办法撬开缝隙；倘若墓葬中没有陪葬品，即使没有石椁，又何须担忧呢!”

由于人心不足，自古以来，有多少帝王将相坚信视死如生，幻想到了彼岸世界，还享受在世的奢靡荣华，恨不得将生前生活用度全部打包搬到地下。

可惜的是，任你生前位高权重，也难以管得了身后事。墓主死后过不了多久，埋身之地就成了盗墓者的乐园。每当夜黑风高之际，古冢荒坟魅影穿梭，残碑野草丛里旧坟起新土，朽骨被拖出来，陈尸野外，墓穴中奇珍异宝被盗取一空。

倘若赶上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官匪难分之日，秩序大乱后，兵祸所过之处，昔日帝王陵寝、将侯坟丘无一遗存，罕有保全。盗墓发丘这种深更半夜干的勾当，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大干起来。

比如秦末，项羽曾率兵发掘始皇帝陵寝，将地面陵阙宫殿破坏殆尽、从地宫攫取大量财宝后，满载东归彭城(项羽是否挖开始皇帝地宫，历史上说法不一，但估计至少挖开了一些陪葬坑)。

为了阻挡盗墓者，墓主人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不

过，无论是传说中真假难辨的重重机关，还是编造的各种唬人的诅咒神话，都没能挡住盗墓者的步伐。

无论关中汉唐帝陵，还是北邙魏晋公卿坟丘，基本难以逃脱被掘墓抛尸的命运。

就是汉文帝本人的霸陵，虽说在汉末大乱中侥幸逃过一劫，但至西晋后期，五胡乱华、天下鼎沸之时，终究没有逃脱被盗的厄运。

究其原因，虽然文帝一再宣示要薄殓，但后世人并不相信。

历史上一再宣布要薄葬的帝王不在少数，但真正做到的估计凤毛麟角，大多数其实不过是遮人耳目罢了。

文帝陵寝或许陪藏品少一些，器物节俭一些，但相信其规模依然可观。这一点，参照他同样号称节俭的儿子刘启的阳陵，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说，最好的防盗墓措施，正如张释之所说那样，干脆什么都别放，贼不惦记了，自然就安全了。只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会成为例外。

可惜，在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例外一说。

当然，张释之的那番话，到底还是触动了文帝。毕竟，敢于对皇帝说真话的人从来都是稀罕物，而在一片附和声中，敢于发出不同声音，更是难得了。

不盲从，有魄力，敢于碰硬，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做一名护卫将军实在是一种人才浪费。有一个岗位更适合他，那就是廷尉。

谁承想，张释之上任廷尉不久，皇帝就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

# 第七章 匈奴方略

## 依法办事

张释之才上任没几天，廷尉府就接到一名人犯，押送犯人前来者是皇帝卫队骑士，他们声称皇帝出巡途经长安城北中渭桥(建于秦始皇时期，初名横桥，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又称作渭桥)时，该犯突然从桥下窜了出来，车驾马匹受到惊吓，差点伤到天子。

张释之一听，事关皇帝安危，自然不敢大意，立即亲自提审。

廷尉大堂，张释之端坐其上，问："说吧，究竟是怎回事？你藏匿于桥下，到底有何图谋？"

"我本家住长安郊区，当时恰好路过中渭桥，听闻道路封闭，禁止通行，一时间无处回避，只好藏于桥下。乡下人没见过大场面，左等右等，时间过去了很久，估摸了一下，以为皇帝车队差不多过去了，便探头爬了出来。谁知，刚露面，正赶上皇帝车驾驶了过来，仓促之间，一下子就蒙了，只好撒腿就跑，不经意间惊扰了皇帝。"那人怯怯地回答道。

张释之听他说得合情合理，不像是撒谎的样子，就按照违反清道禁令处理，罚了点钱了事，并将处理结果汇报给文帝。

文帝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此人冒冒失失，惊扰了我的马匹，亏得马儿生性温顺，我才侥幸平安无事。倘若赶上一匹烈马，说不定朕现在早已身受重伤，如此严重罪行，你竟然就想罚点钱结案了事？"

看到皇帝愤怒，张释之并没有慌乱，依然很平静地回答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我只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如果随意变更条文，轻罪重罚，以后如何取信于民？如何让民众敬畏法

律？假如陛下在案发现场立即处死他，我无话可说，但要是交给廷尉府，廷尉作为大汉首席执法之人，就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执法。如果随意增减处罚，天下执法者群起效仿，都按照执法者自己的喜恶判决，那么，老百姓们会怎么看？他们又如何肯再相信朝廷？希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

法律的可贵就在于它不做假设性有罪推理，一切判决结果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者不能掺杂个人情感，不能受外界干扰。唯如此，才能保持法律的尊严和公信力。

法律条款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一旦公布，就不能随意更改，哪怕它是一部有缺陷的法律。这对构建公平社会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有着更大的正面意义。

然而，在专制社会，对法律最大的破坏往往来自上层权力的干扰。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在高压皇权之下，公正公平从来没有实现过。再完备的法律，在皇权面前都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权力横行的年代，想要追求法律的公正无私，无疑是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追求公平、公正、公理，依然是人类的至高追求，哪怕是在暗无天日的黑暗年代，总有一些人，勇于挑战权力桎梏，不肯停下追求正义的步伐。

在黑暗如铁的岁月中，他们身上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让我们感触到人类良知的温度。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民族数千年来面对屠刀和凌辱时，不至于丧失正义必胜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的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风雨。

毫无疑问，张释之就是这样一个人。

虽然文帝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张释之的判决结果。

这就是正义的力量!

此次道路违禁案审判结束不久，长安又发生了一起惊天偷盗大案，有贼人竟然惦记上皇家宗庙的器物，夜半时分，悄然潜入高祖庙，将神座前供奉的玉环盗走了。

作案者是惯犯大盗，还是迫于生活、铤而走险的初犯，我们一概不知，但偷盗者很快落网，被交到廷尉府。

本案性质恶劣，手段卑劣，不但冒犯了皇家尊严，也严重伤害了文帝的个人感情。这不仅仅是偷盗皇家财产，更是对当今天子祖先的冒犯和大不敬。

文帝将案犯交给张释之处理，并事先对案子定性，要求从严从快处置。

很快，廷尉府将判决结果送到御前，以偷盗宗庙器物罪判处死刑。

文帝一看，勃然大怒，以前有人冒犯朕，你张释之宽宥处理也就罢了，如今对冒犯朕皇考的大案，也竟然想大事化小，这事传出去，你是赢得了宽仁的美誉，倒让朕背上不孝的恶名!

文帝盛怒之下，当着张释之的面将判决结果给驳回去了："该犯为非作歹，简直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庙的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府，就是要灭他的族!没想到你却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条条框框，高举轻放，你让朕往后如何立足于朝堂之上!又有何颜面侍奉先帝宗庙？"

文帝将一顶大帽子直接扣在张释之头上，你为了顾及法律，竟然不顾及朕的感受!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换了一般官员，早就招架不住了。但张释之不同凡人，他是个坚守原则的人，他心中有一根底线，那就是法律必须得到全面彻底的执行，决不能随意曲解和选择性地执行。

他缓缓跪下，免冠，面向皇帝，一字一板地说："法律判决，就必须体现出罪行的差异，对罪犯的惩处，必须与他的罪行相对等。按照法律规定，判处死刑已足以惩处该犯的罪行。"

怒火让文帝丧失了理智，此时跟他讲什么法治精神，他根本听不进去，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法理剖析，而是怒火的宣泄口。

任凭张释之再三耐心解释，文帝依旧不肯罢休。

直到最后，张释之向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有人偷盗宗庙器物，就要被灭族，那么，假如有一天，有狂妄愚蠢之辈从长陵(高祖陵)挖走了一抔土，请问陛下又该如何处置？"

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为了惩治犯罪，弘扬正义和公平，哪怕是在万恶的专制皇权社会，法律更多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但并不能就此抹杀它同样也有维持公平正义的法律属性。

哪怕它本身就是一部恶法，比如存在株连灭族等不人道条款，但在惩处犯罪时，也必须体现阶梯型审判，根据犯罪的不同程度，体现出差异性。如果不管罪行造成的结果差异，一律处以最重刑罚，那么，非但不能彰显法律的正义，更不能有效震慑犯罪。

面对张释之的诘问，文帝哑然，不得不暂时将此案搁置。后来，他将此事与薄太后商议，好在薄太后也是个明白事理之人，母子二人合计后，最终，还是认可了张释之的判决。

由于张释之的坚持，皇帝不得不放弃干预司法的企图，他守护了法律的尊严，赢得了世人的敬重。

这个世道从来不缺乏丑恶，官员贪墨渎法，强者欺凌弱者，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唯有逆来顺从，才能艰难地活下去。

但是，像张释之这样坚持依法办事的官员的存在，唤醒了绝望中的人们对公理和正义的最后一丝希望。不过，在皇权社会，想要保持独立的司法审判，几乎很难做到，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皇帝身上，

只是，能遇到像文帝这样懂得克制和内敛的皇帝，几乎与陨石砸在头上的概率差不多。

其实，文帝之所以收手，很大程度是迫于形势的不得已而为之，而并非出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自古以来，张释之常有，而汉文帝不常有。在戏剧舞台上，经常看到忠良蒙难、好人遭殃，但好在正义虽然迟到，却从未缺席，赖天子圣明，忠臣的冤屈得到昭雪，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种大欢喜的结局，大多只是戏剧的套路，是善良人们自我安慰的美好幻想罢了。真实的历史上，更多的是坚持正义的人未必有好的结局，坏人却逍遥终身。

所以，在传统民间故事中，像作为正义化身的包拯出场时，往往怀抱尚方宝剑。他需要最高皇权的加持，方能伸张正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当时人们对法律公平的期望，仍然寄托在皇帝身上。

但是，皇帝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对于这一点，张释之也心知肚明。多年后，文帝去世，太子刘启上位，他恐慌不已。他知道，司马门事件虽说时隔多年，但刘启心结依旧未释，必然不会放过他。

两难之间，张释之称病在家。但长期装病也不是个办法，问题还得面对，他也想过干脆辞职回家。反正老家家境也不差，就算一家子回去，也不至于饿肚子。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刘启心中的气肯定难以理顺，一旦自己离职后，成了一介布衣，恐怕下场会更凄惨。

算了，还是向刘启服软认个罪吧。但这样，岂不是自扇嘴巴，承认当初自己做错了？刘启能否放过自己还两说，但势必会招来士大夫的唾弃，多年坚守的道义，将彻底被踩在脚下。

如此，天下人又会怎么看他？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当年的种种做法，不过是沽名钓誉之举!

就在张释之两难之际，有个王生替他解了围。

王生，名字与籍贯不详，只知道他是研究黄老之学的读书人，年纪一大把，但不曾出仕。汉初朝野崇尚黄老思想，像王生这样的人，在朝野间很受推崇。

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朝廷征召王生入朝。

按照礼制，臣下上殿要脱去鞋子，仅穿袜子方能进入。古代的袜子，就是一双缝制的布套，套在脚上，然后用带子拴在脚踝骨上。

王生须发皆白，一袭布衣，步入大殿。

大殿之上，皆是峨冠博带的衮衮诸公，三公六卿分列两旁。

王生回过头来，看见了张释之，大剌剌将脚丫子一伸，说："我袜子带松了，帮我系一下。"

话音一落，大殿上一片哗然，这个老家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廷尉乃是朝廷重臣，岂能任他指使!

众人没料到的是，张释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跪下来，一丝不苟地将王生袜子带系好，然后站起来，回到自己的位置。一切非常自然，他没有生气，没有难堪，仿佛做了一件理所应当的平常事。

大殿上又是一阵骚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有之，惊讶得合不上嘴的有之，众人都感到很不可思议。

事后，有人看不下去了，埋怨王生："就算张廷尉脾气好，你也不能这样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让他跪下给你系袜子带呀!"

谁知王生哈哈一笑，说："你们懂什么？我这是在帮助张廷尉。"

看着他一脸不解，王生解释说：“我一个乡下糟老头子，折辱张廷尉图个啥？张廷尉是一代名臣，天下敬仰，我又不能帮他做点啥，因此，让他跪下为我系袜子带，是帮他树立敬老礼贤的美誉。”

群臣一听，恍然大悟，交口称赞王生做得不错，对张释之为人自然又敬重了三分。

实际原因，其实王生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说出来。

不妨想一想，他要是真为了帮张释之树立高大形象，大可在长安闹市中，让张释之当街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他系袜子带，那样岂不是远比庙堂之上传播更快？

王生是个聪慧人，早就看出了张释之目前的困境，与其说他在为张释之做宣传，还不如说在为张释之解围。王生在大殿上那一幕行为艺术，其实并非做给百官看，而是做给宫禁之中的刘启看。

一个新君即位之初，头等大事就是尽快树立威望，如果不想在朝野舆论间失分，就不会蠢到向张释之这样深得民望之人开刀!

王生鼓动张释之主动向刘启认个错，保证不会有事。张释之内心惴惴不安，但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进宫，向刘启认错。

果不其然，刘启大度地表示，过去的事了，提它作甚。

但实际上，刘启是个记仇的人，他内心依然迈不过那个坎儿，一年后，就把张释之撵出朝廷，打发到淮南国做国相去了。

没多久，张释之就在落寞中悄然离世。

有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张释之虽死，但他正直磊落的家风留了下来，他的儿子张挚(字长公)，跟父亲一样，特立独行，拒绝迎合权贵。不过，他的命运跟父亲差不多，在大夫任上，被免官回家。

官位可以丢，但信念不能丢，张挚直到死，也没再出来做官。或许他低个头，认个错，拐个弯，做个高官并不难。

但如果那样，他就不是张释之的儿子了。

## 晁错方案

文帝即位以来，提拔重用了一些人才，而且一度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然而，他做事缺乏魄力，用人很难做到有始有终，张苍、袁盎、张释之等曾深受倚重的臣子们，最终皆被疏远抛弃。

在那个时代，天下人都有错，但皇帝永远是绝对正确的。国有难，思良将，每当危机来临时，文帝总在叹息身边缺乏为国效力的人才，殊不知，世间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眼光和重视人才的魄力。

大汉建立以来，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匈奴人倚仗弯刀短弓，在帝国北疆恣意侵扰，但是，朝廷上下始终拿不出个有效的对策来。多年来，汉廷上下除了被动还击，对来去如风的匈奴人毫无办法，想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威胁，更无从谈起。

文帝来自北方代国，对匈奴的祸患感触尤为深刻，在代国那些日子，每日无不生活在匈奴人的阴影之下。对于匈奴人的残暴肆虐，他耳闻目睹了不少，一提起匈奴人，他就恨得牙痒痒。

但如何应对匈奴，乃是国之大事，不能感情用事，必须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才行。只是群臣们对匈奴主张不一，主和者有之，主战者有之，群议纷纷，莫衷一是。

鉴于大汉立国以来对匈作战胜少负多，多数人还是主张以和亲安抚为主，不过，也有人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提出不能对匈奴妥协，要做好随时与敌人战斗的准备。他指出，与匈奴的战斗关乎大汉生死存亡，绝不能对敌人保留丝毫幻想，不但要勇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直到赢得最后的胜利。

此人正是太子家令晁错。

按照汉朝制度，太子有十县为个人汤沐邑，该地区的税收归太子，作为日常开支用，而这项工作即由太子家令负责。与此相关的太子府库房、饮食等都由太子家令掌管。

太子家令秩千石，地位待遇相当于司农少府，是个肥缺。

按理，晁错只要管好太子的钱袋子，让太子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了，至于匈奴战事这类国防大事与他八竿子打不着，根本没必要蹚浑水。

这世间有一种人，有理想，有信念，位卑不敢忘忧国，晁错正是此类人，他的志向从来不在安心做一名太子家令。他不愿意关起门来，过属于自己的滋润日子，他追求的是大汉的长治久安，梦想立不世之功。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汉初以来，读书人研习的对象，或儒学，或黄老，然晁错则不然，他入门研究的是法家思想，专攻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

申不害、商鞅二人都曾主政一国，分别在韩、秦两国推行变革，以法治国，他们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影响极大。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天下显学，无外乎儒、墨、道、法四家，然而大多数都仅仅停留在学术理论阶段，真正用来治国，有过政治实践并取得成功的，仅法家一家而已。

秦奉行法家思想治国以来，采用严刑峻法，耕战一体，成效斐然，经过数辈人的打拼厮杀，终于一统天下。但成也法家、败也法家，最终不出十五年，秦王朝就土崩瓦解。

一个帝国的灭亡，固然是多方面原因所致。但世人直观印象中，秦的覆亡，用法家思想治国无疑是主因。因此，汉以来，相对于儒

家、道家大行其道，法家思想进入了沉寂期，像晁错这样依旧钻研法家思想的人，比较少见。

晁错口才非常好，加上博览群书，通晓经典，想谋个差事并不难。他先被任命为州郡文学掾，后来从地方调到长安，担任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秩百石，隶属于太常，负责整理收集典章制度，以备皇帝顾问。

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和秦末战乱，许多典籍散失殆尽，至文帝时，天下重新回归秩序，整理挖掘像《尚书》这类古籍事项被提上日程。只是，国家图书收藏里连只字片语都找不到了，朝廷里面已经无人知晓《尚书》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距离秦朝灭亡才不过数十年，还有一些秦时遗民逃过了劫难，活了下来。

书简竹帛可以被焚烧掉，但人的记忆是没法被抹掉的。当年，始皇帝的焚书令从咸阳传达到全国各地时，不少读书人家收藏的书简都被搜出来付之一炬。不过，好在上古书籍文辞简约，字数并不算多，有些记性好的人，愣是将整本书背了下来，储存在脑海中，靠着人工记忆保存了不少上古古书。

另外，秦法虽说严苛，但为了使文化薪火相传，有一些人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冒着被杀头灭族的危险，想方设法将一些古籍藏了起来。只是许多人历经多年战乱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藏书处，随着主人的消失，成为永久的秘密，永远消散于历史长河中。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个藏书人，侥幸躲过了战乱，幸运地活了下来，等到了天下重新恢复平静，汉朝建立后，又回到了故乡济南郡(治所东平陵县，今山东章丘市西)，他叫伏生。

当然这不是他的本名，秦汉之际，称读书人为某生，伏生相当于伏先生的意思。有种说法，伏生本名伏胜，但可信度有多高就不得而

知了，所以，我们还是称呼他为伏生好了。

伏生是秦朝时的博士，专研《尚书》，得知始皇帝下达焚书令后，他不忍心多年朝夕相伴的书简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便偷偷将它们藏于墙壁的夹层中。

天下乱起后，伏生也跟随众人亡命天涯。

好在楚汉之争不过短短四年，时间不算太长，伏生凭借记忆，在残垣断壁间找到了当年的藏书。可惜的是，数十篇已丢失，只找到二十九篇。

《尚书》是上古的档案汇编，是研究三代以来政治大事的第一手资料，古代社会保存档案资料非常不易，因此，它能穿越时空流传下来，其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汉朝建立后，儒家经典不断被搜集挖掘出来，经整理后，在社会上逐渐重新流传开来，只是《尚书》一直没有被发现。伏生让《尚书》重见天日，无疑是填补了儒家经典的一大空白。

只是，经历焚书事件和多年战火，《尚书》永远成了残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无法挽回的损失。伏生手中的这部《尚书》残卷，就了世上为数不多的遗珍孤篇了。

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像伏生这样的国宝学者，该请到长安来，神仙般供着才是。只是，伏生已年过九十，根本经不起舟车劳顿。现在是与时间赛跑的时候，必须趁着伏生健在，抓紧培养继承人才行。

文帝决定派人前往伏生处学习《尚书》，这份传承文化的重任落到晁错肩上，其中原委不言而明。一来晁错博览群书，文化功底深厚；二来身为太常掌故，整理搜集典籍本来就是职责分内之事。

然而，晁错的这趟公费学习并不顺利，他首先需要克服语言关。

伏生年迈，齿落殆尽，说话漏风，口齿不清，操着齐地方言，而晁错是中原人，说的是颍川方言，两人沟通本来就非常困难，更何况《尚书》记载的是上古文献，语言文字佶屈聱牙。所以，师生之间，往往是伏生气喘吁吁地说了半天，而晁错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后来改变授课方式，伏生先讲，再由他女儿担任翻译，转述给晁错。如此一来，晁错虽然听懂了一些，但由于双方方言差异，掌握得也不过十之六七，略通大意而已，实事求是地说，晁错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由于惠帝时，朝廷已经废除秦时以来的挟书律(即民间不得擅自藏书，违者灭族)，所以伏生《尚书》问世后，很快风靡齐鲁大地，许多儒学大学者皆以伏生《尚书》来教授学生。

在伏生门下求学者，除了晁错，还有济南郡本地人张生(名字不详，是一名博士)，和千乘郡(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欧阳生。

比起晁错，这二位学术研究精深，后来皆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对两汉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说张生，他后来将所学《尚书》传授给一位姓夏侯的都尉，夏侯都尉又传给族子(血缘关系较远的家族晚辈)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再传给族子夏侯胜，这一脉传承被称作大夏侯氏学。

夏侯胜又传给从子(堂侄)夏侯建，夏侯建自创门派，被称作小夏侯学。

再说欧阳生。欧阳生，名不详，字和伯，学成以后，传授给老乡倪宽(两人都是千乘郡之人)，倪宽后来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估计欧阳生早卒)，此后欧阳家代代相传，至曾孙欧阳高，开创欧阳学，显赫一时。

大小夏侯学与欧阳学，皆出自伏生《尚书》，由于在传播之始，文本是用汉以来的隶书书写，为了区别于先秦时的古文字(包括周秦籀文、秦小篆)，称之为今文尚书。

今文尚书在西汉之时，对学术界影响甚巨，但相对于张生和欧阳生这两位同门师兄弟，晁错在学术上的造诣逊色得多。不过，晁错的济南学习之旅，客观上对世人认知《尚书》的价值，以及今文尚书最终取得官方承认，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至于对晁错本身，此次学习似乎没产生多大效果，儒学典籍的学习，没有让他变得儒雅起来。相反，他的骨子里处处透露出耿直、倔强，甚至近乎于刻薄的秉性，为人处世爱较真、认死理，缺少圆融和变通，更像商鞅这类法家之士。

晁错的这种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合群，在官场上不受欢迎的人。比如，他和袁盎就很不对付，两人别说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是同处一室，都觉得对方多余。

同僚们往往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晁错远远看到袁盎，掉头就走，袁盎也一样，一看到晁错，就视若空气，根本懒得理睬。

要说两人有什么私人恩怨，那倒没有，只是政见和性格不合而已。就这样两个互相不大待见的人，谁也没料到，他们的一生，却犹如欢喜冤家一般，注定纠缠在一起。

不过，袁盎在官场上虽有起落，但总体上还是受到文帝重视，随着走马上任吴国国相，仕途得意，风光无限。

晁错本来志向不在学术研究，而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在官场上一直没有起色。他从伏生那里学成归来后，写了一份学习总结报告给文帝，文帝口头嘉勉一番后，给他授予了太子舍人(在宿卫太子府小官)、门大夫(负责给太子府看门)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官。估计考虑到晁错的学术水平还不错，后来文帝又升他为博士。

但晁错并不醉心于学术，他特别想让皇帝知道，他不是个甘心埋首简牍的老学究，而是胸怀济世安邦之志的大才。

博士一职，虽说是个装点门面用的虚衔，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提建议。

晁错打定主意后，决定亲自给皇帝写一份意见书，内容是关于皇太子教育方面的。毕竟，他曾担任太子舍人和门大夫，提这方面建议显得合情合理，不至于招皇帝反感。

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名叫《言太子知术数疏》，内容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太子才智超群，天赋过人，书读得够多了，驾驭、骑射等超绝出众，现在该给他补补刑名之术的课了。

所谓刑名之术就是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君王如何驾驭臣下之类的帝王之术。不难看出，虽然晁错学了《尚书》，但从内心推崇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

本来嘛，儒家仁义主张，作为舆论宣传说辞还可以，但到目前为止，从没有一个君王当过真，真拿儒家学说来治国。

文帝接到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后，感到很合胃口，觉得这样的人才，应该提拔到太子身边的关键岗位上去。当即下诏，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

晁错凭借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太子刘启的宠爱，成为太子身边的红人，两人成日形影不离。每有大事，晁错都在一旁，帮助刘启出谋划策，府内之人都称他为“智囊”。

晁错上任太子家令后，决定再接再厉，继续给皇帝提建议，这一次他的建议是关于国家对外大计方针的。大汉对外政策的焦点，毫无疑问就是匈奴。

晁错的对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这些年来，汉朝受够了匈奴的欺凌!自大汉建立以来，北部边疆就没安宁过，匈奴人或大举入侵，或小股滋扰，杀害边境军民，劫掠村镇乡邑，给汉朝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

长期以来，汉朝与匈奴作战不断受挫，匈奴人给大汉军民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大汉畏敌心理很严重。想要扭转目前局面，指望匈奴

人回心转意，与大汉和平相处，无疑是痴人说梦。

狼是改不了吃人的习惯的，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狠狠揍它，只有彻底打疼了它，它才会变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打赢匈奴，单凭蛮干肯定不行，必须讲究战略战术。首先，汉朝急需一场胜利，而且是压倒性胜利，唯有如此，才能鼓舞士气，彻底克服畏敌心理。

自吕后以来，匈奴人三次突破陇西，烧杀劫掠，那里的将士们士气低落，军中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丧失了必胜的信念。所以对匈奴作战，必须从陇西发动反击，唯有如此，才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晁错指出大方向后，又列出了胜敌之法。

为何与匈奴人作战，多是汉军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因素还是人，关键在于将领的素质。

陇西一带百姓常年受匈奴欺辱，所以很容易唤起斗志。陇西的士卒们久经战火，并非贪生怕死的怯战之辈，只是将领多是平庸之人，就算是一群狼，由一只羊做领队，也会变得涣散无力，靠这样的军队，想打胜仗，基本不可能。

现在必须做的，就是将能力强的将领提拔到关键岗位上去，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想要克敌制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占据有利地形，利用地理优势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强化军队训练，严肃军纪；

三、加强军队武器装备，提升士卒战斗力。

结合汉匈双方的优劣，晁错认为敌我各有所长。具体来说，匈奴

人最大优势在于马匹，匈奴马成长于草原大漠，那里自然环境恶劣，战马经受过雪灾、风暴、狼群等种种考验，它们能够在冰雪覆盖大地之后，用蹄子刨开积雪，寻找枯草充饥，常年游牧迁徙，等于时刻处在战斗状态。

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匈奴马极强的忍耐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军马匹多属于圈养，其战斗力以及耐力显然没法与匈奴马相提并论。

除了马匹优良外，匈奴军队战斗力之所以优于汉军，还与匈奴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由于匈奴人常年过着游牧迁徙生活，他们能够数日不下马，困了就在马背上睡觉。在作战时，可以在飞驰的马背上突然回身射击，其骑射技艺是汉军无法匹敌的。

不过，匈奴并非没有弱点，其生产工艺远远落后于汉地，武器和甲胄等作战装备远不如汉军。匈奴人身穿的基本是皮甲，常用武器是弯刀短弓，无论甲胄防护，还是弓箭射程，都远逊于汉军。

根据汉匈双方军队的优劣、作战地理条件对各自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制约。在丘陵山谷地区，汉军无法发挥优势，但在地势平坦的旷野两军对垒，无论军队人数还是装备，匈奴与汉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尤其是汉军强弩，匈奴人根本无力招架。

汉匈边境冲突中，匈奴人之所以屡屡得手，就是倚仗快马短弓，搞游击偷袭，且从不与汉军进行大规模的对垒阵地战，成功扬长避短，让汉朝军队疲于应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如何击败匈奴，晁错提出了一条很高明的计策——以胡制胡。

当时有数千义渠人，归降了汉朝。义渠人活跃在今天甘肃庆阳西南一带，主要以游牧为生，在战国时，还曾一度立国，后被秦所灭。

晁错认为，义渠人的生活习性与匈奴人非常相似，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熟悉匈奴的特点，将他们武装起来，配合汉军作战。

可以说，晁错的这份建议书，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生活习性、作战方式、地理环境以及提高战斗人员素养，扩大战争盟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可谓涵盖了方方面面，并从战略战术角度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主张，逻辑缜密，契合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这份建议书后世称为《言兵事疏》，这篇雄文，展示了晁错“智囊”美誉并非浪得虚名，就是从今天视角去看，也不由得为之拍案叫绝。

但奏疏递上去时，晁错内心还是隐隐有些不安，以他目前的身份，妄议军国大事，有点不合时宜。为了稳妥起见，在奏疏末尾，他特意加了一句《论语》上的话，“狂夫之言，请明主选择”。

意思是我就说了一些狂悖的话，陛下姑且看着办。

晁错满怀忐忑，皇帝如何处置，他心中没谱。

## 移民政策

上书不久后，晁错收到一个意外惊喜，文帝赐给他一份玺书(加盖皇帝玉玺的回信，以示庄重)。

皇帝对臣下回书，是一种特殊礼遇。晁错自然异常欣喜，从玺书字里行间，他敏锐察觉到，皇帝对他的建议还是蛮欣赏的，不过，话说得有些意味深长——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什么意思？

你晁错提这些建议没错，但朕要是听取采纳了，就有问题了!

这话听着有些矛盾，其实不然，文帝的意思很明了，就是晁错的主张固然很有见地，但是不合时宜。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文帝知道，以汉朝目前的家底，根本无力与匈奴开战。

战争从古到今，说白了，归根结底拼的就是消耗，开战容易，粮食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

晁错明白了，他主动进攻的策略被皇帝否决了。

不过，晁错没有灰心，决定再次给皇帝上书。既然皇帝不愿意与匈奴开战，那么，退而求其次，咱们积极防御。

在这篇名叫《守边劝农疏》的奏疏中，晁错提出为了防御匈奴人侵扰，必须加强边境国防建设，具体方法有两条：

一、移民实边；

二、备战屯粮。

攻守，是战略问题，但在战术层面，要想有所作为，须具备两大要素：人力和物资储备!

相对于匈奴，大汉无论在哪方面，皆拥有绝对优势。匈奴与汉的矛盾冲突，属于结构性矛盾，这种残酷竞争绝非朝夕之间能够解决的，必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必须在边疆地带加强移民，而且还要设法站得住脚，实现军民一体，为国戍边。

其实，移民实边策略早在秦朝时就曾实行过，可惜功败垂成，最后边民纷纷逃亡。究其原因，是因为秦廷将罪犯、商人等强制押送边境戍边，移民不过是惩罚手段，民间当然毫无积极性可言。

北方天气严寒，环境很差，大多数地方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蛮荒地区，不少人要么死在途中，要么由于水土不服，死在戍边地头。

待到秦朝崩溃，他们便一哄而散，各自逃亡，始皇帝开拓的河南地再次落入匈奴手中。

秦廷自始至终只懂靠高压手段，却没有任何奖励机制，很显然，这种移民政策一开始就注定会彻底失败。

晁错指出，匈奴人不种庄稼，衣食用度全靠牲畜，不像中原人那般套牢在土地上，他们来去如风，飘忽不定，逐水草而居，这就意味着，守边军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没法预测匈奴人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杀出来。

汉匈边境绵延万里，分兵把守局面，使汉军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给予匈奴致命一击。匈奴躲在暗处，汉军置于明处，信息上完全不对称，匈奴一旦窥察到某地兵力薄弱，就会发起攻击，从东部燕、代，中部上郡、北地，西部陇西，匈奴神出鬼没，汉军常常被搞得防不胜防、疲于应付。

以往遇到边境告急，朝廷方面若是派一支快速小分队驰援，难起作用。但若大规模调兵遣将，等援军抵达时，匈奴人早已逃之夭夭。

时间久了，有些地方的汉朝军民，实在不堪匈奴侵扰，而朝廷又无法及时支援，迫于无奈，为了自保，不惜与匈奴暗通款曲，甚至绝望之下有人干脆投降了匈奴。

种种此类事件，无疑是打击了边境军民的士气，进一步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匈奴打仗，基本没有任何有章可循的战术，你固守，他滋扰；你出击，他退却；你后撤，他又尾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汉军犹如跟魅影搏斗，有劲没处使，但又没法摆脱，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精神紧张，疲惫不堪。

汉军在边境筑造边塞戍所，分兵把守，可是规模太小，根本不起作用，搞不好还被匈奴一锅端了。要是规模较大，匈奴人是躲远了，但是长年累月仰赖内地供应补给，反而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负担。

另外，戍边军人定期换防制度，引发一个问题：当一批士兵刚摸透边境情况，就要撤防，换上一批新兵，又要从头开始。如此周而复始，边境将士一直处在摸索敌情状态。

想要改变当前局面，必须要让一大批人扎根边疆，就地垦荒，实现自给自足。

晁错认为，想要百姓安心戍边，就得让他们在当地安家落户，同时朝廷要给予优厚政策。比如只要愿意去边疆的犯人，可以减免刑期；良家百姓同意应募赴边，赐予爵位，免除赋税，给予衣食等生活用品补助。只有这样，才有人敢于冒险前往北境。

为了安排移民，让他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朝廷应在边境一带，选择有水源的要塞之地修筑城郭。诸城之间相互距离，不能离得太远，大概保持在不过一百五十步[1]即可，这样一旦出现敌情，大家可以相互救援，共同御敌。如此，既加强了边防力量，同时也缓解了朝廷远途供应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

这一次，文帝接到奏疏后，没有犹豫就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诏招募民众，移民边境。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抛弃故土，移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短期内在感情上肯定很难割舍，更何况要去的是一片充满生死考验的边塞之地。如果想要移民们在新移民点生根发芽，单靠政策导向和经济利诱还是不够的。

于是，晁错经过综合考量后，再一次上书文帝，进一步建议朝廷，在边塞移民点，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建立组织机制加强管理。

一个人到了陌生地方，少不了出现水土不服等疾病。还有，乍到异乡难免动思乡之情，产生孤苦无依之感。在移民队伍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和巫师，医生防止疾病，巫师给予精神抚慰，防止移民们由于疾病折磨或者思乡，而大规模逃亡，避免重蹈秦朝覆辙。

此外，朝廷必须对新移民点管理官员的选拔把好关，务必任命一

批勤政爱民的官吏，按照伍、里、连、邑等级建立基层组织，让移民们尽快熟悉新环境。在闲暇时，尽快着手组织移民加强军事训练，逐步形成战斗力，增强自保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所有的矛盾根源都是经济问题，吃饱穿暖是普罗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然而在古代社会，在绝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人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挣扎在生死线上。

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农耕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客观原因外，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还要承受沉重的赋税，以及黑商的盘剥。

在传统社会，按照职业，人们一般分为士农工商。在名义上，农民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士人，要高于商人。然而实际上，农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顶风冒雨，胼手胝足，倘若逢上好年景，或能混个肚子圆；如果遇到旱、涝、蝗等天灾，就会立刻破产，被逼得卖儿鬻女。

商人促进货物流通，互通有无，固然有推动社会经济繁荣的贡献，但是在生产效率很低的古代社会，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高利盘剥，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更有甚者，某些掌握了巨额财富的富商，结交王侯显贵，大搞权钱交易，影响力超过了一般官员。晁错认为，当今天子即位以来，社会稳定，没有大的灾害，但国家粮食储备却没有明显提高，这与商人的所作所为有莫大关系，这是很危险的事。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农民大量逃亡、土地荒芜、农业萧条。

如何扭转目前局面？晁错建议重农抑商，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农业的氛围，朝廷要通过政策性引导，用粮食作为调节社会的杠杆，鼓励民间积极给朝廷募集粮食，按照数量多寡授予爵位。

这样一来，有钱人必然用钱购买粮食，献给朝廷，以换取爵位；普通民众，卖粮得了钱，增加了货币收入；而朝廷可以趁机增加粮食

储备。国家有了粮食，反过来，就可以减免百姓赋税，减轻民众负担。

爵位，可以由皇帝随意授予，完全是无本生意。晁错这一招，盘活了粮食的有效流转，避免了商人大量囤积粮食，实在高明得很!

另外，只要民众将粮食运输到边境军营，就能得到爵位，送粮六百石赐爵上造(秦汉两朝二十级爵的第二级)，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位)，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级)。

那么，爵位有什么用呢？就是犯法后可以抵罪，免除责罚。

在专制皇权社会，因为法律太过严苛，民众想要不违法，几乎很难做到，一不小心就成了犯罪分子，家中有了爵位，就等于拥有了一张免罪符。因此，民间对爵位的需求量非常大。

百姓出粮，朝廷给爵，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晁错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回应，文帝不但接受了晁错的意见，而且下诏将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当年的土地税减半，返还给农民。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文帝决定率先垂范，亲自下地耕作，让皇后采桑养蚕。男耕女织，是农耕社会的最基本分工，皇帝和皇后带头劳动，激励民间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粮食储备。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二月十六日，文帝下诏，表明往后宗庙所需的粮食和祭服，要来自皇帝和皇后亲自耕织所出，并要将此事制度化。

很明显，这是作秀给天下人看。

不过，有些具有正面意义的事，即使是作秀，也值得肯定，毕竟上行下效，皇帝的姿态对营造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氛围还是很重要的。

文帝在晁错的谋划下，积极移民戍边，鼓励农业，提高国家粮食储备，国力也逐渐复苏。就在此时，北部边境传来坏消息，帝国边疆烽火再起，匈奴人又大举入侵了。

## 蚍蜉力量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人攻入北地郡朝那县(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西三十三里古城乡)要塞，北地郡都尉孙印死于混战之中。

匈奴一路烧杀掠夺，所过之处，犹如蝗虫过境，搜刮一空。百姓被掳为俘虏，牲畜成为战利品。匈奴人剑锋直指安定郡彭阳县(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

始皇帝时所建的回中宫(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也在此次大洗劫中被匈奴人焚烧为白地。

匈奴人的前锋斥候，一度已抵达甘泉宫。

在冬日凛冽的北风中，长安城内，似乎已能嗅到匈奴人的腥膻气。京城上下，陷入空前紧张的气氛之中。在这以前，虽然汉匈边境冲突时断时续，但像匈奴这样深入大汉腹地，自高祖兵败白登以来尚属首次。

匈奴之所以如此嚣张，除了仗着兵强马壮之外，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高人在背后给匈奴人出谋划策。

一切还要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济北王刘兴居发起的那场叛乱说起，虽说这次叛乱根本没形成气候，很快就被朝廷平息了。然而，由于刘兴居的意外搅局，让汉军错过了一次反击匈奴的机会。

当时，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战车和骑兵，前往高奴，准备攻打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实力不济，仓皇出塞，正当汉军准备追击时，刘

兴居的叛乱，打乱了计划，文帝只得命灌婴回师南下平叛。

汉匈之间的一场大战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匈奴人一看暂时无法捞到便宜，只得放弃南下，转而向西拓展，攻打月氏(读音月支)。月氏是一支活跃在今甘肃敦煌、祁连一带的游牧民族。面对强大的匈奴，他们哪里是对手？所以他们被迫离开肥美的祁连山牧场，放弃故园，一路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当年，冒顿单于曾被送到月氏做人质，做人质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如今，匈奴人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匈奴人鸠占鹊巢，驱逐了月氏人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向西扩张，楼兰(都城扜泥城，即今新疆若羌县东北罗布泊西岸楼兰古城)、乌孙(今中国新疆西部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部分区域，都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的赤谷城)、呼揭(亦作乌揭，主要活跃于今哈萨克斯坦斋桑湖至新疆阿尔泰山间额尔齐斯流域一带)等二十六个小国及部族，慑于匈奴兵威，纷纷投降。

一时间，匈奴势力范围东起大海，西至中亚，广袤万里的亚洲北方草原都成了匈奴人跃马扬鞭的牧场。

短短一年时间，匈奴实力急剧膨胀，冒顿单于有点飘飘然，又开始惦记起南方邻居来了。他以异常傲慢的口吻，给文帝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这样：

上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向大汉皇帝问好。皇帝曾提过汉匈和亲之事，本来两家已经谈妥，大家都很高兴，但遗憾的是，贵国边境官员侵扰和欺辱右贤王，右贤王一时头脑发热，没有跟我汇报，误信身边一些小人的挑拨谗言，与汉朝官吏发生冲突，致使匈奴与大汉的和平盟约破裂，我们双方亲密如兄弟般的友谊被破坏，这实在令人遗憾。为了释疑解惑，我特意派使者到贵国，不料使者却被无辜扣押，而大汉自此再也没有遣使来匈奴。

为了惩罚右贤王，我命他戴罪立功，去西边征讨收抚月氏。幸赖上天庇佑，剽悍的匈奴将士们一路向西，凡是反抗者一律杀死，投降者安抚。月氏、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国民众，皆已成为我匈奴的百姓，他们年轻力壮的弯弓之士俱为匈奴的战士。

现如今，北方已经安定，战士们养足了身子，喂肥了战马。

我觉得，为了年轻人可以无忧无虑快乐成长，老人们能够幸福美满安享晚年，汉匈两国是时候重叙友谊、缔造永久和平了。只是尚不知皇帝想法，故特意派人捎书给您，顺便献上骆驼一匹、战马两匹、驾车之马八匹，聊表心意。

皇帝如果不想匈奴太靠近汉朝边塞，为了表示我方诚意，我可以下令匈奴官民后退，与大汉边境保持一定距离。

顺便说一句，使者书信送到后，还望让它及时返回来。

这封书信当然非冒顿亲笔所书，极有可能出自投靠匈奴的汉地读书人之手，它将中国文字的微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字面看，言辞很客气，但在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傲慢、恐吓和蛮不讲理。

文帝接到书信后，就这封匈奴来信让大臣们讨论。

大臣们的意见很统一，目前匈奴风头正劲，如果此时两国轻启战端，很显然对汉朝不利。再说了，就算侥幸打赢了，夺得匈奴一些地盘，又有什么用？

匈奴人那些不毛之地，根本没法种庄稼，对中原人来说一文不

值，与其白白消耗人力财力，还不如应了冒顿和亲的提议。

文帝听后，想想觉得也对，遂于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回信：

皇帝向匈奴大单于问好。对于单于的提议，我很赞同，只是长期以来，汉朝一直遵守汉匈和约，将最好的物产慷慨馈赠匈奴，倒是匈奴经常背离我们兄弟般亲密的友谊。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单于也就不要过于责罚右贤王了。我只希望，单于往后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所言不虚。

作为礼尚往来，文帝在回信的同时，给冒顿赠送了许多锦绣衣服和黄金配饰等生活用品。

只是，文帝再没等到匈奴人的回信，没多久，从匈奴那边传来消息，冒顿单于死了。

冒顿，这位匈奴历史上最伟大的王，一生横跨秦汉两代，驰骋大漠草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他的名字一度成为汉朝君臣的梦魇。现在他死了，大家都觉得可以松口气了。

匈奴新单于是冒顿的儿子稽粥(jī　yù)，号老上单于，汉朝朝廷觉得应该趁着匈奴新老交替之际，抓住机遇，主动向匈奴示好，表示汉朝愿意再度与匈奴和亲。

文帝共有两个女儿，长女馆陶公主刘嫖下嫁开国功臣堂邑侯陈婴之孙陈午，次女(名字不详)下嫁周勃之子周胜之。

现在要与匈奴和亲，自然只好从诸侯宗亲中另觅他人了(当然，就算文帝还有女儿，他也舍不得让自己女儿远嫁塞外)。后来，选了一位翁主(诸侯王女儿称呼)，嫁给老上单于。

在帝制时代，女人的命运实属可怜，哪怕你是出身皇室宗亲，也

难逃沦为政治交易牺牲品的命运。可怜这位远嫁蛮荒的姑娘，在史书上，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在皇帝眼中，她与送给匈奴的财帛礼物没什么区别，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可以想象，她如同今天的你我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过梦想，也曾幻想过未来的幸福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女子，在史书中根本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载，没有离别的哀愁，没有对未来即将前往的蛮荒世界的惶恐，哪怕是一滴清泪的痕迹，都没有留在史书上。

或许，她也曾在夜半无人时面对残烛明月默默祈祷，但愿来世，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身在帝王家，命运注定从属于权力和政治，根本没有资格拒绝。

皇帝嫁女，自然不比寻常百姓人家，尤其是和亲这种政治联姻，更是关系到大汉帝国的颜面，自然要办得风风光光。

翁主出嫁，除了数量惊人的奇珍异宝、绫罗绸缎等作为嫁妆外，还有一支由宫女、宦官组成的陪嫁队伍，他们跟随翁主一起前往匈奴，伺候她的饮食起居，然后老死异国他乡。

和亲使团即将出发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在陪嫁随从中，竟然有人站出来说不，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前往匈奴，而且此人还是个宦官!

此人名叫中行说(读音同悦)，燕国人。

但是，在当时人眼中，一个小小宦官，算什么东西？跟猪狗牲畜没什么两样的货色，还敢跟朝廷谈条件，死也要死到匈奴去!

中行说最终还是被迫上路了，不过，他临走前撂下一句狠话：“你们强撵我去匈奴那种不是人待的地方，往后我也不会让你们过安分日子!”

一个小宦官能有多大能量？没人拿他的话当回事，这桩和亲过程中的小插曲，很快就被人们忘了。

有一种昆虫叫作蚍蜉(即白蚁)，没有人在乎它们的存在，世人常以蚍蜉比喻不自量力的妄人，然而它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韩非子云："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汉宫的那些日子里，中行说活得就跟一只小小的蚍蜉差不多，没有人拿他当人看。谁也没料到，就是这只小小的蚍蜉，在汉匈两国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搅得大汉王朝数十年不得安宁。

中行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韩非子的话绝非夸张之词。他心想：既然你们不拿我当人，我就让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知道一下，就算是一只小小蚍蜉，也能翻天!

中行说带着满腔怨恨，踏上了北上之路。

在宫廷多年，他深谙察言观色之道，懂得如何讨人欢心，何况匈奴人哪有中原人那么多弯弯肠子？中行说靠着在汉宫练就的一身逢迎本领，到了匈奴后，在单于庭左右逢源，没多久，就成了老上单于身边的红人，深得单于信任，对他可谓言听计从。

自踏入匈奴起，中行说一刻都没有忘记复仇。

要复仇，就不能让匈奴和汉朝过于亲近，必须设法让匈奴单于厌恶汉朝。

与汉朝相比，匈奴还处在半蒙昧状态，衣食生活皆仰赖牲畜，日子单调简朴，从中原出产的缯帛丝绵、饮食器具等精美生活用品，让匈奴人惊羡不已。

长期以来，匈奴上层阶级以用汉朝服饰为荣，如果有人穿上一件

锦衣，就会立刻招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

中行说觉得第一步，必须设法要匈奴克服对汉朝物产的羡慕心理，并要建立对汉优越感。

“咱们匈奴人口总数还比不上汉朝一郡人口，但却能与汉抗衡，其中缘由何在？就在于饮食起居，因地制宜，拥有本民族特色，不必受制于汉朝。匈奴人穿的旃衣(毛毡等制成的衣服)和皮袄结实耐用，吃的肉和乳制品营养丰富，反观汉朝人穿的丝绸衣物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匈奴人穿上它，骑马奔驰时，一不小心碰到灌木荆棘就会撕烂。匈奴人一旦迷恋上汉人的这些物产不能自拔，日子久了，受到侵蚀，改变自己生活习惯，受制于人，单于不得不小心啊!”中行说对老上单于循循善诱道。

“那依你看，怎么办才好？”老上单于有些迟疑地问道

“将汉朝送来的绢帛和谷物之类的东西，统统丢到垃圾堆，明白告诉汉人，这些东西对匈奴就是一堆废品，毫无用处，离开它们，匈奴人照样过得很好!”中行说斩钉截铁地回答。

老上单于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

他承认，中行说说得在理，但他做不到。

中行说只看到了衣食之类物品的实用价值，但他忽略了人类的另外一个重要需求，那就是审美!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的天性，中行说无力阻止匈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以后的日子里，汉地的衣食用品在草原上依然是紧俏品，深受匈奴人喜爱。

不过，中行说的这番见解倒让老上单于对他更加倚重。

匈奴人没有文字，处理日常生活事宜时，都靠约定俗成的习惯，日子过得很简单，无非就是狩猎和放牧。牲畜是匈奴人最重要的财

产，牛羊多寡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为了帮助匈奴人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中行说先从单于身边人入手，教他们一些简单会计和数学知识，以便于统计人口和牲畜数目。

在中原人看来，这不过是些再简单不过的东西，料想宦官出身的中行说也没有太多知识储备。但这些简单实用的知识对匈奴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匈奴人对中行说愈加佩服。

中行说久居汉地，非常了解中原人爱面子，凡事都要讲个名分，在朝堂上尤为如此，各种烦琐的礼仪制度，处处彰显等级差别，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脑袋掉地。

如今，他决定先好好嘲弄一下汉朝，先从气势上压过它。

汉朝和匈奴虽然冲突不断，不过两国君主之间还是少不了书信往来，毕竟无论是战是和，在地理上，双方是搬不走的邻居，要知己知彼，方能有的放矢，谋划对策。

汉朝朝廷写给匈奴单于的书信，一般都是写在一尺一寸长的木札上，书信开头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然后列举外交事宜以及赠送礼品清单，封泥后加盖皇帝宝玺。

中行说给单于出主意，要他再给汉朝朝廷回信时，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印章和封泥尺寸都放大，超过汉朝皇帝印玺规格，书信开头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再写上回赠礼物名单。

过度地虚张声势，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中行说知道，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匈奴人跟大汉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便用这种细节问题和傲慢态度设法恶心汉朝。

外交问题无小事，事关国家体面，汉朝朝廷自然也不甘示弱。

来而不往非礼也，汉朝方面了解匈奴风俗之人，大有人在。有位汉使出使匈奴期间，就拿匈奴人重青壮、轻老弱的风俗做文章。

“听说匈奴人轻贱老年人，是否有这回事啊？”他若无其事地问中行说。

乍听，使节是在了解邻国风俗民情，实际上可以听得出来，话语间不无嘲讽之意。

尊老爱幼，是文明社会的最基本体现，而你们匈奴连这一最基本的人伦素养都没有，就跟禽兽差不多了!

中行说是个聪明人，马上反驳道：“你们汉朝方面，年轻人被派往边疆戍边时，家里老人是否也是将家中最好的衣物和吃食拿出来，给他们带上？”

汉使不得不承认：“是的!”

“同样的道理，在匈奴，作战是头等大事，年迈体弱之人无法参加战斗，将最好的食物让给健壮的年轻人吃喝，让他们保护自己，这样一家人才能免遭灾祸，平安长久。怎么到你们口中，就变成了匈奴人轻贱老人了呢？”

汉使自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又问：“那么，请问匈奴人父子同处一室，父兄死，便继娶其妻妾，又是怎么回事呢？不知礼仪为何物，颠倒人伦，几近禽兽矣!”

这个问题就比较尖锐了，汉使似笑非笑地看着中行说，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出人意料的是，中行说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反而很从容地答道：“匈奴人不像汉人，有那么多繁缛虚文礼节，人人都活得简单纯朴，完全出自天性，饿了吃肉，渴了喝奶，闲暇之际，在草原上纵马奔驰，狩猎为乐。高兴时，大家聚在一起，纵酒欢歌，载歌载舞。就是君臣之间，也没有太多礼仪束缚，处理政务，犹如大脑指挥手臂，浑若一体，这是你们汉人不能体会到的。至于说，父兄死，子弟继娶之事，伦理是有些混乱，但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部族人口和财产的流失。你们中原人是严防伦理，没有继娶风俗，看上去一本正经，其实

完全是表面功夫，假正经而已。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权夺利，骨肉相残的事还少吗？”

中行说口才实在了得，他根本不给汉使任何反驳的机会，反问之后，又自问自答地说：“你们所谓的礼仪，无非是强调等级差别、尊卑贵贱而已，老百姓日常忙碌于田间地头，伺候桑麻稼穑，农闲时，又要给皇帝修宫殿、修城墙，一年到头搞得疲惫不堪，哪有工夫锻炼自我防卫能力？哪有匈奴人过得轻松自在？别以为你们能住上砖石垒砌的破屋子，佩戴着冠饰，装模作样，就高人一等。收起你那些喋喋不休的说辞吧，其实，你们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经济基础决定文明形态，在处于半蛮荒状态的大漠草原，人们奉行的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匈奴人的头脑意识中，根本没有仁孝礼让这样的文明观念。

客观地说，匈奴人轻视老弱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行说说得没错。但他偷换概念，将战争时特殊情况与风俗混为一谈，是典型的强词夺理。至于他贬低中原文明，美化匈奴陋习，更是不值得一驳。

中行说这种诡辩，当然难以说服人，引来汉使激烈的反驳。

屁股决定脑袋，身份决定立场，争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宾主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争议次数多了，中行说懒得浪费口舌，只要汉朝来使一张口，他就硬邦邦扔下一句话：“贵使不要再啰里啰唆了，你现在只需思考做好一件事就好了，那就是按时将汉朝最好的绢帛和粮食送到匈奴来，多余的话就没必要说了。如果胆敢作假，或者成色不好，那么，等到秋收之时，匈奴的战马就会将你们的庄稼踏为平地!”

作为生理残缺之人，宦官心理一般都极度扭曲，仇恨已经蒙蔽了中行说的心智，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复仇。只有复仇的快感，才能让他找到生存的价值。

一定要让汉朝君臣知道，就算我是一只卑微的蚍蜉，也要撼动大汉帝国这棵参天大树!

如果说中行说报复大汉的皇帝和群臣还情有可原，但他整日挑唆匈奴侵扰汉朝边境，使无数无辜百姓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就不能原谅了。

以身侍敌，祸害自己的母国，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可耻行径!但是，如果站在中行说的角度看，汉廷剥夺了他作为男人的权利和尊严不说，就连做奴才也做不成，毫不留情地将他扔到大漠，丢给匈奴人，既然汉廷如此无情无义，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他逆来顺受？

这就是历史的两难!

只是那些无辜百姓的冤屈又跟谁去说？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自从有了中行说这个狗头军师，匈奴人对汉朝的内情更加明了，老上单于掌握了汉朝上下一心求和、不愿开战的心理，对大汉的滋扰更加频繁。

和平不能靠乞求，一味地委曲求全，只能助长敌人的气焰。多年的忍让和苟且，文帝早已忍无可忍，那么就无须再忍了!

他下定决心，要跟匈奴来一个了断!

[1]　古人以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步”是一种长度单位，历来说法不一，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据《汉书·食货制》记载：“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编者注

# 第八章 寂寞英雄

## 持节云中

多年来，考虑到内政不稳、国疲民困，汉朝朝廷对匈奴的骚扰一直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于朝堂上的主战声，文帝一般都采取抑制态度。因为，大汉实在经不起战争，保持社会稳定，让民众休养生息，才是目前压倒一切的头号任务。

忍字当头一把刀，忍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但文帝接过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江山，除了选择忍，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年来，匈奴在边境线上不停地制造事端，他忍了；吴王刘濞等诸侯骄横跋扈，他忍了；朝堂上，功臣倚老卖老，把持朝政，他也忍了。

但如果就此认为，文帝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如今，匈奴人快要杀上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敌人的刀尖已快要插到胸口了，难道要束手就擒，将大汉江山拱手让人不成？

一道诏令从未央宫传出，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sù)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做好沿边诸郡防守，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做好出击匈奴的准备。

同时，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集结千辆兵车、十万骑兵，驻扎渭水北面，拱卫京城安危，防止匈奴人突袭长安。

宣布军事部署和人事任命后，文帝亲自到渭水大营劳军，整肃军纪，厚赏将士，并决定御驾亲征，出塞与匈奴决一死战。

皇帝亲征匈奴的消息传开，朝堂上炸了锅，引起轩然大波，群臣们纷纷站出来反对，表示天子不能轻易涉险。皇帝亲上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文帝长于代国，虽说对匈奴有所了解，但毕竟不像高祖那样身经百战，岂能凭一时血气之勇与敌搏命？

战场上刀剑无眼，谁也不能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当年高祖就是由于阵前中箭，最终死于箭伤。

只是，文帝已经铁了心，任群臣们费尽唇舌，百般劝谏，他根本听不进去。

皇帝油盐不进，这可如何是好？

好在有人聪明，想到有一个人的话，皇帝一定能听得进去，还得赶紧动员她出来劝阻，她便是薄太后!

老太后心疼儿子，文帝要亲征，她自然一百个不愿意。

文帝为人至孝，母亲出面发话，他只得作罢，便命张相如率董赤、栾布出征匈奴。

正当汉军集结完毕，开赴边境时，老上单于率领匈奴大军已经在塞内祸害了月余。在这段时间内，抢钱抢粮抢人，已经抢得差不多了，得知汉军大部队将至，他才不想做无谓的纠缠，满载战利品从容扬长而去。

等到张相如带领汉军赶到塞上时，连个匈奴人影子都没看到，大军在边塞附近草原上转了一大圈，只好原路返回。

匈奴人给汉朝朝廷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却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数万汉军劳师远征，没能斩杀敌人一兵一卒。遇到这样幽灵般的对手，汉廷上下非常郁闷，但又毫无办法。

不过，让文帝稍感欣慰的是，此次匈奴大举入侵，在萧关遭到驻地汉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尤其振奋人心的是，有两位新入伍的勇

士斩杀匈奴颇多，战绩斐然。

他们是一对堂兄弟，来自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静宁县西南)，兄长叫作李广，弟弟名叫李蔡。

说起来，李氏兄弟也并非一般布衣百姓，祖上可是大有来头。秦始皇发动统一六国之战时，在灭燕之战中，率领先锋军的是位名叫李信的少壮将军，他率领秦军率先抵达易水，迫使燕太子丹远逃辽东。李信穷追不舍，一路追击到衍水(今辽宁省太子河)，穷途末路的燕王喜使人逼杀太子丹，李信获其首级而归，一时名扬四海。

李广兄弟正是李信的后裔。李信本籍槐里县(今陕西省咸阳兴平东)，后来，李氏后人迁徙至成纪县。虽说家道中落，但李家的骑射传统世代传承不辍，在家庭熏陶之下，李广兄弟从小练就一身本领，特别是李广，箭术娴熟，加上臂力惊人，可以做到矢无虚发，一箭毙命。

得知朝廷为抵御匈奴颁发征兵令，兄弟二人便以良家子弟身份参军入伍。

何为良家子弟？就是出身清白，没有犯罪记录的家庭出身的孩子。

同样是参军，良家子弟与罪犯戍卒大不一样。罪犯戍卒是被强征，属于戴罪入伍，具有惩罚性质，而良家子弟入伍为主动参军，在以后战功提拔等方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李广因战场上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为中郎(秩比六百石，属于高级郎官)，李蔡也被提拔为郎官。

自此以后，李广常侍从皇帝身边，扈从出行。

外出总免不了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道路受阻，甚至在荒郊野外路遇野兽，但李广毫无惧色，当场将野兽格杀。

李广高超的武艺和过人的勇气，令文帝深为折服。有一次，文帝用惋惜的口气说：“你生在当下，实在有点可惜了，没遇到好时机，要是早一点，赶在高祖争夺天下之际，以你的本事，就算封万户侯，也不在话下啊!”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从来是英雄血染红了帝王们的皇图霸业，但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能成就勇士的英雄梦。

文帝这番话，表面上说给李广，实际上又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呢？

他明白，自己注定成不了与父亲并肩的伟大帝王。冥冥之中，宿命已成定数，纵然贵为天子，亦无法摆脱命运的枷锁，他在为英雄报国无门而叹息时，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无法为英雄提供驰骋舞台而伤神!

或许文帝自己也没料到，他一句无意间的感慨，却一语成谶，犹如魔咒梦魇，伴随了李广一生，令他终身无法摆脱。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足够广阔的天地，就看帝王的魄力和决断力了。比如困扰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文帝总是感叹，朝中缺乏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然而，人世间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伯乐。

有人就曾断言，即使当世有廉颇、李牧这样不世出的将才，皇帝也不会用他，为此，文帝还气恼了许久。

直到这次匈奴大举入侵之时，文帝又想起了此人，便将他找来，再次当面质问他：“冯唐，你倒是说说看，怎么知道我不会任用廉颇、李牧呢？”

冯唐担任的官职是中郎署长。

按照汉制，郎中分属车、户、骑将等，中郎高于郎中，分属五

官、左、右中郎将。未央宫、长乐宫及上林苑等皇家宫廷、离宫、园囿等俱设有郎署，供各级郎官更值宿卫之用，郎署负责人称作郎署长。

冯唐署理的是一处中郎署，故称为中郎署长。

冯唐祖父本是赵国人，曾在李牧手下效力，两人交往过密，对李牧的生平事迹颇为熟悉。

想当年，李牧遭人陷害，蒙冤而死后，赵国再无大将，秦人很快就灭了赵国。赵国亡国后，为了逃避秦人迫害，冯唐祖父和家人隐姓埋名，藏匿民间。

祖父死后，冯唐父亲携带家人远离赵国，举家迁居代地。在这以后的数年间，包括赵、代在内的河北地区，先后历经了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几乎沦为丘墟。为了给家人寻一个稳定的生活去处，待大汉建立后，冯家又一次搬家，这一次他们迁到了关中，落户安陵。

由于家庭渊源，可以说，冯唐自小就是听着廉颇、李牧的故事长大的，对他们的逸事可以说如数家珍。

汉初人才选拔制度还不太规范，基本由地方官员在辖区内考察举荐，考察内容主要两个方面：个人才能和品德。冯唐由于孝行被举荐为中郎署长。

在中郎署长任上一干就是好多年，由于常在皇帝身边侍从，冯唐对文帝性格比较了解。有一次，文帝乘车路过冯唐任职的郎署，冯唐在一旁侍候。文帝看冯唐年纪不小了(推断大概五六十岁了)，便和他拉家常："老人家老家是哪里呀？怎么这把年龄了，还在做郎官(郎官一般是贵家子弟晋升的跳板，多由年轻人出任)？"

冯唐一一如实回答。

文帝一听冯唐是赵人，又曾在代地生活过，顿时有了好感，毕竟他是在代国长大，那里相当于故乡，他乡逢故人，自然备感亲切。他

向冯唐打听一些代地的陈年旧事："想当年，我在代国时，尚食监(负责诸侯王膳食的官员)高祛经常向我提起赵将李齐，讲他在巨鹿之战时的英雄气概。到如今，每逢吃饭，还会想起往事，历历在目，老人家知道李齐此人吗？"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名将如云，至于李齐，不过是个不入流的人物罢了。冯唐当即回答说："比起赵国历史上的名将廉颇、李牧，李齐差远了。"

文帝感到好奇，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冯唐回道："我祖父曾在赵军中担任将领，与李牧关系很不错，我父亲曾在代国(秦末楚汉之时)担任过国相，与李齐共事，交往甚密。因有过这段渊源，我对他们的为人都比较了解。"

文帝一听，颇有些激动，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说："可惜啊，我没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大将之才，否则，我还会为匈奴所困扰吗？"

不料，冯唐却没有附和，反而淡淡地答道："请恕臣下直言，陛下就算手下有廉颇、李牧般人才，您也不会重用他们。"

一句话戳到了文帝的痛处，他没想到冯唐会这样当着众人面公开打自己脸，恼羞成怒之下，当场拂袖而去。

虽然文帝很气恼，但并不糊涂。

回到宫中，过了许久，待气慢慢消了，文帝又召见冯唐，用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你有什么话就不能私下跟我说吗？为何非要当众令我难堪，这不是存心羞辱我吗？"

冯唐听完，先向皇帝致歉，然后答道："我是个见识短浅之人，不懂得忌讳回避，没有很好地维护好陛下的颜面。"

等于直白告诉皇帝，我就是这性子，拐弯抹角、见风使舵那种事，我可干不了!

文帝见他是个直肠子，也就没太放在心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直到这次，君臣二人再次见面。

但文帝心结依旧，不肯承认自己不重用人才。

万方有过，朕躬无错，皇帝一般都是这德行!

但是文帝又不得不拉下面子，询问冯唐，因为边患越来越严重，自打张相如带领大军归来后，匈奴人又先后偷袭云中郡、辽东郡，顺道还祸害了代郡，数以万计的百姓或被杀，或被掳走，不计其数的牲畜被抢走。

边境消息不断传到长安，文帝食不甘味、寝不安床，他迫切需要一位廉颇、李牧式的将领，帮他扭转乾坤。

正所谓，漫说汉庭思李牧，未闻郎署遣冯唐。

冯唐依然是冯唐，文帝依然是文帝，只是双方心态有些不一样了。

面对皇帝的询问，冯唐心想，非常人才必须用非常方式对待。要想得到国士，就必须以国士待之；想要虎狼之师，就必须给他吃肉；想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帅，就必须给他绝对的权力和自由，这样才能放手一搏，建立非常功业。问题是陛下你能做到吗？

“我听说，在古时候，每逢大将出征，君主亲自跪下推将军的车毂，说：‘国门以内的事我决断，国门以外的事，由将军裁定。所有军队中封爵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先自行决定，待归来再奏报朝廷。’我曾亲耳听祖父谈过李牧的故事，他统率赵国大军驻扎边境时，在军队驻地，由军队出面，设置交易市场，租税收入供军队使用，称为军市。李牧将从军市征收的税金，自行用来犒赏部下，而赵王从来不过问，也不干预。赵王交给他的任务就一项，打仗必须取胜，其他的事一概不问。”

关于军市，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出现。不过，商鞅提倡耕战，打压商业，所以对军市一直持抑制态度。真正将军市发扬光大的，李牧当属第一人。军市既可以增加军队收入，又促进了驻地居民商品流通，可谓一举两得。

文帝没有插话，只是默默地听。

“正因为有了自主权，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充分发挥才智，李牧组建兵车一千三百辆，麾下精于骑射之士一万三千人，能够上阵杀敌的士兵有十万人。有了这支强大的军队，赵军才能北驱匈奴单于，大破东胡，消灭澹林(古代东北一支部族)，西抑强秦，南援韩魏。此时的赵国，犹如中原霸主，无人敢轻视。只可惜，后来赵王迁即位，听信宦官郭开的谗言，自毁长城，杀了李牧，赵国旋被秦人消灭，赵王迁自己也沦为秦人俘虏。”

这些往事，才过去不过数十年。冯唐虽说得风轻云淡，但文帝听来却是惊心动魄。

说完李牧旧事，冯唐话锋一转，说道：“我听说，云中郡郡守魏尚，亦效法李牧开军市，不但将税金全部用来犒赏士兵，还自掏腰包，每隔五日杀一次牛，款待宾客、军吏和身边之人，手下的人都乐于效死。就连匈奴人得知云中汉军将士上下齐心后，也不敢再轻易攻袭云中边塞。后来，有一次，匈奴入侵云中，结果被魏尚迎头痛击，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狼狈逃窜。魏尚手底下士卒们多数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不懂大道理，不熟悉法律，他们参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上阵杀敌，为国效力。然而，在报功时，因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就被治罪，他们的功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文帝一直不说话，只听冯唐讲述。

紧接着，冯唐话就有些尖锐了：“听说魏尚在上报军功时，因为比斩敌实际人数多报了六人，就被陛下下诏夺爵，判处入狱一年。臣下冒昧地认为，如此轻赏重罚，会寒了边关将士们的心。臣据此认为，陛下纵然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也不会重用。臣口无遮拦

说了这么多，请陛下治罪!”

文帝是个明白人，他明白如今匈奴大敌当前，在这节骨眼上必须稳住军心，做出重视人才的姿态来。

在谈话结束后，文帝当即就让冯唐带上皇帝符节前往云中郡，宣布赦免魏尚，官复原职。

经过此次谈话，文帝对冯唐刮目相看，任命他为车骑都尉，掌领中尉和郡国车士。

冯唐的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大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然而，在以后的七年中，冯唐基本处于被闲置状态，在平淡中消耗时光，毫无建树。直到文帝去世，才被调任为楚国国相，但是上任没多久，就被罢官了。

冯唐为何被罢官，原因不明，但很有可能是与楚王刘戊(楚元王刘交孙子)有关。

刘戊此君是个十足浑蛋，他还在当楚国太子时，父亲刘郢客让申公做他师傅，指导他读书。申公是何许人也？他可是当时大儒。早年曾与楚元王交游，共同求学，后来又陪刘郢客一起赴长安求学于浮丘伯，按辈分，差不多是刘戊爷爷辈了。

刘交与刘郢客父子二人好学尊儒，但万万没料到，后世出了个刘戊这样的混世魔王，他打小就不爱读书，特别憎恶父亲逼他读书。申公作为一代宗师，估计教导他严苛了一些，就被刘戊记恨心头。待他即位没多久，就罚申公去做苦役。申公一大把年纪，哪里受得了这罪？好在后来抽了个机会，逃离了楚国。

估计，冯唐的遭遇跟申公差不多。

在以后的时光中，冯唐闲居家中，淡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一天天消磨时光，直到年华不再，华发满头。

数十年后，朝廷下诏民间推荐人才，才记起冯唐来。只是此时的冯唐已是年过九十，垂垂老矣，难堪大用了。

# 快意人生

人生在世，最难的是按照自己的性子快意地活着。每个人总有一些人生信条，不同的是，有人可以变通，但有人则不然，为了自己信条，可以不惜以身涉险，冒着惹恼皇帝的风险。比如张释之、冯唐就这样，他们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文帝时代，是个不错的时代，也是个不幸的时代。

总体来说，国家保持了稳定，社会生产力在稳步地提高，平常老百姓暂时告别了秦末以来的战乱，日子虽然仍旧艰难，但至少不用再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帝一直保持着冷静头脑，抱定不折腾的精神，除了在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4年)冬季那场匈奴大规模入侵，他一度打算亲征外，对外基本保持守势，不主动挑事，也按住了朝堂上一些人不切实际的鼓噪。

比如文帝即位之初，大将军陈武就曾怂恿对南越、朝鲜动武，开疆拓土。陈武的理由也很充足，南越、朝鲜自秦一统天下后，就归属中华帝国，成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是，秦末大乱之时，两地趁机各自割据，自立门户。高祖成立大汉之初，碍于天下初定，无暇分身，腾不出手来，只得作罢。现在可不一样了，天下已定，海内皆仰承陛下恩泽，应该出兵讨伐，一统宇内才是。

其实，陈武的另外一层潜台词没有说破，文帝以外藩入主大统，想要立威，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自古以来，帝王将相一旦身处不利，为了平息纷扰，快速树立权威，往往会发动对外战争，以达到凝聚人心、转移视线的目的，这种手段从来都是屡试不爽。

说实在的，面对陈武的提议，很少有君王会经得住这样的诱惑，哪个皇帝不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呢？

况且，以大汉的体量，对付南越、朝鲜这样的边陲小国，还不是手到擒来？

好在文帝没有热血冲头，他果断拒绝了陈武的提议——

“当年先帝知道百姓已困疲至极，不能再加以驱使了，因此，没有考虑南越、朝鲜之事。先帝尚且如此，我岂敢再生妄念？现如今，匈奴年年入侵，边境百姓日子过得实在太凄苦，为了抵御外敌，父死子继，士卒们超限服役，无暇休养生息。为此，我常常彻夜难眠，倘若北部边境安定下来，老百姓能过上安分日子，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怎么还敢痴心妄想，另起刀兵之念呢？这事，你以后就别提了。”

战争就是个魔鬼盒子，开启容易，但是一旦打开，谁也无法保证它会发生什么。文帝的冷静理智，让大汉避免了卷入另外一场战争泥沼中。

仗是不打了，但帝国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赵佗在南天一隅公然称帝，朝廷总不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吧。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如果任由赵佗这样招摇下去，大汉天子的威严何在？

安抚四夷，手段无非有二，武力威慑和笼络羁縻。目前既然排除了动用武力的可能，剩下只有一个办法：外交解决。

文帝先派人到真定，修葺赵佗先人的墓地，按时祭祀赵佗祖先，并安排人手守护，以免再遭破坏。另外，赵佗在老家的同族亲人，均被委以官职，重金厚赏。

死者已矣，无知无觉，给死人脸上贴金，无非是做给活人看。

汉廷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做给赵佗看的。只是赵佗身在千里之外，路途遥远，音信杳然，难免以讹传讹，如何是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一名得力人手前往南越，对赵佗恩威并施，晓以利害，让他放弃称帝。但是环顾朝堂之上，又有谁能够担当起这份重任呢？

当时丞相陈平还健在，他对皇帝说，此事好办，有个现成人选。

文帝问：“谁？”

陈平说，陆贾在先帝时，曾出使南越，轻车熟路，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

文帝当即表示同意。

从高祖至文帝十多年间，陆贾一直半隐半仕，游刃于朝野之间，从来不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但从来没有远离高层政治。文帝继位之初，表面看周勃、陈平等人出了大力，风光无限，实则陆贾一直在幕后助推。

所谓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君子居高处，往往如临深渊。张良推辞高位，得以善终，而周勃设法踩着陈平往上爬，结果身陷囹圄，几乎性命不保。

陆贾是一位智者，知道人生成功，能力固然重要，但准确把握时机，懂得进退，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他的志向并不是在庙堂上挥斥方遒，而是在天下间合纵连横。他一直在静静等待时机。果不其然，朝廷的诏书到了，他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代表朝廷出使南越。

赴南越之路，陆贾多年前就走过，谈不上陌生，只是现在形势远比当初复杂多了。吕后末年那场失败的南征，使得大汉与南越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陆贾此次的南越之行，注定不轻松。

好在陆贾不辱使命，利用他出色的口才和外交才华，最终使赵佗主动放弃称帝，成功维护了大汉帝国的体面和尊严。自此以后，南越

王赵佗恢复春秋两季朝贺的礼仪，按时派人到长安朝见大汉皇帝。

然而，实际情况是，赵佗只有对汉廷上书时，守宗藩之礼，在其国内仍以天子自居，汉越之间的矛盾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而已，根本冲突依然未得到解决。

不管怎么说，陆贾的南越之行，为汉朝赢得了一个稳定的南部边境。文帝求稳的策略，还是发挥了效果，成功避免了大汉与匈奴和南越同时敌对的局面。

和平岁月是国家之幸事，但却是英雄的不幸。平淡的日子，消磨了英雄的意志，磨掉了壮士的棱角，让他们变得与平常庸人差不多。

秦崩、楚亡、汉兴，这些惊天巨变，才短短二十几个春秋，多少英雄事，早已成为陈迹往事，多少英雄骨，化为腐草流萤。

平庸的年代，是埋葬英雄的坟冢。

不过总有一些人不改本色，还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活着，比如栾布。

这些年，栾布先后在地方做过燕国国相，在朝廷被委任为将军，要论身份，他早脱离了草莽阶层，跻身于庙堂阶陛之间，却依然保留着快意恩仇的江湖习气，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从不藏着掖着。他公开对人讲：“一个人在潦倒落魄之时，没法做到忍辱负重，就算不上汉子，但志得意满后，还不能按照本性活出个人样来，也谈不上是个英雄好汉。”

栾布还是当初的栾布，只是社会大环境已今非昔比。

栾布只是个个例，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栾布一样，按照自己的性子去活。如今天下一统，比不得战国乱世，不能任你书剑飘零，恣意江湖。

功名利禄是身外物，唯有自由最难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是

每个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事。栾布活出了精彩人生，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人生有所得，就有所失。在这个世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交易的。

交上灵魂、尊严、自由，换来金钱、名利、地位。

哪怕坐在三公位置，与皇帝坐而论道，也有些线终究不敢逾越，有些话终究不敢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在庙堂言不由衷。

但栾布不一样，无论落魄失意，还是身居高位，他都有魄力，能担当，敢作敢为，活出了大家想活的模样，所以他成了神。栾布死后，燕赵一带百姓为他立社奉为神明，号称栾公社，香火不绝。

可惜的是，英雄如栾布，让世人铭记的光辉事迹还是在高祖时，他敢于站出来为彭越收尸，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与皇帝据理力争。此后，除了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他跟张相如出塞，在大草原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外，终老案牍之间，一事无成。

文帝时期，注定不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年代。

实际上，在平庸生活中消耗时光，最终沦为籍籍无名者的英雄，何止栾布一人？季布的人生遭际，与他同样相差无几。

文帝即位之时，季布人已不在长安，他从中郎将调到河东郡，担任郡守。季布的名气很大，朝野之间广为人知。文帝觉得让他屈居地方，实在有点委屈，想调他到长安，出任御史大夫。

季布接到皇帝诏令后，赶到京城，住进驿馆，等待皇帝召见。可是一来二去，等了一个多月，却仍然毫无动静，迟迟不见皇帝召见。

原来就在他调任期间，出现了一点意外。

文帝听到了一些关于季布的负面传闻，比如有人说，季布人是不错，就是脾气不太好，常常醉酒耍酒疯，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恐怕他很难与人共处，保不准会贻误大事。

文帝性格谦和，也缺少几分果断，做事用人常常优柔寡断，很难做到始终如一。听别人在耳边这么一说，他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有些犹豫了，最终打消了由季布出任御史大夫的主意。

只是人都来长安等了这么久，总得有个说法吧？

于是，文帝决定还是见见季布。

君臣二人见面后，寒暄了好一阵，只是文帝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客套话，绝口不提季布出任御史大夫一事。胡乱扯了一大堆后，文帝宣布会见结束，让季布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打道回府，重返河东，继续去做他的郡守。

千里迢迢，大老远从河东郡被召到长安，又在驿馆窝了一个月，难不成就是陪皇帝聊几句家常？这样的事，搁在谁身上都窝火。

季布心里很不爽。

换了一般官员，眼看即将到手的三公高位就这样失之交臂，纵然心中腹诽，但对皇帝的决定，又能如何？只好权当回京休假一月，然后回到自己一亩三分地，继续该干吗就干吗。

可惜，季布不是常人。

季布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面对高祖、吕后是如此，如今依然如此。

“臣在河东任上，也没干出什么出色业绩，无故蒙陛下召见，定是有人利用虚名欺骗您。我在京城白白耗了一个月，啥事没干，如今又被遣回，想必又有人在陛下面前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称赞就召臣入京，又因一人毁谤就送臣出京。我个人的毁誉得失倒没什么，只是这

事传出去，恐怕有损陛下圣誉。”

话虽然说得委婉，但句句都戳中文帝心窝，季布这是在说自己为君做事摇摆，没有个人定见，单凭别人三言两语，就受人摆布。

文帝听后一脸尴尬，坐在那里，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半晌后，他才讪讪说道：“河东犹如朕的膀臂和大腿，实在太重要了，特意召见你，就是想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

这样的理由，说出来恐怕文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季布也不想再与皇帝辩论。

这场谈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回到河东任上，季布继续做他的太守。后来，他听到一件事，皇后哥哥窦长君与一个名叫曹丘的家伙交情挺不错。

曹丘，楚人，能说会道，整日周旋于权贵之间，如鱼得水，据说他与宦官赵谈关系密切。靠着逢迎权贵，组建了一个超级大的权力关系网，从中获得了大量好处。

此事本与季布毫无关系，但他认为，窦长君是谦谦君子，绝对是为曹丘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决不能眼看着好人吃亏上当而坐视不理。

虽说在官场多年，但季布依然不改嫉恶如仇的英雄本色。

不行，这事必须要管，他特意给窦长君捎去一封信，希望他远离曹丘这种巧言令色之徒。

窦长君收到信不久，曹丘也到了。他央求窦长君，写一封介绍信，将他引荐给季布。

窦长君说，拉倒吧，季将军不喜欢你，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

曹丘缠住不放，窦长君经不住他软磨硬泡，没法子，只得答应。

曹丘揣好信，匆匆上路了。

走在半道上，曹丘先让人将介绍信送到季布府上。

季布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这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当下打定主意，等曹丘一上门，就好好羞辱他一番。

一场唇舌之争，看来无可避免了。

但没承想，待到曹丘上门后，事情的发展却峰回路转，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自曹丘进门后，季布就一脸冷漠，没拿正眼看他。

吃了闭门羹后，曹丘却满不在乎，对主人的冷脸视而不见，远远冲着季布深深一揖，不待他开口，就说道："将军是楚人，我也是楚人，算起来，咱们也是同乡，在楚国民间流行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可知这句话为何传播如此之广？那是由于我到处宣传的缘故，如今宾客登门，没料到却遭到您的疏远，这恐怕不是足下应有的待客之道吧。"

季布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声誉，听曹丘这么一说，自然没法再板着脸了，一肚子气也消去了一半。

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却被曹丘三言两语化解。通过一番攀谈，宾主相谈甚欢，季布觉得曹丘这家伙也不像传说中那样差劲嘛，便挽留他多住些日子再走。

他乡闻楚音，已是难得，更兼曹丘口吐莲花，说得季布心花怒放，两人越说越投机。曹丘在季布府上一住就是几个月。

分别之际，季布又给曹丘送了许多厚礼。

秦汉之际，侠客义士重诺轻生者多矣，然季布名冠天下，多与曹丘的宣扬有关。

世人一般习惯了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只是，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岂能以简单的好坏优劣来分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君子小人，抑或公卿白衣，所求者无非名利而已。真正不为名利所动者，犹如木石一般，恐怕也没有做事的动力了，更遑论正义还是罪恶。

赵谈和季布，看似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其实都需要曹丘这样的中间人，去做一些他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事。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名利二字存在，都需要曹丘这样的信息传播者。

季布信诺守义、急公好义的事迹，感染了不少人。他的弟弟季心，估计受了兄长的熏陶，也是个侠肝义胆之人，常常急人所急，为人抱打不平。有次，估计是为了仗义助困，季心杀了人，在家乡待不下去了，跑路到吴地。

恰好袁盎在吴国担任国相，收留了他，他才躲过了一劫。

季心侠义之举感召了不少人，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榜样，有不少人效法他，为弱者伸张正义。

此后江湖上流传着一个传说，有困难，找季心，他就在你我身边。有时候，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都出现了季心行侠仗义的事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季心肯定不会分身术，事情的真相是，许多季心的追随者也打着他的名号到处活动，宣扬他的名声。到最后，都分不清孰真孰假了。

## 问卜长安

在帝国时代，皇家子嗣繁盛与否，从来就不仅仅是皇帝的家事，

更关系到王朝命运。所以，历史上各朝各代帝王家，无不将壮大宗室、繁衍子孙，作为头等大事。

文帝一生奉行节俭，后宫规模并不大，儿女也不多，还有不少早夭了，能够健康活下来的儿子，唯有刘启、刘武、刘参、刘揖四人。四个皇子中，属刘揖最受疼爱。

幼子受宠，也是人之常情。

刘揖被封为梁王。他非常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文帝对这个小儿子也寄予厚望。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发生了一场意外，刘揖从马上摔下来，不治身亡。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文帝造成了很大打击，很长时间内，他都沉浸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

梁王刘揖之死，也对另外一人造成了致命一击，他便是梁王太傅贾谊。刘揖死后，贾谊整日以泪洗面，愧疚、自责、哀伤，一齐涌上心头，久久难以释怀。一年后，贾谊撒手人寰，追随刘揖而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对刘揖的这份真挚感情，令人动容。然而，他的死，并非仅为痛失一位好学的学生这么简单。师生情谊再深厚，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不至于哀伤丧命。

刘揖的死只是一个诱因，贾谊真正的死因，是对现实的失望、对理想的绝望。

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殉葬。

贾谊临终前，忆起历历往事，愁肠百结，饮恨而终。只是又有谁知，他也曾是一名明朗的洛阳少年，也曾胸怀天下，志在家国，只可惜他错生时代，终究难逃宿命，在最美好的年华中辞别了人世。

洛阳，曾经的东周都城，有着数百年历史沉淀，这里人文荟萃，

英杰辈出。虽说大汉成立以来，洛阳不再是帝国的都城，但依然文化昌盛，天下瞩目，贾谊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贾谊从小就聪慧过人，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声名在外，为坊间所称道。

不久，他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此人姓吴，名不详，人称吴公。说起这位吴公，可是大有来头，他曾一度师从大秦丞相李斯学习律法，对法家思想有过深入研究。

吴公当时的身份是河南郡(原秦三川郡，高祖二年改为河南郡，治雒阳县，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郡守。他非常赏识贾谊的才华，将其召入门下，亲自授业。

这一年，贾谊刚年满十八岁。

一名无名小子，乍然之间受到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的赏识，是何等荣幸？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固然取决于勤奋努力，但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他的生活圈子。

成功是靠汗水拼搏而来，这话没错，只是当你还在挥洒汗水奔跑时，有人已经乘车上路了。

结识吴公，无疑是让贾谊搭上了快车。

且不说贾谊从吴公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增长了多少见识，只从平台来说，吴公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高层权力世界的门。

不久以后，吴公因在法律方面的造诣被朝廷征召为廷尉。贾谊与吴公分别后，又师从淮南国相张苍，没错，就是后来成为大汉丞相的那位。

有了这样过硬的人脉资源，贾谊想不发迹都难。

果然，吴公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向朝廷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年少得志，贾谊意气风发，揖别洛阳，一路向西。

长安，我来了，此行我只带两样东西，才华和梦想。唯有理想与年华不可辜负，汉家宫阙下，应有我实现抱负的舞台。

年轻人有激情是好事，但往往由于涉世未深，头脑过于简单，以为饱读诗书就掌握了真理，可以粪土王侯了。只是，诗书上圣人只会讲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只会告诫修身养性、如何做一名谦谦君子，但从不会讲权力场的凶险与肮脏。

实际上，此时的长安，刚刚经历过一场权力搏杀。作为失败者一方，吕氏家族几乎被悉数杀戮，胜利者一方，功臣们全都已经上座，虎视眈眈，准备新一轮的政治分赃，基本上没有多余位置分给外人。

虽然，未央宫大殿皇帝宝座上，文帝已就座。

但庙堂上那些老臣们，从内心中并没有将这位来自北方边陲的年轻人当回事。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长安。

一对年轻人见面了，这一年，文帝二十三岁，贾谊二十二岁。

由于贾谊的博学，加上有廷尉吴公推荐，朝廷授贾谊为博士。博士嘛，就是点缀物，没有任何实权，不过是供皇帝闲暇时咨询的闲差而已。对于这样的任命，正忙着在权力桌上大快朵颐的功臣们并不介意，乐得给新任的廷尉卖个顺水人情。

初到长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想要有所作为，除了熟悉朝堂上的显贵外，还要了解京城舆情，贾谊觉得很有必要到市井中去了解一番。

朝臣中与贾谊关系比较要好的要属中大夫宋忠，两人在一起话题广泛，上至圣贤治国之道，下至长安街头八卦，无所不谈。

按照汉朝休假制度，朝廷公职人员，每隔五天准许休假一天，在家洗浴休息，称为洗沐。

一天，恰好赶上洗沐，两人闲暇无事，一起结伴外出。当时刚下过雨，天空如洗，街上行人稀少。

贾谊提议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在朝堂，便在卜者、医师之间。我来长安已有些时日，朝堂上衮衮诸公都认识得差不多了，对他们的才学和人品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何不趁着今日有空，去瞅瞅长安的卜者，说不定会有新收获。”

小医治人，大医医国。天道观天，人道问卜。

上古之时，医巫不分家，医者和卜者往往集于一身，掌握天机之人，往往要么是君主，要么是卿相。

伏羲、黄帝、周文王等上古圣君本身就善卜。卜巫大成之书《易》之三传《连山》《归藏》《周易》，据传就是分别出自伏羲、黄帝、周文王。

商周之际，占卜之风尤甚，无论战事、政务、游猎，只要是大事，事先都要占卜，希望从冥冥之中得到神明的启示。

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前夕就曾问卜。作为小邦周，发起对大邑商之战，心里终究没底，犹豫不决之下，决定问卜。幸赖吕公望捣碎龟甲，坚定了他伐商的决心。

连个人生死和王朝兴亡命运都交付于卜者之手。上古之时，卜者掌握着神谕的解释权，说其一言兴邦、一言亡国，毫不为过。从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权重之大。

至春秋战国，周道陵迟，天子衰微，诸侯更替，士人崛起，医卜星象等本属于上层秘不示人的知识开始下沉，一些精于占卜之士，或归于山林，或隐于市井。

不过，利用世人求名求利之心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也是大有人在，于是人们对卜者的看法也渐渐变了。

卜者不再是高高在上掌握破解神谕密码的圣君，也不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智慧化身，而是被视为不入流之辈，为社会所轻视。既然如此，贾谊和宋忠两位士大夫为何还要屈尊，去请教一位市井卜者呢？

原来在长安东市出了一位占卜高人，此人名叫司马季主，楚国人。

待贾谊和宋忠二人同车赶到司马季主卜馆时，正值司马季主给三四名弟子讲课。

两人在旁边细听，只听得司马季主讲的都是天地起源、日月运行、阴阳吉凶等非常玄妙的东西。一听就知道此人了不得，绝非坊间方术之士可比。

贾谊和宋忠上前施礼，司马季主回礼完毕后，让弟子们给他们二人安排个坐席，然后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讲课，洋洋洒洒，逻辑严密，足足讲了大半天。

二人为司马季主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谈吐所折服，敬仰之意油然而生，在旁边恭恭敬敬地坐着聆听。

司马季主阅人无数，自贾谊和宋忠进门起，从二人衣着和言谈举止就看出，他们非富即贵，绝非市井斗升百姓，不过，他并不急着点破。

倒是贾谊和宋忠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司马季主讲完课后，便率先发话了：“观先生相貌，听先生谈吐，作为晚辈，我二人深为折服，您实在是我二人生平所未见之高士。只是恕我们愚钝，实在不明白，像您这样的高人，为何要沦落到如此地步，从事如此低贱卑微的职业？”

没想到，司马季主既没有被两人充满了惋惜语气的话语所感动，

更没有流露出一丝羞愧与难堪，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犹如被侏儒优伶的滑稽表演逗乐一般，搞得贾谊和宋忠莫名其妙。

司马季主笑了半晌才停下来，反问道：“两位看上去是很明白事理之人，却为何说出这样没有见识的话来？我倒想听听，你们所认为的贤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你们认为高尚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又是如何认为我就是卑下污浊之人呢？”

衡量人的标准数以万计，但归纳起来其实就一条——成王败寇。居高位、发大财，身份、地位、财富成为检视是否成功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标准，这种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贾谊和宋忠也未能免俗。

在他们看来，以司马季主的学识和见解，本该跻身于庙堂，峨冠博带，指点江山才对，为何却自甘沦落，流落市井，靠给凡夫愚妇卜吉凶度日呢？

“高官侯爵是每个有才华的人所追求的，处在高位的自然是成功人士，而像先生这样卜筮之人，靠编造虚幻梦想、假借鬼神之意取悦世人，骗人钱财，自然是卑污低下，为人所不齿。”

两人直言快语，没有遮遮掩掩。

司马季主淡淡地说道：“二位安坐，且听我细讲，真正称职正直的人，为官做事，多以诤言规劝君王，如果劝谏多次，君主依然听不进去，便自动引退。这样的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称赞或批评，都不会左右其看法，他们亦不会在乎对方感受，只要对百姓有利就行。真正的贤能之人，不会去霸占不胜任的职位，不会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利益，面对心术不正、品行不端之人，哪怕他身居要职，也不屑于去奉迎讨好。他们对个人得失看得开，淡看荣华富贵，不以一时荣辱而迷失自我。但是，如今朝堂之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

面对司马季主的反问，贾谊和宋忠一时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司马季主看二人窘状，冷冷说道：“你们嘴里所称道的那些人，

如果以此来对照要求，恐怕都应感到羞愧才是。你看看现在朝廷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在没上位之前，一个个低眉顺眼、奉迎上司、结党营私，打击正人君子，靠着沽名钓誉，邀功受宠，一旦攫取高位，就利用公器，牟取私利，歪曲皇帝法令，大耍官威，夺民众财物，整日挥霍公帑，吃喝玩乐，沉湎于犬马声色，简直就是一帮身披官服、手里没拿武器的强盗，就是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是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你们又凭什么认为他们就是成功人士，是道德高尚的贤者，是引领社会发展的航标？”

贾、宋二人本来都是能言善辩之人，但面对司马季主的反诘，一时间感到词穷，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倒不是纯粹口才和语言技巧问题，此时，纵然苏秦张仪重生，任他们巧舌如簧，也不得不承认司马季主说的是事实，根本无法反驳。

或许，司马季主根本就没打算辩论，径自继续说道：“现如今，朝堂上那些高官显贵们，对地方上盗贼横行的情况无力制止，对四夷对我大汉不宾服的局面束手无策，奸邪之徒充斥朝野无法斥退，国库被虚耗，听之任之，不能整饬，民间庄稼歉收无力调节。针对这些乱象，他们若有才能不去做，是不忠；如果没有本事，却只是靠着送钱和拉关系忝居高位，阻碍有德有才者升迁，这就是尸位素餐，是无耻!

“如果因为有人占据了高位，就认为他是贤能之人，实在荒谬至极，难道没听过鸱枭(猫头鹰，古人认为是不祥之鸟)也能和凤凰一起飞翔吗？兰芷(一种香草，常比喻君子)和芎□(一种名贵药材)被遗弃在荒野，蒿萧(比喻小人)却长得茂密旺盛，如今，正人君子(暗指自己)被逼隐退，还不是拜庙堂上衮衮诸公所赐？”

司马季主等于把话挑明了，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身居要职无所事事，我之所以走投无路，沦落如斯，还不是你们的缘故？你们现在反过来奚落我？

贾、宋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开始为刚才的失言感到懊恼。

司马季主不想再纠结这个话题，开始谈起卜者来。

“伏羲创立八卦，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然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效法文王，按照八卦行事，从而大破吴国，最终称霸天下。卜者通过他们的言行教化感染着芸芸众生，使鬼神得到供奉，使臣子忠心侍君，使子女孝顺奉亲，使父亲疼爱养育子女。问卜者出于感激之情，给几十枚，乃至百十来小钱，这不是很正常吗？由于占卜师的话，病人或许痊愈，垂死之人或许得以复生，惹祸之人或许灾祸得以免除，嫁女娶媳妇者或许得以生养，这种贡献岂止值几个小钱？卜者所得到的与他们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成正比!”

请注意，司马季主一再强调“或许”，意在说明，卜者的预测不见得百分百准确，占卜的作用不在于预测的准确度。事实上，世上也从来不会有先知之人。

人们之所以热衷问卜，是源于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恐惧和疑惑。

君臣猜忌、家庭生隙、仕途莫测、身体健康、家族繁衍等困惑，无不困扰着凡夫俗子，在迷茫时刻，他们急需一个心灵导师指点迷津，安抚焦躁不安的心。

如此，占卜师便应运而生。

面对芸芸众生繁杂的疑惑、千奇百怪的求助，岂是单靠江湖骗人伎俩就能应付得了的？需要对人情世故有着全面把控，非大智慧不可。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真正做好事的人，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

在司马季主看来，卜者正是这样一群人，不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卜者都耐心体贴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让他们对未来不至于绝望，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卜者为大汉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要背负江湖骗子的恶名，受到主流社会的轻视，这实在不公平。

司马季主继续说道："卜者提供的是精神产品，无须占地储蓄，也不要用车搬运，没有占有任何社会资源，而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世间提供服务的行当多了去了，怎么单单诘难卜者呢？天有不足，故星辰移向西北；地不足东南，就用海为池(据《淮南子》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日月尚有盈亏圆缺，就是圣王贤君的大道，也是忽存忽亡，而你们为何单单要求卜者的预测必须真实有效？"

卜者之所以为人所诟病，无非是预测的事不准确。但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曾完美，岂能唯独苛求卜者呢？

司马季主又以说客为例，道："说客为了说服游说对象，经常夸大其词，动辄引经据典，夸饰上古圣王的事迹，其实大多数根本经不起推敲。但为了打动君王，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非如此不可，大家也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同样道理，卜者为了给问卜者释疑解惑，怎能单靠片言只语，就让他们恍然大悟？自然免不了说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话。总之一句话，良驹不可能与笨驴同拉一辆车，凤凰难与麻雀为群。君子常身居下位，就是不愿招人瞩目。他们暗中观察世道人情，默默做顺天应人的事，不在乎地位和虚名。像你们这样不了解实情，就草率乱下结论，哪里晓得长者的大道呢？"

不难看出，司马季主绝非一个简单的卜卦之人，他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却隐居市井的智者。他轻视权贵，甘愿淡泊名利，观点做派与老庄思想不谋而合，不消说，他是一位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从他的言谈可以看出，他对当今朝廷那些掌权者的不满。

司马季主虽混迹民间，对朝堂上情况却看得一清二楚。

反观朝廷中有些人水平不咋地，却能占据高位，日常期间，他们无意于国计民生，只知一心追名逐利。

更令人生厌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而趾高气扬，优越感十足。

司马季主的一番话，戳中了贾谊和宋忠的心事，尤其是贾谊，年轻人汲汲于功名，优越感致使心态膨胀，他现在需要一盆冷水，让头脑冷静一下。

贾谊和宋忠被司马季主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站起来，勉强行礼后，满怀沮丧和失落地走出了卜馆，再无心思逛街，一头扎进车里往回走。

一路上，两人闷声无语，谁也不说话，心情很压抑，犹如巨石压在心头，几乎喘不过气来。

三天后，两人再次在皇宫大殿外相逢。宋忠特意将贾谊拉到一旁，避开众人，若有所思地感慨说："司马季主说得没错，懂得大道之人安若泰山，地位越高越危险啊，占卜之人纵然算卦不准确，也不见得被追讨卦钱吧？但立足庙堂，侍君之侧，出谋划策万一不到位，恐怕往后就难有容身之地了。唉，咱们哪有资格对卜者说三道四呢？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吧。"

一语成谶，多年后，宋忠奉命出使匈奴，结果出师不利，半道而返，最终落了个罢官判罪的下场。

而贾谊本人，也很快被逐出了长安。

其中原因，诚如司马季主所言，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与他的道德才能根本没关系。贾谊哪里知道，当时占据高位之人，哪里是什么贤德之人？多是嫉贤妒能之辈，他不知道，在不经意间，他已经得罪了不少人。

昔为海上鸥，今为笼中鸟。一朝罹尘网，其身不由我。

长安，就是一张权力的天罗地网，一旦沾上，根本逃脱不出去。

个中缘由，一句话，贾谊吃亏就吃在他太年轻了。

## 遭谤去国

贾谊年少气盛，事业心强，自打入京以来，觉得自己站在帝国的中央舞台，想撸起袖子，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所以司马季主那套不当出头鸟，隐姓埋名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他。

就算长安水很深，也要到中流去击水。如果不积极进取，一心做缩头乌龟怎么能行？

纵然司马季主说得对，但并不适合我，咱们还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你且在市井卜卦吉凶，劝化匹夫愚妇好了，我嘛，还是驰骋庙堂为上。

年轻人好胜心太强，想处处露脸出风头。

贾谊所担任的博士一职，就是为皇帝提供咨询意见。每当皇帝有诏令就相关事宜征询时，在场的许多耄耋宿儒都三缄其口，唯独贾谊一一对答得头头是道，引得众人频频点头称是。

一袭白衣，身形纤瘦，立在一帮糟老头子中间，二十几岁的贾谊显得非常抢眼，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没多久，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虽说也是个位高却没有实权的虚职，但年纪轻轻的贾谊，作为一名没有任何根基的政治素人，一下子被抬到如此高位，立刻在长安官场引来一片骚动。

羡慕者有之，嫉妒不满者更是大有人在。

要知道，多少人就是熬白了头发，也未必能爬到这样的位子。

贾谊的出现，给暮气沉沉的朝堂带来了一股清流，文帝感到非常欣喜，对他寄予厚望。

即位以来，文帝环顾朝堂之上，皆是一帮功臣，而自己从代国带来的几个人又不堪大用。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君王，周围却都是一帮跟他父辈相当的老臣，年轻的文帝处处谨慎，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冲突。

不过，文帝不甘心就这样永远活在老臣们的阴影之下，他想要有所作为，想培养属于自己的团队，他不想整日面对一帮皓首银须的老人。死气沉沉的朝堂之上，迫切需要青春激昂的面孔，来搅活这摊死水。

跟自己年龄相仿，有才华、有见识、有魄力的贾谊适时地出现，使得文帝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年轻的君臣二人在一起，一下子有了许多共同话题。

大汉建国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但由于开国之时，缺乏开创性的架构大师，帝国所有的制度几乎都照搬秦朝那一套。如果说在高祖时期这是不得已的权变之举，那么，现在是时候做出变革，草创大汉自己的制度规范了。

秦制固然具有划时代的巨大进步意义，但秦兴有赖于它，秦亡也有赖于它。秦制犹如一贴带毒的虎狼药，想要终结乱世，非得以毒攻毒，下猛药不可，然而它自带的毒素，也会侵蚀帝国肌体的健康，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变革，那么，大汉迟早会走上秦朝覆亡的老路。

高祖君臣目睹了大秦帝国的崩溃，自大汉建立后，时时以秦为鉴，萧何、曹参、陈平等历任相国都提倡与民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

与此同时，总结秦朝灭亡原因，以免大汉重蹈覆辙，是帝国成立以来的一项重大课题，只是，汉初群臣多出身草莽，根本无力完成这一重任。虽说，陆贾也曾写《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内外原因，然而，也是浅尝辄止，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缺乏系统性剖析。

于是，这一重任落在了贾谊身上。

毕竟，历史性回顾总结不能一代代拖下去，趁着秦汉兴亡的见证者还有不少人健在，必须完成这一重大工程。

此时陆贾与贾谊同僚，两人同为太中大夫，肯定有所交流，陆贾对年轻的贾谊必定有一定的启发。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梳理、修改、总结，三篇鸿篇巨制横空出世，对秦的灭亡做了全面回顾，名曰《过秦论》。

《过秦论》向上追溯至秦孝公，指出商鞅变法给秦带来的巨变，后经过六代国君的励精图治，才得以最终灭周室，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继而，回顾秦始皇在继承历代先君基础上，开创了空前强大的大秦帝国，深刻剖析了其为政之得失。笔锋一转，指出始皇帝死后，秦二世没有很好把握纠正秦政弊端的历史机遇，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将帝国推向了不归路，至秦王子婴时，已无力回天。

秦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军力、财物、人才等，陈胜吴广之辈与之相比，犹如蚂蚁与大象搏斗。但就是一只小小的蚂蚁，愣是将大秦这头巨无霸怪兽掀翻在地了。

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之灭亡，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对施政方针做出因时制宜的调整。国家进入和平状态后，还一味执行战时那一套高压政策，不懂得恩威并施、张弛有度，最终吞噬了自己。

亡秦者，非陈胜吴广，亦非刘项二人，恰是始皇父子。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而如今，大汉如果不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重新走上亡秦的老路绝非危言耸听。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总结秦朝得失，最终目的还是避免前朝犯过的错误，更好地走好当下的路。

那么，该怎么办？

必须从现在开始，对那些承袭于秦朝的制度加以甄别，在历法、服色、制度、法律、官职、礼乐等诸方面进行全面变革。

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具有超乎常人的才智和超前的洞察力，对他们来说，年龄、资历、经验这些衡量

一个人的参数统统失效，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平常人，又岂能以常人而度之？

事实证明，贾谊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拥有与年龄不相称的远见卓识，对国家当前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内政外交方面，他的主张大致如下：

一是大汉在制度上对前朝继承过多，而没有确立自己的制度，与秦的区隔不彻底，新朝开创性不足；

二是当前法律过于严苛，对前秦暴法应该加以选择性摒弃；

三是诸侯日渐坐大，已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建议削弱诸侯势力；

四是匈奴已然成为大汉主要敌人，妥协和忍让绝非长久之计，要逐步分化瓦解匈奴；

五是经济上，要重农抑商，加强国家储蓄。

围绕以上观点，贾谊先后向文帝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论积贮疏》等奏疏，无不针砭时弊，切合实际。

改革变法从来就不是温情脉脉的词汇，有变革就意味着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更何况触动权势地位乎!

权力高位坐久了，就习惯性地视为理所当然，容不得别人染指。

经历过失去权力痛苦煎熬的人，当侥幸失而复得后，对权力的迷恋会更加疯狂到变态地步。

不幸的是，贾谊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人。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人，在吕后当政时期，几乎全都

靠边站，被踢出了权力的核心圈。权力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一旦拥有后，时间一长，就会离不开它。权力带来的美妙感觉，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很难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后，老臣们是如何在煎熬中度过那些时光的。

好不容易熬死了吕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岂能愿意再失去一回？

他们这些人，为了权力，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比如周勃，为了坐上右丞相宝座，不惜踩着陈平肩膀上位。

人在权力场，相互倾轧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诛灭诸吕过程中，我们可是冒着灭族的风险，好不容易才夺回失去的荣华富贵。没想到，冷不丁，不知从什么角落冒出一个毛头小子来，整天不是在皇帝耳边叽叽喳喳鼓噪个不停，就是在朝堂上指指点点，老臣们自然很不爽。

当年我们追随高祖征战时，你还在娘胎之中呢，哪里轮到你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

更让老臣们隐隐不安的是，文帝对贾谊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潜在的威胁。

年轻天子这是要撇开老臣们，扶持自己的班底人马。

果然，没多久，皇帝提议，任命贾谊做公卿。顿时，朝堂上一片哗然。

此前，皇帝虽然暂时搁置了贾谊要求变革制度的建议，但却采纳了在京的列侯必须动身前往自己封地的意见。

老臣们感觉到了，皇帝这是要卸磨杀驴，拿咱们开刀呀。不行，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不信咱们还斗不过一个毛头小子!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老家伙们都是刀口舔血过来之人，啥场面没见过，岂能甘愿让贾谊爬到自己头上去？哪怕挤到咱们圈里都不行，不然咱们老脸往哪里搁!

说干就干，老家伙聚在一起密谋一番后，联合起来，向文帝施压：

“这个来自洛阳的年轻人，学识浅陋，没啥本事不说，野心倒不小，一心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乱七八糟，陛下可不能受他蒙蔽啊!”

在老臣们的威胁下，文帝招架不住了。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根本斗不过这帮老家伙，没法子，只得选择妥协和退缩。

老臣们轻松战胜了皇帝，赢得了胜利。

贾谊为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沦为皇帝和权臣斗争的牺牲品。

两个年轻人，一君一臣，在二十几岁的美好年华，尝试了人生的绚丽，也品尝到了失败的苦涩。

通过此事，文帝明白了即使贵为天子，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贾谊也懂得了，在政坛上，仅靠才华、勇气、理想，远远不够。

然而，一切都晚了。

长安是待不下去了，那么，离得远远的，前往遥远的南方，去长沙国吧，朕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蹊跷的是，在贾谊遭到排挤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尤其是廷尉吴公和御史大夫张苍集体失声，这就值得玩味了。

如果说，一般朝臣不敢表态支持贾谊，或是畏惧功臣集团的庞大势力，或对贾谊锋芒过于外露心怀不满，这不难理解。

但吴公和张苍实在不应该，吴公是贾谊的伯乐，张苍与贾谊有师生之谊，关系匪浅。而且他们官位显赫，吴公掌握帝国司法系统，张苍掌握帝国监察系统，这两人要是联合起来力挺贾谊，估计任何人都要考量一下其背后的能量。

可惜的是，他们自始至终，一直保持沉默。

或许他们本身都是刚从地方调到中央，资源有限，贸然与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对着干，很容易引发朝廷官僚集团内部的撕裂，刚刚平息了吕氏之乱的大汉王朝，实在经不起新的动荡。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让贾谊远离朝廷，是平息这场纷争的唯一途径。

以张苍低调为人的个性，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

这样解释，的确合理，也说得通。

不过，历史的真相或许未必是这样。

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张苍默许周勃、灌婴、张相如这些人排挤贾谊，甚至支持他们的行动。

背后的奥妙是，贾谊和张苍虽然有过师生之谊，但两人的关系或许并不融洽，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政治主张相背，可以说是截然对立。

张苍是从秦朝的旧时代过来的人，他目睹了秦末大动乱，又经历了吕氏和刘氏的权力之争，对于政治纷争和国家动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他感触太深了。

他的为政理念，其实与萧何、曹参等基本相差无几，就是尽量不折腾，让国家休养生息，让千疮百孔的社会面貌得到疗愈，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所以，他反对改变大汉的德性，坚持汉继承于秦，属性为水德，不同意改变历法、服色等，总之，最好现在啥都别乱动，一切顺其自

然最好。久病之人，经不得乱翻身，让他静卧休养就好，国家也是如此。

试想，一旦文帝公开支持贾谊的一系列变革主张，势必引起新的政治纷争，满朝官员都将无法置身其外。纵观历朝变革，无论成败，莫不是在经历血雨腥风之后，惨烈收场。

如果真如此，大汉王朝恐怕就要风雨飘摇了。

或许，正是张苍的沉默，成了压垮贾谊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多久，朝廷宣布贾谊即日调出长安，赴长沙国做太傅，距离他出入长安，还不到两年时间。

来时壮志踌躇，去时失魂落魄。

经过这番宦海沉浮，那个意气风发的洛阳少年消失了，贾谊变得意志消沉，满怀惆怅。

长沙国，治临湘县(今湖南省长沙市)，户二万五千，人口十二三万，为大汉开国以来仅存的异姓诸侯。长沙国国力弱小，历任长沙王多数短命，短短二十几年，已历五世，此时长沙王为吴差(吴芮玄孙)。

长沙国地处南方，下辖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的小部分土地，地势较低，气候多雨、潮湿、闷热，许多地区还处于未开化的蛮荒状态。

贾谊长期生活在北方，骤然间去到这样一个陌生地区，难免产生只身投荒的感觉，内心的悲怆可想而知。

一路走，满怀伤感，心怀对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忧惧，一种强烈的不祥感涌上心头，贾谊觉得此行是一条不归路，他是没法活着回来了。

# 第九章 残酷真相

## 时空对话

贾谊仓皇辞别帝京，临行前，他回望宫阙，不由得悲从中来，一时万念俱灭，心如死灰。一路南下，离长安越远，他的心情愈加沉郁。

不久前，他还在庙堂之上睥睨王侯，指点江山，与天子对答自如，不料一夕之间就从云端坠落，跌入尘埃，远贬长沙。

时耶命耶!奈何奈何!

失落、无助、悲观，一齐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或许，走出长安那一瞬间，他想起了司马季主的忠告，可是一切皆为时晚矣!

贾谊一下子老了许多，感到眼前一切黯然失色，他的世界只剩下黑白两色，嘴里尝到的唯有无尽的苦涩。

世人皆云读史明心，其实未必。

贾谊写过《过秦论》雄文三篇，对历史往事必然了然于胸，简帛之上前圣列贤陈迹，堪堪可读。然而，当大难临身时，未必还能坦荡自如。

远的不说，春秋战国以降，圣哲如孔孟、老庄，多谋如伍子胥、孙膑，善战如廉颇、李牧，受倚重如商鞅、吴起，居位高如孟尝、春申，哪一个的人生不是大起大落，甚至九死一生？哪一个的命运不是曲折跌宕，背影凄凉不忍卒视？

当步入长安的那一刻，他就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怪只怪他的起点太高，步伐太顺，一切来得太快，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站到了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名师赏识，仕途顺畅，皇帝器重，贾谊在短短两年间经历的这些事，估计有些人一辈子都未必能遇到，他有些眩晕，陶醉其中，来不及沉淀。

年轻人容易热血冲动，将事情想得理所当然，然而政治向来是残酷无情的，容不下丝毫的浪漫情怀。

贾谊是个幸运儿，但遗憾的是，他的人生缺乏一种体验——挫折。

一个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注定走不了太远。

挫折可以磨炼人的心性和意志，使人变得更加坚韧和从容。

可惜的是，挫折教育近乎空白的贾谊，恃才傲物，为人做事过于生硬，难免给人留下目中无人的印象。

关于贾谊被疏远的原因，在《风俗通义》中记载着另外一个版本。贾谊与邓通同为太中大夫，在工作中少不了有所交集，但是他看不起邓通，言语间经常讥讽邓通，而且是当着朝廷大臣的面冷嘲热讽。

邓通是何许人？是文帝的枕边宠臣。他的身份满朝文武官员谁人不知？旁人巴结都来不及，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贾谊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当众让邓通下不了台，这分明是官场大忌，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

一个凭才华为国分忧，另一个以色事君，各安本分就好，但是贾谊非要跟邓通过不去，那就休怪邓通不讲情义!

惹不起丞相申屠嘉，难不成还怕你贾谊不成？邓通在文帝枕边吹一阵轻风，贾谊就被吹出了长安。

贾谊一路哀怨，步履踉跄，从关中南下，越往南，气候愈加潮

湿，他的心情也愈加阴郁。

一日，一条大河拦路，一问方知是湘水。

湘水，古属楚国，它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而且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河流，荆楚文化的一大半都是这条河流孕育的。楚辞中许多瑰丽的诗篇，都在吟诵湘水。

《湘君》如是，《湘夫人》亦如是。

这些辞藻华丽、情感幽怨的诗篇，都出自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

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和理想主义者。

屈原的自身经历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他才华横溢，情操高洁，怀揣“美政”理想，志在力挽狂澜，扶楚国大厦之将倾。然而，楚怀王父子昏聩愚蠢，被一群宵小包围，耽于安乐，不思进取，至死执迷不悟!

屈原犹如一团烈焰，划过楚国黑暗夜空，他希望燃烧自我，点亮无尽的黑幕，唤醒昏睡的君王。

然而，一切都是无用的，他很快被无边无尽的黑暗吞噬。

黑暗的世界是容不得光明的，一切归于沉寂，悄然无声。

屈原分明听见了秦人自函谷关向东而来的铁蹄声，似乎已看到郢都殿苑间长满荆棘，阶陛之上麋鹿游嬉。

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屈原被放逐，他一路流浪，然犹不甘心，曾问卜于太卜郑詹尹，只是大势已定，虽鬼神亦难以更改，问卜又有何意义？

理想已灭，残喘于世间又有什么意义？

罢了，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借一江清流濯吾心，宁愿以身殉葬理想而去，亦不愿苟活于此污浊世界。

于是，屈子自沉于汨罗，已百余年矣。

面对同一江清流，贾谊不禁生出感慨：君在百年前，我在百年后，虽时空相隔，然我们的命运又是何其相似!

他站在湘江边，形只影单，面容憔悴，身形枯槁。俯瞰江流，看着水面上倒映出的人影，他都有点分不清是屈子还是自己。

同病相怜之下，贾谊面临江风，挥毫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字里行间看似表达了对屈原生不逢时的惋惜，实则字字都是对自己命运不公的哀叹。

跨越时空的对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贾谊唯有将墨痕未干的文稿投于湘水。屈原是绝望之下自沉汨罗江，但此时贾谊尚不想投身于湘水，并非简单的缺乏勇气，而是对未来，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毕竟当今天子不是昏聩的楚怀王，自己的人生尚未到完全绝望的地步。心情虽然很差，但既来之则安之，到临湘上任后，贾谊虽身在长沙，却时刻系长安。

贾谊被放逐后，长安的庙堂并没有平静下来，周勃等人在排挤走贾谊后，并没有得意许久，很快，君相矛盾爆发了。

文帝无法容忍周勃的跋扈，不甘长期受制于人，很快借故将其下狱。周勃差点命丧囹圄，多亏薄太后出手搭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帝国宰相下狱，朝野震动，虽远处长沙，贾谊也得知了。

政敌倒霉，贾谊并没有弹冠相庆，更没有投井下石，反而上书文帝，他提出，周勃这样身居高位者，纵然有罪，也要维护必需的人格尊严，切不要随意折辱(周勃在狱中，估计没少吃苦头)。因为他们的颜面，也事关朝廷的体面，就算是罪当死，也要让他们选择自尽，死

也要死得有尊严，不能无休止地羞辱。

这就是一个人的胸襟!

贾谊的上书，让文帝颇为触动。此后，若有大臣犯罪，他多选择让他们自裁，罕有弃市街头之举。

但如果就此以为贾谊要推动帝国法制逐步走向文明，使得刑法体系更加人性化，那是高看他了。因为他的本意是要让刑法体现等级差异，公卿大臣就算犯罪，在惩处时也要与普通平头百姓有所区别，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一般人不一样，就是死，也有一种优越感。

请记住，贾谊的人性化建议中，并不包括底层官僚，更别说农夫和百工这些社会劳苦大众。客观地说，贾谊的建议，本身就是在制造一种不平等。

萧何、周勃等人即使贵为宰相，一旦送到牢中，被狱吏呵斥辱骂，各种刑罚招呼，一样少不了，与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区别。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周勃，在牢中，也被狱吏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贾谊却提倡让一部分人犯罪后，享受“特殊待遇”，实在有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然而，又不得不承认，这是文明的进步，哪怕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样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因为，在帝国时代，法律本身就是荒谬的存在，比如文帝时代允许私人铸币。

货币发行权本来属于国家权力，保证货币的权威性，是维护市场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在历朝历代，私自铸造钱币都是杀头的重罪。然而，在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朝廷下令废除盗铸钱令，容许民间铸钱。

铸币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一般穷人根本没能力铸币，能够铸币的人，多是像邓通和刘濞这类非富即贵之人。

这些人为了将利益最大化，设法大量掺假。

所铸钱币往往成色不足，质量得不到保证。像邓通铸造的邓氏钱，在市面上流通极广，这些合法假币，坑了千千万万底层百姓。

马克思说过，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有人不惜铤而走险，甘愿走向绞刑架。更何况开动钱范铸钱，是个一本万利的活儿!

如此泛滥下去，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致使通货膨胀，物价不稳，民众在利益驱使之下，都会一窝蜂地去伐薪烧炭，凿山取铜，再无心思侍候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田地荒芜、农业萧条、粮食减产，帝国将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真到了那一步，恐怕离国家崩溃也不远了。

任何王朝的覆灭，看似各有不同理由，实则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秩序无以为继，引发社会动荡。

贾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上书建议取缔私人铸币，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但是却遭到了文帝的拒绝。

至于理由，文帝没有任何解释，贾谊也没再提，这又是为何？

其中缘由就在于，大家都是明白人，点到为止即可。

作为一名放逐之臣，贾谊虽有一颗谋国尽忠的拳拳之心，然如今，处境尴尬，既然皇帝听不进去，再多言无益。

那么，放任私人铸币，其中利弊，文帝是否真的不晓得？八成不见得，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早在秦统一天下之初，始皇帝灭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统一了天下货币。

商周以来，钱币形制、材质不一，有银、锡、珠、玉、龟、贝等，大小轻重悬殊，天下归一后，钱币当然也要定于一。

秦廷宣布，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为二十两，以秦制半两钱为下币，二者并行，作为流通货币。

不过，一切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秦统一不过短短十五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在辽阔的帝国境内实现货币统一，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如今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样是秦半两，有的重达二十七克，有的却不足五六克。

大汉建立以来，货币制度基本保持秦制，实行黄金和半两钱并行的制度。黄金多用来进行大额交易，诸侯进贡、朝廷赏赐、宗庙献祭以及与周边四夷往来亦多用黄金。

诸侯有义务每年向朝廷进贡一定的黄金，作为献祭宗庙之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赋税)。要是缺斤少两或者成色不足，轻则受到斥责，重则剥夺封爵。

汉初半两钱，远不如秦半两钱重，质量大幅缩水，变薄变轻，犹如榆荚，被称为榆荚半两。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米至一石万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为了抑制物价，打击通货膨胀，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吕后改革币制，由朝廷统一铸造钱币，铸造“八铢八两钱”，钱币的铸文依然为半两。同时颁布盗铸钱令，严禁民间私自铸币。

只是好景不长，短短四年后，吕氏与刘氏争权，波及经济领域，再度搞得货币贬值，新铸“五分钱”，其重仅为秦半两的五分之一。如此大幅度的货币贬值，无疑要从民间大肆敛财，再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文帝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能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废除旧币制，反其道而行之。

于是，他废除了盗铸钱令，改革币制，废除“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钱”，同时容许民间铸币。

文帝的目的就是减少来自朝廷的垄断，刺激民间经济的复苏，做到藏富于民。

至于，出于宠信的原因让邓通铸钱，为了安抚刘濞许他开矿铸币，实则与文帝的经济政策并行不悖。

不过，由此引发的新的货币危机是文帝所没想到的，或者说他也考虑到了，但无力扭转。

这场货币战争还要进行下去，直到数十年后，才会出现转机，只是无论贾谊还是文帝，都已看不到了。

在长沙国的日子，贾谊的心情一直很差，情绪就犹如南方的天气，少有明媚阳光，多为阴晦低沉。但是，命运觉得贾谊还不够倒霉，又再次捉弄了一下他。

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有一日，贾谊在室内闲坐，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鵩鸟，径自落到了贾谊的座位上。

鵩鸟大概就是猫头鹰一类的鸟类。猫头鹰作为一种益鸟，如今家喻户晓，可是在那个时候，它还被民间视作不祥之鸟，谁家房舍周围树木上有猫头鹰栖息鸣叫，就会被认为这家人要倒霉，甚至会死人。

这类看法，可谓源远流长，秦汉之际就盛行。贾谊看到鵩鸟入室，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了，心情差到了极点，无以排解，便写了一篇《鵩鸟赋》。

文章中，他问鵩鸟，我现在已经混得如此狼狈，未来怎么办，吉凶又如何，还望你指条明路。

鸟儿自然难解人意，呆呆注视了一会儿，便自顾自飞走了，抛下贾谊独自一人，在那里怅然徘徊了许久。

好在否极泰来，一年后，贾谊接到长安那边传来的消息，皇帝召他回京。

## 言外之意

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贾谊激动不已，内心熄灭已久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

贾谊回到京城，发现长安依旧，只是物是人非。

当年诋毁排挤他的人，灌婴已死，周勃罢相回封地，但朝廷中功臣集团实力依旧，邓通依然备受宠爱，红得发紫。

作为功臣集团的一员，张苍接任丞相，在他保守稳健的政治主张之下，新生力量注定没有壮大的机会。

不过，贾谊对未来，还是抱着殷切希望。

过去几年，君臣二人天各一方，虽然不时有奏疏相通，但文字毕竟是死物，哪有面对面交流来得透彻？

贾谊心情很迫切，他有太多的话想对皇帝说。

仿佛又回到了当初，他风度翩翩，自洛阳初入长安，见到了皇帝，君臣两人无话不谈，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一刻都是那样漫长，贾谊在熬煎中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午后。

文帝重鬼神，所以对祭祀之事非常重视。按照礼制，祭祀天地五畤，皇帝一般不亲自参加，而是指派某个官员作为代表祭祀即可。祭祀仪式结束后，祭祀人员会把胙肉(肉类祭祀品)带回一部分，献给皇

帝，表明将神的祝福传达给了皇帝，称为受厘。

贾谊赶回长安时，正赶上一场祭祀仪式，文帝坐在未央宫前殿正室——宣室，接受受厘。

仪式结束后，文帝接见了贾谊。

两人相见时，文帝还沉浸在祭祀大典带来的虚幻意境之中，久久不能回神。

对于君臣重逢的场景，贾谊脑中不知浮现了多少次，各种台词在心中早已烂熟于胸。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皇帝再次见面后的谈话是围绕鬼神展开的。

看文帝目光盈盈，贾谊不忍逆拂皇帝之意，让他扫兴，只好顺着皇帝意愿，谈论起鬼神之事来。

好在贾谊博览群书，涉猎极广，这些事自然难不倒他。

贾谊旁征博引，上至古籍记载，下至民间传闻，滔滔不绝，一讲就是数个时辰，不知不觉已是夜半时分。

宣室内烛光摇曳，君臣二人的身影，投射在殿内屏风上。夜半无人，鬼话连篇，现场气氛格外神秘诡异。

文帝听得入神，毫无倦意，后来觉得还不过瘾，不经意间将坐席向贾谊靠拢，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

会谈结束后，文帝不由得感慨道：“我好久没见贾生了，自以为学识已超过了他，但如今看来还是差远了。”

但一切也仅仅如此而已，感叹完后，文帝再次让贾谊出京，赴梁国，任梁王刘揖的太傅。此后直到去世，贾谊再也没见到文帝。

失望，深深的失望。

或许，这就是宿命。

对于这次会面，后世人持有不同观点，绝大多数人都站在同情贾谊的一边，认为文帝不重视人才，一手造成了贾谊的悲剧命运。

贾谊去世千年后，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就公开站出来为贾谊叫屈：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文帝本人——像贾谊这样不世出的人才，不和他倾谈国计民生，却大费周章地谈论鬼神之事，实在是荒谬至极。

可以说，李商隐这首诗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其实，后世那些为贾谊鸣不平之人，又何尝不是借贾谊之事抒发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呢？

就拿李商隐来说，他满腹才华，却一生坎坷，纠缠于牛李党争，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不得已只好靠作诗与饮酒打发时日，与郁郁不得志的贾谊何其相似!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宋人王安石认为，一个人是否受到重视，并不在于他担任多高的官职，而是看他的政治主张有多少被皇帝采纳。从这个角度来看，贾谊虽说没有坐上公卿高位，但他的不少建议还是被文帝采纳，所以不能完全说他生在明主之世却怀才不遇。

近世以来，更有人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认为贾谊之所以以悲剧方式结束了一生，与他的性格有关，比如毛泽东就有诗云：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梁王的死本来就是一场意外，又何必全部往自己身上揽？

后人当然可以超然地评价古人，然而，要是真正置身于贾谊的处境，能否比贾谊做得更好呢？恐怕未必。

在命运面前，别说贾谊，就是文帝自己也未必扭转得了。

作为一名弱势天子，许多事是文帝没法改变的，其中就包括对贾谊的人事安排。

虽说灌婴已死、周勃去国，但当时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因阻力太大，文帝都被迫放弃了拜窦广国为相的打算，尽管他是窦皇后的弟弟。更何况是贾谊!

文帝与贾谊夜半论鬼神，他迷信鬼神固不可取，但君臣共处一室，夜半私语，又何尝不是关系密切才如此？

至于国政大事，该说的早就说了，能采纳的他早就采纳了，不能执行的说了也白说。何况此次贾谊返京，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君臣二人不如讨论点感兴趣的话题。

贾谊从长沙国太傅调任梁王太傅，这一调动，看似平级调动，实则是在为贾谊未来东山再起埋下伏笔。

梁王刘揖是文帝的幼子，备受宠爱，贾谊去做他的太傅，将来前程定然不可限量。毕竟，功臣们多数年事已高，迟早会死去，而贾谊还很年轻。

人生最大的优势，不是地位和金钱，而是年龄，只要活得够久，就能笑到最后。不论帝王还是将相，最终都将输给时间。

从理论上看，历史很明显是站在贾谊的一边。遗憾的是，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谁也没料到，贾谊年仅三十三岁，就走完了一生。

贾谊死了，但他的很多预见却得到了证实，比如他在任梁王太傅

之时，建议文帝削藩，称诸侯尾大不掉之势隐然形成，必须加以防范。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分化诸侯实力，缩小其规模，使之无力与朝廷抗衡。

刘揖死后，贾谊再次提出，梁国地势非常重要，必须掌握在骨肉至亲的手中才行，否则，一旦东方诸国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次，文帝立刻采纳了贾谊的意见，将儿子淮阳王刘武徙为梁王，并划四十余城与梁国，扩大梁国规模。

多年后，山东诸国作乱，果真是由于梁王刘武奋力抗击，坚守梁国不失，才保证了长安的安全。

贾谊之死是个悲剧，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比如对晁错而言，贾谊之死，等于排除了他仕途上的拦路虎。没有了贾谊这座大山，晁错出人头地就容易多了。

晁错频频向皇帝上书，纵论内政外交，还蒙文帝赐书垂询，一时风光无限。

贾谊死后第四个年头(文帝前元十五年九月)，朝廷举行了一场人才选拔赛，称为“举贤良文学”。文帝下诏，要求诸侯王、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守，务必高度重视这次活动，大力向朝廷举荐人才。

关于此次人才选拔的初衷，文帝列出了三条：

一、选拔贤能之人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比如上古圣君大禹就曾遍布天下求贤，因此夏朝的统治绵延久长；

二、重视人才是祖宗的成例，高祖刘邦依靠英才豪杰辅助，取得了汉家天下；

三、我个人能力有限(勇于承认，作为皇帝难能可贵)，需要大量人才帮助治理国家。

屈指一算，文帝即位后，十五个年头一晃过去了，迫于功臣集团的压力，一直无力扭转弱势君王的处境，但培养自己亲信团队的信念他从未放弃过。

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初春，丞相张苍在与公孙臣的大汉德性之争中落败，不得已自动去职，为文帝施展手脚提供了空间。

如今，老家伙们死的死、散的散，至于那些侯二代们，成长于和平年代，大多数只知混吃混喝，才干平平，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

于是乎，接到皇帝诏令后，他们不敢怠慢，纷纷向朝廷推荐人才。

晁错被平阳侯曹窋(曹参之子)、汝阴侯夏侯灶(夏侯婴之子)、颖阴侯灌阿(灌婴之子)、廷尉臣宜昌(姓不详)、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联名举荐。

这五位举荐人，除了后两位是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员外，前三位都是开国功臣之后，属于典型的侯二代。曹窋资质平平，虽说一度担任御史大夫，但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政绩，至于夏侯灶和灌阿，在史书中没有任何事迹记载，大概也是平庸之人。

他们联名举荐晁错，究竟是真心为国举贤，还是趁机向太子刘启示好(晁错是刘启身边的红人)，不得而知。总之，晁错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有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虽说此前，晁错已给皇帝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此次选拔人才，绝不是简单地填补官员空缺，而是直接参与朝廷的决策。故而，单靠有人举荐还不行，还要应对皇帝亲自考核。

虽说高祖暮年也曾下《求贤诏》，责令御史大夫周昌、相国萧何为国举贤，但由于高祖旋即去世，实际上成效并不大。

所以，此次文帝亲自下诏选拔人才，在大汉建国以来尚属首次，

也是对健全官员察举制的一次重大尝试，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于此次考试，文帝列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关于如何治国(明于国家之大体)；二是如何办事(通于人事之终始)；三是敢于进谏(能直言极谏)；四是剖析皇帝不足之处、官吏办事不公之处、政事不畅之处、百姓不宁等现象；五是如实回答，不要有所隐瞒。

这五点，没有玄奥的哲理思辨，没有形而上的问题，可谓全都切中实际，表明了文帝求真务实的态度，他现在需要的是能治国理民的干才，能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敢于讲真话，不务虚之人。

扯淡清谈之人走开，脚踏实地干活的人欢迎。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点要求都比较辛辣和尖锐，不但考验应试者的学识、见解，也考验答题者的胆识。

历来君王都喜欢说：欢迎大家给我多提意见，对我的毛病别客气，尽管指出来，你批评得越彻底、越到位，朕越欢迎。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帝王只不过做个姿态而已，如果你当真了，那可就错了。聪明的选择是，应该立刻站出来说，陛下英明伟大，哪有错？错的都是咱们这些臣下，对陛下的旨意领会得不到位，执行得不彻底。

给君王提意见，从来都是个高风险的活儿，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龙逄、比干、伍子胥、文种……这个名单没有尽头。

应答者们如何回答，分寸如何拿捏，实在是个大难题。

纵然皇帝大度，但是那些官员一旦得知有人揭他的短，会不会狗急跳墙，打击报复？

好在文帝也想到了这一层，宣布大家尽管畅所欲言，不要背上思想负担，一定要把话说透，不要有所保留。所有的策论试卷，写完

后，一律密封，由朕亲自拆封浏览，不要担心有人阻挠。

此次被举荐者约有百人，文帝逐一御览，有一份试卷，让他眼前一亮，其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答题人：晁错

举荐人：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颍阴侯灌阿、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

一、试举例谈谈对“明于国家大体”的看法。

答：本人以上古五帝的事迹，来回答此题。五帝时期，君王圣明睿智，大臣们比起君王差远了，所以君王们亲自坐明堂处理政务，能做到上符合天时，下顺应地利，中得人和，君王恩德不仅惠及民众，就连飞鸟、鱼类、昆虫、草木等一切生物都受到恩泽(这有点夸张了)。因而，当时五谷丰登，物产丰富，民众安乐，河图洛书、神龙凤凰等祥瑞神兽都不断出现，以庆贺盛世。

二、试举例谈谈对“通于人事终始”的看法。

答：本人以上古三王(指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的事迹，来回答此题。三王时期，君臣都比较贤明，以计谋安定天下，做事无不从人情出发，实行人性化管理。

是人都想长寿，三王就保护百姓不受到伤害；是人都想富裕，三王便设法使百姓免于贫困；是人都想社会安定有序，三王便尽力维持社会秩序；是人都想过上舒适的生活，三王便注意不过于劳民伤财。三王制定法令无不合乎人情，做事将心比心，自己讨厌的事也不要求别人去

做，自己喜欢的事也不禁止别人去做。如此管理百姓，民众敬重官府，就如子女待父母，仿佛流水一般自然天成。百姓和睦、国家安宁、社会有序，这就是人事终始的人事之道。

三、试举例谈谈对“直言极谏”的看法。

答：本人以五霸(有多种说法，常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大臣事迹，来回答此题。我听说五霸认识到他们治理能力不如大臣，便将国事托付给大臣去处理。

辅佐大臣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作为人臣，时刻检视自身，不敢诬上，遵守法令不容私情，遇到灾难，自己带头往前冲，俸禄不敢超标，任人唯贤，不与能人抢位子。赏赐都是按照功劳大小，绝不以个人喜恶待人，受到惩罚者都是些危害国家和不忠不孝之人，处罚轻重都是按照所犯罪行，绝不为自己一时愤怒胡乱诛杀。

正因为做到了赏罚公正，就算是被判了死刑之人，也甘愿受死，毫无怨言。如果发现法律背离了情理，就加以修改，免得伤民，若君主执行法律过程中有所偏离，就加以纠正。总之，能够做到补救君王过失、彰显君王美德，使君主内无邪行、外无秽名。做到这样，就是直言极力劝谏之士。五霸之所以能匡扶天下，矫正诸侯，是由于懂得自己不如臣下，善于用直言极谏弥补自身不足。

四、试举例谈谈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看法。

答：本人以秦朝兴亡事迹来回答此题。秦王不如

三王，其臣也不及三王的辅臣，却能兼并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原因何在？因其凭借有利山川地形、充足的财富积累，且秦人善于作战而已。

与秦相比，六国君臣多是无能之辈，内部意见不一，民心涣散，无法有效整合。所以，秦王得以兼并六国，立为天子。秦统一天下后，摒弃三王建立功业的办法，亲信谄谀之臣，肆意扩充宫殿规模，穷奢极欲，搞得老百姓精疲力竭。

秦朝上下依然不知收敛，群臣只知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严刑峻法，苛虐百姓，草菅人命。因此，上下离心，民心尽失。刚开始，还只是侵害平民百姓，后来逐渐扩大到富家大户、普通官吏，再后来就连宗亲大臣都不放过，弄得最后人人自危，皆有叛心。待到陈胜登高一呼，很快土崩瓦解。秦朝的灭亡就是典型的“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

陛下即位以来，废除秦时乱法，宽厚爱人，礼敬长老，抚恤少孤，亲自以身作则，禁止奢侈作风，废除诽谤罪，废除盗铸钱令，废除肉刑，选派正直官员，斥退奸邪小人，兴利除害，变法革旧。凡此种种，都是古来罕见，但陛下一一做到了，实在是天下百姓的幸事。

五、将心中所思所想一一陈上，不要有所隐讳。

答：五帝时，臣不如君，君主亲自主抓；三王时，君臣皆贤能，君臣共治；五霸时，君不如臣，便放手让臣子去做事。不同时代，根据不同情况，圣贤们各自分工，建功立业。

《论语》云：“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

军队打仗总不能取胜，就得转移战场再战，一个人要是长期贫穷，实在过不下去，就要考虑改变职业。

陛下的天资不亚于五帝，临朝已有十五年了，但老百姓的日子依旧没有富足，盗贼依然出没，边境仍然得不到安宁。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大家都认为是由于陛下未能亲自处理政事，而是依靠群臣处理政务。

虽说现在大臣们都是天下的精英，但跟陛下一比就差远了，就如同五帝时期，大臣不如君王一样。陛下不亲自处理政务，却依赖远不如己的臣下，我认为是有失天子的圣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在这样周而复始间流逝了，但陛下之盛德却终究不能遍及天下、流传万世，我实在为陛下感到惋惜。

晁错的这篇对策，看似纵论古今，历数古今君王成功之道，其核心无非只有一点，就是君主和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

洋洋洒洒说了很多，但真正打动文帝的奥妙就在于，晁错说出了文帝想说却不能说的政治现实，就是他即位以来，一直受制于功臣集团，无法真正做主。

但是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晁错没有说。

就算不说，文帝也明白，有些事可以说，可以做；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但不能说。

在某种意义上，晁错和贾谊非常相似。

他们没有太过硬的背景，但都才华过人，性格上都有些执拗。

他们都曾师从名师，贾谊师承吴公、张苍，晁错师承伏生，他们都曾经与皇帝有过多次奏疏对答，有些被采纳，有些被搁置，而且颇得皇帝赏识。

他们都曾侍候皇子，贾谊为文帝爱子梁王刘揖的太傅，晁错为太子刘启的太子家令。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贾谊最终抑郁而死，晁错却在此次对策后不久，被皇帝擢升为中大夫。

时耶？命耶？

究竟为何？

## 医患纠纷

升为中大夫后，晁错继续给文帝出谋划策，先后共写了三十多篇意见书，每篇都有独到的见解。

虽说不见得每次提出的意见都被采纳，但每一次文帝都为晁错的才华惊叹不已。

其实，晁错的许多意见与贾谊可谓不谋而合。比如对内削弱诸侯势力，加强物资储备；对外坚决拒绝和亲，主张做好与匈奴长期斗争的准备等。有的意见甚至比贾谊更激进，但晁错最终安然无恙，贾谊却英年早逝。

两人之所以命运不同，除了贾谊本人性格原因外，与朝堂权力格局变化也有莫大关系。贾谊崭露头角之时，正值汉初功臣们的权力巅峰期，而晁错出道较晚，等他崭露锋芒时，灌婴、周勃、陈平、张苍等功臣集团的大佬们或死或退，根本无力阻止晁错的崛起。

然而，革命尚未完全成功，晁错尚须努力。功臣们尚未死绝，当晁错正式成为皇帝顾问团成员之一时，朝廷的中枢大权依然掌握在功臣手中，此人便是丞相申屠嘉。

这位最后的功臣终结者，恰恰是晁错。

晁错可谓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大汉庙堂的权力格局，从他开始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但所有这一切，还要等数年以后才出现，晁错的道路还很长。

就在贾谊早逝、晁错崛起的这几年，朝堂上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倒是有一桩看似不起眼的越境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推动了一场刑法大改革。

汉承秦制，汉朝的法律制度几乎都继承自秦法，而秦法以苛虐残酷闻名。在秦法中仅仅死刑就数以百计，砍脑袋算是最幸福的死法了，其中许多折磨人的酷刑，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听了，也会吓得战栗。

高祖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宣布废除秦朝苛法。然而，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争取民心的舆论宣传而已，实际上，汉朝建立后，还是大量继承了秦朝残酷的刑罚。

比如，高祖动辄喜欢用烹刑来吓唬人(比如栾布因为给彭越收尸，就差点被煮了)。试想将一个大活人丢入热水沸腾的大鼎，活活煮熟，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但这不算最惨，高祖将功臣彭越处以醢刑，即将犯人剁成肉酱。彭越被处死后，高祖还将他的死尸肉酱分赐诸侯，其酷烈程度与秦时毫无二致。

除了死刑，次一等的刑罚就属于肉刑，包括：

黥刑，在脸上刺字着墨，让犯人一辈子洗刷不掉，是一种莫大的

羞辱，秦末汉初的九江王英布就曾受过此刑；

劓刑，割掉鼻子，商鞅变法时，秦公子虔被处以此刑；

刖刑，砍掉脚，或剜掉膝盖骨，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孙膑被判处刖刑，沦为废人；

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史学家司马迁(他的故事后面会详述)被判处此刑；

杖刑，当众脱了裤子打屁股；

……

还有很多。

相对于死刑，肉刑除了对人的肉体进行摧残外，还有强烈的人格羞辱意图，经历肉刑之后，犯人除肢体残缺外，还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总之，这是一种从肉体到心灵的双重折磨。

凡经历过肉刑之后的人，像孙膑、英布这样挺过来又能成就一番事业者寥若晨星。多数人基本就变成行尸走肉了，跟活死人差不多。

肉刑，是罪恶的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污浊阴暗的一页，将人性的恶释放到了极致。

这样的罪恶，只要它存在一天，谁都无法保证，哪一天不小心会落到自己头上，哪怕是救死扶伤的医者。

医生从来就是一项高危职业，古往今来都一样。

在古代社会，医者的地位并不高，医卜星象常被同列，都是比较低贱的职业。治病救人无法保证发家致富，但一不小心惹了患者家属，激化了医患矛盾，轻则摊上官司，重则说不定还会搭上性命。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史记》本传称文帝四年，《资

治通鉴》称十三年，根据《史记》《汉书》“文帝本纪”记载废除肉刑，可推断为文帝前元十三年)，有一位倒霉的兼职医生，惹上了官司，按照汉朝律令，当判处肉刑。

这名医生名叫淳于意，齐国临淄人，他的正式身份是齐国太仓令(即负责管理粮仓的官员)。淳于意本来管好粮仓的入库、支出，做好账目明细就可以了，只是他天生一颗济世仁心，一心想学医，治病救人。

淳于意在年轻时就喜欢钻研医术，打下了不错的医学基础，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淳于意向同郡元里的名医公乘阳庆(公乘为爵名，为秦汉二十级爵的第八级，阳庆为姓名)拜师学医。

此时，阳庆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家里富足，衣食无忧，只是眼看时日不多，但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若将自己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实在不甘心。淳于意的出现，让老阳庆感到很欣慰。

淳于意能结识阳庆完全是出于偶然。

起初，淳于意听说淄川唐里有个名叫公孙光的名医，便前去求学。淳于意医学天赋很高，不久，就学会了公孙光的所有医术。

公孙光觉得，再不能让他在自己这里浪费时光，便对淳于意说：“以你的天资，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有个同胞兄弟住在临淄，精于医术，远比我强多了。”

于是，淳于意跟着公孙光到了临淄城，意外碰到了阳庆的儿子阳殷。阳殷估计有事求助于齐王，打算给齐王献一匹马，但苦于无人引荐，好在公孙光人脉广泛，替他引荐，成功将马献给了齐王。

如此一来，阳殷欠了公孙光一个大人情。阳庆远比公孙光兄弟厉害多了，于是公孙光索性将淳于意托付给了阳殷，让他写信将淳于意引荐给阳庆。

阳庆是个怪人，医术非常高明，却从不医治人；家藏医书非常丰富，却从不展示给自家孩子，也不愿意给自己孩子传授医术。

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这样一个怪脾气之人，却和淳于意一见如故，非常投缘，越看越欢喜。不过，在传授医术给淳于意前，他提了两个条件：

一、绝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是从我这里学的医术；

二、跟我学习可以，但先把你脑袋中，那些以前学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

面对怪人提出的怪条件，淳于意丝毫没有犹豫，马上答应下来。

在古代社会，缺乏系统教育体系，医学也不例外，知识的传承往往靠师徒间口传心授。医学是一门实践经验非常强的学科，每个传承者经验差异很大，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所以路子太杂乱，反而会形成干扰。

阳庆觉得，要想学精医术，就必须专一，将以前所学的知识全部抛弃，先把自己当作一个医术基础为零的医学素人。

有时候，脑中一片空白之人，方能做到专心致志。

在以后的日子里，阳庆将生平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淳于意，包括相传从黄帝、扁鹊那里传下来的《脉书》(《脉书》在1984年张家山汉简有出土，主要讲经络、针灸等)、《五色诊》(介绍观察患者面色，以判断病情)、《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医学古籍。

师从阳庆后，第一年，淳于意主要学习望闻问切、针灸、药理学等医学基础知识。在第二年，开始参与临床治疗，积累临床经验，虽然也治愈了一些人，但医术还很肤浅。通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

践，到了第三年，淳于意医术日益精湛，可以准确判断患者病情，做到手到病除，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

通过三年的学习，淳于意已是一位出色的医生了，向他求医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头有脸的人物，比如齐国官员、王府的内眷等。淳于意在齐国的名气越来越大。

淳于意不但医术精湛，而且有个良好的职业习惯，将每次出诊过程都详细记录在案。直到今天，在史书中，还保留着二十五例病例，如实记录了患者姓名、职位、性别、症状、诊断过程以及治疗结果等。由于病历涉及许多专业术语，比较枯燥，就没必要一一罗列，先简单介绍几例。

齐国有个名叫成的侍御史(比御史大夫低一级的监察官员)，约淳于意去看病，患者自称头疼得厉害。

号脉完毕后，淳于意没有立即给出诊断结果，只是说，病人病情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叮嘱了几句多休息之类的话，就出来了。

成的弟弟昌觉得有点蹊跷，跟了出来，询问哥哥病情究竟如何。淳于意便直说：“患者得了疽病(即痈疽)，病源在肠胃间，五天后会肿胀，再过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并指出其病因是酗酒后同房引发的。

疽病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疾患，病原菌为葡萄球菌，有的生于皮下组织，也有的寄生于内脏，初期只是局部疼痛，但随着肿胀，肿瘤化脓破裂，导致病人死亡。

果如淳于意所言，八天后病人吐脓血而死。

齐王因为自己的小孙子生病后厌食，吃不下饭，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便召淳于意去看病。观察和询问后，淳于意诊断出小孩子系精神焦虑引发气郁，反胃打嗝吐酸水，导致情绪低落，食欲不振。

淳于意当即给患者开了汤药，叮嘱按时服用。过了一天，病人胸中胀气消散，两日后开始进食，三天后痊愈。

没多久，淳于意又被一名叫作循的齐国郎中令叫去看病。

淳于意赶到时，发现房内早已聚集了许多医生。他们一致认为，病人是逆气进入腹腔，都在围着给病人针灸，但根本无法缓解病人的痛苦。

通过观察，淳于意认为，是医生们误诊了，病人得的应该是涌疝，得了这种病，患者会大小便不通。一问，果不然，病人已经三天没有排便了。

淳于意当即开了一剂火剂汤，病人服用后，很快就能大小便，服了两剂后已能排便通畅，三剂后便痊愈了。

至于病因，淳于意诊断出是患者长期憋尿同房，造成尿液回流膀胱，致使无法排便。

一名叫作信的齐国中御府长(负责管理王后钱财衣物等出纳及库藏的官员)出使楚国，经过莒县阳周水时，察觉桥面损坏严重，想拉住辕马，紧急停车，由于缰绳扯得太急，使拉车的马儿受惊，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河中。时值严冬，信被浇了个透心凉，受了严重风寒，回家后忽冷忽热，高烧不退，幸亏淳于意及时给他开了驱寒退烧药，他才保住了性命。

再后来，就连宫内眷属也听说了淳于意医术高明，齐国太后因大汗后脱衣小解，导致排便困难，在淳于意的治疗之下得以痊愈。

如果遇到得了不治之症的患者，淳于意会将情况如实告知其亲属，比如齐国章武里有个叫曹山跗的人生病了，找到淳于意。号脉后，淳于意说：“病人生的是肺消瘅，外加寒热病。”当即叮嘱患者家属，已回天乏术，赶紧回去，让病人好吃好喝等死好了。

曹山跗这类病是没法治好的，只能听天由命，但有些病明明可以

治好，可是遇到不听医嘱、自找死路的患者，就是神医淳于意也没办法。

齐国的中尉(负责治安的官员)潘满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小腹疼痛厉害，请淳于意诊疗。号过脉后，淳于意诊断出病因是酒后纵欲过度，告诫他立刻停止同房，否则将有性命之忧。

或许淳于意已料到患者不肯配合治疗，后来他遇到齐国一名叫饶的太仆和一名叫由的内史时，他说道：“中尉要是再这样下去，估计活不过三十天。”

不出所料，潘满如没把医嘱当回事，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结果二十天后尿血不止，一命呜呼。

其他诸侯听闻淳于意医术高明后，也纷纷派人来求医。据淳于意后来回忆，济北王、淄川王(济北、淄川是从齐国分出的小国)就曾请他到自己的藩国去治病。

在济北国，淳于意先后治好了济北王的风寒、王宫侍女的妇科病和济北王奶妈的胸闷，在淄川国治好了淄川王的头疼，以及他的一位美人(嫔妃的称号)的难产。

济北王和淄川王深为淳于意的医术所折服，但总不能将他长留在身边，于是派人到淳于意那里去学医。

济北王派来的是太医高期、王禹，淄川王派来的是太仓马长(淄川国物资储备库马匹管理员)冯信。

高期、王禹是科班出身，济北王派他们来是情理之中。只是冯信作为管理马匹的工作人员，派遣他来，实在出人意料，究竟是淄川国实在无人可派，还是淄川王认为医兽和医人原理相同，就不得而知了。

虽说找淳于意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但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处境(估计病人多是王室贵胄和官员，赖着不给诊疗费)，他依然家徒四

壁，一贫如洗。

但是求医者却源源不断，且不说胶西王、济南王等齐地的诸侯，就是赵王、吴王也千里迢迢派人来找淳于意，让他不胜其烦。

这些爷们都骄横跋扈惯了，谁也惹不起，要是硬性拒绝，恐怕招来麻烦不说，说不定还性命难保。于是，淳于意想了个招，将自己户籍挂在邻居名下，不再打理家事，四处游走，在民间看病，挣点零花钱养家糊口。再后来，他干脆跑到杨虚侯刘将闾(齐悼惠王刘肥之子，齐哀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的弟弟)的封地躲了起来。

齐王刘则(齐哀王刘襄之子，谥文王)，年不满二十，或许是因为吃得太好，又懒得动，年纪轻轻，身体太过肥胖，脂肪积累太多，患上严重的哮喘，还经常头痛，造成视力下降，一看就是严重的高血糖患者。

刘则本打算找淳于意治病，但派去的官吏根本找不到人，只得作罢。在位十四年后，备受病痛折磨的刘则去世。

刘则一生基本抱病卧床，没留下一儿半女。按照惯例，诸侯王没有子嗣，封国当废除，齐国遂并入中央，由朝廷直辖。

或许是考虑到齐悼惠王刘肥诸子的势力庞大，尤其是刘襄、刘章、刘兴居等人在文帝上位过程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齐国被取消后不到一年，文帝又将齐国一分为七，分封给刘肥诸子，以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即为后来的齐孝王。

淳于意在刘将闾的封地内时，还曾一度跟随他到过长安，在长安近郊的安陵一带为人治过病。

在那些年里，作为五个女儿的父亲，淳于意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冒着非法行医的风险，在民间替人治病；一面又要躲避诸侯和达官贵人的纠缠，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行医从来就是高风险，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药到病除，难免出现

医疗纠纷，即使是神医淳于意也承认，自己的诊断无法做到绝对准确。

但是病人和患者家属可不这么想。

人一旦生了病，思维方式就变得跟正常人不一样，在问题认知上出现偏差，在患者看来，医生就该无所不能。我把个人性命安危交到你手里，你就得负责到底。只是他们忘了，医生并非神仙临凡，其实医生跟一般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是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罢了。

绝大多数患者可不这么想，在其他行业出现失误，也许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医生相当苛刻，虽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医疗治病关系人命，生死大事，完全寄托于医生之手。只是，谁又能完全没有医疗失误呢？

医患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个难以破解的难题。淳于意有意躲避，不给权贵看病。

这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再后来，淳于意被任命为齐国太仓令，成了官员后，公务缠身，更难腾出手来替人治病，自然得罪了不少高官和有权有势之人。

他们决定狠狠整治一下淳于意。

但是，淳于意为官清廉，要找个职务犯罪的证据实在困难。要是从他兼职医生身份入手，原本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只是医疗治病专业性实在太强，一般外行人很难从技术角度找到把柄，再说古代社会，根本没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那么，怎么办？

不难，不难，在有着博大精深的官场厚黑学积淀的国度里，想要整人，办法多的是。政治问题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可以用政治手段处理，专业问题就用法律手段来整治!

这帮人很快找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罪证：淳于意私下交游诸侯!

为防止诸侯相互串通对抗朝廷，汉朝朝廷严禁诸侯私自接触，各个诸侯国的民众更是不得擅自到处游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这也是淳于意一再拒绝赵王、吴王、胶西王等诸侯王邀请的原因，对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他是很清楚的。

一旦朝廷追查起来，这些诸侯王们可以有十万个理由开脱，倒霉的恐怕就是淳于意了。

但是，在这些诸侯王面前，他太弱小了，总有被官吏堵在家门口，无路可逃的时候，只得给济北王等人治病。

这就等于坐实了指控，他私自越境，结交诸侯的罪名是逃不了的。

## 修法事件

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夏，淳于意被免去官职后下狱。

太仓令是诸侯国的重要职位，像这样的官员被罢免治罪，必须报备朝廷。长安方面一听，淳于意竟然私下到处窜动，与不少诸侯来往，感到事态严重。

对诸侯私下结交外臣，朝廷方面历来非常警惕，不由得怀疑，淳于意如此活跃，在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朝廷不敢大意，立即下诏给齐国，要求将淳于意押送到长安来。

按照汉律，交游诸侯罪名坐实，将处以肉刑。这意味着淳于意到长安后，下半辈子将会沦为废人。

淳于意上路那天，临淄街头人山人海，人们都赶来围观这位神医

太仓令沦为囚犯后的模样。

淳于意的五个女儿也来给父亲送行。家里突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女儿们像天塌了一般，连哭带喊，凄凄切切，好不心酸。

淳于意本来心情就很差，再被女儿们一通哭闹，搅得更加心烦意乱，不由得骂道：“哭，就知道哭!生了你们一帮黄毛丫头，却没有一个儿子，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哭有什么用!”

父亲的一顿训斥，深深刺痛了小女儿缇萦的心，她当即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免受肉刑的折磨。押送淳于意的队伍上路后，她一路跟随押送队伍，一直追到了长安。

缇萦是看出来了，父亲的罪名已经坐实，想要推翻，根本不可能，如今能做的就是主动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能够改变父亲罪刑的只有一人，就是当今天子。到了长安后，缇萦主动上书文帝，信的内容相当感人：

我父亲作为朝廷官吏，齐国当地人民都交口称赞他为官廉洁公正，现在因犯法被判刑。我感到非常痛心，人一旦被处死就不能重生，受刑致残的人，就算想改过自新，再也无法康复。我情愿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罪，好让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名犯人的子女，想把书信转交到皇帝手里，简直比登天还难，我们不知道缇萦这位小女孩用了什么手段，通过层层官吏之手，将书信送到皇帝手中。总之，奇迹发生了，她的书信被成功送到了文帝手里。

缇萦质朴的话语打动了皇帝，因为文帝本人至孝，虽然他们地位悬殊，但人对亲人的感情都是相同的。

不过，就算是天子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因为一个人上书，就随意更改判决。退一步讲，就算文帝动用皇帝特赦权，赦免了淳于意，那

么以后呢，再出现淳于意这样的案子怎么办？

如果人人都效仿缇萦伏阙上书，又如何处理？

特赦权必须慎用，一旦滥用，无疑是纵容犯罪，后患无穷。

地位决定高度，文帝的位置决定了他做事决不能单靠一时冲动，凭借个人感情用事。

所以，法律问题还需要法律来解决。

至文帝时，汉朝建立已二十多年，但法律制度依然深受秦律影响，秦法中的许多苛法酷刑都保留了下来。

高祖虽提出过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楚汉之争及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中，高祖常年在外作战，留萧何坐镇关中。

萧何曾经做过秦朝底层司法管理官员，工作经验告诉他，约法三章肯定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更何况此时秦朝刚刚灭亡，在民间潜伏着各种前朝失势者，他们随时会伺机而动，利用法律漏洞钻空子。

政治口号不妨说得漂亮一些，但手中的大棒要时刻高高举着。

萧何在秦律基础上草拟出《九章律》。《九章律》包含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基本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汉朝四百年历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一座汉初墓葬，墓穴内有大量陪葬书简。书简内容非常丰富驳杂，涵盖法律条文、医学典籍(其中就有淳于意研读过的《脉书》)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这是研究汉初法律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从《二年律令》中不难看出，汉初的法律依然非常苛虐，许多秦律的苛法都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了。

不过，相比秦朝，汉朝的法律总体上有些进步，比如惠帝时废除挟书律(此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时期，严禁民众私自藏书，典型的愚民法律)、高后元年废除妖言罪(在社会上散布谣言)、三族罪(即将涉罪之人自身家族，以及父族、母族三族之人全部杀掉)等。当然，这些公开宣示，不见得如实执行下去，实际上，纵观两汉，为了实际政治斗争需要，妖言罪一直存在。

文帝即位时，离秦亡不远，社会上对苛政的厌恶之情仍在蔓延，加上他本人处于弱势，所以他推崇黄老思想，为政低调内敛。处理案件时，基本能遵守法律，这一点可从他一再尊重廷尉张释之的判决就可以看得出来。

秦律中，有许多不人道的法律，其中有一项为商鞅变法时推出的连坐法，就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凡家中父母妻儿老小，全受到牵连，一个都逃不掉。

这种恶法实在残忍，许许多多无辜之人，根本没做任何错事，就因受到牵连而被送入大牢。

法律的根本原则应该是惩罚坏人，打击罪犯，保护善良和无辜者。很明显，连坐法违背了这一原则。

文帝觉得连坐法再执行下去，无疑会让更多无辜者蒙冤，实在不公平、不人道，所以他即位第二年，便提出废除连坐法。

谁承想，他一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了左右丞相周勃和陈平的反对。

周勃与陈平都是从秦朝过来的人，身上难免留有旧时代的思想烙印。他们认为连坐法可以震慑罪犯，好让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在犯法之前，好好掂量一番，连坐法已经实行很久了，还是维持原样最好。

这种逻辑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谬论即使存在了一万年，也成不了真理。

在寻常具体政务上，文帝多看这些老臣脸色行事，事事照顾他们的情绪。但在事关国家法律典章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决定不退让，冷冷回复说：

“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会谨慎守法，受到惩罚也会乐于遵从。官员在管理百姓时，要用善念引导民众，而不是用恶法惩处他们，如果执意如此做，那么就是用法律手段迫害民众。我不觉得连坐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你们还是再斟酌斟酌吧。”

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周勃和陈平语塞了。

碰了钉子后，他们开始觉察到，这个年轻皇帝不是靠摆出老资格，凭借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的。毕竟都是官场老油条了，还等什么呢？赶紧转舵，识趣地顺从上意才是上上策。二人赶紧回话：“臣等见识短浅，不如陛下看问题看得那么远，陛下使有罪之人免除拘捕之苦，不让无辜之人受到牵连，天下苍生有幸，蒙受陛下如此大恩，臣等奉诏，请彻底废除拘捕法、连坐法。”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被深深地感动，是否掬了一把清泪？深为大汉数以万计的民众感到庆幸，他们遇到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仁慈明君。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你就想得太简单了。

不错，相对秦始皇父子，文帝是个富有同情心的皇帝，他处处谨慎，不喜欢搞好大喜功之举。总体来说，是个不错的人。

但别忘了，他的首要身份是皇帝，绝不能简单地将他看作一个善良的好人。历史一再证实，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不见得就能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皇帝也不见得就是个好人。

一个人，无论个人品行好坏，一旦坐在皇帝宝座上，他的所思所想，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维持江山稳定，如何将位子传给子孙万代。

至于其他的一切，包括法律等，都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既可以是打击对手的有力武器，也可以是笼络民心的手段。

至于如何运用，那就要看政治需要了。

因此，不难理解，同样是汉文帝，在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时，他可以与权臣们的阻力抗争，力行废除连坐法。但十四年后，在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他又以诛杀三族手段处置了新垣平。

因为，不这么做，不足以洗刷文帝受到愚弄带来的耻辱；不这么做，不足以平息这桩政治丑闻；不这么做，不足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说白了，文帝就是要用新垣平及其族人的血，制造寒蝉效应，此事到此为止，决不允许人们再讨论，就当此事从来没发生过。

不过缇萦上书救父时，文帝展现给世人的面目，依然是仁慈之君，因为新垣平事件要在三年以后才发生，他暂时还没有露出权力的獠牙。

有了以前废除连坐法的经验，文帝已经轻车熟路了，他下诏，命令相关部门废除肉刑。

修改、废除法律毕竟是大事，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该开的会还是要开。

为了做足姿态，文帝在诏书中写道：

听说古时候有虞氏(指舜)时期，犯罪之后，就在人犯的帽子和服饰上画上不同的图案，来表明他犯罪的程度。就算如此轻微的处罚，也没人犯罪，那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如今刑法中，保留三种肉刑(黥刑、劓刑、刖刑)，但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的

德行浅薄，对百姓教化不够？想想我就很惭愧，现在许多人犯了罪，根本得不到改正的机会，我实在很同情他们。肉刑会让一个人的肢体终身残缺，无法复原，这样的刑法是多么残酷，是多么不人道!我命令从现在起废除肉刑，用其他办法替代惩罚，只要犯罪后不逃亡，服刑年满后就地释放，恢复自由身。

同样是废除法律，但这一次与上次废除连坐法相比，文帝说话的语气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此时周勃、陈平等政治强人基本都已不在了，对继任的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文帝说话就没必要那么客气了。

张苍和冯敬也没有反驳皇帝诏令的勇气，他们知道，文帝这不是跟他们商讨废除肉刑的可行性，而是要他们拿出替代肉刑的方案来。经过一番讨论后，张苍和冯敬拿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一、原判处黥刑的，改判为髡钳后去服城旦刑、舂刑，即本来是脸上刺字的，改判为剃掉头发，戴上铁项圈，罚去做修城墙和替公家舂米等苦役；

二、原判为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即本来是割掉鼻子的，改判为打三百板子；

三、原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

四、原判处剁掉右脚的，杀人后主动自首、受贿及枉法之人、监守自盗，以及本已判刑，但又重犯罪，一律弃市(在街头公开斩首)；

五、犯人若被判城旦刑和舂刑，刑满三年后，改为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即本来罚为无期徒刑，一辈子替朝

廷修城墙、戍边和舂米，现在改革修订后，修城墙满三年后，男犯派去深山砍柴(祭祀鬼神放火，要用柴火)，女犯派去筛选清洗米(祭祀鬼神用米)，期限是一年；

六、服鬼薪白粲刑一年后，服隶臣、隶妾刑一年，免为庶人，即砍柴淘米苦役干完一年后，再到官府做一年奴婢，才释放为平民；

七、若原本判处为服隶臣、隶妾刑的，改为服役两年后，男犯再服为司寇刑(剥夺自由，协助捕盗、运输等苦役)，女犯改为如司寇刑(就是类似司寇刑)，一年后释放。

法律修改案报上去后，文帝当即写了一个大大的“可”字，宣布批准。

这次刑法修改案最大受惠者无疑是淳于意。修改案公布后不久，他即被释放，回家后根据文帝的要求，给皇帝写了一份供述词，详细介绍了他多年的行医过程，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医学资料。

故事看上去似乎很圆满，孝女救父，孝心感动仁君，释放名医，并举一反三，借此机会，修改了秦朝以来摧残人性的肉刑制度。后世史书中，对这一段大书特书，以此作为佐证，来树立文帝仁义之君的高大形象。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文帝批准的那份由张苍和冯敬提供的法律修改案，就会发现有点不对劲。

从表面上看，废除了黥刑、劓刑、刖刑等灭绝人性的酷刑，并规定了徒刑的期限，毫无疑问有着进步意义，但大汉法律由此变得更加宽松和人性化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就劓刑、刖刑改为笞刑来说，处以劓刑、刖刑后，如避免伤口感

染，除了造成身体残疾外，起码可以保住命，但一个人被打三五百板子后，很少有能活下来的。更有斩右足改为直接砍头，若说是减刑，还不如说是直接给了个痛快而已。

种种迹象说明，文帝的这次刑法改革，不但没有减轻犯人的惩罚，反而是轻罪重判，以至于许多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死于板子之下，就是侥幸活下来的，也落下了终身残疾。

这哪里是减刑的善举？分明是以轻罚的名义变相杀人!

正义，有多少罪恶都是在披着你的外衣!

历史的真相，总是这样令人不忍卒读!

# 第十章 多事之秋

## 兵归细柳

文帝登基后第十六个年头，重新改元。

帝王改元之事，此前并不多见，此后则逐渐频繁起来。

改元是为了讨个好兆头，借新元伊始，希望一切重新开始。

只是，改元后的大汉，看不出与往年有何区别，并无变好的迹象。

这些年来，糟心事实在太多，天灾频仍，干旱、洪涝、瘟疫接踵而至，匈奴人又不时扰边，烧杀抢掠。文帝几乎没睡过几天安稳觉。

一句话，他这皇帝做得太苦了，太不容易了。

与父辈和子孙相比，文帝工作努力，生活节俭，拒绝铺张浪费，不好大喜功，对臣下也比较宽厚，纵然有人犯了错，也不过于苛责。他奉行轻徭薄赋政策，不断改进法律，努力减轻民众的负担。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饱尝离乱之苦的大汉王朝，能够早日繁盛起来。

该做的他都做了，但成效并不明显，仿佛老天总是跟他过不去，那该怎么办呢？

剩下的还有一条路，就是求助于鬼神，他频频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不过，鬼神也没给他带来多大福运。

文帝子嗣本就不多，又一个个先他而去，早年在代国为藩王时，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早夭。后来生的四个儿子中，最喜爱的梁怀王刘揖死于意外。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另外一个儿子，代王刘参也年

纪轻轻就去世了。

文帝察觉到自个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绝不能就这样困于长安，坐老等死，他决定要亲自到帝国的边境视察，了解大汉边防现状。

从文帝后元二年开始，他频频离京出巡。

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夏，巡雍地的棫阳宫(秦昭襄王建，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北)。

文帝后元三年春二月，再次回到代国视察。

文帝后元四年夏，巡幸雍地。

文帝后元五年春正月，巡幸陇西，三月到雍地，秋七月行幸到代地，这一次出巡等于花了大半年时间，走遍了大半个帝国疆土。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文帝花了近一半时间，行走在路上。他内心世界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他心情很沉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深深焦虑。

匈奴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就如北方草原的风暴一样飘忽不定，令人捉摸不透。虽说近几年来，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一直没有打起来，但北部边疆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状态，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

多年来，匈奴人掌握着战事的主动权，汉朝多处于守势，被动应付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过来。

文帝也试过用和平手段稳住匈奴，让汉匈两国的紧张局面缓和下来，他曾主动致信匈奴单于，希望两国能够和平共处。

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和平从来不是靠单方面良好的意愿就能实现的。

匈奴人言而无信，一而再、再而三毁约。有好多次，双方和平宣

誓结束不久，匈奴大军就开始扰边。

逐渐地，文帝对匈奴人不再抱有幻想，自文帝十四年匈奴人大规模入侵以后，对匈备战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说文帝后元二年，汉朝与匈奴再次和亲，文帝也正式下诏，向天下宣布汉匈两国自此既往不咎，过去的事都翻篇了，往后两国约定为兄弟之国，要相亲相爱犹如一家人。

没有人拿外交辞令当真，这些话说出来，估计文帝自己都不相信，在此以后，他根本没有放松对匈奴的戒备，反而更加频密地出巡。相信匈奴人会放弃杀人放火，就等于相信狼会斋戒，不再吃羊一样。

就在宣布和亲短短四年后，匈奴人再次兵分两路，一路三万人马杀入上郡，另一路入侵云中郡，许多无辜的军民惨遭杀害。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为了迎击匈奴，朝廷任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驻兵于飞狐口(河北省蔚县东南恒山峡谷口之北口)，原楚相苏意为将军，驻兵句注山(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二十五里)，郎中令张武驻兵北地郡，要求严防死守，务必将匈奴人拦截于塞外。

不过，鉴于匈奴人善于搞轻骑突袭，为拱卫长安的安全，文帝特意命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驻兵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宗正刘礼(楚元王刘交之子)为将，驻兵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驻兵棘门(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的特殊时期，肩负保卫京城安全重任的将领必定是深受皇帝信任之人。

刘礼是宗室子弟，徐厉有何能耐不得而知，倒是周亚夫在此次京城保卫战中脱颖而出，备受天下人瞩目。

周亚夫出身显赫，父亲是大汉开国元勋周勃。

当年，周勃罢相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寂寥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于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辞世，他的绛侯爵位由长子周胜之承袭，次子周亚夫出任河内太守。

在河内太守任上，周亚夫遇到了相面大师许负。

许负一生阅人无数，早年她遇到高祖和薄太后时，就断定高祖当得天下，薄太后当生天子。她的预言后来都一一得到应验。

自从和薄姬别后，许负销声匿迹已久，江湖上久不闻其人。不知何故，二十几年后她再次现身，成为周亚夫的座上宾。

与这样神级的预言家相逢，机会难得，周亚夫自然要问问自己将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此时的周亚夫处境很微妙。

周勃追随高祖开创大汉，立下不世之功，又在诛杀诸吕、拥戴文帝上位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再造大汉。如此功勋，在朝堂上罕有人能与之比肩。

可就算如此，最终也落得个黯然出局的下场。

不过，周勃虽然下野，但其个人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周亚夫出任河内太守，固然是个人能力出色的缘故，但又何尝不是文帝对功臣后裔的安抚？

父亲曾经是一棵大树，如今已无法为他遮风避雨，但功臣之后的标签，是周亚夫一辈子注定要背负的。

周亚夫暗自一直在努力证明：靠自己努力，也能打出一片蓝天。目下，他要设法走出父亲留下的阴影。

未来怎么办？将来的路会走向何方？周亚夫心中没底，很想有人为他指点一下迷津。

然而，许负给他的答案，完全出乎意料。

许负说："我仔细观察您的面相，可以断定，三年之后，您将封侯，再过八年，就能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此后九年，你将被活活饿死。"

世人皆知相面者就是讨个安心，图个好心情，所以观相之人大多数会说点吉利话，就算不准确，多年以后，谁还记得？

但是，许负不是那些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她是个有职业操守的预言师，她的眼神坚定而又诚恳，看上去根本不像在说谎。

周亚夫静静注视了她足足一刻钟，然后突然笑了起来，说："我们家的侯爵，已被我大哥承袭，就算有一天他有所不测，空出的爵位也由他儿子继承，根本没我什么事。再退一步，诚如您所言，假若有一日我会封侯，怎么又会被饿死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不过，许负没有笑，她的表情依然冷峻，她用那枯树枝似的手指了一下周亚夫的嘴巴说："不知你是否注意过你的口型？"

"我的嘴怎么了？"周亚夫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嘴巴。

"你的嘴唇有竖纹入口，这是将被饿死的征兆。"许负答道。

而后，宾主二人陷入长久的沉默，谁也不说话。

至于许负是什么时候离去的，周亚夫没有察觉到。

时光飞逝，周亚夫平静地度过了三年时间。

无病无灾，任期内也无大事，关于许负的预言，他都快忘记了。就在此时，他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哥哥周胜之被剥夺爵位，下狱了。

原来，周胜之不知何故竟然杀了人。

被杀之人是谁，不知道；为何杀人，也不知道。这些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他的夫人，也就是文帝的女儿，这一次并没有像上次公公周勃下狱时那样，站出来求情。

原因很简单，夫妻二人长期不和，公主经常被老公冷落。皇家和权臣家庭的联姻，本身就是权力联盟的产物，自然没有任何感情而言。父亲的倒台，估计进一步增加了周胜之对公主的厌恶，夫妻俩感情越来越差，以至于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换了寻常人家，夫妻俩走到这一步，大不了一拍两散，但是王侯世家做不到。别说是和皇家联姻，就是两大王侯世族通婚，也绝不能轻易解除婚约。

因为，自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家事，而是两个大家族共同进退盟约的信物。解除婚约就意味着两大家族毁约。

一句话，皇帝的女儿没法退回去。

不过，公主在婆家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受了不少气。

周胜之冷落女儿的事，文帝肯定知道，自然很恼火，于是便以周胜之杀人为借口，下诏将他处死。

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在将侯国废除一年后，文帝还是决定再次恢复周家爵位，并计划从周勃诸子中选择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出来继承侯爵。

于是，周亚夫被推了出来，封为条侯(食邑在条城，今河北省景县)。

此次匈奴大举入侵，文帝特意将周亚夫调来，让他驻军细柳，委以京城防卫之重任，就是要考验一下他的能力。

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如今，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将军们已凋零

殆尽，文帝身边缺乏独当一面的大将。一旦大敌当前，又该靠谁冲锋陷阵，御敌于国门之外呢？

战争才是军人的磨刀石，卓越的将领都是在战场上磨砺出来的，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和平年代出不了真正的大将之才。

战争是国家意志的较量，个人英雄主义从来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所以，真正的大将不一定饱读兵书，本人武功不一定要有多强。

战争中主将的智慧、胆识、意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将成千上万将士握成一拳，打得出去，收得回来，能够号令如一，令行禁止。

汉军已沿着北方防线布置了大量军力，但文帝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京城的布防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他决定亲自到各处去视察一番，做到心中有数。

文帝从长安出发，先到刘礼统领的霸上军营，再到徐厉统领的棘门军营。

听说天子亲自前来劳军，两地驻军早早做好准备，将军营收拾一新，待到皇帝车驾来临时，全体将士在军营门口夹道欢迎，任由卫队在军营内纵马狂奔。

谁不想借此机会，给皇帝留下个好印象呢？

但文帝似乎开心不起来，脸上没有丝毫笑意，眉头紧蹙，忧心忡忡。他看出来了，两处驻军军纪松懈，将士们松松垮垮，一旦匈奴人突破边塞，不出两日便能抵达关中腹地，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指望他们战胜敌人？

视察完两地后，文帝没有稍做休整，立刻直奔细柳而来。

皇帝护卫队的前行开路人马先行一步，提前抵达细柳军营门外。

与前两地不同的是，军营大门外空空荡荡，没有人出来迎接。相反，壁垒之上将士们都铠甲鲜明，一个个刀出鞘、箭上弦，戒备森严，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军营上下弥漫着战争的紧张气息。

前行人马别说入营，根本靠近不了，无奈之下，只得冲营内喊话："天子将至，速速开门迎接。"

谁知军营都尉冷冷地回话道："军中只听将军军令，不听天子诏令。"

碰了个钉子，前行人员气得不行，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傻站在军营门口。双方就这样对峙着，直到文帝率领大部队到来。

不过，军营都尉依然不肯开门放皇帝一行入营。

文帝无奈，只得派人带上皇帝符节前去传话："皇帝前来慰劳军队，请开门迎接天子。"

半晌，才见军营大门缓缓打开，文帝正准备纵马入营，有个守门的小吏站出来提醒说："我们将军有令，在军营中不得纵马疾驰，望陛下见谅。"

文帝心头一凛，不由自主地放缓步伐，徐徐进入营来。待走到将军营帐外时，方见周亚夫满身披挂，手执兵器在帐门外等候。

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见到皇帝驾临，周亚夫并没有跪下行君臣跪拜大礼，仅仅略微躬身，行拱手礼，说："臣下身着甲胄，望陛下原谅臣不能行大礼，允许臣以军礼相见。"

入营后，文帝发现细柳军营内军容整肃，将士们士气昂扬，毫无颓废之气，不由得为之一振。再看周亚夫器宇轩昂立在车驾前，不怒自威，颇有大将风范，心下不由得暗生欢喜，便扶着车前轼木，神态肃穆地向将士们致意，并让人对周亚夫传话说："将军辛苦，皇帝陛下特意来慰劳将军!"

劳军仪式结束后，文帝当即离去。随从人员慑于周亚夫军威，一个个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直到离开大营后，才长舒了一口气。

众人觉得周亚夫对皇帝态度如此不恭敬，莫不是要图谋不轨(联想到周勃的结局)？大家都一脸恐慌地看着文帝，但无人敢吭声。

一路上，谁也不敢说话，怕惹得皇帝大发雷霆。有人私底下暗自幸灾乐祸，等着周亚夫倒霉，看他的笑话。

不料过了半晌，文帝却由衷赞叹说："像周亚夫如此治军，才称得上真正的将军啊。至于霸上、棘门军营，犹如儿戏，防御形同虚设，倘若敌人偷袭，主将迟早会沦为俘虏；至于周亚夫，谅匈奴人连进攻的胆量都没有!"

好在匈奴人在边境滋扰一番后，便自行离去，仗终究没有打起来。月余后，朝廷也下令，拱卫长安的三大营也撤防。至于周亚夫，事后被文帝拜为中尉，留在了长安。

中尉，位列九卿，负责京城的治安，兼管中央武库，可谓位高权重。文帝将如此重任交给周亚夫，对他的欣赏与器重可见一斑。几年后，周亚夫凭借他的勇气和忠诚，将陷入内乱的大汉帝国从危亡之际拯救过来。

事实证明，文帝有着过人的识人眼光和敢于用人的魄力。

外患暂时解除了，但内忧却接踵而至。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盛夏之际，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庄稼大面积枯死，紧接着蝗灾又起，田野里到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它们肆意破坏，无论庄稼、花草树木，无一幸免。蝗虫过后，赤野千里，化为一片白地。

面对各地不断传来的灾情，文帝焦灼不已。他下诏宣布，从现在起，暂停各诸侯国向朝廷的进贡，取消对一切山川沼泽的封禁令，允许百姓们入禁区狩猎捕捞，展开生产自救；同时缩减宫廷各项开支，

对郎官等人员进行裁减，命令打开官仓，拿出粮食赈灾；另外，允许有爵位的百姓出售爵位。

然而，灾情依然无缓解的迹象。

文帝想：朕即位二十多年来，宵衣旰食，兢兢业业，但上天为何还是如此待朕？难道是朕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恼了上苍？

朕生活中节俭为本，拒绝一切奢华；无论对诸侯还是百姓，都宽容相待，废除肉刑，抛弃秦以来的苛政；重视人才，从基层选拔有才之人；尊重功臣，让他们善始善终，生荣死哀，能做的朕都做了，但为何上天对朕依旧如此不公？

懊恼、忧虑、恐惧、疑惑，文帝百思不得其解，种种困扰之下他病倒了，自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康复。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文帝病情越来越重，他感到死神正在向他招手，自己时日不多了。

对于生死，文帝看得很开。自古以来，哪有不死之人？生老病死，皆出于造物主之手，有谁能逃脱？想开了，也就释然了。

文帝知道，他能坐上皇帝之位，完全是一场意外，与天命和德行完全无关。现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结束坎坷曲折的帝王生涯，要趁着清醒，将身后事交代清楚。

他太疲惫了，临死之际，没了对生的留恋，没了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多了些从容，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

自己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千斤重担将由儿子刘启挑起来。外有匈奴强敌压境，内有诸侯隐忧，太子能否扛得起来？他心中没底。

对于身后的人事安排，文帝没有太多的交代，只是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周亚夫。

“我死后，万一国家有难，周亚夫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可以委以重任，让他率兵出征，必能力挽狂澜，切记切记。”

文帝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太子刘启。

## 新朝气象

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夏，六月初一，文帝驾崩于未央宫，时年四十六岁，在位二十三年。

在身后遗诏中，他一再强调自己德行浅薄，反对厚葬，丧葬仪式一切从简，切不可过于扰民。遗体下葬三天后，无论官民，即可停止举哀。至于后宫嫔妃，悉数送回娘家。

先秦以来，帝王丧葬本着事死如生的原则，无不极尽奢华，恨不得将生前所有生活用度如数搬到地下去，更有罪恶的人殉制度，逼迫后宫嫔妃等人殉葬。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但文帝终止了它，这一点实在值得嘉许。

皇帝临终遗诏，本该交代身后国计民生、内政外交、人事安排等大政方针才是，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他一概不提，唯独不厌其烦地叮嘱丧葬之事，甚至吊唁人员的丧服和哭灵天数，都反复叮咛。

文帝留下这些令人费解的遗言，背后的原因估计只有一个，他知道自己一生无论文治武功都乏善可陈，唯一可以称道的是苦心竖立起来的仁君形象，这是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他非常在乎后世怎么看自己。

一个人，尤其是作为帝王，爱惜名誉，在意后世的评价，说明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倘若像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实在可怕。

不可否认，文帝遗诏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数百年后，他的墓室被盗，盗墓者从霸陵的玄宫中盗窃出大量陪葬品来。事实说明，文帝墓葬也并非如他宣示的那样节俭寒酸。

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皇帝。

纵观数千年历史，靠文治武功彪炳千秋的帝王不乏其人，但像他这样懂得克制和内敛，并为自己设立了清晰底线的帝王并不多。

文帝驭龙宾天后，太子刘启遵照父亲的遗愿，提拔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同时，任命典属国徐悍为将屯将军(一种杂号将军)，任命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

复土将军是临时职务，皇帝去世时，负责陵寝营建及下葬工作，葬礼结束后，随即撤销。

文帝还是代王时，张武就追随在文帝身边，后来，他跟随文帝入长安，多年来深受倚重。如今，由他来完成文帝尘世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情理之中。

朝廷征发长安附近各县士卒一万六千人，又调集内史(自秦时起，京畿附近由内史治理，故该区域以官名为名，不称郡，治所在咸阳)士卒一万五千人，由张武统一指挥调度，负责霸陵墓道的开凿，以及举行皇帝棺椁下葬仪式。

沉寂的霸陵，一下子冒出了三万多人，变得喧嚣起来，錾子凿子开凿山石发出的叮叮当当之声在空谷间回荡，士卒们的号子声震动四野。

正当张武率领士卒们在霸陵工地热火朝天干活时，在长安庙堂上，大行皇帝的丧礼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文帝走后，皇太子刘启扛起了父亲撂下的重任。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九，刘启即皇帝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尊父亲为太宗孝文皇帝，谥法慈惠爱民曰文，文是相当高的美谥了。

紧接着，景帝下诏，要求在京城和各诸侯国为文帝立太宗庙，与高祖庙一样享受世代供奉。

作为皇帝，文帝或许算不上太出色，不过，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不好大喜功，不瞎折腾，在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和处处掣肘的内部朝堂之间辗转腾挪，艰难维持大汉没有散架，已经尽力了。

逝者已矣，举国悲哀的丧礼表面之下，新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了。

根据宗法制，王朝开国者为始祖，然后他的法定继承者(理论上应该是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后君位应由他这一脉继承，至于他本人死后则应被尊为太宗。

景帝尊文帝为太宗，就等于向天下人宣布，从此以后，汉家天下都由他这一脉来继承，别人全都死了心吧。景帝这一招，实在厉害，抢先一步，站在了法理和礼法的制高点上。

与此同时，新朝人事布局也已开始。

丞相乃是百官领袖，不宜轻动，仍由申屠嘉担任。御史大夫由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陶青出任，至于廷尉则由张欧担任。

张欧是景帝太子宫的旧部下，专攻刑名律法，虽说是研究法学出身，但为人却温和宽厚。

这三人可谓老中青组合，是典型的阶梯型搭配，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做到了各派势力的最大平衡。可以看出，景帝颇费了一番心思。

景帝目睹了父亲在位时，一直受先朝老臣的掣肘的情景，父亲终其一生都小心谨慎，步履维艰。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汲取教训，决不

走父亲的老路。

最高权力架构安排妥当以后，剩下的事，就是最大限度扩充自己的班底人马。若没有把一班嫡系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景帝恐怕又会沦为弱势皇帝。

此时霸陵营建已完工，文帝的棺椁顺利送入玄宫，墓道填封后，文帝的葬礼在盛大的挽歌中结束。

随文帝下葬的，不仅仅是陶俑、生活用具等，还有张武的政治前途，也被一并埋葬。张武的郎中令头衔与复土将军这个临时职务一起被罢免。

像郎中令这样的关键职位，必须交给自己人，景帝才能睡得放心。

新任的郎中令是前太子舍人周仁。与贪财受贿的张武相比，周仁为人廉洁谨慎，值得信任。

朝廷司法和宫廷安保已经交给了自己人，但这还远远不够，京畿之地拱卫京城，地位非常重要，也必须安插自己人马才行。景帝下令将内史一分为二，由贴身智囊中大夫晁错担任左内史。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权力交替的规律。

通过一系列人事大洗牌之后，景帝很快稳固了地位，将朝政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巩固内政之余，外交工作也丝毫不能疏忽。御史大夫陶青受命到代国边塞送公主与匈奴和亲，在此新老交替的特殊时机，景帝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必须设法稳住匈奴人才行。

不过，想要帝位永固，争取民心支持才是头等大事。就在即位当年五月，景帝宣布了一项重大惠民政策，减免百姓二分之一田税，降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为了便于了解这项政策，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汉初以来的税收变化。

汉承秦制，赋税制度莫能例外，不过是在原来秦朝制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调整而已。汉时主要税目包括田租(农业土地税)、刍稿税(田亩附加税)、口赋(人头税)等，其中田租是最主要的一项税目，为朝廷财政的最主要收入之一。

田租是实物征收，即按照土地年产量的一定比例征收。大汉建立之初，高祖就命人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照十五税一征税。

高祖晚年，估计为了应对剪除异姓王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税率有所提高。待到惠帝时，又恢复了十五税一制，终惠帝、吕后执政之世，一直沿用不变。

及文帝即位，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分别于文帝前元二年、十二年、十三年将当年的田租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再减免一半，即执行三十税一制。

不过，这几次减税政策仅限于当年。就是说，国家的正常法定田租依旧是十五税一，减税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优惠政策罢了。

此次景帝宣布，三十税一成为永久税制，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惠民措施(关于景帝推行三十税一制的时间，史书记载有差异，《史记》《资治通鉴》称景帝前元元年，《汉书·食货志》称景帝前元二年)。

除了减轻百姓税收负担外，景帝对刑法制度也做出了重大修改。

废除肉刑作为文帝的一项德政，为他赢得了名誉，然而，这项举措空有减刑之名，却行杀人之实。本来经受肉刑之后，还可以活下去之人，改革后却被活活笞打致死，因此，这项举措受到世人诟病。

景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下诏说，将原判处肉刑的罪犯改为笞刑，增加笞打数，实际上与判处死刑没啥区别，有些人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也沦为终身残废。此后，将本该判笞打五百次的，减为打三

百次；原笞打三百次的，改为笞打二百次。

被按倒在地，挨二三百板子，尽管也是非常残酷的刑罚，估计还是不少人挨不住，被打死打残。但无论怎么说，比起挨五百板子，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

即位后不到一年间，景帝频密推出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对提升自身形象着实加分不少。

紧接着，景帝将另一项大事也提上日程，那就是给自己儿子们封王。与高祖和文帝相比，景帝儿女较多，先后有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大汉建立初期封的那些诸侯王，与景帝血缘已远。像吴王刘濞自恃财大气粗，实力雄厚，文帝在位时，已开始对朝廷多有不恭。如今，新皇帝即位不久，他更是倚老卖老，对景帝曾打死他儿子一事至今耿耿于怀，对朝廷心怀不满，天下人尽皆知。

为防范吴、楚等关东诸侯，必须未雨绸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时机，还是自己儿子值得信任(当然，在权力斗争中父子亲情也未必靠得住)，必须将儿子们封到各地，扶持和壮大他们的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儿子们就是有力的帮手。退一步说，就算帮不上忙，至少可以稳住基本盘，在诸侯面前，保持中央朝廷的相对优势，天下就不会出大乱子。

景帝皇后是奶奶薄太后(景帝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娘家人，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迎娶她为太子妃。

估计这位薄皇后，是文帝为了讨好老太太强行包办的，景帝一直不喜欢她。

薄皇后有个致命缺陷——不能生育(也有可能是景帝厌恶这门婚姻，不愿亲近她，使她根本没有怀孕的机会)。自古以来，皇后不育者，地位就很难坐得稳。果然，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夏四月，薄太后一死，薄皇后失去了靠山，很快就被废黜了。

至于理由，无法为皇家繁衍子嗣，这一条就足矣。

薄皇后一废，虎视眈眈的嫔妃们为了争夺皇后宝座，马上开始明争暗斗。皇帝的女人很多，但皇后却只有一个，皇后的凤冠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为了争夺它，在宫廷内上演的斗争之残酷，丝毫不亚于庙堂上男人们之间的斗争。

不过，就目前来看，后宫嫔妃中，最有可能成为继任皇后者，非栗姬莫属。

栗姬也是自信满满，以准皇后自居。

栗姬有自傲的资本，她一口气先后为景帝生下刘荣、刘德、刘阏三个儿子，其中刘荣又是皇长子。

由于薄皇后没生育，宫中缺嫡子，按照礼法，在皇位继承人顺序中，刘荣排列最前。若不出意外，刘荣被立为皇太子是早晚的事，而栗姬的另外两个儿子刘德、刘阏也分别被封为河间王和临江王。特别要介绍一下河间王刘德，他喜欢收藏书，不惜重金从民间征集购买上古遗书。作为一个爱书人，他有个很不错的习惯，每当收集到一卷好书时，特意让人将书誊写一遍，将副本送给原主人。

爱藏书之人比比皆是，但能做到刘德这样的的确不多。刘德藏书并非用来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而是认真钻研。

刘德认真做学问，名气越来越大，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敬重，有些人不惜拿出祖传的孤本藏书，献给刘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德藏书越来越多，快要赶上朝廷藏书的规模了。

刘德收集整理了不少周秦之际的古文(用籀文书写)旧书，包括《周官》《尚书》《礼记》《孟子》等，多是是儒家学说的经典文献。

许多山东儒学研究者得知后，都纷纷跑来和刘德交流切磋。

刘德做学问，不盲从、不迷信古人，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对比、筛选、甄别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后世流传极广的成语“实事求是”，最早就是用来称赞刘德的治学精神。

虽说生下了刘德这样高智商的儿子，但栗姬本人的智商实在堪忧。她凭着漂亮脸蛋，仗着皇帝宠爱，根本不屑与后宫其他嫔妃为伍，说话做事完全不经过大脑，一切心事都明白无误地写在脸上。

或许可以说栗姬是个性情中人，为人至纯无伪，然而，后宫从来就不是太平世界，像她这样的性子，能在后宫是非之地存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性格决定命运，栗姬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以悲剧收场。不过目前，她在后宫的风头正劲。

在宫里混的，无论嫔妃，还是宦官，哪一个不是人精？看到栗姬备受皇帝宠爱，都争着讨好她。

栗姬正在享受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只是，并非所有人都像栗姬这样母以子贵、子以母荣，比如唐姬母子。

唐姬原本是景帝另外一位宠妃程姬的侍女，她能够跻身皇帝嫔妃行列完全是一场意外。

有一次，景帝醉酒召幸程姬，不巧的是，程姬正逢例假期，便让身边侍女唐姬收拾梳妆一番，代替自己侍寝。

景帝当时醉意朦胧，根本没有分得清，春宵一度后，唐姬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后生下一子，取名刘发。

为皇帝生下皇子，固然可喜，但由于唐姬身份卑贱，母子二人在宫中不大受人待见。

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封王之际，栗姬儿子自不消说，其

他几位嫔妃，如程姬的儿子刘余被封为淮阳王，刘非被封为汝南王(另外一个儿子刘端，后来被封为胶西王)，贾夫人的儿子刘彭祖被封为广川王，封地都是极好的地方。

只是，苦了刘发母子二人，被封到了潮湿狭窄的长沙国。

原长沙王吴著在景帝刚即位没几天，就去世了，他膝下没有子嗣，朝廷顺势就将封国废除了。就这样，汉朝异姓诸侯王时代至此彻底终结了。

长沙国狭小，地势低洼，加上气候潮湿，景帝就把它丢给了刘发。

同样是皇子，差别实在太大，刘发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数年后，刘发回到长安为景帝祝寿，宴席上，他起身献舞，只是缩手缩脚，好像肢体受到拘束，无法舒展开来一般。刘发扭扭捏捏的舞姿，惹得在场观众哈哈大笑。

景帝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便问刘发："要跳，好好跳便是，为何搞成这副样子？"

刘发当下接过话茬儿，一语双关地说："臣在狭窄地方待久了，一时间无法放开手脚。"

景帝马上明白过来，对刘发这孩子，确实有些愧疚。为了弥补，当下将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划分给长沙国。

不过，谁也没料到，时间过了一个半世纪后，正是谁也看不起的刘发后裔一支子孙，在汉朝倾覆危亡之际，扛起了复兴汉室、重振刘氏江山的重任。

至于其他人，彼时早已灰飞烟灭了。

## 一语成谶

景帝即位后，朝堂上的群臣中，要论君臣关系，无人能出晁错之右。就是丞相申屠嘉、御史大夫陶青这样位列三公的重臣，在景帝眼中，尚不如晁错这样一位区区内史，更别说廷尉张欧、郎中令周仁了。

景帝和申屠嘉在朝堂上论事时，完全是中规中矩的君相议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但是令申屠嘉感到郁闷的是，自己作为堂堂大汉丞相、百官领袖，在景帝上台半年以来，快沦为橡皮图章了，朝廷大事、法令修改等事，自己根本插不上嘴。

几乎所有大事，都是皇帝和晁错在私下商讨决定的，凡是晁错提议的，皇帝一律照准，而对于自己提的意见，景帝多敷衍了事。

申屠嘉这个丞相近乎成为摆设了。

一气之下，他干脆躲在家中生闷气。

虽说不出门，但毕竟是帝国丞相，申屠嘉耳目并不闭塞。很快，他得到一个消息，晁错办公的内史府新建了一座南门。

朝廷衙署建一座门，本是稀松平常之事，只是这座门修得不是地方，严重违背礼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内史府大门原本是向东开，晁错出门上朝办事，需要绕一大圈，给晁错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晁错是个急性子，做事讲究高效率，不想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路上，便想从南面开一扇门。

只是内史府南面毗邻太上皇庙(祭祀高祖的父亲刘太公的庙)，要从南面抄近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凿穿太上皇庙的墙垣。

估计是，晁错因景帝的过分宠信昏了头，命人在太上皇庙墙上开了一个洞。

在皇家宗庙外墙打洞，实在是大逆不道之事。要知道当年有人盗取高祖庙供桌上的玉环，要不是张释之拦着，文帝盛怒之下，差点将盗窃者灭族。

论性质，晁错此举要比盗窃更加恶劣。

如此一个打击政敌的绝好机会，申屠嘉岂能放过？他立刻上书皇帝，要求诛杀晁错。申屠嘉是军人出身，习惯了按部就班，做事都按照程序来。

他自信以为这次掌握了晁错的把柄，罪证确凿，足以给政敌致命一击，扳倒晁错十拿九稳。

夜很漫长，申屠嘉静静等待，好不容易熬到天明，就动身入宫。一路上，他反复盘算了多次弹劾词。

申屠嘉见到景帝时，发现皇帝身后站着晁错，猛地有一种不祥预感涌上心头。不过，这种念头在申屠嘉脑海中仅仅盘旋了片刻，他就镇定下来。

申屠嘉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什么场面没见过？就不信晁错能翻了天。

于是，他无视晁错的存在，从容慷慨陈词，指摘晁错大不敬之罪，要求皇帝立即下诏，诛杀晁错。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景帝没有暴怒，没有咆哮，脸上平静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晁错凿墙之事，是经过朕同意批准的。”

景帝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平淡无奇之事，但对申屠嘉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着一脸错愕的申屠嘉，景帝很耐心地解释说：“晁错凿通之墙，是太上皇庙的外围墙，并非真正的庙墙。况且，在那里原本就住

着一些散官，谈不上对太上皇庙的冒犯，这件事，晁错从头到尾都没错。”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申屠嘉还能说什么？

既然晁错无罪，那么，申屠嘉就属于诬告了？

无奈之下，他只得违心地向皇帝请罪。

大家都是聪明人，景帝当然不会真的就此治罪，温言宽慰了申屠嘉几句忠心体国、其心可嘉之类的客套话后，就宣布结束朝会。

眼看一场血雨腥风，就这样风轻云淡地结束了。

申屠嘉生性耿直，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为官清廉，私德无可挑剔，加上军人出身，说话做事干净利落，直来直去。

正因为如此，他向来自视甚高，不喜欢搞小圈子，敢于碰硬。可惜的是，如今天子不是文帝，晁错也不是邓通，他奈何不了。

申屠嘉下朝后，百思不得其解，只怪自己没有抢先一步，先下手为强。若是来个先斩后奏，先将晁错斩了，再去向皇帝报告，估计皇帝也只得面对现实了。

只是，时机一旦错过，说什么都晚了。

申屠嘉哪里知道，他在家中静待天明的那个夜晚，是个极不平静的夜晚。

一夜时间很短暂，但也很漫长，足够做很多事。有时候，一夕之间，足以改变历史。

就在申屠嘉将弹劾书递进宫不久，消息传到了晁错耳中。他大惊失色，立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趁着暮色入宫，抢先一步向皇帝主动请罪。

晁错先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向皇帝做了汇报，经过半宿诚恳反思和检讨，景帝大度地表示，鉴于晁错自动认罪，态度不错，此事到此为止，不会追究。

要说在战场上挽强弓冲锋陷阵，申屠嘉在行，但要是玩职场权术，他实在太低级了。虽说此时他已担任丞相五年，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在官场那些游戏面前，他依旧犹如一名新秀。

抑或不是不知，而是不屑为之。

但官场世界，单靠忠诚、廉洁、耿直远远不够，还需要生存智慧。

回想往事，自己历经九死一生，从没怕过谁，不料却栽在晁错这竖儒手中。申屠嘉实在不甘心，心中愤愤不平。

申屠嘉一口气憋在心头，无处发泄，回到家中后，急火攻心之下，大口吐血不止。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依照惯例，申屠嘉死后，御史大夫陶青递补为丞相，由晁错担任御史大夫。

经过此事，世人充分领教了晁错的政治能量，朝野为之震动，谁也不敢再去招惹这位皇帝身边的“智囊”。

申屠嘉之死，表面看似死于一场突发疾病，属于意外事故。实际上，死因是偶然，但结局是必然。

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日子太久了，景帝决不能容忍他们无休止地掌权下去，是时候改变这种局面了。

让申屠嘉继续担任宰相，只不过是景帝即位之初的临时安排，本来就是权宜之计。

对于毁坏宗庙外墙之事的处置结果，固然有景帝宠信晁错之缘故，但绝不这么简单。

景帝不甘心像父亲一样，做个弱势皇帝，他绝不希望朝堂上再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强势宰相，继续把持朝政。

试想，申屠嘉动辄在景帝面前说，当年臣追随高祖皇帝躬冒矢石，诛灭暴秦云云，景帝会是什么感受？

没有人能长期容忍一个爷爷辈的人，整天摆老资格，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地唠叨，景帝也不例外。

申屠嘉幸亏死得及时，不然，说不定景帝会亲自送他到地下服侍高祖去。但并非所有人都像申屠嘉这般，死得恰是时候。

景帝是个记仇的人，凡曾得罪过他的人，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他都记着。

张释之秉公执法，在宫门口拦截过他，他即位后，尽管表面上大度地表示不会追究，但短短一年后，就将张释之调离长安。不久，在落寞中，张释之死于淮南国相任上。

张释之好歹算是善终了，但邓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自文帝去世后，邓通就夹着尾巴做人，把自己关在家中闭门谢客，可景帝仍然没放过他。邓通给文帝吮吸脓疮，使自己难堪不已的往事，景帝一直记着，即位伊始，他就免去邓通太中大夫一职。

有些人很快就嗅出风向有变，邓通倒霉的时刻到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此时此刻正是落井下石的时机，还犹豫什么呢？

客观地说，邓通谈不上道德高尚，倒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文帝对他宠爱有加，但他也有自知之明，做人比较低调，很少掺和朝政大事，做人也比较本分。

但如今皇帝要整人，作为臣子，要是不积极响应，那就是大大的不忠。

打击政治人物，通常就是两个办法，要么从政治入手，查查是否

有私下搞阴谋、涉嫌谋逆之类的行为；要么从经济入手，调查一下，看看是否存在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之类的行为。

可惜的是，这两种办法，在邓通身上都行不通。

文帝在世时，邓通在他心中的位置非常特殊，文帝与他的关系远比与景帝这个儿子还要密切。真要给邓通扣个谋反之类的不赦之罪，搜集证据实在有点困难。

至于贪污腐败，邓通更是不沾边，不是他不爱钱，而是他本身就是钱的象征。一般人或许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但邓通一辈子或许什么都缺，就是不差钱，因为他家本身就是铸钱的，要多少，就铸多少。

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再大的难题都难不倒有心之人。既然邓通最大的问题是钱，那就以钱为突破口。

不久，朝廷收到揭发信，检举邓通私自在西南境外铸钱。

邓通铸钱是合法的，但他跑到境外铸钱，究竟想干什么？难不成想勾结外敌，给大汉的敌人送钱？

邓通的主要铸钱基地就在蜀地，邓氏钱流通天下，是否有将钱输出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估计邓通本人都说不清。

据官方说法，经朝廷有关部门实地调查，确有其事，罪证确凿。

那还等什么？景帝立刻下令，将邓通的财产全部充公。

朝廷宣布，就算没收了全部钱财，距离罚款数额，邓通还欠过亿。

如此天文数字，邓通注定是还不清的，当然，景帝也没指望他还得清。

这是一场猫玩老鼠的游戏，景帝不急于让邓通马上去死。他就是

想看着曾经富甲天下的邓通，一无所有后，穷困潦倒，在绝望和恐惧中一点点消耗生命，直到奄奄一息。

死亡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死期已定，自己却无能为力。景帝就是要看着邓通像溺水之人一般，慢慢地沉下去。那远比一刀处死他，更能满足他扭曲的报复心理。

可能是念在邓通曾忠心侍候过父亲的分上，长公主刘嫖于心不忍，私下派人偷偷给邓通送去一点钱物。

哪想到，邓通身边布满了朝廷的眼线，刘嫖的手下前脚刚走，后脚就有官吏上门，称邓通还欠朝廷亿万巨债，当即把她送的钱物给没收了。可怜的邓通，连个束发的簪子都不剩了。

刘嫖无奈之下，只得让人给邓通接济些衣食。

走投无路之下，邓通只能露宿街头，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邓通饿死在街头。

昔日，曾有相面者预言邓通会被饿死，如今一语成谶，难道世上真有未卜先知之人？

预言之类的事，没人能说得清，邓通的命运也绝非冥冥之中注定。

且不说这则预言是否真有过，就算是真有此事，也是在景帝一手操作之下，让饿死邓通的预言最终应验了。

景帝的恶毒远不止饿死邓通这一件事，数年以后，他让另外一条饿死人的预言，也得以应验。

邓通的死，让景帝压在心头多年的恶气终于得到释放。

但烦心事，依然不少，头号烦恼就是立储之事。

高祖、文帝都是在称帝不久便进行立储。按照惯例，景帝登基后

就该册封太子，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三月，景帝封诸子为王，却没有册立皇太子。

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 家宴风波

景帝迟迟不册立太子，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薄皇后虽然眼下膝下空空，但并不代表她以后永远不能生育，太皇太后薄氏还健在，贸然立一个庶子为太子，也要考虑一下老太太的感受。总之，即位之初，册立太子时机不成熟。

不过，就在封王过后不到一月，薄太后就去世了。

此后数年间，太子的位置一直空着，景帝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立太子之事，看上去遥遥无期。

这样的情况，在以前还没出现过。

之所以这样，主要是景帝顾忌母亲窦太后的感受。

窦太后已失明多年，老太太虽眼盲，但心里亮堂着呢。

俗话说，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但娘的心是长偏的，一碗水难端平。窦太后在对待儿子们的态度上，跟寻常百姓家老太太没多大区别，对小儿子刘武偏心一些，格外疼爱。

她觉得，景帝做了皇帝，刘武却只是个诸侯王，实在委屈了他。

老娘的心思，景帝心中如明镜一般。

为了讨好老太太，景帝竭力满足刘武。

刘武的封地梁国，地处天下之中，下辖四十余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凡有好东西，景帝首先赏赐给这位宝贝弟弟，刘武库房藏钱

接近一百亿，珠宝玉器更是数不胜数，远比长安皇家收藏还要多。

这么多钱，就是几十辈子也花不完，有钱花不出去也是件烦心事。

在古代社会，受技术条件限制，花大钱又好玩儿的事并不多。刘武想来想去，那就搞工程吧，他决定扩大梁国都城睢阳城的城建规模，经扩建以后，睢阳的周长达七十里，快超过长安城了。

而后，他又大规模营建园林，面积方圆三百余里，几乎可以与皇帝的上林苑相媲美。

有钱有势，自然有人会主动套近乎，不少人纷纷主动来投靠刘武。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出身不同，但目的相同，就是想攀上刘武这棵大树升官发财。

这些人中，有文人骚客，也有亡命之徒，既有给刘武涂脂抹粉装点门面之辈，也有出帮忙馊主意、下黑手的不法之徒。一时间，刘武的梁国内汇聚了三教九流的人物。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一年岁首，诸侯赴长安朝见天子，刘武也在其列。

当刘武一行抵达函谷关时，发现长安方面早早派人在此等候迎接。

迎接刘武的标准，远远超出诸侯王应有的待遇，一切仪仗、车马都是天子规格。迎接使者手持皇帝的符节，请梁王登上皇帝御用辇车，一路浩浩荡荡，开往长安。

到达长安城郊时，皇帝已在迎候，兄弟二人同乘坐一辆车，一起返回未央宫。此后一段时间，哥儿俩又再次同车前往上林苑狩猎，看上去兄谦弟恭，手足情深，给天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是，其间究竟有多少是真情实意，又有多少是作秀表演，只有

他们本人心里清楚。

不过，景帝如此大张声势、近乎夸张的做法，既有做给老娘看的意思，也有做给天下人看的成分。

窦太后有窦长君、窦广国两位兄弟，景帝即位时，窦长君早已去世，为了博窦太后欢心，景帝封窦广国为章武侯，封窦长君的儿子窦彭祖为南皮侯。

景帝知道，要哄得老太太高兴，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得在她心头肉刘武身上下功夫。

除了这一层外，景帝也想让那些对他怀有异心的诸侯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并非孤家寡人，还有个亲弟弟在支持，一旦有难，绝非是一个人在战斗。

朝会仪式结束后，景帝特意设家宴款待刘武。席间都是家人，没了庙堂上的礼仪拘束，大家酒喝得很高兴，景帝也不知不觉多喝了一些。

兄弟俩推杯换盏，亲切的话越说越多，不经意间，景帝说了一句让在场人出乎意料的话：“待我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梁王。”

景帝的话说得真真切切，本来喧闹的酒宴，一下子沉寂下来。谁都摸不清皇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有何用意。

是趁着酒意在试探刘武，还是酒后失言，在场的人都吃不准。所以，权当什么都没听见。

窦太后耳朵好使得很，听后当即喜形于色，欢欣不已，这是她等了许久、最想听的一句话，她感到心情非常舒畅。

刘武听后，内心也不禁一阵狂喜，但很快冷静下来，他可不像老太太那样，头脑简单好哄，他知道这肯定不是景帝的真心话。

兄弟情义再深厚，哪里比得上父子情深？哪有放弃自家儿子，将

皇位传给弟弟的道理？

所以，欢喜归欢喜，他还是连连谦让了一番。

本以为这段家宴间的意外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此时有人站了出来，义正词严地指出，皇帝的话是大错特错，会酿成大祸，并要皇帝纠正错误，立刻收回说过的话。

此人名叫窦婴，官拜詹事。

詹事主要负责太后、王后、太子等诸宫饮食起居等日常事务，秩二千石。

詹事官职前通常加上所在宫室名称，比如皇太后宫称长信宫，太后宫詹事称作长信詹事，太子府詹事称作太子詹事。詹事属官有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等。

窦婴是窦太后娘家堂侄，世居观津，平常喜欢交游，朋友圈子比较广。文帝时，窦婴曾一度出任吴国国相，后来由于身体不适(估计是伺候不了吴王刘濞而找的借口)，去职在家疗养。景帝即位后，窦婴重新出山，担任詹事一职。

论身份，他是窦太后的家人；论职务，他是詹事。所以他出席皇帝家宴，是在情理之中。

刚才景帝那番话传入耳中后，以窦婴的政治直觉，马上觉得不对劲，皇帝心里怎么想他不知道。但皇帝说出如此高度敏感的话来，作为臣子，该如何回应？

立即附和称赞，陛下英明!若说出这样的话，就是政治白痴。很显然，窦婴不傻，不会蠢到自我作死。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只管闷头喝酒，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无论你们选谁做皇位继承人，都是你们老刘家的家事，跟我们老窦家毫无关系。作为外人，皇帝立皇太子我全力拥护，立皇太弟我双手赞

成。

在局势尚未明朗之前，最好不要轻易表态站队，两边都不得罪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骑墙做法或许不可取，但做官学会两面下注，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

窦婴显然既不是智商低能儿，也不是官场老滑头，他端了一盏酒，走到景帝面前说：“大汉的天下，是高祖开创的基业。帝位父子相传，是汉家制度，陛下岂能轻易改变规矩，传位给梁王？”

本来喜乐融融的宴会，顿时变得很尴尬。

在这种氛围下，不论如何打圆场、和稀泥，都是吃力不讨好。

景帝、梁王刘武、窦太后谁都不再言语。再丰盛的酒宴，此时吃喝起来都变得索然无味。

一场本来欢欢喜喜的皇家聚会，由于窦婴不合时宜地搅局，最终不欢而散。

这位不识相的堂侄，公然出来扫兴，让窦太后胸口堵得慌。好啊!你小子是见不得我太开心，成心给我添堵。

窦婴也明白，这一次算是彻底惹恼了姑姑，便再次称病辞职。这样一来，窦太后火更大了，你还跟我犟上了，看来不愿伺候我了，那以后干脆也少在我眼前晃悠，眼不见心不烦。

没过几天，窦婴接到消息，老姑姑已经将他从入宫名册上除名，剥夺了他入宫的资格。并传出话来，以后你且安心在家养病，朝廷春秋朝会大典，就不用参加了。

姑侄俩从此就杠上了。

梁王刘武看老娘为了他，不惜跟自家堂侄翻脸，暗中自喜，变得

更加骄横。

唯有一个人，经过此次家宴后对窦婴颇有好感，觉得他立场坚定，值得信任。

此人便是景帝。

窦婴，你暂且等等吧，你终究会有出头之日的。

不过，窦婴在家赋闲的日子并没有太久，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被朝廷请出山来。

直接原因是，吴、楚等诸侯发动叛乱了。

吴王刘濞不臣之心由来已久，景帝害得他老年丧子，这份恨他一直放在心头，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好在刘濞终究是经过战火考验之人，知道举兵反叛不是闹着玩的，反复权衡之下，拿不定主意，因而迟迟没有起兵。

有些人以为，刘濞年龄大了，胆子小了，其实不然。他的谋反之心多年来有增无减，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

名不正，则言不顺。打仗并非单纯地在战场上两军对垒，争取舆论的支持，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文帝在位时，对刘濞这位堂兄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一直宽容大度，多加安抚。而吴国方面，一来蓄积力量需要时间，二来一时之间也找不到起兵的理由，一来二去，就拖到了现在。

对于刘濞的野心，天下人看得一清二楚，贾谊、晁错等人一再建议文帝，对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做好准备，有所作为。

文帝由于内外受困，只能本着能拖就拖的原则，将问题留给了后人。

朝廷和刘濞对对方的心思都一清二楚，双方都在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景帝即位后，晁错觉得，诸侯坐大的局面已经形成，若再不果断出手，恐怕后患无穷。所以，他一再给景帝上书建议削藩。

君臣二人常在一起谋划如何削弱诸侯势力。

晁错在景帝耳边不断劝说，先出手将制人，后出手必将制于人。

景帝年轻气盛，也想趁着即位之初，打击诸侯，树立自己的权威。

虽说晁错跟着儒学大师伏生学了几年正宗儒学，但学术根基和为官原则还是以刑名之学为主。

学法律出身的他，缺少一般儒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做事严谨，讲究条理性，思维敏捷、富有逻辑，绝不会被一时热血冲昏头脑。

削藩一事，并非晁错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多年来坚持的主张。如今他成了帝国首席检察官，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岂能放弃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

关东诸侯们在景帝即位后，都已隐隐预感到，朝廷要拿他们开刀了。

削藩之事，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如此大事，必须在朝堂上集体讨论决议才行。

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卿大臣、诸位列侯和宗室，意外的是，会议现场很平静，没有人踊跃发言，也没有激烈争论，大殿上一片沉默。

申屠嘉的结局，大臣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知道跟晁错唱反调会是什么下场。

最后，还是窦婴站出来表示反对。

窦婴曾担任过吴国国相，跟刘濞打过交道，掌握吴国第一手资料。削藩一事，他远比朝堂上这些大臣们更有发言权。

窦婴意见很明确，目前时机特殊，实在不宜激化朝廷与诸侯之间的矛盾，只要朝廷不主动挑起事端，吴国也不至于率先叛乱。

诸侯谋反，唯有刘濞能挑头，但他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只要熬到他死，一切就好办了。

晁错马上反驳，刘濞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么多年，想谋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指望他幡然醒悟，无异白日做梦，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从此，晁错就记恨上窦婴了。

既然一时半会儿没法拿刘濞下手，不如先拿其他诸侯开刀，既可以敲山震虎，警告刘濞不要轻举妄动，顺便也能设法削弱他的潜在盟友。

晁错称，他得到可靠情报，半年前薄太后去世，正当全国官民都沉浸在巨大悲痛之时，楚王刘戊竟然在国丧期间淫乱不止，简直是禽兽不如!是可忍，孰不可忍，建议陛下下诏立刻处死他。

于是，景帝趁着刘戊来长安朝觐之际，将他拿下。

刘戊下狱，倒不是晁错故意罗织罪名，刘戊本身就是个十足的浑蛋，治他的罪，根本不需要故意陷害。

刘戊似乎就是基因突变。楚元王刘交、楚夷王刘郢客父子二人，都好读书，善待知识分子，无论做人还是治国，都中规中矩，就算吕后当国时，也挑不出他们什么毛病来，不得不称赞他们一番。

刘郢客刚死之时，刘戊尚能装模作样，装作继承了父祖礼贤下士

的优良传统，但时间一长，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

最先识破他真面目的是穆生。穆生自楚元王起，就是楚国王宫的座上宾，深受元王敬重。

穆生不喜饮酒，元王特意为他准备了一种叫作醴的甜饮。刘戊即位之初，也常给穆生备着甜饮，可时间不长，穆生就发现桌面上的甜饮不见了。

穆生敏锐察觉出了这一变化，回到家后，对家人说："是时候离开了，如果再待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沦为囚犯，戴上铁项圈，押解到集市上，蒙受羞辱。"此后便装病不出门。

和穆生一起追随楚元王的申公、白生，听到消息后，觉得穆生器量未免太小了，不就是一杯甜饮吗？至于这样耍小性子吗？便径自逼上门来。

"先生难道忘了先王是怎么待我辈吗？今王不过是细微之处考虑不足，略有失礼之处，你至于这样吗？"一见面二人就埋怨穆生。

"你们以为我真的是为一杯甜饮而难以释怀吗？见微知著，从细节见真章，先王之所以敬重我们，是重视我们的学问和儒学大道，今王完全忽视儒学大道，我们还有必要留在楚国吗？这难道仅仅是小小的失礼吗？"

申公、白生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刘戊讨厌读书，一拿起书卷就犯困，他们也拿他毫无办法。

三人此次谈话后不久，穆生便以生病为由，自行离去。

刘戊自然乐得清闲，去吧，好走不送。

申公、白生二人念及楚元王、楚夷王两代先王的厚恩，不忍心放弃刘戊，依旧留在楚国，每日对他苦口婆心，劝勉他勤于政务，好好读书。

但刘戊往往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当回事。

如果说，刚开始刘戊还多少有点收敛，后来日子一长，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整日过着淫靡奢侈的生活，为政暴虐，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楚国太傅韦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以刘戊的性子，犯颜直谏肯定没有好下场。于是，他换了个比较含蓄的手法，作诗一首，希望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警示他，谁知道刘戊根本懒得看一眼，直接丢到一旁。

韦孟算是看出来了，刘戊已是无可救药，再待下去说不定会招来杀身之祸，遂偷偷溜走，逃到邹地藏了起来。

刘戊习惯了淫乱放纵的生活，以至于在薄太后丧礼期间也不懂得加以节制，最终事情败露，传到晁错耳中。

削藩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击削弱诸侯的势力，至于是否从肉体上消灭诸侯王本人，倒不是重点。若是真的杀了刘戊，弄不好反而逼得刘濞等人直接提前造反，那样反而弄巧成拙，得不偿失了。

于是，景帝和晁错君臣二人分工明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晁错高声喊杀，景帝要求宽仁相待，刀下留人。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朝廷下诏饶过刘戊死罪，但削去楚国东海郡、薛郡两郡，收归朝廷。

景帝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哪里知道，刘戊根本不思悔改，被削地后，他一气之下暗中派人勾结吴王刘濞，谋划一起反叛朝廷。

申公、白生得知后，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不忍心看着刘戊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遂一起对他进行规劝，希望刘戊回头是岸。

刘戊早就受够了二人的聒噪，一怒之下，下令将他们用绳子拴起来，他们穿上囚衣，将他们押去舂米。申公、白生二人都是饱读诗书

的大儒，加上年事已高，哪里受得了这罪？咬紧牙关熬了些日子后，申公设法逃了出来，白生下落不明，估计最终死于非命。

就在刘戊谋划叛乱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出现了一对逃难母子。

他们的出现，使得吴、楚企图作乱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 第十一章 七王之乱

## 父子诀别

这对母子就是刘富母子，他们仓皇逃难到了长安。

刘富是谁？为何流落到了京城？

刘富是大名鼎鼎的楚元王的儿子，按辈分算起来是景帝的堂叔，被封为休侯。刘富身为堂堂列侯，怎么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

原因是他怕遭到追杀。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威胁大汉宗室？

那个人就是他的亲侄子楚王刘戊。

高祖驾崩之后，在宗亲中，楚元王辈分最高，与皇家的关系也不错。吕后执政时期，一度让元王之子刘郢客出任宗正，负责宗亲事务。

元王去世时，由于楚太子刘辟非早逝，刘郢客继位，是为楚夷王。文帝尊崇元王，对元王的子孙一概特别关照，元王诸子的封爵甚至与自己儿子差不多，至于空出来的宗正一职，继续由元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刘礼接任。

及景帝即位，元王的其他几个儿子全部封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埶(“埶”为艺的异体字)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做人要将心比心，刘富觉得朝廷待咱不薄，作为臣子，应尽本分才对。得知楚王刘戊胡作非为，连申公这样的当世大儒也敢公然折辱，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派人劝导一下这位大侄子，让他多少收敛一下，做人不要太过分了。

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有时候，比人与类人猿的差距还要大。

作为长辈，刘富本出于一片好心。谁知在刘戊看来，自己这位叔叔竟然胳膊肘往外拐，替外人说话，当即让人给刘富带话：“叔叔和我不同心，待我起兵后，第一个就拿您老人家开刀!”

刘富一听，大惊失色，知道刘戊这个愣头青会说到做到，不敢掉以轻心，连夜带上老娘离开封地，星夜兼程赶到长安。

到了京城，性命暂且保住了，但由于受到刘戊谋反牵连，又擅自逃离封地，刘富被朝廷剥夺了封爵，从宗室属籍中开除。好在后来朝廷得知他曾数次劝谏刘戊，便改封他为红侯。

只是，现如今关东乱起也是迟早的事，又得罪了刘戊，好不容易逃到长安的刘富一家子说什么都不敢再到封地去。

刘富老娘与窦太后沾亲带故，她出面央求，希望朝廷不要再撵他们母子出京。窦太后不忍，便答应下来，让他们留在长安，后来，老太太就老死京城。

做父母的心都一样，无论王侯将相还是平头百姓，无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平安无事。刘富一家子刚安稳下来，又有一位老人不远千里，从颍川老家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赶到长安。

进长安后，老人家一路打听，摸到了晁错住处，拍打起门扣来。

晁错开门一看，大吃一惊：“父亲，您老人家怎么来京城了？”

“啥也别说，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回老家!”晁父气喘吁吁地说。

“家里出啥事了？”晁错一头雾水。

“当今皇上刚即位不久，就安排你执掌国柄，可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事？你侵犯了诸侯王们的利益，离间了皇家的骨肉亲情，如今天下诸侯无不恨你入骨，你这样做，到底图个啥？听爹的话，赶紧收手吧!”晁父苦口婆心地劝儿子。

“不，父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为了国

家的安宁，我做的是正义的事业，没有错!”对于老父亲的话，晁错不仅不认同，还费心思向父亲解释，希望老父能够明白，他绝非为了个人的权势富贵，而是为了大汉长治久安。

为了今天，晁错已经等了好多年。

他头脑很清醒，早料到在朝廷与诸侯的斗争中，自己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其中就包括同僚的阻挠和家人的不理解。

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不过，关键时刻，总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逆向而行，扭转乾坤。

晁错这个人的性格确实不大讨人喜欢，但他坚持心中理想，敢于一往无前的精神的确值得敬佩。

知子莫若父，对儿子的性格，晁父很了解，他明白单靠自己三言两语，很难打动儿子。最后，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刘家的天下安宁了，但咱们老晁家将要大祸临头了，我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晁父回去后，就服毒自杀了，临死前黯然地说：“我实在不忍看到咱们家大祸临门啊!”

晁父死后不过十几天，吴王刘濞就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公开叛乱了。

汉朝廷与诸侯都在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谁抢得先机，谁就等于掌握了主动权。

刘濞蓄谋已久，但选择现在起兵，主要是觉得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景帝在削去楚国两郡后，也对赵国和胶西国开刀了。

赵王刘遂是赵幽王刘友的儿子。刘友死于吕后手中后，吕后一度将赵国封给吕禄，不过没多久，吕禄就死于倒吕政变中。

文帝即位后，为显示拨乱反正，特意封刘遂为赵王，第二年，又

将赵国河间郡分出来，封刘遂弟弟刘辟强为河间王。

像赵国这样的大国，一直为朝廷所忌惮，文帝另立河间国，就是要削弱赵国。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补偿凄惨而死的刘友，给他的儿子们广施恩露，让人挑不出啥毛病来。相比文帝，景帝的做法就比较简单直接了。

楚王刘戊被削去东海、薛郡两郡的前一年，景帝已下令削去赵国一郡，收归朝廷直辖。

至于赵王刘遂的罪名，史书上没有说，估计强加之罪的嫌疑比较大，不然一定会大书特书。

胶西王刘卬涉嫌卖官鬻爵，被削去六县。不同于楚、赵两国，胶西国本是从齐国分出来的小国，实际也不过一郡之地罢了，如今，一下子被朝廷剥夺六县，胶西国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刘卬为人好兵，生性勇武，对朝廷剥夺封地一事耿耿于怀。

老谋深算的刘濞洞若观火，朝廷削赵、楚、胶西三王封地的用意，他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景帝和晁错的真正目标并不是这些人，而是自己，等其他诸侯一个个被削弱后，就会拿吴国开刀。

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趁诸侯们对朝廷有怨气之际，煽动诸王，抓紧建立同盟，只要诸侯们抱团起兵向西，绝对有胜算!

于是，刘濞的信使们一个个从吴国出发，奉命前往各个诸侯国，鼓动诸王响应刘濞，合兵西向，拿下长安，共享天下。

胶西王刘卬是刘濞重点争取的对象，他特意派了中大夫应高前去游说。不过，应高此行到底有几成胜算，刘濞心中也没底。为了防止策反不成，反而留下把柄，老奸巨猾的刘濞并没有让应高带上书信，应高只需将自己的口信捎给刘卬即可。

人心隔肚皮，凡事必须留一手。

应高马不停蹄赶到胶西国，拜见刘卬。

为保险起见，应高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决定先摸一下刘卬的底细。

游说这种事，说复杂的确很复杂，必须琢磨措辞，推敲逻辑，摸透对方心思才行。但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是诱之以利、喻之以害，使得对方权衡得失之后，做出有利于己方的选择。

煽动他人造反，从来就是个危险活儿，尤其是游说刘卬这样火暴脾气的主儿，弄不好还得把自己性命搭进去。对于这一点，应高很清楚。

对付刘卬，仅仅许诺好处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显得自己不是跑来将胶西国拖下水，而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才行。

“吴王最近很忧虑，觉得大祸将要临头，特意派我前来，和大王说点心里话，不知当讲否？”

“说吧!”刘卬不置可否地回答道。

“当今天子继位以来，重用奸臣，受奸佞之徒的蒙蔽，只顾眼前好处，看不到长远利益，轻信谗言，随意变更祖宗法令，侵夺诸侯的封地，对诸侯的索取也越来越多，不少无辜之人被牵连诛杀，这种情形往后只会越来越严重。一个人一旦尝到甜头，就不会轻易罢休。诸侯中就属吴国和胶西国比较有名(这是在故意给刘卬戴高帽，实际上两国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今都被朝廷盯上了，往后恐怕没有安分日子过了。吴王因身体不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朝见皇帝了，常常忧虑遭到皇帝猜忌，却苦于无法解释，只好潜身缩首，谨小慎微，就算如此，还是担心朝廷不会放过自己。听说大王您因涉嫌出卖爵位，已经被削去封地，但我觉得这事，朝廷不会就此罢休。”

提起被削去封地之事，刘卬顿时感到很泄气：“那么，依先生之见，寡人当如何才好？”

应高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三言两语，就把胶西国和吴国都塑造成受害国，便趁热打铁说：“如今的吴国和胶西国处境相似，遭遇相同，吴王决定就算豁上性命，也要为天下人除害，就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刘卬一听，大惊失色，立刻明白了，刘濞这是打算拉他下水。

被削封地后，刘卬牢骚满腹，很是愤愤不平，但从来没想过反叛朝廷。毕竟，造反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马上推辞说：“虽然形势危急，皇帝逼迫过甚，但我有罪在前，怎敢乱生妄念，对皇帝不恭？这事还是别提为好。”

应高看出来了，刘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在他内心摇摆不定的时候，必须要狠狠推一把才行。

“作为臣子，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土地，排斥打击忠臣，他已把坏事做绝。朝堂上群臣莫不对他恨之入骨，各地诸侯皆生反叛之心。现在，天上出现彗星，各地暴发蝗灾，此乃上天降下的预兆。如此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大王应允，吴王愿率楚王先一步攻入函谷关，夺下敖仓，等候大王莅临，然后均分天下，岂不美哉!”

应高为刘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画卷，刘卬听完两眼放光，利令智昏，彻底抛弃了最后一丝顾虑，立即点头答应与吴国结盟，一起谋反。

得知刘卬同意后，刘濞仍有些不放心，觉得空口无凭，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亲自跑一趟，到胶西国会盟。

在和刘卬面对面达成共识，亲自签订盟约后，刘濞才安下心来。

造反之人大多心虚，因为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彼此间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刘濞既要利用刘卬为他做炮灰，又要防止他临阵叛逃，在自己身后插刀子。

你可以背叛朝廷，当然也可以背叛我，这就是刘濞的逻辑思维。

实际上，是否要追随刘濞造反，胶西国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群臣中不乏头脑清醒之人，有人就善意提醒刘卬说："就算把诸侯所有土地加起来，也不过朝廷十之一二，双方实力悬殊，能否取胜实在难说。退一步说，即使将来反叛成功，就意味着会同时出现两个君王，到时候，到底谁听谁的？为了争权夺利，势必出现新的争执，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还不如老老实实，安分过日子。"

只可惜，刘卬已完全昏了头，根本听不进去。

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误判形势者并非刘卬一人，齐王刘将闾、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辟光、济北王刘志几个也被刘濞花言巧语打动，纷纷响应。

齐悼惠王刘肥一系，自吕后起，就受到猜忌和打压，幸好刘肥肯放低身段，低调做人，设法迎合吕后，才得以善终。

吕后死后，在诛灭吕氏政变中，刘肥诸子出力最多。

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和齐哀王刘襄里应外合，配合朝廷功臣集团，为铲除吕氏势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襄自以为是高祖皇长孙，一心想入主大统，谁知群臣却迎接文帝即位，他自然心有不甘。

更让刘襄哥儿几个愤愤不平的是，刘襄当不了皇帝也就罢了，刘章、刘兴居两人本来被许诺一人分封赵王、一人封梁王，文帝却事后食言，只从齐国分出城阳郡和济北郡给他们。

刘章为此郁郁寡欢，两年后抑郁而终，刘兴居一怒之下干脆起兵发动叛乱，只不过造反了短暂数月就被镇压了下去。刘兴居的反叛，使得朝廷对齐地诸王更加不信任，处处防范和排挤。

刘襄之子齐文王刘则死后，文帝甚至一度以刘则无子为借口，废除了齐国。后来顾忌到刘肥诸子的势力，害怕因为把事情做得太绝，会导致像刘兴居一样反叛的事情再度发生，便封刘肥另外一子杨虚侯

刘将闾为齐王，同时又将齐国一分为六，加上原来刘章的城阳国，原本拥有七十余城的强大齐国，被划分为七个小国。

文帝此举，就是想分而治之，让刘肥的子孙再无法威胁到朝廷。

可以说，汉廷自吕后起，对刘肥一系的打压、排挤、分化从未改变。所以，刘卬兄弟几个对朝廷的积怨由来已久，他们觉得皇位本来就是自己的，现在夺回来是理所当然。

齐地七国中，六国已明确表态与吴国并肩战斗，唯有城阳国保持沉默，此时的城阳王是刘章之子刘喜。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刘章去世，刘喜继位。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9年)，刘喜一度迁为淮南王，四年后，又重返回城阳国。或许是出于种种顾虑，刘喜没有和他的几位叔叔一样，追随刘濞。

为了尽快达成统一战线，刘濞大度地宣布，城阳景王刘章在诛灭吕氏行动中，已立下不世之功，因此，此次行动城阳国不必出人出力，待取得成功后，照样给他们分胜利果实。

刘濞这一招很高明，既显示了胸襟大度，同时，变相地将城阳国也拉入了自己阵营。

就在刘濞勾结诸侯，准备起兵之际，朝廷方面传来诏书，诏令削去吴国会稽郡、豫章郡，归朝廷所有。

毫无疑问，这道诏书等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坚定了刘濞造反的决心。

## 白首起兵

按照汉制，诸侯封国内的国相、太傅、内史、中尉等重要职务由朝廷统一任免，诸侯王无权过问。尤其是封国的国相，握有兵权，肩

负监督和牵制诸王的重任，历来由朝廷绝对信任之人出任。

为防止国相与诸侯勾结，国相出任前，都不许带家眷。为了权力制衡，汉朝在制度设计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事实证明，这种制度是很有效的，在汉朝历次诸侯谋反中，罕有国相与诸侯王共谋造反。

为防止队伍内部有人暗通朝廷，在决定造反之前，吴国境内由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刘濞处死。

肃清行动完毕后，刘濞向吴国全境内发布战争动员令：“寡人今年六十二岁，将亲自带兵出征，我的小儿子才十四岁，也在阵前效力。按照此标准，吴国境内十四岁与六十二岁之间的人，都要入伍出征。”

通过极限动员后，刘濞共征兵二十万，吴国境内的男丁基本全被他征集入伍了。刘濞决心以倾国之力，与中央朝廷殊死一搏。

而后，刘濞又派人到闽、东越，动员两国发兵相助，又纠集了约十万人马。这样一来，刘濞麾下总兵力有三十余万。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三日，刘濞于广陵起兵反汉，率领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西进，渡过淮水，进入楚国境内。

得知吴兵西来，楚国的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苦苦劝谏楚王刘戊，劝他及早悬崖勒马，不要与刘濞沆瀣一气，以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是刘戊早已铁了心，哪里听得进去？为了防止张尚、赵夷吾挡道，他干脆直接将二人处死，然后率兵与吴军会合。

在北方赵国，赵王刘遂也跟刘戊一样，将劝阻他不要谋反的国相建德、内史王悍活活烧死，随后，一面屯兵于赵国西部边界，只等吴兵跟上后，与刘濞一起西进。另一面，派使者北上，寻求匈奴帮助。

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刘遂根本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了，就连勾搭汉朝世仇匈奴这种引狼入室的可耻之事都能做得出来。

这种人要是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没天理了。

果不其然，叛军与朝廷还没打起来，队伍内部就开始出现内讧，窝里反了。

齐王刘将闾有贼心没贼胆，答应刘濞一起谋反后不久，就有点懊悔了，越想越后怕，干脆关起门来装死，拒不发兵。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刘肥的其他几个儿子一看，老哥太不仗义了，跟朝廷的仗还没打起来，你就开始临阵退缩，当了逃兵，这不是打击咱们盟军的士气吗？

胶西王刘卬一怒之下，纠集了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杀了过来，将齐国都城临淄团团包围。不过，济北王刘志没有赶来，不是他不想来，而是他被属下软禁起来了。

在造反前夕，不知何故，济北国都城博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城墙出现了坍塌，这在古代可是不祥之兆。济北国郎中令提出，出兵之前先把城墙防御工事修好了再说，刘志心急火燎，一心想早点攻入长安，到京城花花世界去享福，哪里听得进去？

谁知这位无名的郎中令也是个强势人物，一声令下，就把刘志扣押了起来。刘志气急败坏，恨死了这位郎中令，坏了他的大事，殊不知，正是由于他被软禁，后来才得以保住性命，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再说临淄城下，刘卬率领的叛军战斗力实在太差，久久攻不下临淄。

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的齐王刘将闾心急如焚，临淄城虽说城高池深，但日子一长，难保不被攻破，他便派路中大夫(姓路的中大夫)火速前往长安，向朝廷求助，求朝廷赶紧发兵救援齐国。同时，他又与刘卬等人私下周旋，尽量设法拖延时日。

路中大夫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绕过叛军，一路纵马奔驰，向京城方向赶来。

在路中大夫赶往长安途中，朝廷已经获悉吴、楚举兵造反之事。景帝想起文帝临终遗言，当即提拔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全权负责平叛事宜。

但如何平叛，总得拿出个作战方略才行。景帝召见周亚夫，询问作战部署大略。

周亚夫提出，叛军财力雄厚，楚地一带的士卒向来剽悍善战，如果朝廷与他们正面作战，胜负难料，不一定能占多大便宜，上上之策就是设法切断敌人物资补给。叛军远道而来，只要粮草不济，定会军心大乱，届时朝廷再全力反击，必然会赢得胜利。

景帝听完频频点头，但是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朝廷方面能想到的，刘濞就想不到吗？他苦心经营数十年，谋反作战想必已经做了无数次模拟推演，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他岂能不知？岂会坐等朝廷来切断他的补给运输线？

周亚夫早就料到皇帝会产生疑惑，他说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设下一个令刘濞无法拒绝的诱饵，吸引这只老狐狸上钩，想尽一切办法将吴、楚叛军套牢，朝廷就可以顺势腾出手来，趁机切断叛军的粮道。

那么，诱饵是什么呢？

“梁国!”周亚夫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景帝倒吸了一口凉气，梁王刘武那可是窦太后的心尖肉，将他推到与叛军交战的最前沿，置于险境中，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如何跟老太太交代!

皇帝眼中流露出迟疑，周亚夫看得一清二楚。

实际上，他设计作战方案之时，已做好了承受各种结果的心理准备，包括皇帝的猜忌、训斥甚至被革职查办——毕竟将皇帝亲弟弟推入狼窝的设想，实在是骇人。

不过，周亚夫毕竟不是一般人，知难而退不是他的性格。看皇帝犹豫，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进一步提出，以梁国为饵，并非作假，而是真的要做好彻底抛弃梁国的准备。

唯有如此，才能让刘濞看不出丝毫破绽，才会满心欢喜地咬钩，也唯有如此，没了任何后援的梁国，才能做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爆发出最大的战斗力，与敌人拼命，死死缠住叛军，为朝廷大军腾出手来赢得战机。

景帝听后，为周亚夫大的胆构想震惊不已，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狠下心来，点头应允。

在随后召开的朝会上，景帝宣布由太尉周亚夫统领三十六位将领东出平叛，迎战刘濞率领的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汉初功臣郦商之子)北上消灭赵王刘遂，将军栾布率兵对付齐地诸国叛军。

朝堂上紧密锣鼓调兵遣将之时，齐国路中大夫赶到了长安。

听完汇报后，景帝得知齐地诸国并非全部反叛，感到欣喜之余，当即吩咐路中大夫，如今特殊时机，决不能耽搁时间，就不挽留你了，还要劳烦你尽快赶回去告知齐王，请他务必坚守住城池，朝廷马上派大军赶来救援。

可怜这位老兄，千里迢迢从齐地好不容易赶到长安，没喝口热茶，没睡个囫囵觉，便再次上马，日夜兼程往回赶。

一来一回，数千里路途颠簸，没带回一兵一卒，仅仅带了一个口信。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于绝境中的人们来说，他回去，至少会带回一丝希望，让他们支撑下去。

路中大夫再次赶到临淄城外时，他绝望了。

跟他离开时相比，叛军的人数增加了好几倍，将临淄城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严严实实，可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如今就算是插了翅

膀也难以飞进去了。

叛军也很快发现了他，路中大夫成了叛军俘虏。得知路中大夫是齐王派到长安的信使后，叛军将领如获珍宝，觉得可以利用他搞心理战，彻底摧垮齐军的斗志。

“你到阵前，向城里守军喊话，就说朝廷军队已经被我方击败，他们的失败是注定的，再做任何抵抗也是徒劳的。守城已毫无意义，不如早点开城投降。”叛军利诱威逼说。

路中大夫答应下来了，但叛军将军总还是有些不大放心，又逼着他对天盟誓，绝不反悔，反复排练了好几遍，觉得万无一失后，才放心带他来到城下。

临淄的城垛遥遥在望，路中大夫远远看见了城头的齐王刘将闾。就在此时，令叛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路中大夫忽然提高嗓门，冲着城头大声喊道：“大王!朝廷已经派太尉周亚夫亲率百万大军东出，一举击溃了吴楚两国叛军，现在正率领大军马不停蹄地向齐国赶来，请大王务必坚守城池，绝不能投降!”

一切来得太突然，叛军将领们当即傻眼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路中大夫会临阵变卦。路中大夫声音洪亮，城上城下，听得真真切切，叛军内部也引起了一阵骚乱。

本想瓦解齐军的士气，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搅乱了自家军心。

气急败坏之下，叛军将领当即处死了路中大夫，然而，一切晚矣。齐国上下听说朝廷援军不日前来，备感振奋，就是本来首鼠两端的齐王刘将闾也彻底打消了与叛军私下媾和的念头。

三国叛军除了继续围城外，一时间也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

在胶西王刘卬等围困齐国之时，吴王刘濞也没闲着，一边整合集结吴楚联军一边加强舆论攻势，企图在天下人面前争取舆论支持。任

何做坏事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作恶。

历来反叛者，明明破坏了社会稳定，搅乱了国家秩序，但都不愿承认自己在祸国殃民，无不竭力往脸上涂脂抹粉，将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刘濞也不例外，在向朝廷发起正式攻击以前，先向天下发出一份给所有诸侯王的公开信，抢先打响舆论战，企图占领舆论制高点。

舆论战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核心无非两点，一是抬高自己，二是抹黑对手。

只是景帝是文帝生前就册立的合法继承人，他的继位正大光明，合情合理，受到朝野承认，帝位合法性不容置疑，而且他即位不过短短两年，也挑不出大的执政过失来。

抹黑皇帝有点难度，就从晁错身上下手。

天下人都知道，削藩之事真正的决策者是景帝本人，晁错不过是给皇帝做参谋，执行皇帝意志罢了。

但这些，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刘濞采取隔山打牛的战术，在公开信中宣称皇帝身体不好，以至于精神恍惚，判断力出现错误，受到奸臣蒙蔽，听信谗言，抛弃先帝功臣，任用小人，发生了侵夺诸侯土地、重用酷吏审讯折辱诸侯、疏离刘家骨肉等等令人痛心的事。

那么，这个大奸臣是谁？就是晁错!

如今刘氏江山受到极大威胁，高祖宗庙眼看不能血食，宗亲诸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晁错为非作歹吗？决不答应!

刘濞在公开信中接着说：“我现在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但决不愿袖手旁观，我愿意顶着一头白发起兵，诛杀这个奸佞之臣，匡扶大汉社稷!吴国虽面积不大，好歹方圆也有三千里，国内人口不算多，可

集结五十万大军不成问题，我跟南越王关系也不错，他们提供了三十万大军(吹嘘军队数量规模以壮声威，在古代是个惯例)。我虽然本事不大，但愿意为诸王前导，在阵前效力。”

在吹嘘完自家实力后，刘濞不忘夸耀一番自己的统一战线如何强大，称将与东越王、楚王、淮南三王(即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合兵一处，并首向西，在洛阳等候与齐地诸王和赵王胜利会师。

刘濞又称，燕王刘嘉(琅邪王刘泽之子)出兵占领代地和云中郡后，率领燕国与匈奴混合战队，南下破萧关，直取长安。

谋反风险太高，成功概率又实在太低。这些诸侯王在各自封国内呼风唤雨，有吃有喝，有钱花，虽说被削了一部分土地，但过日子还是绰绰有余，为何放弃幸福生活，要跟着刘濞卖命呢？

刘濞煽情地说，朝廷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诸侯们对朝廷不公平的做法，充满怨恨由来已久，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掰着指头举例说明，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勃、庐江王刘赐皆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为了报仇，十多年来，从未好好休息过一天。另外，前长沙王的儿子们因没有继承王位也愤愤不平(长沙王吴芮死后，由于没有子嗣，封国被废除，但吴芮的其他后裔肯定还在，封国被废除，不满之人肯定大有人在)。

不过，还有一个人，刘濞没有说，就是他自己。

刘濞举兵造反，是为了谋取皇位，但给儿子报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七七八八说了这么多，拎着脑袋上阵厮杀，还是靠广大将士们，不是靠诸侯王，那么大伙儿跟着造反又有何好处？

刘濞也给出了答案，我节衣缩食三十年，就是为了今天，武器、

甲胄、粮食、钱有的是，大家只管努力向前就是了，这些你们都不用操心。

对于战功，刘濞明码标价：杀死大将军之人，赏赐黄金五千斤，封邑万户；杀将军之人，赏赐黄金三千斤，封邑五千户；杀副将之人，赏赐黄金两千斤，封邑二千户；斩杀二千石官员，赏赐黄金一千斤，食邑一千户；斩杀一千石的官员，赏赐黄金五百斤，封邑五百户。凡立下以上战功者，皆封列侯。

刘濞也不忘向朝廷阵营的官吏伸出橄榄枝，鼓动他们自动脱离朝廷，投奔到吴楚阵营来，对投诚之人，开出优厚的条件：城中士卒过万和户口万户的官吏投降，封赏与捕杀大将军对等；城中士卒和户口满五千的官吏投降，封赏与捕杀将军对等；城中士卒和户口满三千的官吏举城投降，封赏与捕杀副将对等；城中士卒和户口满一千的官吏举城投降，封赏与捕杀二千石的官员对等。就是普通小官吏投降，也会按照官衔大小给予相应封赏。

刘濞信誓旦旦，对于其他赏金，朝廷多少，我翻一倍，赏金的兑现问题，大家根本不用担心，我的钱全天下到处都有，你们不需要跑到吴国来领赏。

这份公开信可谓极具煽动性，很快在全天下传开。不多久，在长安街头也开始流传。

大战尚未开始，叛军的舆论和心理攻势已从四面八方向京城扑来，长安人心浮动，战争的恐惧气息弥漫于大街小巷。如何应对刘濞的攻势，景帝找来晁错，君臣二人日夜磋商。

不承想，晁错给皇帝提出的建议比周亚夫更大胆，更令人瞠目结舌。

“如今之际，面对刘濞的蛊惑，难免人心动摇，将朝廷数十万大军指挥权交给外人，实在难以让人放心。”晁错告诫皇帝说。

“那么，你觉得该由谁来带兵出征？”景帝疑惑不解。

“请陛下您御驾亲征!”晁错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那么京城防守该由谁来负责？”景帝又问。

“臣!”

## 秘密谈话

和晁错谈话后，景帝没有表态，他决定再听听另外一个人的意见。

此人便是窦婴。

窦婴旗帜鲜明地反对立梁王为皇位继承人，给景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晁错提出削藩后，满朝文武官员保持沉默，唯有窦婴站出来反对。种种迹象说明，窦婴是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信任。

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多咨询各个方面，听听不同意见，总是没有错的。

越是在危急关头，越要保持头脑冷静。

遍观宗室外戚之人，论能力和见识，像窦婴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窦婴不像外臣，接见没必要搞得太正式，景帝依照家人亲眷的标准接待他，窦太后也作陪。

寒暄过后，景帝表示，有意让他出山担当重任。

窦婴听后，没有大喜过望，反而淡淡地说：“臣患病日久，尚未痊愈，未免耽误大事，还请陛下另择贤能为好。”

听话听音，在旁的窦太后立刻听出来了，窦婴对她当初的做法怨

气还没消，不由得老脸一阵泛红。

景帝当然也明白了，窦婴的心结还未解开，便说："如今天下处于危难之际，你还这样推三阻四，可不好吧？"

话既然挑明了，窦婴再不好意思推辞了。

毕竟窦婴是个有抱负的人，不甘于长久籍籍无名，过混吃等死的日子。

景帝当场宣布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赏金千斤。

窦婴接受任命后，景帝问："王孙(秦汉时对贵族男子的尊称)谈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吧。"

窦婴说："要说对时局的了解，有一个人比臣看得更透彻，陛下应该听听他的建议。"

"谁？"景帝感到很好奇。

"袁盎!"

景帝即位后，袁盎就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他早已被剥夺了一切官职，贬为庶民。要是窦婴不提，景帝早把他忘了。

而那个让袁盎沦为白身的推手，是晁错。

早在文帝时，晁错和袁盎就形同水火，但由于袁盎一直受文帝赏识，故晁错没有机会下手，一直在等待机会。

景帝即位后，晁错飞黄腾达，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任御史大夫。手握对百官的监察大权后，晁错便迫不及待地出手了，他指示手下检举袁盎，指控他在担任吴国国相时，私收吴王刘濞的贿赂。

国相结交诸侯是死罪，晁错就是想置袁盎于死地。

好在景帝还不算太糊涂，下诏特赦袁盎，仅仅罢黜了他的官职。

几经宦海沉浮，袁盎早已看开了，就想安心做一名平头百姓。

窦婴好客，喜欢结交朋友，他的朋友圈子很广，从不问出身，袁盎虽沦为平民百姓，还依然与栾布等人出入窦婴家中，为窦家座上宾。

袁盎本想就这样，平平淡淡走完一生。

孰料，晁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除掉袁盎决不甘心。

权力斗争没有双赢，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在晁错看来，只要袁盎还在人世一天，难保不会翻身，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他。

刘濞谋反的消息传来后，晁错觉得彻底铲除政敌的机会来临了，立即找来丞史(御史大夫的属官，汉朝时，丞相有两长史，御史有两丞，合称丞史)谋划："袁盎担任吴国国相时，大量接受刘濞的财物，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一直以来包庇刘濞，替他隐瞒朝廷，屡次打包票说，吴王不会反叛。可如今刘濞却真反了，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赶紧拟出一个检举惩处袁盎的方案来!"

晁错信心满满，笃信袁盎此次在劫难逃，死定了。

不过，这位丞史却没有顺着长官思路办事，而是说出了他的想法："想当初，吴王还没谋反，那时惩处袁盎，或许可以达到告诫效果，警示吴王朝廷已掌握了他的阴谋，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可如今，吴王已反，处罚袁盎已于事无补，更何况，吴王谋反之事，袁盎也不见得真的了解内情，咱们办案，要有确切证据才行!"

丞史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言外之意很明白，如今国家内乱，大敌当前，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朝廷稳定团结的局面，可不能敌人还没杀上门来，咱们内部先乱了阵脚，自己人相互倾轧。

晁错听后，想想也对，内心开始有所动摇，有点犹豫要不要立刻拿袁盎开刀。踌躇之后，就暂时将此事搁置了起来。

晁错不知道，他这一犹豫，反而送了自己性命。

那个丞史才跟晁错谈完话，就一溜烟跑去给袁盎通风报信。

他为何这么做，是因为同情袁盎，还是因为看不惯晁错赶尽杀绝，没有人知道。总之，袁盎得救了。

袁盎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一时间顾不了太多，连夜跑到窦婴府上求救。

他没有丝毫隐瞒，将自己在吴国国相任上之时，为了稳住刘濞，也为了自保，不得已接受财物等事，毫无保留地向窦婴和盘托出，表示自己无愧于心，愿意当面向皇帝澄清。只是自己现在是白身，希望窦婴向皇帝引见。

恰在此时，景帝召见了窦婴。

或许一切都在冥冥中注定了，晁错和袁盎这对生死对头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有时候，给别人一条活路，何尝不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当你步步紧逼，将对手逼入绝境时，有可能同时使自己陷入绝地。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是人呢？

袁盎可不仅仅是会讲仁义大道的腐儒，要论杀人，他的办法不比晁错少。他在朝中做过中郎将，在陇西带过兵，在吴国与刘濞做过伴，他的人生阅历，远比晁错丰富得多。

袁盎这一辈子还真没服过谁，文帝时，宦官赵同(实名赵谈)恃宠而骄，袁盎当着皇帝的面强行让他下车。申屠嘉贵为宰相，权倾朝野，在袁盎面前，也是心服口服。

晁错，对不住了，是你逼人太甚，那么，就休怪我无情!

窦婴出宫赶赴荥阳前线时，袁盎入宫了。

见到皇帝时，景帝正在与晁错商议给前线筹措军粮之事。

与吴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个地处遥远东方的诸侯国，对长于深宫的景帝来说，依然有些陌生。

在他记忆中，只是依稀听说吴国有个叫田禄伯的将军颇有些才能，除此之外，对吴国的底细，他了解甚少。

两军交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景帝迫切地想知道关于吴国的真实情况。

目前在朝中，唯有袁盎是为数不多的在吴国工作过多年的人之一，对吴国的实际情况最了解。

也许当初，景帝不同意处死袁盎，就是留了一手，以备不时之需，也未可知。

“你曾经出任过吴国国相，想必知道田禄伯吧，此人能力到底如何？对于吴国、楚国叛乱，可有好的应对之策？”

“陛下且宽心，吴国、楚国叛乱没什么了不起，无须过虑，用不了多久，朝廷就会彻底将他们击败。”袁盎说得很轻松，就像拉家常一般，不过，他没有正面回答景帝的问题。

袁盎的回答，让景帝感到很意外。

“吴王开挖铜矿，自行铸造钱币，又煮海水制盐，靠着无数的财富积累，纠集了天下英雄豪杰，熬了大半辈子，等到头发白了才举兵作乱，要说他没有周密的盘算，说出来谁信？你怎么一口咬定他会很快败亡，一事无成呢？”袁盎的话太空洞，景帝觉得他在敷衍自己，心中有些不悦，当即反驳。

“陛下说的是，吴国拥山海之利，开山取铜铸钱、沸海煮盐都是事实，吴王拥有用之不竭的财富也不假，但要就此断定吴王招揽了天下豪杰，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英雄豪杰岂是靠金钱就能收买的？

他不过是拼凑了一伙贪图钱财的亡命之徒罢了。倘若吴王麾下真有英雄豪杰，定然辅助他匡扶正义，做利国利民之事，怎会挑唆吴王起兵造反呢？”袁盎不慌不忙地回答。

这番话看似说得正气凛然，滴水不漏，实际大而不当，冠冕堂皇却非常空洞，所谓君臣大义和国家秩序，这些话站在不同立场，都能解释得通。刘濞也不会承认他在犯上作乱和祸国殃民，他以正义之师自居，自诩举兵造反是在做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

至于真英雄无法靠金钱笼络这种说法，更是完全不着边际。

谁敢说刘濞几十年来招募的人全都是酒囊饭袋，没有一个真有本事之人？

或许，真英雄豪杰没法用金钱来收买，但英雄豪杰也缺钱，也要养家糊口，也要吃喝拉撒，汉朝中央朝廷肯定无法做到野无遗贤吧？那么，肥得流油的吴国，何尝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不过，袁盎说这番无懈可击的废话，在政治上完全正确。

连在一旁的晁错都忍不住插话说：“袁盎说得对!”

一直以来，晁错恨不得将袁盎除之而后快，这次为何一反常态，当着皇帝的面给袁盎帮腔？

也许是晁错公私分明，他与袁盎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只有政治立场不同，所以，只要袁盎说得对，他会毫不犹豫地赞成。

也许是为了在皇帝面前撇清，他之所以屡屡揭发袁盎，并没有掺杂个人利益在内，只是一心谋国。只要对国家有利，哪怕是政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赞成。

也许是景帝太年轻，面对气势汹汹的吴楚叛军乱了分寸，晁错想借袁盎的话稳住他。

又或许，各种情况兼而有之，但真实情况唯有晁错自己知道。

但对于袁盎来说，有晁错这句话就够了。

景帝又问：“虽然如此，请你还是谈谈具体措施才行。”

“事关机密，请陛下让身边人回避。”袁盎马上回答道。

袁盎的提议完全合理，谁也无法保证皇帝身边没有刘濞安插的耳目。

景帝示意左右侍从之人退下，晁错没动，留在了原地。

晁错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皇帝最亲近之人，不属于外人，无须回避。

但是，袁盎依然一言不发。

景帝催促他，现在可以说了，袁盎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句：“臣所说的方略，唯有陛下一人可知，非人臣可知。”

晁错猛地似乎明白了什么，但是一切都晚了，他只得悻悻退下，到东厢房回避。临走前，回过头来狠狠瞪了袁盎一眼。

不过，袁盎面无表情，根本懒得再理他。

目送晁错的背影消失在殿门口后，景帝回过头问袁盎：“现在可以说了吧。”

“吴楚等诸侯宣称，高祖分封天下，遍立刘氏宗亲为诸侯，晁错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实在不甘心，说到底，他们是痛恨晁错，而不是反朝廷。为今之计，只有斩杀晁错，遣使赦免吴楚七国的谋反之罪，归还被削除的封地，如此一来，他们就失去了造反的借口，兵不血刃就能平息战乱。”

袁盎的话说完了，景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袁盎知道皇帝已被打动了，现在他无须再多说一句话，只要静静

等待即可。

果然，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权衡之后，景帝深深叹息了一声，说：“若真是这样，我怎么能为了爱惜一人，而得罪整个天下？”

皇帝已经主意，要拿晁错做牺牲品了。

不过，姿态还是要做足，毕竟晁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他的帝位。

如今，只需给皇帝搭个台阶。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皇帝是在别无选择、百般无奈下，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此计以外，以臣有限的智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袁盎脸上堆满了内疚和谦恭，而在内心中，他如释重负，他知道在短期内，自己性命无忧了。

在东厢的晁错尚不知自己的生死已在三言两语内决定了。

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是在家国天下、万姓苍生等崇高词汇的遮掩下，干一些交易、出卖、利用的肮脏勾当。

晁错为人刻薄，不会做人，不会团结同僚，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如同商鞅、吴起、韩非等历史上的著名法家之士一样，他善于谋国，但拙于自全。

或者说，个人得失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变革无不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以晁错的智商和学识，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削藩，他图的是什么？

说白了，成功了，巩固的也是刘姓江山，但是倘若失败了，他将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的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历来不缺乏为民请命、为国牺牲之人，他们敢于为了自己心中崇高的理想而牺牲。

支撑晁错无所惧地往前冲的源动力，正是来自他的忠诚与理想。

自战国以来，国家动乱，民不聊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诸侯林立，政令不一。

大汉建立以来，高祖之所以有限地恢复分封，是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的不得已之举。

只是，权力会侵蚀人的心性，它不会由于血缘而变得温情脉脉起来。那些刘姓宗亲诸侯们，为了权力和利益，不会比异姓王更加亲近，正是这些诸侯王的存在，对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削弱诸侯王势力，并非晁错一人之见，而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包括晁错的死对头袁盎。

但明白是一回事，真正去做是另一回事。

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需要大智大勇，手段和勇气不可缺，权力的支持也不可缺。

权力的诡异就在于，无论你做正义之事，还是祸国殃民之事，都离不开它。

一切成功之事，都是在正确的时机、用合适的人、用恰当的方法完成的，缺一不可。

文帝时，贾谊、晁错都先后主张削藩，但文帝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诸侯犹如脓疮，长在大汉的肌肤上，已有数十年了。晁错觉得不

能再等下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等它深入骨髓，一切就晚了。

晁错犹如一名冒死冲锋的战士，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然而，他疏忽了一点，正面射来的毒箭易躲，可身后的刀子实在难防。

历史上那些变革者的下场，晁错比谁都清楚，但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诸侯们开刀，是他太过自信，以为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一定会换来皇帝对自己的绝对信任。

只要君臣相互信任和扶持，大事必成!

至少，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也许他怀有侥幸心理，商鞅、吴起之所以以悲剧收场，是由于秦孝公、楚悼王早死。但如今皇帝年轻，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和信任，削藩之事必然成功，自己也可以青史留名。

可惜的是，这世上最难测的正是帝王心。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景帝的帝王术正是晁错教给他的。

如今这位好学生，要用晁错教的本事来对付他的老师了。

帝王术的核心，就是臣下猜不透帝王的内心世界，不可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喜恶，手中紧握赏罚生杀大权，令臣下战战兢兢，不敢逾越，永远对皇帝的内心捉摸不透。

指望与皇帝交心，实在太过天真。

但是，晁错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假象所蒙蔽，对与皇帝师生之谊的期望严重超值，陶醉于景帝对他的言听计从之中。

但他忘了，如今的景帝，不再是他的学生，他是大汉天子，天子的心胸未必如大海一样宽广，但天子的心思绝对如大海一样深不可

测。

## 朝衣斩市

景帝与袁盎密谈后，朝堂上下一如既往，大臣们依旧按部就班，上朝办事，下朝回家过日子，看不出与往日有何不同。

倒是长安坊间流传着一件事：新任大将军窦婴出征前，将皇帝赏赐给他的千斤黄金悉数陈列廊下，任由军官们拿去用，而他自己却分毫不取。

对于此类收买人心的伎俩，晁错不会太过关注。大战在即，千头万绪的事需要他去处理，他无暇关注其他。

他不知道的是，袁盎已被景帝秘密拜为太常，在家收拾行囊，随时待命前往吴楚大营，与刘濞妥协和谈。

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过去，一眨眼，十天时间转瞬而过。

晁错不会想到，这十天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时光，死神正向他一步一步逼近。

第十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瓯突然一起联名给皇帝上书，弹劾御史大夫晁错：

吴王刘濞大逆不道，图谋作乱，危害宗庙，天下人应当共诛之。社稷危亡之时，御史大夫晁错不为君分忧，还给陛下出馊主意，称将百万大军交给群臣不可信，让陛下亲自带兵出征，置天子安危于不顾，将陛下推上第一线，自己却留在京城，又说要将徐县(属临淮郡，治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半城镇)、僮县(属临淮郡，治今安徽泗县东北骆庙乡潼城村)一带直接让给吴国，他究竟是何居

心？他这是意在离间陛下与群臣百姓，却与吴楚暗通款曲，实在大逆不道，对这等毫无人臣之心之人，臣等义愤填膺，强烈要求腰斩晁错，其家人、父母妻子兄弟等，无论老少统统处死!

陶青、陈嘉、张欧三人分别掌握行政、京城卫戍、刑事司法大权，他们的联名指控，相当于代表了百官的意志，分量十足。他们对晁错控诉的三大罪名大逆(危害君父)、不道(违背君臣伦理)和通敌(将土地拱手让人)，每桩都属于十恶不赦之罪!

如此罪名，不仅要打倒晁错，而且要彻底斩草除根!

晁错为人冷峻，不懂得通融，注定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但从陶青等人的指控来看，他几乎站到了所有官僚的对立面，这究竟是为何？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他们对晁错的指控罪名完全是莫须有。削藩政策的真正主导者是皇帝本人，晁错所做的一切，最大的受益人正是景帝，他怎么可能对皇帝不忠？怎么可能危害皇帝？至于说晁错勾结刘濞，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根本不值得一驳!

那么，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是否有道理？

实际上，晁错说得并没错，而且有前例可循。

大汉开国之初，先有楚汉之争，后有英布等诸侯叛乱，高祖将长安丢给萧何，亲自带兵出征，群臣配合无间，最终赢得了胜利。

高祖之所以在暮年还要带着伤病亲征，除了鼓舞士气，对大将拥兵自重始终保持戒备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赵王武臣、燕王韩广等人一旦脱离旧主，就马上自立称王，韩信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拥兵自重，公然要求立他为齐王，这一幕幕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将军权交给属下，高祖一直抱

有高度警惕，所以宁愿亲征，也不肯轻易将军权拱手让人。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吴楚联军公开反叛，想要赢得胜利，就必须全力以赴，这意味着，朝廷必须将倾国之力托付给平叛主帅。那么，谁能保证主帅在刘濞的利诱面前不会动摇？

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大汉危矣!

晁错思维之缜密，从他给文帝上的数篇奏疏就可见一斑，以他的深谋远虑，肯定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故而，他建议景帝亲征，意在让景帝效法先祖，而他的抱负，是想做大汉的萧何第二!

至于放弃徐县、僮县之地，涉嫌串通吴楚，更是无稽之谈，就算全天下人勾结刘濞，唯独晁错不会。

且不说晁错是否有过这样的提议，即便是有类似主张，也属于战术转移，为了全局，只要赢得最终胜利，不必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周亚夫不是也主张必要时可以抛弃梁国以拖住敌人吗？

一国与区区两县相比，孰大孰小？

为何周亚夫没事，晁错就涉嫌通敌了？

当初，晁错主张削藩时，除了窦婴站出来反对，陶青、朱嘉、张欧等人一个个缄口不言，不敢吱声，如今却跳出来要求惩处晁错，他们的底气何在？

他们出于公意，还是私心作祟？

要说完全没有掺杂个人私心，根本不可能。且不论景帝对晁错的宠信已令满朝文武恨得牙痒痒，就是陶青本人，也感受到了来自晁错实实在在的威胁。

大汉建立以来，文武官员属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最为尊贵，因太尉不常设，且几乎是个名誉头衔，所以御史大夫为仅次于丞相的高官，地位类似副丞相。

自文帝以来，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旦出任御史大夫，下一步极有可能就会担任丞相。

张苍、申屠嘉、陶青等历任丞相无不如是，在担任丞相前，都曾有过出任御史大夫的履历。

陶青本是官二代出身，庸人而已，之所以能够出任丞相，完全是出于权力平衡需要。

他这个丞相完全是过渡安排，若不出意外，被晁错取代是早晚的事。

景帝即位以来，晁错光芒四射，完全盖住了陶青这个丞相的风头，陶青在朝堂上几乎没有存在感。

如今晁错倒霉，要说陶青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之心，说出来怕是没人相信。

另外两位，中尉陈嘉是什么来头，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估计也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事。

廷尉张欧是安丘侯张说(生平不详)庶子，虽说也跟晁错一样研究刑名之学出身，但为人胆小，属于不粘锅类型的官员，奉行的原则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个典型的和事佬。有案件送到他手里时，他往往打回去重审，能拖就拖。遇到实在没法拖延的，只得将案件卷宗封起来。在张欧身上根本看不到帝国最高司法官该有的雷厉风行，总是一副拖泥带水、慢慢吞吞的样子。

周围人每当提起张欧时，都由衷地说一声：“好人啊，为人太厚道了!”

这对一个主管刑狱的司法官来说，可不是什么好评价。

张欧之所以能出任廷尉，完全是由于他是景帝在太子时期的旧人而已。

就这样三个人，现在画风突变，站出来异口同声地对晁错喊打喊杀，实在突兀，令人惊掉了下巴。

不是他们三人一夜之间换了思想，改变了工作作风，而是得到皇帝的暗授机宜了。

是景帝抛弃了晁错。

晁错自始至终就错了，错不该将景帝视如高祖皇帝。

成长于深宫之内的景帝，自幼浸淫于权谋厚黑学，内心阴暗、自私，比先祖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高祖身上那股来自民间的豪气与豁达。

高祖与萧何共起于细微，血雨腥风之中并肩作战多年，他尚且对萧何不放心，在前线作战时，仍不忘笼络他，深恐后院起火。一旦局势稳定，就立刻将萧何投入大牢，萧何几乎死于狱中。

高祖尚且如此，况景帝乎!

晁错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不顾个人生死安危，与景帝推心置腹，奈何在皇帝眼中，他不过是一粒棋子而已。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悲乎!悲乎!

晁错!晁错!一错再错。

年轻气盛的景帝本想借用晁错铲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将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但他低估了对手的能量，当吴楚联军汹汹而来

的消息传来时，他顿时慌了，一时手足无措。

在这种心境之下，听到晁错让他亲赴前线时，畏惧、怯懦之后生出了愤怒。那一刻，晁错的悲剧就注定了。

当袁盎提出牺牲晁错时，景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那一刻，他不是犹豫要不要抛弃自己的恩师，而是在思考如何以说得过去的理由牺牲晁错。

自古无情莫过帝王，危急时刻，他们最先考虑的是自己，至于他人，他们从来不在乎。

帝王的颜面比天大，既要杀人，也要做得冠冕堂皇。这种事不需要皇帝亲自动手，只需要一个眼神，陶青等人马上心领神会。

陶青、陈嘉、张欧三人治国理政本事稀松，但落井下石可是轻车熟路。经过数日的灯下密谋后，就将一份义正词严的控诉书放在皇帝书案上了。

这一刻，景帝没有丝毫犹豫，抓起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可”。

与此同时，中尉陈嘉已在赶往晁错府的途中。

抓人是陈嘉的本职工作，当仁不让。

此时的晁错还完全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陈嘉赶到晁错家门口时，正逢晁错穿好朝服准备上朝。

陈嘉连哄带骗，拉晁错上了车，待车行驶至长安东市时，陈嘉忽然动手，将晁错拽下车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可叹晁错至死都没明白怎么回事。

堂堂御史大夫，没经过审讯、没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这样被杀害!

这相当于利用国家公共机器，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刺谋杀!

那一刻，长安东市的民众，莫不惊骇不已。

晁错死后，家中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处死，一个不留。

景帝为何如此急迫处死晁错，而且是当街处死？

主要是目前局势紧迫，他害怕夜长梦多。

另外，当街杀人，就是做给刘濞看，表明自己与晁错划清界限态度之坚决。

对于晁错的死，后世有不少争议。但总体来说，对他的初衷，多数人持肯定态度，认为错在方式方法有问题。

苏轼就曾写过一篇《晁错论》，他认为晁错做事太过于急于求成，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适得其反，自己落了个横尸街头的下场。

不得不说，东坡先生之论，属于事后诸葛亮，要是他处在晁错的位置上，未必能做得更好。

晁错晁错，错生时机，错信君王，错用方法，一错再错，终酿大错!

当长安城里的君臣明斗暗算，上演丢卒保帅的大戏时，在遥远东方的吴楚叛军大本营，也因为下一步进军路线的问题，将帅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大将军田禄伯(就是景帝念叨的那位)提出，目前大军蜂拥向西，受道路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很难铺展开来，吴楚兵力优势无法发挥出来。不如兵分两路，由他带上一支五万左右的人马，顺长江和淮水水路沿江而上，直接攻占淮南国和长沙国，然后直攻武关，与刘濞会师关中。

不难看出，田禄伯此人并非浪得虚名，很有战略眼光。

他的用兵方略完全可行，一旦执行，汉朝朝廷将腹背受敌，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田禄伯汇报作战计划时，吴国太子刘驹也在场。

田禄伯前脚刚走，刘驹马上就对刘濞说：“咱们是干什么？是造反哪，既然我们可以反叛朝廷，又怎么指望别人不背叛我们？父亲将军队交给外人另辟战线，实在难以放心，万一他生了二心，岂不是白白损失了一支力量？”

果然是做贼者心虚，反叛者眼里人人皆是叛徒。

刘濞一听，儿子说得有理!遂否决了田禄伯的提议。

不久，又有一位姓桓的年轻将领给刘濞出主意：“咱们吴国多是步兵，汉军多为战车和骑兵，步兵利于山地战，车骑善于平原野战，咱们应该扬长避短，不要与汉军过多纠缠，无须对沿途城池挨个攻占，应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趁着汉军尚未反应过来，迅速拿下洛阳武库，占领敖仓，然后依据山河之险，号召诸侯。如此一来，就算一时半会儿攻入不了关中，也可与朝廷做长期对峙，天下大势可定。反之，大王要是过于恋战，斤斤计较一城一邑之得失，行军缓慢，战线过长，等汉军战车和骑兵火速赶到，在梁国和楚国的大平原上两军对垒，我军必败无疑。”

桓将军这番战略分析可谓精辟到位，将双方的优劣得失剖析得一清二楚。

无论古今，战争说到底就是在拼消耗，靠的是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吴楚联军远离大后方，致命软肋就在粮食供给。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对于这一点，战争双方的将领，周亚夫和桓将军的看法出奇一致。只是敌我立场不同，周亚夫要设法切断吴楚粮道，桓将军则是提出首先占领国家粮仓，拥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刘濞将桓将军的提议在军事会议上提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在座的一些老将领们倚老卖老，当场提出反对意见，用轻蔑的语气说：“年轻人就喜欢拼血气之勇，两军阵前冲锋陷阵还可以，至于战略战术这些事关全局的大事，他能懂什么!”

刘濞本来就自信满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听老将们这么一说，也就没把桓将军的意见当回事。

殊不知，正是患得患失和骄傲自大，使他错过了最佳战机。

梁国是西进的必经之地，国富民足，要是绕过这么一块肥肉，刘濞实在心有不甘，所以一心想先拿下梁国。

正当刘濞发起围攻梁国之战时，有两个人从长安赶来求见。

一人是前国相袁盎，一人是自己的侄子德侯刘通。

# 第十二章 黎明时分

## 死而后生

袁盎和刘通分别以朝廷正、副使身份来到吴楚联军军营。

刘通是刘濞的弟弟德哀侯刘广之子，出发前被任命为宗正。

袁盎与刘濞是旧识，刘通与刘濞是叔侄，景帝希望利用个人情义与血缘亲情打动刘濞，劝他就此罢兵。

听说袁盎来了，刘濞就猜到他此行目的了，干脆避而不见，让袁盎吃了闭门羹。

但刘通究竟是自家亲侄儿，刘濞还是出面接见了。

刘通比较尽职尽责，叔侄见面后，让刘濞跪下拜接皇帝谕旨。刘濞感到非常滑稽可笑，行了，都是明白人，现在都兵刃相见了，还用得着演戏吗？便大笑道：“我现在已称帝，自立为东帝，还用得着跪拜他人吗？”

说完，就把大侄子晾在一边，不再理睬。

不过对于袁盎，刘濞还是有些赏识，想策反他留在吴军做将军。如果此事成了，不只多了一位人才，对朝廷士气也是重重一击，实在是一举两得。

可惜，袁盎让刘濞失望了，任凭他派去劝降之人费尽口舌，袁盎兀自不动，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既然不为我所用，那么，就杀了吧。

为防止袁盎逃走，刘濞命一名都尉带领五百人先把袁盎的住处包

围起来，待天明，就结果他的性命。

时值隆冬，天气异常寒冷，吴国的士卒们多来自南方，哪里禁得住北国的寒风？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有位司马(武职官员)很体贴地带来两担酒：弟兄们，天这么冷，哥儿几个还在遭这罪，要不喝点酒暖暖身子？

士卒们接过酒瓢，尝了一口，香醇扑鼻，劲道足!

还是司马懂得体恤咱们，众人你一口我一口，饮了起来。谁知一个个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司马看了一圈，众人犹如稻草捆一般，横七竖八倒得遍地都是，任凭如何唤叫，都兀自不动，没人应声。

他感到满意，这酒买得值!为了买到它，可是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呢。时间紧迫，不能停留太久，他一头扎进袁盎营帐，拉起他就往外走。

由于太突然，袁盎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顿时蒙了，大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刘濞又在耍花招，便坐在那里不动。

司马无奈，只得跟他说起一桩往事来。

多年前，袁盎还在吴国国相任上，这位司马当时是国相府上的一位从史(汉朝高官临聘的属官，类似于现在政府机关没有编制的工作人员)。

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出入袁盎府上，一来二去就跟周围人混熟了。就在这期间，结识了袁盎的一个婢女，两人都正值青春年少，情愫懵懂之际，很快互生爱慕之情，私订终身。

这一切都被袁盎看在眼里，不过，他故意装糊涂，视而不见，没有点破。

可惜好景不长，有人察觉了，私下悄悄告诉从史，别以为国相眼瞎，对你们那点小秘密，他早已知晓，趁着他还没下手，抓紧时间逃命去吧。

从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那还等什么？赶紧溜吧。

从史不见了，袁盎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赶紧驾车去追。

从史两条腿自然跑不过马车，没走多远，就被袁盎撵上，强行带了回来。

从史心想，这下彻底完了。

万万没想到，袁盎非但没治罪，反而成人之美，将婢女赐给他，让他们成婚，正大光明地成为合法夫妇。而且还跟以前一样，继续让他做他的从史，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朝堂上，袁盎跟皇帝一再强调等级秩序和名分级别(比如慎夫人席子事件)，但他绝不是那种食古不化的腐儒，对于年轻人追求爱情，能大度包容成全，实在难得。

与人私通，非但没被追究，反而拥得美人归，工作也保住了，这位从史可谓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从史经历了与爱人离别又重聚，职位失而复得之后，对袁盎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他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袁盎的恩德。

只是，袁盎后来回了长安，自此音信杳然，两人再无交集。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从史在职场上一步一个脚印，直到坐上司马的位子。岁月流逝，但恩人的情义他从未忘记。不过，对于袁盎来说，这不过是一桩陈年旧事，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故人重逢，旧事重提，别有一番感慨。

司马当下催促道："吴王明天定会杀您，请速速动身离开!"

袁盎本想马上就走，但转念一想，又停住了脚步，他说："你家中有父母妻儿，我一走了之容易，但岂不是拖累了你一家？算了，我还是留在这里，听天由命吧!"

不得不佩服袁盎这种气度，到了生死关头，没有只顾自己逃命，仍为他人考虑。

司马非常感动，但既然他敢于冒险救人，定然提前做了周密安排。他说："您只管走就是了，您走后，我也要逃命去了，我的父母已被安置在安全之处，请您不必为我担忧。"

说完，司马掏出刀，一刀割开营帐帷幕，引导袁盎往外走。

营帐四下，满地都是醉酒的士卒，两人蹑手蹑脚，从士卒们身上小心迈过，悄然离开了吴军大营，分道扬镳，各自逃命。

虽然走得急，但袁盎依然没忘带上符节。

作为使者，符节不离身，犹如战士不弃刀，这是职责使命所在，对于这一点袁盎很清楚。

为尽快赶路，他将符节上的节旄取下来，揣在怀中，以节杖为拐杖，在茫茫夜色中，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

袁盎跌跌撞撞一口气走了七八里路，好在吴军始终没有追上来。

此时天色渐渐发白，袁盎暗自庆幸逃离虎口。正准备要歇一会儿，忽然，远处出现了一队骑兵，袁盎大惊失色，以为遇到了吴兵，待走近一看，才知虚惊一场，原来是巡夜的梁国侦察兵。

袁盎长吐了一口气，知道自己终于安全了。

抵达梁王大营后，袁盎让人赶紧疾驰去长安，给皇帝禀明实情，让他彻底丢弃和平解决吴楚叛乱的幻想，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再说景帝，自袁盎走后，心中忐忑不安，恰好，在前线军中任校尉谒者仆射的邓公(名不详，汉中城固人)回长安来汇报工作。

景帝很想知道梁国的前线情况，见到邓公后，急切地询问：“卿自军中来，听闻晁错伏诛，吴楚退兵否？”

对于晁错的死，邓公既感到惋惜，又深为他不值，但知道这是皇帝钦定的案子，故而，一直不敢为他抱屈喊冤。如今，皇帝要问，他觉得心中的话不吐不快，便直言道：“吴王久怀不臣之心，蓄谋作乱已有数十载，碰巧赶上朝廷剥夺封地，被彻底惹恼了，诛杀晁错不过是为谋反找的一个借口罢了。他如此大费周章，哪里仅仅是为了一个晁错？晁错对朝廷一片忠心，却遭到杀害，臣担心自此后，天下士人都缄口不言，不敢再为朝廷说真话了。”

邓公的话，让景帝感到有些意外，他若有所思地问：“是吗？”

“诸侯坐大，危及社稷宗庙，天下人皆知，唯独晁错敢于任事，请求削弱诸侯土地，以加强朝廷威望，本是利在万代的好事。可惜，削藩刚推行开来，晁错就遭诛杀，朝廷如此做法，简直是亲痛仇快。对内堵住了忠臣的嘴，往后恐怕无人敢再说真话；对外等于帮助诸侯们除掉了一个对手。臣以为陛下的做法，实在不可取。”邓公没有回避，将积压在心中的话一吐为快。

景帝听后，半晌没有言语，许久之后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您说得很对，我现在也很后悔杀了晁错!”

事后，景帝提拔邓公为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东北)中尉，算是对他敢于直言的一种奖励。意在告诉天下人，逆耳忠言朕还是听得进去，是非善恶朕还是能辨得清的。

至于这是景帝迫于形势不得已的表态，还是真的心生悔意，已不重要了，毕竟死者不能复生，世上再无晁错矣!

为保住江山，对于皇帝来说，无人不可牺牲，就算明知你是冤枉的，也无不可，大不了事后再平反昭雪嘛，届时别人还得感念皇恩浩

荡。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是和是战，讨价还价，那是政客们的事，作为将军，必须为赢得战争做准备。景帝派袁盎出使吴国时，周亚夫已行至霸上，准备东出函谷关，迎战吴楚叛军。

历史往往充满偶然，有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在关键时机冒出来，三言两语，往往就会改变历史进程。在霸上，周亚夫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叫赵涉。

只知道，他是位读书人，至于是哪里人，以前干过什么，统统不知。

“将军此去救梁国，是打算走函谷关吗？”赵涉问道。

周亚夫点点头，从关中东出，函谷关是必经之道，这还用问吗？

赵涉劝道：“将军切不可走函谷关，这条道路天下人皆知，吴王岂能不知？走函谷关必经崤山、渑池，沿途多山势险要之地，很容易隐蔽藏身，得知将军东来，吴王必会在此地埋伏刺客，狙击将军，将军切不可冒险。行军打仗讲究出其不意，将军何不调整行军路线，改走蓝田，经武关，直奔洛阳？如此一来，虽说行程上耽搁一两天，但可以直取洛阳武库，杀他个措手不及，吴楚叛军定会乱了阵脚，将军可一举夺得作战先机!”

周亚夫一听，非常高兴，当机立断，下令改变行军路线，改走武关，果然沿路平安无事，顺利到达洛阳。而后，周亚夫派人至崤山、渑池一带搜捕，果然抓获了不少埋伏于此的吴国刺客。

至于赵涉，周亚夫奏请皇帝，让他担任护军(军中监督官)。

周亚夫没有稍做停息，立刻在荥阳集结部队。

只要牢牢守住荥阳不失，吴楚叛军就无法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

刘濞率领吴楚叛军猛攻梁国棘壁(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梁国数

万士卒战死。梁王刘武以韩安国、张羽等人为将军，死守睢阳城，誓死抵抗吴楚叛军，双方死伤惨重，战争陷入胶着状态。

韩安国字长孺，梁国成安县(今河南省汝州市东南)人，后来移居睢阳，曾跟随田生(邹县人)学习《韩非子》法家思想及杂家学说，后做了梁国中大夫。

张羽是楚国国相张尚的弟弟，张尚死在楚王刘戊手中，他与叛军有着血海深仇，为了给兄长复仇，打起仗来跟玩命一般，勇不可当。

韩安国与张羽二人，一个老成持重，一个勇猛过人，两人互补不足，搭配得当，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之下，吴楚叛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时难以突破梁军防线，陷入两难之境。进攻讨不到便宜，如果绕过梁国直接西进，又怕梁军在后面偷袭，被前后夹击。

恼羞成怒之下，刘濞进一步加大兵力猛攻梁军阵地，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梁国。

战况果如周亚夫当初预想，双方都拼尽全力厮杀。

目前，梁军能够拦阻住吴楚叛军，主要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以及将士们被激发出来的高昂斗志。不过，要是时间一长，梁军能否顶得住，实在难说。

刘濞为了今日，准备了几十年，无论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远在梁军之上。

眼看将士伤亡不断扩大，梁王心急如焚，得知周亚夫已经率兵东出，急急派人去求援。

谁知周亚夫没有直奔睢阳而来，反而直奔梁国以北的昌邑(在今山东省巨野西南)，然后深挖沟，高筑壁垒，摆出长期屯兵于此的架势。

面对纷至沓来的梁国求援信，周亚夫不为所动，坚守不出。

刘武急得快疯了，只得派人前往长安，请求皇帝下令，命周亚夫出兵救援。

接到刘武的求援后，景帝也坐不住了。虽说他以前曾和周亚夫有约在先，但现在已顾不了那么多，要是刘武有个闪失，老娘还不跟他拼命!景帝立即派使臣前往周亚夫营中，命他立刻出兵，救援梁国。

皇帝的诏书周亚夫接下了，但依然按兵不动。

## 大侠相助

周亚夫不出兵，并非自身实力不足。

自东出函谷关以来，得到了朝廷、地方，甚至是民间的大力支持。

刘濞、刘戊等人为了个人野心，将国家拖入战乱之中，他们这种不义之战，注定不得人心，不断有人加入平叛大军，其中有骑郎将李广、河间王刘德的太傅卫绾、将军直不疑(官秩两千石，具体职位不详)。

李广的事迹以前提过，在这里介绍一下卫绾和直不疑。

卫绾和直不疑可谓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的人生起落大致同步，性格也颇有些相似，就连最后的结局也近乎一致。平定吴楚叛乱，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先说卫绾。卫绾，代郡大陵(今山西省文水县)人，在文帝时，他凭借擅长的弄车之技被选为郎官。究竟什么是弄车之技，有种种说法，有说是以马车为表演道具的一种杂耍，也有说是娴熟驾车。不管怎么说，卫绾是文武全才，这一点毋庸置疑。

卫绾为人敦厚谨慎，深得文帝信任，不断被提拔，一直坐到了中郎将的位置上。

中郎将直接负责皇宫宿卫和皇帝本人的安全工作，在文帝时做过这一官职的另外两位，便是大名鼎鼎的袁盎和张释之。

卫绾为人眼快、腿勤、嘴巴紧，工作认真负责，相比动辄直言劝谏的袁盎和张释之，文帝更喜欢卫绾，前后共赏赐他六把宝剑。

那时候，景帝还是太子。有一次，他邀请皇帝身边的近臣赴宴饮酒。

太子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微妙，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君臣。皇帝对太子的心态也很复杂，既希望太子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但同时又担心太子势力过大，对自己构成威胁。

古往今来，在位皇帝被太子架空，甚至父子骨肉相残、逼迫退位之事史不绝书。

太子不好当，没出息肯定不行，但锋芒太露，又怕遭到皇帝猜忌。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父子亲情，在权力竞争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皇帝对太子的提防，丝毫不亚于对臣下的戒备。

太子想要过得好一些，就要设法掌握皇帝的喜好与厌恶，以便投其所好，讨其欢心。

要掌握皇帝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要从皇帝身边的人下手。

中郎将负责皇帝安全，掌握皇帝行踪自不必言，对皇帝的了解也远超过一般官员。

在皇帝身边待了这么多年，卫绾耳濡目染，见得多了，自然知道宴无好宴，酒无好酒。但太子盛情相邀，又不能直接拒绝，遂借口身体不适，婉言谢绝了邀请。

文帝去世前，特意交代景帝说："卫绾此人是个值得信赖的长者，我死后，希望你善待他。"

景帝嘴上满口答应，但心头的结却一直解不开，继位后，就把卫

绾晾到一边，不予理睬。

卫绾心中明白，皇帝这是故意不给他好脸色看，所以在工作上更加谨慎细微，不敢懈怠，景帝尽管有些不满，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出啥毛病来。

君臣二人就这样在不冷不热中度过了一年多，直到有一次，景帝要去上林苑，特意让卫绾与自己同乘一辆车。

卫绾有点尴尬，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侍坐一旁，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说点啥。沉默中，不觉已走了很长一段路。

半晌后，还是景帝主动发问了："知道为何让你陪朕同乘一车吗？"

"臣下不过是代郡一介戏车士，幸有微薄功劳，蒙先帝和陛下擢升为中郎将，以臣的愚钝，实在不敢揣测陛下之意。"卫绾恭恭敬敬地回答。

对卫绾的态度，景帝还比较满意，便旧事重提，问他，当初相邀，为何不肯赏脸。事已至此，卫绾更是打死都不能承认了，一口咬定自己当时确实病了，动不了身。

都是陈年往事了，景帝也不再想深入追究，当场要赏赐一柄剑给他。

景帝的用意很明了，作为先帝的旧人，往后也要一如既往地忠于朕。

要是换了旁人，肯定马上感激涕零地接过剑，抓紧机会向皇帝表忠心，以争取换得皇帝更大的信任。

谁承想，卫绾却说："先帝在世时，已给臣赏赐了六柄宝剑，恕臣不能再接受陛下的赏赐。"

皇帝赐剑是一种荣耀，宫内的剑也是稀罕物事，朝臣中大多数人

获赏后，多拿来馈赠亲友，或用来购置产业，很少有人收藏在家中不动。

景帝当下表示有些怀疑，立即命人去卫绾家中取剑，结果发现六把剑完好如初，根本没有动过。景帝释然了，他看出来了，卫绾私德没问题，是个忠于职守之人。

事实上，果真如此。

在平常工作中，有功，卫绾先推给属下，有过，则揽到自己头上。这些年来，人们都说不出卫绾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他身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卫绾是一个称职的人，是一个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总之，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好人。

这样的人，更适合去教书育人，而不是做将军。

于是，景帝便打发他到河间国，做河间王太傅。

吴楚之乱起，卫绾立刻率领河间国的军队，赶来援助周亚夫。

再说直不疑。直不疑，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文帝时期，曾担任郎官。郎官署地方并不宽敞，常有多位郎官被安排住在同一间屋内。

有一次，直不疑住处发生了失窃事件，和他同室的一位郎官发现自己的金子不见了。当时，屋内就剩下他和直不疑两人，直不疑成了最大嫌疑人，他怀疑直不疑偷了金子。

直不疑没做任何解释，连连道歉之后，去市场买了同等重量的黄金，交给了失主。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不料几天后，故事却发生了逆转。有位请假回老家的同室郎官回来了，一进门，就不停地向失主致歉，原来他急着回家，在收拾行李时，估计赶上黑灯瞎火没看清，错

将他人的金子裹在行李中带回家了，到家时才发现里面多了东西。

真相大白后，失主反而不好意思了，尴尬地一个劲向直不疑道歉。而直不疑没有得理不饶人，反而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

周围之人无不为直不疑的气度和胸襟所折服，都认为他为人忠厚可靠。后来，此事也传到文帝耳中，文帝很是欣赏。自那以后，就不断擢升直不疑，一直提拔到中大夫的高位上。

人红是非多。直不疑高升后，一些人眼红，就开始编造各种谣言诋毁他，比如有人散布谣言说："直不疑人长得帅，但就是戒不掉喜欢和嫂子私通的毛病!"

这就跟当年陈平被人非议一样，看来不仅仅是蛾眉遭人妒，就是男人长得帅，也难免绯闻缠身啊。

谣言这东西，你根本没法解释清楚。造谣者只需随意编造几句似是而非的话即可，而受害者想要自证清白，实在太难，甚至越辩解越解释不清，陷入越描越黑的怪圈。

对付谣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时间一长，它就会自动消失。因为现实中，每天总有源源不断的新消息散播开来，人们对同一件事的关注热度总会出现疲劳，视线很快就会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去。

直不疑听说别人散布谣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没有兄长的。"然后，再也没做任何回应。不久后，谣言也就云消雾散了。

卫绾和直不疑两人加入平叛作战的队伍中，以他们沉稳的性格，断不会冒险求战，反而有助于朝廷队伍沉得住气，稳住阵脚。

除了以上三人外，还有不少民间人士，也自动加入到周亚夫的队伍中来，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游侠剧孟。

剧孟，洛阳人。洛阳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可是剧孟与当地浓

厚的商业氛围格格不入，他不置产业、不经商，只喜欢结交朋友，为人仗义，大名在江湖上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过，剧孟也有不少不良毛病，比如喜欢赌博。但毕竟瑕不掩瑜，在普通百姓眼中，有缺点的大侠胜过完美圣人，看上去更真实，更接地气，所以丝毫没影响人们疯狂地推崇他。

相比于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在民间，人们更喜爱游侠。虽然游侠也不是无所不能，但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普罗大众来说，游侠至少是一种精神寄托。

剧孟的母亲去世后，闻讯而来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仅车辆就有千乘之多，塞满了剧孟家门前的道路。其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之崇高，由此不难看出。

剧孟家中虽无余财，但扶危济困、重诺轻死的义举感染着不少人，在江湖上的号召力，丝毫不亚于王侯，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白衣卿相。

不要说民间普通老百姓，就是在庙堂上的公卿大臣，也有不少人是剧孟的忠实粉丝，袁盎就是其中之一。

晁错的死，彻底让袁盎灰头土脸。为了扭转颓势，此后他也多次向景帝进言，但上书后，大多如泥牛入海，根本没有回音，他也自觉无趣，索性称病辞职。

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索性搬回安陵老家，跟乡邻们混在一起，整日斗鸡赛狗，倒也自得其乐，过了一阵难得快活的日子。就在这段日子，剧孟路过安陵，特意前来拜访袁盎。

剧孟的登门造访，让袁盎喜出望外，他忙前忙后盛情款待了剧孟。

安陵当地有个富户人家，认为剧孟好赌，整天东窜西窜，不务正业，就是个社会二流子。当着袁盎的面表示，实在不明白袁盎为何与

这种货色搅和到一起。

袁盎听后勃然变色，当即反驳道：“你懂什么!剧孟是个赌徒不假，但你可知道他母亲去世后，前来送殡的车辆有千辆之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得人心!人生在世，谁没有个三病六灾？危难之际，面对他人的求助，多数人要么称家有年迈父母，要么借口诸事缠身走不开，天下人所能指望的唯有季心(季布弟弟)、剧孟而已。别看你身后经常有几名随从跟着，你敢保证，一旦有事，他们靠得住吗？”

富人被反驳得哑口无言，袁盎此后再也不与他往来。

此事传开后，一时间成为江湖美谈，人们无不交口称赞袁盎。

像剧孟这样的大侠前来相助，不亚于得到一支军队。

周亚夫兴奋地说：“吴、楚想成大事，却不懂得求助于剧孟，由此可知，他们必败无疑!”

随着朝廷平叛力量的不断壮大，汉军将士们的士气也进一步高涨。

周亚夫决定，趁着吴王刘濞与梁王刘武拼杀之际，快速出手切断吴楚叛军的粮道。

此次行动意义重大，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派谁去比较合适，周亚夫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派弓高侯韩颓当前去，执行此趟任务。

韩颓当此人出身可不简单，他父亲是秦末群雄之一的韩王信。当年，韩王信叛汉失败后，仓皇北逃，遁亡匈奴，在逃亡至颓当城(具体地点不详)期间，喜得一子，便指地为名，给孩子取名为韩颓当。于此前后，他的太子也诞下一子，取名为韩婴。

或许是思乡心切，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韩颓当和韩婴叔侄二人，自匈奴南归，率部下投奔汉朝，汉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为襄城侯。

在匈奴长大的韩颓当，性子与父亲韩王信截然不同，他身形剽悍，作战勇敢，敢冲敢拼，将此趟截断敌人粮道的重任交给他，再合适不过了。

韩颓当带上一支轻骑兵，悄然出发，奔袭淮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又称泗口、清河口，在今江苏省淮安市西北)，没等叛军反应过来，就一举夺取了敌人的运粮渡口，斩断了吴、楚叛军的粮道。

在睢阳战场，已近乎绝望的梁军仍然拼死抵抗。他们已不对援军抱任何希望了，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打算跟叛军拼个鱼死网破。

梁国上下都知道，一旦睢阳城破，合城老幼，必无存活之理。

不过，他们慢慢发现，叛军的战斗力渐渐不支，攻城的力度也在逐渐减弱。

日子一天天过去，睢阳幸赖城高池深，终究没有被叛军攻破。

直到有一天，天色发白时，守城的梁国将士们发现，叛军不知什么时候撤退了，城外空空荡荡，已无一人。

围城月余后，睢阳终于解围了。

大家激动地欢呼雀跃，梁国得救了!

## 后发制人

撤离睢阳后，叛军对突破梁国防线继续西进已失去了信心。加上军中缺粮，将士们吃不饱肚子，军心开始动摇，不再对未来抱有任何幻想。

刘濞急需要一场大胜来激励士气。他听说周亚夫已转师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正率军前来。

吴军断粮，士兵饥寒交迫，急于求战。周亚夫粮草充足，根本不

急着作战，下令死守营寨，绝不迎战。

大战在即，两军僵持不下，士卒们都神经紧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稍有点风吹草动，不小心发生误判，就会酿成祸端。某天夜里，或许误传消息，汉军军营内突然哗变，以为叛军攻进来了，情况不明之下，军中发生内斗，士卒相互厮杀起来，一度打到了周亚夫营帐门口。

好在周亚夫沉着应变，依然安睡如山，根本不予理睬。

看统帅没任何反应，大家渐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便停止了拼杀，各自散去。

在战争中，由于通信不畅，往往难辨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同袍之间自相残杀的事屡见不鲜，亏得周亚夫应对得当，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汉军平稳下来，但叛军内部却没法沉得住气，由于缺粮，军心浮动，士气低落。

不能再这么干耗下去了，为了速战速决，叛军决定夜袭汉军。

为了迷惑汉军，叛军打算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佯攻东南面，实攻西北角。

夜幕时分，吴军大张旗鼓地向汉军大营东南角调集，故意摆出要从东南方向进攻的架势。不过，吴军计谋很快被周亚夫识破，他没有被敌人制造的假象所迷惑，命令加强西北面守备。

果不其然，吴军突然从汉军大营西北角发起冲锋，只是汉军早已做好准备，吴军的数次冲击都以失败而告终。

吴楚叛军粮食告尽，西进受阻，又没有打过胜仗，死亡和绝望笼罩在每个人心头，失败的阴霾挥之不去。士兵大半饿死，部分四下走散，还有不少人选择投降汉军。

周亚夫趁机发起反攻，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楚王刘戊见败局已定，无力回天，绝望之下拔剑自杀。

眼看大势已去，吴王刘濞带麾下壮士数千人乘着夜色，仓皇撤离战场，一路狂奔，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镇)，又逃到东越国以寻求避难。

刘濞刚喘了口气，就派人四下收拢吴楚残兵败将。东越是小国，虽说军力不强，但少说也有军队万人，加上纠集的残兵，刘濞依然贼心不死，企图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之后，东山再起。

刘濞抵达东越不久，汉朝使者也暗中尾随而至，面见东越王。一番威逼利诱之下，很快，东越王就出卖了刘濞，骗他一起出城劳军，刘濞兴高采烈地答应下来。

刚出城不久，突然跳出一人，提着矛戟冲着刘濞狠命刺了过来，毫无防备的刘濞来不及躲闪，当场一命呜呼。东越王割下刘濞脑袋，命人快马加鞭送去长安，献给皇帝。

刘濞遇刺后，吴国太子刘驹逃离东越，投奔闽越去了。(《史记》称刘濞两个儿子刘子华、刘子驹逃跑到了闽越，没提太子名字，此处从《汉书》。)

刘濞、刘戊已死，吴楚叛军的残兵败将群龙无首，走投无路之下，或降周亚夫，或降梁王刘武。

吴楚叛乱自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起兵，二月中旬兵败，至刘濞被杀，前后不过三月而已。

刘濞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整场叛乱就像一场闹剧，虽然一度给汉廷造成很大压力，但终究一事无成。

不过，在吴楚反叛中，与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的愚蠢和狂妄相比，叛军将领周丘的表现倒是可圈可点。

周丘，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东)人，为人嗜酒如命，加上品行不端，在老家待不下去了，便跑去投奔刘濞。

刘濞仗着财大气粗，笼络了不少人，自以为兵多将广，手下能人异士更是多如牛毛，根本没把相貌平平的周丘放在眼里。

起兵之初，刘濞就对那些投奔他的人大肆封官，分别授予将军、校尉、侯、司马等职务，唯独对周丘不闻不问。

周丘心里很不服，直接找上门，面见刘濞。

“大王，我知道我这个人没多大本事，不敢奢望分一支军队给我，只希望能授予我一支符节，我定会设法报效大王。”

言已至此，刘濞再不好推辞，都要造反了，区区一支符节算得了什么？当即二话不说，将符节给了周丘。

刘濞本没对周丘抱任何期望，万万没想到，他给了周丘一支符节，周丘还给他一个惊喜。

周丘带上符节，单枪匹马出发，趁着夜色返回故乡，摸入了下邳城。

吴王造反的消息已在下邳城内传开，官民无不人心惶惶。

周丘一人径自住进了宾舍，亮出符节，传话下邳县令前来参见。

下邳县令不明就里，急忙赶来。

周丘随便编造了个罪名，让县令的随从杀了他，然后，又召集当地官吏富豪，宣布道：“吴王大军将到，要杀光下邳人也不过是吃一顿饭的工夫。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现在投降，保全家人不说，有才之人，还可以封侯。何去何从，你们看着办!”

这些人听后吓傻了，都知道周丘是个浑蛋，他要说好消息，还没个准儿，但是要说坏消息，必定马上就会到。

那还等什么？保命要紧啊，立即四下散去，劝说周围的人投降。

待到次日天明，下邳人全投降了。

周丘靠一人之力，一夜之间招降了一座城，收抚了三万人。

不过，周丘并不知足。他一边派人通知刘濞，一边又带人继续向北扩展，攻占沿途城邑。

等攻下城阳时，周丘已拥有了一支十万人规模的大军。

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却传来刘濞战败逃走的消息。正所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周丘明白，一旦吴楚的主力部队失败，单靠自己孤木难支，撑不了多久，于是只得后撤，退回下邳。

在返回途中，周丘越想越郁闷，急火攻心，导致后背毒疮发作，还没抵达下邳，就死在途中了。

周丘一死，他拼凑起来的人马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吴楚叛乱平息之时，胶西王刘卬、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围攻齐都临淄已三月有余，估计这三位平日养尊处优的草包王爷能力实在太差，始终没有攻破临淄。

正当他们进退两难时，汉军大将栾布与平阳侯曹奇(曹参之孙)率大军赶到，久围不下的叛军早已是疲惫之师，哪是久战老将栾布的对手？一战即溃，各自逃回封国去了。

齐国之围遂解。

临淄城是安全了，可齐王刘将闾却高兴不起来。他风闻自己曾私下勾结刘濞之事已被朝廷得知，感到在劫难逃，索性在朝廷追究之前，喝一口毒药自行了断了。

胶西王刘卬逃回国后，太子刘德建议说，汉军远道而来，已是人困马乏，趁尚未缓过神来，咱们立刻再次集结人马，杀个回马枪，打

他个措手不及，如此，或许还有一丝希望。退一步，就算袭击失败了，也可以转战海上，在茫茫大海上，汉军又能奈我何？

只要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只要大海在，何愁没鱼吃。

刘德的建议是可行的，对于目前的刘印来说，是个不错的选项。

可惜刘印就是个色厉内荏的家伙，已被栾布吓破了胆，完全丧失了斗志，面如死灰，光着脚丫子坐在席子上，只顾端着碗哆哆嗦嗦地喝水，哪有半点王者风范？

三个月前那个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的胶西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前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面对儿子的提议，刘印垂头丧气地说：“队伍早都散了，还拿什么跟汉军打呀？还是算了吧。”

就在此时，韩颓当也赶到齐地来增援，他给刘印送来一份招降书：

我奉诏前来讨逆，若主动投降，可以赦免罪行，封爵和土地保持不变，但若负隅顽抗，拒绝投降，我必将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大王何去何从，我静等你的答复。

犹如溺水之人看到稻草一般，这封信让刘印产生了一丝幻想，只要主动投降，朝廷真的会放过他？

一日早晨，汉军军营门口，巡查卫兵发现不远处有个人脱了上衣，光着上身跪在那里请罪，一问才知是胶西王刘印，便带他去参见韩颓当。

刘印远远看见韩颓当马上跪下，连连叩头请罪。

韩颓当手持金鼓(指挥作战时，用来传达进攻命令)，面无表情地问道：“我很想知道，大王为何起兵作乱？”

刘卬趴在地上，向前膝行一段，然后辩解说：“晁错掌权后，任意改变高祖定下的法令，侵夺诸侯的土地，我担心长期下去，他会毁掉汉家江山，祸乱天下，故而发兵诛杀晁错。如今听说晁错已被杀，我们就罢兵了。”

到了这一步，刘卬还嘴硬，不肯认错。

韩颓当冷笑一声，问：“大王认为晁错有错，为何不先向天子检举？在未经皇帝诏书同意，也未授予虎符的情况下，就敢对守法诸侯发动攻击，你的本意恐怕并不在晁错吧!”

刘卬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韩颓当也懒得再跟他饶舌，随手拿出诏书，朗朗读道：

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1]

当韩颓当读到“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时，刘卬明白了，皇帝特意将自己拎出来反复重申，看来断无活

路了。

韩颓当读完诏书后，说：“大王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意思已经很明了，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们帮忙？

作为王，就算死，也要有尊严地去死，决不能再忍受一番羞辱。

总算在临死时，刘卬有了一些勇气，没等韩颓当动手，就自杀了。

刘卬死后，胶西国太后、太子刘德也在绝望中自杀。

紧接着，淄川、胶东、济南、济北等诸国也被汉军收复，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皆被杀，济北王刘志由于被软禁，没有起兵，逃过一死。

至此，齐地诸国全部收复。

在叛乱诸侯中，如今只剩下北方的赵国还在垂死挣扎。

吴楚叛乱后，赵王刘遂本计划南下会师，待后来见叛军进展迟缓，匈奴外援部队又迟迟不到，便一直观望，犹豫不前。

同样是功臣之后，同样是名将之子，奉命攻赵国的郦寄实在比周亚夫差远了。当周亚夫在梁国将吴楚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之时，郦寄的伐赵之战毫无进展。

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自己能力太差。

郦寄围困邯郸整整七个月，依然久攻不下，直到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赶来支援。

栾布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经过侦察后，他断定单靠强攻很难攻下邯郸，随即改变战术，发动水攻，引河水灌入邯郸。

漫天扑来的大水彻底摧垮了赵王刘遂的抵抗意志，他绝望之下自

杀了，邯郸遂被攻破。

汉朝立国以来，首次由诸侯挑战中央的叛乱战争，至此完全被平定。

吴王刘濞为了发动这场战争，谋划了数十年，结果不过数月就被平定。他失败的原因不是缺军力，也不是缺钱和物资，而是不得人心。

大汉开国已近五十年，朝野人心思定，过安稳日子是大家普遍的心愿。为一己之私，逆潮流而行，焉能不败!

叛乱平定了，但如何善后，那些参与叛乱的诸侯国又将如何处理，考验着景帝的政治智慧，一场新的权力布局大幕即将拉开。

## 曙光降临

将参与叛乱的诸侯国全部废除，设立郡县，改由中央直辖，无疑是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但是行不通。

实行封国和郡县混合体制，是高祖建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大规模地废除，就是祖宗制度，势必会招来非议。

另外，在吴楚叛乱之际，尚有不少诸侯出于种种顾虑，没有参与。打击叛乱之后，对他们的安抚也是迫在眉睫，若一下子废除数国，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忧虑，担心朝廷下一步会削夺他们的土地。不排除狗急跳墙之下，会有人铤而走险，效法吴楚，再次发动叛乱。

刚刚平息战乱的大汉，实在经不起第二次内乱。

景帝决定三管齐下，打击谋反主谋，赦免被胁迫的无辜者，奖励有功者。

他先宣布，齐孝王刘将闾本不想反叛朝廷，只是受人胁迫，不得已才违心参与，完全不是出自本心。对他涉嫌谋反给予赦免，并让刘

将闾太子刘寿继任齐王。

宗正平陆侯刘礼身在京城，没有参与楚国叛乱，德侯之子刘通(刘濞侄子)曾陪同袁盎去吴楚军营劝降刘濞。

事实证明，这两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朝廷保持一致，敢于与反叛中央之人做斗争，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值得信赖。

景帝打算让他们继承楚、吴两国的王位。

不过，却招来窦太后的反对。

老太太传出话来，楚王刘戊犯浑，毕竟是晚辈，还说得过去，但吴王刘濞在宗室中算是老人了(按辈分，他是景帝的堂叔)，一大把年纪还起来造反，实在不能宽恕。让刘礼继承楚王，我没意见，但让刘通出任吴王，继续延续刘濞一脉的香火，老太太我绝对不答应!

老娘发话了，景帝不得不从。

窦太后别看眼瞎，但看问题很准。

她之所以不同意让刘通出任吴王，固然是对刘濞的气还没消，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像吴国这样一块肥肉，好不容易拿到手，岂能再拱手送人？必须握在自己人手中才行。

景帝第五子汝南王刘非，年方十五岁，年纪不大，却天生一身好气力，颇有勇气，吴楚作乱后，他主动请缨参战。景帝很欣赏儿子的胆识，便授予他将军印，让他随军出征。

刘非在平叛之战立下不少战功，景帝特赏赐天子旌旗，以示嘉奖。

刘通被窦太后驳回后，景帝就改吴国为江都国，封刘非为江都王。

刘非精力非常旺盛，总是想设法做点事，但作为诸侯王，能做的

事实在有限，怎么办？

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从西而来，几乎席卷了江都全境，吹倒屋舍不说，就连广陵城城墙，也被毁坏了十二丈。

也许这桩天灾给了刘非启发，此后他便一门心思研究搞土木工程，大力修建宫殿。反正吴地富庶，不差钱，由着自己性子使劲糟蹋就是了。

参与叛乱的诸王皆死，王位空了出来，景帝趁势封给自己儿子们，封皇八子刘端为胶西王、皇九子刘胜为中山王，恢复鲁国，改封皇四子淮阳王刘余为鲁王(吕后时封外孙张偃为鲁王，文帝撤鲁国)，封皇十子刘彘为胶东王。

赵王刘遂死后，朝廷下令撤销赵国，设邯郸郡，归朝廷直辖。短短一年后，于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再次恢复赵国，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

经过分封、改封等一番大动作后，大汉天下多半已掌握在景帝儿子们手中了。

同时，景帝对有功之臣进行封赏，大将军窦婴被封为魏其侯，河间王太傅卫绾出任中尉，后又封建陵侯，封直不疑为塞侯，封栾布为鄃侯。

平定吴楚之乱，要推首功，非周亚夫莫属，太尉一职本已废除，但由于周亚夫功劳太大，又恢复太尉，由周亚夫继续担任。

只是太尉这样总揽军政大权的职位交给外人，景帝终究不放心。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景帝宣布免去陶青相位，由周亚夫继任丞相，顺便废除太尉一职。

在平乱中，要论战功，无人能出韩颓当之右，只是他已加封弓高侯，已到顶了，无法再加封了。

另外，还有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就是李广。按照军功，他也该封侯，可惜李广是一个善于打仗却不懂政治之人。

吴楚叛军与汉军在昌邑城对峙之际，汉军奉命死守，不肯出战，叛军以为汉军怯战，一度气焰嚣张。李广一马当先，犹如一阵旋风冲到阵前，从万人敌阵中拔下敌人军旗，然后扬长而去。

大战之时，阵前夺敌人军旗，极大鼓舞了汉军士气，此战李广一举名扬天下。此后，世人皆知飞将军李广的大名。

梁王刘武乃一代枭雄，英雄之间总是惺惺相惜，他对李广起了惜才之心，为了笼络人心，他私下授予李广一颗将军印。

朝廷文武官员结交诸侯，乃是大忌，遇到这种事，别人唯恐惹上嫌疑，躲都来不及，李广倒好，大大咧咧接了过来。

犯这类低级错误，说明李广的政治灵敏度实在太差，他这种性格注定了只能做一个好将军，却没法成为一名军事家。性格决定命运，此言实在不虚。

李广接受梁王将军印之事，很快被朝廷得知，没治罪已是念及他的军功，格外开恩了，遑论封侯了。

或许当时李广也没当回事，认为以自己的本事，封侯是早晚之事。他哪里知道，这是他一生中离封侯最近的一次，此后再也没机会了。

循规蹈矩、才能平平的卫绾从地方调入中央，开始步步高升，直到攀上权力巅峰；英雄盖世、不拘小节的李广却被调往蛮荒之地，自此浴血奋战，夜以继日。

李广被授予一个新的职务——上谷太守。从表面上看，从骁骑都尉出任一方太守，的确是高升，但是，李广这个太守，比不得帝国腹地的太平官，实在不是个好差事。

实际上，李广与其说是高升，还不如说是被放逐。

上谷郡，下辖包括今天河北张家口、北京一带地区，郡治设在沮阳县(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处于防御匈奴入侵的最前线，一年四季都处在战争状态。

自打到任后，李广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没睡过一夜囫囵觉。

匈奴人几乎天天侵扰，李广每日不是在跟匈奴作战，就是在赶往迎击匈奴的路上。年长日久之后，已疲于应付，有些不堪重负了。

李广的处境，引起他的老上司公孙昆邪的担忧。

李广曾任陇西都尉，当时的陇西太守正是公孙昆邪。

七国之乱爆发后，公孙昆邪也曾参与平叛战争，战争结束后，调任典属国(秩二千石，负责少数民族交往事务，公孙昆邪本是胡人，由他出任，倒也合适)，封平曲侯。

以他对李广的了解，公孙昆邪知道，再这样长期下去，就算李广不死在战场，也会活活累死。眼看这样不世出的将才就要屈死，他实在不忍，便流着眼泪对景帝哭诉说：“李广此人才气，当今天下无双，加上恃才傲物，从来不服输，再与敌人这样打下去，我担心朝廷会失去这员良将。”

或许是被老泪纵横的公孙昆邪打动了，景帝同意将李广调离上谷郡，改任上郡太守。

历朝历代为抵御外患，不得不授予边关大将们军政大权，但又为了提防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皇帝时常派人到边关巡视。

负责巡视之人，必须是皇帝信任的人。为防止官员之间相互串通，皇帝往往派宦官前往。

宦官干预军事，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心的一件事。将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还不得不防止这些生理残缺的家伙们在背后放冷箭。

这些家伙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功往前冲，有过就往后躲，推诿到他人头上，导致将士们没法放开手脚，屡屡在掣肘之下吃败仗。

明朝后期，明军数十万大军，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红夷大炮，却在辽东战场上，被区区东北一隅的满洲人打得无力还手，宦官监军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在汉初之时，宦官远没有像后世唐、明之际那样，直接走进军营指手画脚，但这种苗头已经出现了。

李广在上郡任上，景帝就派三个宦官到军营来，名义上是观摩学习作战方略，宦官不待在宫中学习如何伺候皇帝及后宫嫔妃，却跑到边关来，傻子都明白他们干啥来了。

生理残疾，心理扭曲，宦官这种物种大多胆怯自私，一旦握有权力，又极度膨胀，以掩盖内心怯懦。这三个家伙一到上郡就不安分，为满足他们的表现欲，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带上几十名骑兵出塞了。

长天白云下，远处大漠孤烟，近处绿草如茵，偶有鸿雁低鸣，空旷的大漠深处，传来悠扬牧歌。神奇的塞外风光，让久居宫中的宦官们兴奋不已，他们纵马在无垠的大草原上来回驰骋，哪里听得进去身边骑兵卫士们的劝阻？

正当宦官们犹如快乐的羔羊般撒欢儿时，不远处的恶狼已经盯上了他们。

匈奴人看出来了，汉军骑士们簇拥的这三位不是一般人。他们觉得发财机会来了。

他们悄悄靠上前来，将弓对准了宦官周围的骑士们。

等骑士们察觉时，为时已晚，匈奴人的箭法非常精准，根本来不及躲闪，数十人纷纷中箭落马。

宦官们也中箭受伤，在骑士们的拼死掩护下才捡了一条命，逃了

回来。

惊慌失色的宦官们，向李广讲述了他们的遭遇，李广听后当即断言：“你们肯定是遇到了匈奴人的射雕手!”

雕是草原上的猛禽，它目光敏锐，快如闪电，飞翔于高天之上，一旦发现猎物，就从高空中俯冲下来，鲜有猎物能从它的利爪之下逃脱。雕，不但是捕猎高手，而且非常狡黠，它在天空飞翔时，常背向太阳，利用耀眼的阳光隐蔽自己，一般人很难射中它。

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无论长幼，人人善射，但能够射中雕者，却屈指可数。因此，射雕手是匈奴人对超级神箭手的称呼。

真正的勇士都喜欢与高手过招，李广就是这样喜欢挑战和冒险的英雄。他当下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根据宦官们的描述，那三个匈奴人没有骑马，料想不会走得太远。

追了数十里路程，李广远远就看见了他们。

像这样的宝贝，一下子全部偷袭杀掉，实在可惜。李广示意手下骑兵分开，两路包抄，他亲手射杀了两个，然后活捉了一个。经过一番盘讯，不出所料，他们果然是神雕手!

李广下令将他捆绑起来，驮在马背上，正准备往回走，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妙，远处有一支匈奴骑兵，看上去有数千人。

匈奴人也看到了李广一行。

大漠旷野，乍然遭遇，对彼此的底细都不大了解，一时间谁也不敢轻易动手。

汉军中有人开始有点慌乱了，提议说，敌我实力悬殊，还等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跑吧!

李广马上喝止了他，低声说：“此去大军驻地，少说也有几十里路，你以为我们能跑得脱吗？我敢断定，只要我们一乱阵脚，必会沦

为匈奴人的箭靶，无一人能幸免!”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随从问他。

“大家保持镇静，只要我们阵形不变，匈奴人一定会误认为我们是汉军大军的诱饵，他们担心中埋伏，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现在听我命令，一起面向匈奴，前进!”李广处乱不惊，从容指挥。

部下们一听吃惊非小，但军令难违，只得硬着头皮，向匈奴方向迎了上去，慢慢行走至距离匈奴约两里路的地方，李广才下令停下来。

汉军的反常举止，令匈奴人迷惑不解，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汉军竟然纷纷卸下马鞍，原地休息。

汉军松松垮垮，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匈奴人开始怀疑，眼前这伙人肯定是派来诱敌的，说不定不远处的沙丘背后就埋伏着汉军大部队。他们愈加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时的汉军骑士们，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小声问李广：“太守，敌多我寡，双方离得又这么近，万一敌人发现我们是虚张声势怎么办？”

李广自信满满地说：“你就放心吧，越是表现得轻松自在，匈奴人越不敢靠近。我们把马鞍子都放地上了，他们会更加认为我们是诱敌之兵，不会轻举妄动。”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双方的内心都在煎熬。

不一会儿，匈奴开始有些焦躁了，队伍中躁动起来，有些人跃跃欲试，有个骑白马的将领为防止有人按捺不住冲出去，走出了阵列，想设法稳住阵脚。

李广突然上马，号召十几个骑士，呼啸着冲向了匈奴军队，张弓挽弩，利箭一齐射向白马将军。匈奴人没料到李广会杀过来，白马将

军中箭落马。

射杀匈奴将军后，李广与部下又如旋风般返回原地，下马歇鞍后，干脆躺在地上休息。

眼看李广如此有恃无恐，匈奴人越发坚信，眼前这支汉军小分队就是在故意挑衅，引诱他们上钩，于是更加不敢出动了。

不知不觉，已是暮色苍茫，夜幕降临草原，双方依然在对峙。待到后半夜，匈奴人担心汉军会趁着夜色发动偷袭，便提前撤走了。

倒是李广，一直待到天明，才大摇大摆返回了驻地。

大营内的将士们想接应，又不知太守去向，一夜不见李广，正焦急万分，忽然看见他安然无恙回来，顿时欢喜无比。

李广就是这样喜欢剑走偏锋，出险招，匈奴人闻其大名，无不头痛不已。在以后的岁月里，李广辗转于大汉北疆沿边各郡，先后出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地太守，过人的勇气胆识，使他名扬天下。

正当李广在边境屡挫匈奴之时，汉廷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和亲。

塞上秋月照铁衣，未央宫中理红妆。

摆平了内部叛乱，景帝现在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趁着汉匈双方斗争中，汉军暂时没吃过大亏，他决定继续和亲，给大汉争取一个休养生息的空窗期。

败了战争和亲，跟赢了战争和亲，那是截然不同。

如今和亲，不是向匈奴乞和，而是表明大汉追求和平的诚意。

在这以前，汉与匈奴多次和亲，但远嫁的要么是宫女，要么是宗室翁主，匈奴人常以大汉嫁过来的是假公主为由，在和亲不久之后就屡屡毁约，侵扰汉朝边境。

为避免战火，景帝狠下心，决定此次选一位真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以示诚意。

堂堂大汉王朝，依靠女人去换取和平，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和流血，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毕竟死的人已经够多了，流的血也够多了。

等着吧，终有一天，今日蒙受的耻辱，必然用鲜血来洗刷。

随着内忧外患的渐渐平息，立储之事也被提上日程。

以前，为了利诱梁王刘武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力，景帝在立储之事上刻意保持模糊，现在七国之乱平定了，就没必要考虑那么多了。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夏天，景帝宣布，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经过多年的努力，大汉终于迎来平静岁月。一轮红日从东方徐徐升起，金色的朝霞洒满长安城，巍峨的未央宫阙沐浴在晨曦的宁谧之中。

[1] 诏书见《史记·吴王濞列传》。——编者注

# 读客传记火爆畅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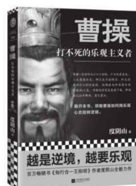
**《知行合一王阳明》大全集**

百万畅销书！通俗讲解王阳明
及其心学思想的经典全集！




**《曹操：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越是逆境，越要乐观！




**《秦始皇：创造力一统天下》**

领略秦始皇如何用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一统天下！




**《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比智慧更强大的是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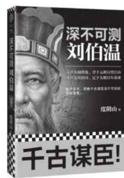

**《李世民：从玄武门到天下长安》**

层层解读玄武门风云突变的疑点细节，
条条理析李世民名垂千古的曲折历程，
领略千古一帝先发制人的决断和心怀天下的胸襟。




**《深不可测：刘伯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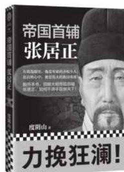
乱世攻城略地，拿下元朝万里江山；
盛世安邦治国，定下大明百年基业。
翻开本书，领略刘伯温深不可测的谋略智慧！



# 读客传记火爆畅销！

**《帝国首辅：张居正》**

在政敌眼里，他是卑鄙的弄权小人；
在百姓心中，他是伟大的救国英雄！
翻开本书，领略张居正如何不择手段救天下！




**《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坚持笨拙，不走捷径！




**《成吉思汗：比武力更强大的是凝聚力》**

军事征服只是头一步，
将欧亚大陆的不同人凝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一步！




**《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不杀人就会被人杀，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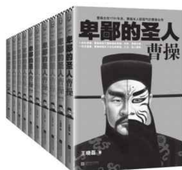

**《曾国藩系列经典套装》**

政商追阅！“曾国藩研究代表人物”
唐浩明经典畅销之作！




**《卑鄙的圣人曹操（珍藏版）》**

一件件讲透，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奸诈、狠毒计谋；
一页页浸透，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仁义、圣人情怀。






激发个人成长

多年以来，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

读客图书以“激发个人成长”为使命，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

**1**.精神成长

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勇气和爱的人!

**2**.知识结构成长

熊猫君家的历史类、社科类图书，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文明演变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长

熊猫君家的经管类、家教类图书，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减少人生中的烦恼。

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精彩绝伦，充满无穷阅读乐趣!

认准读客熊猫

读客所有图书，在书脊、腰封、封底和前勒口都有“读客熊猫”标志。

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

1. 找读客熊猫君




2. 找黑白格子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兴亡四百年. 2 / 李金海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4
ISBN 978-7-5594-4711-1

Ⅰ. ①大… Ⅱ. ①李… Ⅲ. ①中国历史－汉代 Ⅳ. ①K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050948号

# 大汉兴亡四百年. 2

李金海 著

| | |
|---|---|
| 责任编辑 | 丁小卉 |
| 特约编辑 | 王彬彬　石祎睿　乔佳晨 |
| 封面设计 | 陈　晨 |
| 责任印制 | 刘　巍 |
| 出版发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 × 1000 毫米 1/16 |
| 印　张 | 22 |
| 字　数 | 336 千字 |
| 版　次 |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594-4711-1 |
| 定　价 | 54.90 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